

#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 编  
广州市教育学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出版说明

六十年前，广州的青年学生响应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举行了4次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大游行，掀起了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对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醒以及对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均起了重大作用。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一二九运动在广州》一书。

本书分为综述、回忆录、人物传记、历史资料、大事记等5个部分，选收文章30多篇，历史资料50多件，共25万字。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曾直接领导和参加当年爱国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以“留得正气在人间”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不顾年高体弱，或躬身亲往档案馆、图书馆查阅资料，或邀集当年战友座谈回忆、核实、印证史料，再三推敲，几经易稿，撰写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回忆录。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借此谨致以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胡提春、刘智莹、林镜华、黄穗生编辑，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 序 言

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它为全国抗战准备了思想，准备了人才，准备了干部，是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运动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新的里程碑。广州解放初期，我曾在中共华南分局负责青年工作，叶剑英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州的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等党领导下的秘密青年组织，在发动群众，带领群众投身抗日救亡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华南党组织的重建做了组织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成长起来的学生骨干，在解放后担任厅局级以上干部的有100多人。因此，叶剑英同志认为“一二九”运动在广州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现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单位编辑出版《一二九运动在广州》一书，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载下来，以总结过去，激励后人，让人们从中了解我们那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是怎样从爱国主义者，逐步接受党的教育，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而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广州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中共组织屡遭破坏，至1933年停止了组织活动。但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州的青年学生迅速奋起响应，一个月之内举行了3次有数千人参加的抗日示威游行，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谁领导的？这一直是广州的党史学界在努力探

讨的问题。《一二九运动在广州》一书反映了当年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广州青年投身“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在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青年运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健康地发展，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是“一二九”运动给予我们的启示。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最基本的一点。

“一二九”运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年，广州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点燃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青年学生也在工作中得到锻炼，促进了与工农相结合。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工农群众是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对实际生活的理解，对生产实践的认识比青年学生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因此，我们这一代青年更应加强与工农相结合，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一书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党的政策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历史上国民党军政要人很多，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工作中更应尽可能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二九”运动期间，北平曾出现学生抬尸游行的过“左”行动，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及时予以纠正；广州青年学生亦曾有过激的行动，何思敬教授为此作过深刻的检讨。广东党组织重建之后，尤其是张文彬同志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后，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国民党上层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建立各种形



式的公开或半公开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使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涨时期。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各界青年，团结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青年与侨胞，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州是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把它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当前全市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宏图大略，抓好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提高人的素质十分重要。中共中央最近批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在很多青年人对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对老一辈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情况不了解，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多做宣传教育工作。《一二九运动在广州》的编辑出版，为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从资料征集到编辑出版历时近10年，编辑这一本书的几位顾问都是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杨康华同志亲自撰写回忆录，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核实、印证历史情况，到图书馆、档案馆复印历史资料，组织有关老同志撰写文章，其积极认真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令人感动。可惜的是，温焯华，杨康华同志因病已先后去世，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在《一二九运动在广州》即将出版之际，谨此对两位老战友表示深切的悼念！

黄焕秋

1994年10月

## 目 录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 刘智莹 黄穗生 (1)

### 回忆录

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 曾 生 (22)

“一二·九”前后在广州勸勤大学参加学生  
运动的回顾…………… 邹 峯 (51)

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  
…… 刘汝深、温焯华、温盛湘、谭丕桓、叶焜寰 (59)

“一二·九”前后广雅学生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的片断回忆…………… 莫福枝 (71)

“一二·九”运动前后大中中学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  
…………… 董世扬 (78)

回忆女师“一二·九”前后学生救亡运动的情况  
…………… 梁 绮 (85)

市立第二中学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的情况  
…………… 梁锦文 (91)

在广东纺织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岁月追忆…… 钟 华 (97)

关于珠光里事件的回忆…………… 阮群英 (104)

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新篇章  
——纪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 黄煥秋 (108)

我所知道的中国青年同盟…………… 温焯华 (123)

三十年代突进社的组织 and 活动情况

- ..... 张直心 杜埃 刘天行 黄焕秋 (135)
- 追忆马列主义行动团 ..... 杨康华 (146)
-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与广州学生运动片断回忆  
..... 方少逸 (171)
- 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点滴回忆 ..... 梁嘉 (183)
- 广州反帝反封建大同盟片断 ..... 王文魁 (185)
- 回忆社会主义青年行动团 ..... 李康寿 (188)
- 行社读书会与广雅中学学生运动 ..... 李文浩 (192)
- 我所知道的力社 ..... 杨康华 (199)
- 回忆“一二·九”运动前后广州建党活动经过  
..... 王均予 (202)
- 抗战爆发前勤勤大学党组织概况..... 李木子 (锦波) (212)
- 三十年代广州学运及地下党斗争情况片断 ... 李士洋 (217)
- 在省立女子中学参加中共组织前后情况回忆  
..... 余慧 (223)
- 回忆教忠中学党支部的建立及活动情况  
..... 王磊 张江明 袁鸿飞  
方学林 榆 陈坤仪 (229)

## 人 物 传 记

- 冯道先传略 ..... 黄穗生 (251)
- 邱萃藻传略 ..... 温盛湘 (256)
- 钱兴传略 ..... 裨倩红 (265)

## 历 史 资 料

- 悲壮的民族叙事诗 ..... 何思敬 (271)

|                            |          |       |
|----------------------------|----------|-------|
| 荔湾惨案发生的前前后后 .....          | 穗 芒      | (275) |
| 广州学生的怒潮 .....              | 怒 潮      | (284) |
| 论革命策源地的学生运动 .....          | 杨益清      | (289) |
| 我在广州国立中大时 .....            | 邓初民      | (293) |
| 各报有关广州学生运动的报道选辑 .....      | 黄穗生      | (298) |
| “一二·九”前后广州学生运动大事记<br>..... | 广州青运史研究室 | (334) |

##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

刘智莹 黄穗生

1935年12月9日，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进迫，华北面临河山变色，平津行将易帜的万分危急关头，北平爱国学生3000多人冒着北国零下20多度严寒，手挽着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封锁，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从此爆发。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征途中，“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刘少奇也曾对“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

“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广州青年学生迅速起来响应，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从此，抗日救亡运动有如燎原之火蔓延广东各地，势不可挡，广东人民的抗日斗争翻开了新一页。

## (一)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青年学生有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大革命的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广州起义壮烈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九·一八”后的反日斗争及左翼文化运动，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进分子前赴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3年中共广州地方组织遭受破坏后，广州的青年先进分子在何思敬、温盛刚、陈黄光、连贯、陈勉恕、梅龚彬、王均予等共产党员的指导下，分别组成各种左翼秘密组织。1935年7月前后，在中山大学、勸勤大学和其他一些大、中学校里，先后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同盟”、“马列主义行动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勇进社”等秘密团体以及秘密读书会。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大都是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救国工作的。他们同心相应，汇成学生群众中的进步力量，在青年运动中起着支柱的作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又进兵淞沪，攻占承德，而蒋介石死搂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围剿”红军，镇压抗日运动，迫害爱国人士，失尽民心。1935年，蒋介石适应敌人“华北特殊化”的要求，签订何梅协定，使我国在冀察的主权大部丧失。在国命民脉危如垒卵，寇深祸急国亡无日之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武装斗

争一向受到崇敬，红军粉碎“围剿”，长征抵达西北抗日前沿阵地，给人们以巨大鼓舞。我党一贯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八一宣言》的发表，更加深得人心。中山大学进步教师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和谭希履等，在授课、讲演和撰文中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进步书刊、文化作品、电影、戏剧等等的影晌，使青年学生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日益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群众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抗日救国运动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广州是华南的政治中心，粤桂两个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存在较深的矛盾，他们同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结成“西南政务委员会”，标榜“抗日”，以维护其对南京政府半独立的局面。香港是一个特殊地区，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进行活动，其中李济深、陈铭枢在闽变失败后，牵头组成“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张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该盟的许多实际工作，是由共产党员梅龚彬、宣侠父等操办，其机关报《大众日报》及《民族阵线》，发表反蒋抗日文章，转载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对学生群众也有一定的影响。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等主编的《新宇宙》期刊，经常登载宣传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的文章。1935年秋，在“太平洋问题专号”上，刊登了何思敬联同中大近百名教授签名“反对中日亲善”的通电，指出：“强权压迫之下，而与之言合作，非投降而何？”“我国人……应速奋起，以救国家之危亡。”11月下旬，何思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又在《新宇宙》及《中山大学日报》上发表了《悲壮的民族叙事诗》的“序曲——抗战之号召”，呼吁：“这是千钧一发的危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武装起来，抗战起来，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肃清

一切奸诈，冲破一切障碍”，“乾坤再造”，“整个国民，全体同胞，一齐参加神圣的抗战，共同创造历史的前站！最后的胜利是必定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这些用心与血写成的诗句，字字铿锵，激动人心，气吞山河，震撼南天，不啻为中山大学学生员工奋起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在进步教授带动下，中大全体教职工于12月4日致电正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指出“华北濒危，怒皆裂肤”，应“迅下决心，鞭策中央”，“义无反顾，应速挥御侮之师，以雪失地之辱”。这些呼吁抗战救国的言论和通电，激励着群众起来抗日救亡。

## (二)

北平学生12月9日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的消息传到广州，立即在广大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山爆发，溶岩迅速喷溢和燃烧。左翼组织和爱国者纷纷行动起来。中山大学研究院同学会随即发电全国声援，各学院和附属学校许多班级学生举行集会，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开展抗日活动。何思敬同秘密组织主要成员分别交谈，以中大为基地，把整个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起来。11日夜间，全校班代表举行会议，决定翌日召开全校大会，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广东当局眼看运动就要爆发，抢先部署中大“抗声社”（陈济棠的“文胆”，民政厅长林翼中所组织的御用团体）抢夺大会主席团席位，操纵大会，使运动不致扩大。12日上午，在中山大学的全校大会上，“抗声社”按照预谋窃据了大会主



席团大多数席位。由于全体同学员工的抗日情绪高昂，还是冲破障碍，做出了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电请中央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等多项重要决议，并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公推农学院教授张农为总领队。下午一时，由张农率领全体学生和部分教职工共 2000 多人列队从石牌步行进入市区，同医学院及附中、附小 1000 多同学汇合，教忠、大中和女师学校的部分同学也参加进来。4000 人的队伍象一股洪流涌进中心。以“国立中山大学抗日示威大游行”的门旗为前导，同学们手持标语小旗，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歌曲，口号声直冲霄汉。

13 日上午，中大本部和附中学生 3000 多人再次举行大会，热烈讨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决定停课一周到校外扩大宣传，联络市内各校扩大示威运动，成立中大员生抗日会筹委会等。“抗声社”阻拦乏术。抗筹会又决定 16 日召开全校员生工友大会，讨论全校抗日救国会之组成及工作。15 日，中大教职员约 500 人在旧校大礼堂开救国会，决议：讨论制定战时教育工作计划；推举代表联络广州市教育界一致抗日；通电全国一致抗日救国。在此前后，市内一批学校师生也纷纷行动起来。广东法科学院、勤勤大学教育学院和商学院、国民大学均举行员生抗日大会，通电声援北平爱国行动。岭南大学全体华籍教职工亦通电讨伐汉奸殷汝耕。培正、女师、广雅等中学也分别发了通电。许多学校成立了员生抗日救国会。

轰轰烈烈的广州学生抗日运动使日驻穗领事大为震惊，他们马上向陈济棠提出“抗议”，要求“严厉取缔”，企图施加压力迫使广东当局扑灭爱国烈火。

广东当局也慌了手脚，虽然他们多年来标榜“抗日反蒋”，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抗衡蒋介石南京政府，保持西南实力，

利用人民抗日热情，以遏制蒋氏并吞异己的企图，增强其半独立王国的地位。一旦群众的爱国运动发展起来，他们就要阻挠和压制，暴露出其反人民、害怕群众爱国运动的阶级本性。中大学生举行抗日大巡行之后，当局即通过御用的“市学联”连续召开会议，提议搞中日问题和防空问题研究会，致函各校征求“救国方案”，提出指派学生赴京请愿（后来变成“晋京聆训”）等。“市学联”还发出致全国同学通电，要学生“认真重视知识道德体格的切实训练，并以沉着苦干精神，效忠党国”。这实质上是要求广大学生关在校内，不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市学联”会议排斥中山大学参加，甚至不让中大抗筹会代表出席报告示威游行经过及提出抗日工作意见。陈济棠还亲自出马，一再找中大教务长肖冠英和张农“查询”，要防止学生“过激”、“影响外交”，“荒废学业”，并派员到石牌找师生代表作“指示”。教育厅长黄麟书亲自召集其他大、中学校校长开会，施加压力，不让中大到各校联络。中大校内“抗声社”又把持抗筹会与主席团，包而不办。广大爱国学生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要继续向前推进，必须突破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更为壮烈的抗日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大城市响应迅猛发展。同日，中大再次召开抗日大会，几百名教工和学生共3000多人参加。抗筹委在报告工作中谈到被拒绝出席“市学联”会议，以及当局召集谈话作“指示”等情况，同学们对此十分气愤。邓初民及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抗日工作的长期性，希望大家保持沉着，把抗日精神及力量扩大，要拥护西南当局抗日主张，凡抗日者均应拥护，运动中会有牺牲，抗日工作要顾及环境，应有计划、沉着地应战。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法学院系主任

任启珊也报告了本校教职员抗日救国大会情况。随着，大会讨论决定：电慰与声援北平同学“一二·一六”示威游行；通过抗日救国会章程；扩大宣传，联络市内各校同学举行总示威运动；请本校教授定时作抗日救国讲演；出版抗日日刊等等。会后，组织百多个宣传队到市内宣传，并推举霍赐影、钟远蕃、虞焕章、赵君哲、翔万禾5人负责，组织5个特别宣传队，联络市内各校，努力争取爱国同学和教工的支持，同当局遏制行为作斗争。学校教职员抗日救国大会主席团也于17、19两日举行会议，致电全国表明：“国难至此”“举国上下应一致奋起，以抗暴日而救危亡”，“督促政府派兵，诛锄汉奸”，“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作殊死之抗战”。22日在旧校大钟楼，召开本市各大学教职员代表座谈会，决定发表三个电文：（一）致电北平同人同学，慰勉继续奋斗；（二）致电南京政府勿压迫爱国运动，开放言论自由；实行对日抗战；（三）通电全国，望所有职业团体大联合，人民应有作战的自动准备，共促政府抗战。这些电文给同学和教育界以鼓舞，左翼和爱国者均表拥护。

随着抗日运动的发展，中大各左翼组织认识到，必须从组织上取得抗筹会和主席团的领导权，才能把广州和广东的抗日运动继续向前推进。何思敬、邓初民和陈汝棠（老同盟会员，“力社”主持人，同一些学校进步学生有联系）商议办法，并分别指导各左翼组织的负责人和左翼学生要密切配合，形成运动的中坚与核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邹鲁派要稳住，既斗争又团结；对林翼中派要孤立，要利用邹、林间的矛盾；对“抗声社”成员要区别对待，对阻挠抗日运动者要揭露，并把其从主席团中请出去，可联同抗日者则应争取合作。左翼组织统一了认识，积极展开工作，使爱国力量

汇集起来，在斗争中取得相对优势。

12月30日，中大全体学生员工抗日大会在石牌大礼堂再次召开。会上，同学们严厉斥责“抗声社”把持抗日机构，“包而不办”的怠工行为，决议改造临时主席团，重新选出文学院曾振声（曾生）、农学院李康寿、法学院钟远蕃、理学院张凤楼、工学院张万久、附中陈柏昌等同学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决议：（一）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二）以大会主席团为筹备委员，组织中大抗日救国会，领导中大的爱国运动；（三）联络全市学生，于次日举行抗日大游行。

12月31日，中大学生联合市内学校举行第二次抗日游行。当局得悉，省教育厅立即下令全市学校停课，封锁校门，不准学生进出。只有事先联系上的学校，如中大附中、庚戌、执信、禺山、女师、知用、圣三一等校小部分同学冲破阻挠沿途参加到队伍中来，总数约达5000人。游行队伍首先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推出代表谒见党务委员，要求：（一）请政府准许学生及民众抗日救国集会、行动、言论、出版之自由。（二）请“政委会”宣布对日外交态度。“政委会”如临大敌，紧闭铁门，警戒森严，代表进去只见到一个秘书来敷衍应付。同学们站了个多钟头未得结果，怒吼起来：“我们走！向民众请愿去！”大众转向市中心示威游行，沿途散发《告同胞书》和《告全市同学书》，呼吁联合起来抗日救国。游行队伍一边行进，一边高呼口号。队伍整肃，气势雄壮，路人瞩目，热烈鼓掌。

当中大学生积极进行成立全校抗日救国会，并联络各校筹组全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取代当局御用的“市学联”时，邹鲁便亲自出马，公布定于新年1月6日召集全校

师生大会作“训话”，企图以校长身份“领导”抗日。各左翼组织决定顺水推舟，把邹鲁的“训话”大会转变为全校员生工友抗日大会。

1月6日下午2时大会开始，石碑大礼堂里里外外挤满人群，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邹鲁登台先讲赴京交涉中大经费的情况，随后说，中大是抗日的，他本人是抗日的，今天要把中大抗日会组织起来，使中大成为抗日大本营。这番话博得了全场的掌声。接着，他要大家起立，一齐随他举手宣誓抗日。然后，话锋一转，说这次晋京是“催促蒋先生抗日”，并说“蒋先生是在准备抗日的”。邹长期标榜“反蒋抗日”，常骂“蒋贼”，现在一回来就改口美化蒋介石“准备抗日”，理所当然引起了会场上师生员工的不满。但邹不顾台下已经开始发生的骚动，继续板起脸来指责学生的抗日行动“过火”，话音未完，同学哗然，群情鼎沸，一致发出了不含敬意的嘘声，使他不能继续讲下去。几个院长和教授相继上台帮腔，讲不到三、五句，话不中听，即被愤怒的吼声轰了下来，会场秩序已不能维持。邹鲁见状宣布散会。大家不走，要求举行抗日大会。在这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进步教授邓初民毅然登台，同学们掌声雷动历几分钟。邓大声说：“同学们，请允许我向你们发出诺言，如果同学们因抗日救国流血，那我一定和亲爱的同学们血流在一起。”鲜明的立场和热情的话语给同学们极大鼓舞，全场再报以热烈的掌声，高喊请邓先生讲下去。他语重心长地说，“抗日救国是四亿五千万同胞共同的大事，全国人民应不分党派、种族、不分阶级、阶层，不分男女老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同学们刚才的举动，对校长、院长和教授是一种侮辱，是违反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现在谁不抗日，谁就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就要打倒。谁抗日，

谁就是人民的朋友，我们就要拥护。校长、院长和教授们是主张抗日的，我们要拥护；如果什么时候不抗日了，我们就在什么时候把他打倒。”邓这一席话扭转了会场局面，邹鲁也平静了下来。邓最后说，今天开会的任务，是把全校抗日救国会组织起来，组织不起来就不散会。全场掌声不绝。在同学们一致要求下，中大抗筹会临时主席团成员曾振声走上主席台，宣布全校师生工友抗日大会开始。“抗声社”人物抢先提出，要邹鲁公布学校收支由大会审核，想借以转移视线，破坏大会进行。主席团马上表明今天只议论抗日救国大事。大会通过决议：（一）即日成立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领导全校抗日运动。（二）定1月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三）由学校在学生保证金项下拨出3000元作抗救会经费。在议论抗救会执行委员人数及名额分配办法时，邹鲁走到台前推开曾振声，提出以职员和学生各占半数加上校长为当然委员的主张，并接着说“无异议，通过了”，企图以此达到控制抗日运动的目的。同学们对此甚为愤慨，高叫“反对包办抗日”，“反对压制群众”。经过斗争，大会终于通过决议：各学院、附校、教职员均作一个单位，每单位选5人，校长为当然委员。邹鲁愤然拍案大骂“亡国学生”，也无可奈何。这样，在执委会中进步力量就占了相对优势，教职员5人也有肖隽英、黄桔桐、任启珊等进步教授，在同学中也团结了各派力量，包括“抗声社”人物在内。

按照大会决定，1月9日全市学生再次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并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省教育厅慌了手脚，急忙下令各校“放假”，驱散学生，封锁校门。由于爱国学生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当中大及附中4000多人进入市区时，广雅中学全校1000多学生冲出校门赶来汇合。广雅、

执信、庚戌、市三中、仲元、教忠、省女中、女师、知用、禺山、大中及市职等校都组织了或大或小的队伍，先后冲破阻挠参加游行。示威游行学生达1万多人。中大学生百多个宣传小队沿途宣传，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工人参加游行，约3万人在长堤新填地广场举行广州市民抗日救国大会。曾振声当大会主席。大会决议：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全国支持救亡运动，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南京政府卖国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出兵收复失地。这是参加校数和人数最多的一次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大队伍游行到西门散队，部分继续东行的同学激于义愤，前往教育厅要找厅长黄麟书质问。教育厅官员闻讯走避一空，大门紧闭。同学们极为愤怒，有人高喊：“冲进去！”人们一涌而上，捣毁了教育厅的门窗玻璃和一些办公用品，中大附中学生还拆下和抬走了教育厅的招牌，这是当局遏制运动所迫出来的。同学们出于爱国激情而发生的这一行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毕竟授人以柄，被反动当局公开镇压以借口。

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及大游行，进一步推进了市内各校的爱国运动，许多学校纷纷要求成立“抗日救国会”，以取代那些有名无实的“自治会”和“救国会”并酝酿着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当局赶忙宣布各校停课，提前放寒假让学生回乡，以消煞广州抗日救国的气氛。中大和一些学校同学，抓住这个时机组织抗日宣传队，分赴省内外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救亡火种很快在广东各地燃烧起来。中大抗救会的宣传品还传到桂、湘、赣、闽、滇，促进了这些省区爱国运动的高涨。

广雅中学校长霍广河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并任省参议会副议长，曾夸口他的“王国（广雅）很安静”，

“不象中大乱哄哄”。其实，广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爱国学生对国家危亡早就坐立不安，正在酝酿抗日救国的行动。校内先进分子莫福枝、魏南金等同左翼团体有联系，还有“行社”和秘密读书小组，团结着一批同学。“一二·九”爆发后就已议论纷纷，霍广河的谬论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怒。1月9日，全体同学1000多人冲出校门列队参加了游行。第二天一早，传说警察准备来抓人，校内马上召集全体同学举行抗日大会，并用电话告知中大抗救会。中大在校同学由纠察队长冯道先率队前往支援，并抓获警察局派来搞破坏的两名侦缉。其后，大批警察赶来，封锁了广雅通往外面的桥头路口。广雅班代表研究，要求学校发还同学伙食结余作为下乡宣传费用。霍为缓和局势被迫同意。同学们遂组成宣传队下乡。广州爱国学生这一回合的斗争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市二中是个女子中学，向受束缚。校学生会中进步分子梁锦文、莫兰心等在陈汝棠指导下组织了秘密读书会，团结同学酝酿于1月11日举行大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准备组织示威游行。校当局锁住校门，切断校外联系，走读生也不能入校和寄宿生会面。陈汝棠在10日晚上通知中大学生，由抗救会组织力量，先后开了四部校车前往支援。11日晨里应外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成立市二中学生抗日救国会。

爱国运动一浪推一浪，在广州城西一带的国民大学和勤勤大学工学院，联系了附近学校，准备联合示威大游行。国民党对学生运动有如燎原烈火又恨又怕，咬牙切齿，陈济棠命警察局与市党部会商，密谋镇压。

1月13日，荔枝湾附近的广东国民大学联络市二中、坤维、培英及岭大分校学生为一路，西村的勤勤大学工学院为另一路，分头出发，准备到财厅前同市中心的一些学校队伍



汇合，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中大抗救会应国民大学之邀，发动了留校同学几十人，由冯道先带领赶往汇合。民大召开抗日大会，公推唐凌鹰等为主席团，率领队伍出发。成千人的游行队伍刚到荔湾桥头，就遭到广东当局血腥镇压。警察局侦缉和雇佣的黑社会打手近百人，扛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旗子，插进学生队伍，铁尺木棍齐飞，杂以枪声卜卜，对赤手空拳的学生大打出手。同学们边抵抗边走避，几十人负伤，血洒荔湾桥头。冯道先和华侨学生吴近保等4人当场被绑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荔枝湾惨案”。勤勤大学工学院队伍行至西华路口也遭袭击而折回。市内几间学校的小队伍闻讯分散隐蔽。广州学生第四次抗日游行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惨案发行后，陈济棠立即宣布全市戒严，诡称学生同“锄奸团”发生“冲突”以骗社会，并污蔑爱国学生受人“挟持利用”，“荒废学业”，“越出常规”，“扰乱治安”等等，封锁交通要道，到处搜捕积极抗日救亡的师生，并发出“通缉令”。中大学生翔万禾、粟稔、张凤楼、李驹良、朱文畅、梁荣生（梁嘉）、雷瑞英、李康寿等许多人先后被捕。曾振声、钱兴、罗宗煌等被通缉，走避他方。何思敬、邓初民住家接连遭搜查，被迫连夜出走。陈济棠还以“西南政务委员会”训令：派员组织救国义勇队及救国看护队严加训练各校学生；“即派宪兵司令兼总队长，以中大为总队部及第一大队部，省立广雅中学为第二大队部，市立第二中学为第三队部”，同时派兵进驻学校，并在中大、广雅等校以“不准注册”等方式，把一些学生抗日运动骨干开除出校。整个广州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 (三)

抗日救亡，爱国青年学生人同此心。广州“一二·一二”游行对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南粤各地城镇先后作出回应。12月中下旬，省内一些地区的中小学校师生就按捺不住了。12月13日，顺德大良镇的省立工农学校、顺德中学及县立第一小学等中小学校千多人举行集会，并联合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呼唤民众齐心团结救国。12月16日，东莞中学400多名师生在莞城示威游行，下旬，又再次集会，并联合外校行动。12月18日，揭阳县中、女中、简师、第一高小等校及妇女补习学校学生和职员共数千人举行救国运动大会，会后示威游行。12月23日，揭阳、澄海两县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12月24日，汕头市各校学生召开抗日大会。25日，潮阳县各校学生罢课3天，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在这段时间内，中山县中和中山纪念中学等校也举行集会游行，讲演宣传，扩大到各区镇学校。12月27日，阳江中学师生召开抗日大会。北海、合浦一中以及小学和夜校师生在这期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1936年1月上旬，中山大学抗救会决定：组成200个下乡宣传队出发各市县，联同当地学校扩大救国宣传。在此前后，勤勤大学、中大附中和广雅中学等都派宣传队下乡。这对于联合当地学校师生，扩大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宣传队先后到了惠阳、博罗，谒见军政当局，在街头作救国宣传，演出爱国戏剧，群众很受感动。中大两个宣传队30多人抵达惠州，即分头到学校讲演，并同惠州中学、县一中，女

师等校共千多人联合示威游行，举行全县学生联合会抗日大会，决定组织惠阳县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大宣传队到达北海，支援当地学校，冲破校内训育主任的阻力，联合合浦县城廉州中学等一致行动，筹备成立合浦全县学生救国联合会，取得了部分教师的赞助，学校当局也被迫同意短期停课，组织宣传队下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中大 8 个宣传队百多人抵达汕头，商定 4 个队开赴嘉属梅县、大埔、蕉岭等县，其余分别在汕头、潮安、揭阳、普宁、澄海各地。其时，荔湾惨案已经发生，省教育厅急电命令中等学校即日提前放假。当晚，汕头各校学生会代表同中大宣传队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因要避开警探追踪破坏，会议四易其地，决定于翌日上午在汕头举行全市学生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1 月 14 日晨，中大宣传队员分赴各校协同集合学生出发，以汕头市一中为前导，聿怀、大中继之，行进中有海师、省商、现代、角光、同济、民强等校相继加入，队伍约达 1800 人，当游行到中山路时，全体进入中山公园，在浩然亭前举行学生抗日救国大会，主要决议：（一）组织汕头全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各校当场选定代表，立即宣誓就职，表示“誓以至诚遵奉总理遗训，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停止”；（二）致函女中、友联两校当局，责以不应阻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三）汕头市学生抗救总会如受任何方面之压迫，应电广州学生抗日救国会取得救助，等等。学生爱国烈火，鼓舞了汕头市民众。日本领事竟然提出抗议，当地警探奉命到各校勒令学生返家，有些学校还剪去电线迫使学生离校。潮安、潮阳等县学校均因奉命提前放假。宣传队原拟发动抗日游行，无法实现，只能作些联络活动，在各地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举行讲演会。在嘉属之大埔县，宣

传队通过小学校长饶彰风，联同当地学校、书店、文化社团等举行抗日大会示威游行，促进救亡运动的发展。

中大宣传队 40 多人抵粤北的曲江、南雄时，即受到广东北江区绥靖公署限制，无法开展活动，返回广州。有些地方的宣传队被“礼送”或着人“陪同”迫返广州。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州学生火红斗争的一个月，特别是下乡宣传队的活动，对影响和推动全省学生爱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 (四)

从“一二·一二”到“一·一三”，经过一个月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战斗洗礼，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广州爱国学生普遍地发动起来，他们继续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更沉着、坚定地战斗下去。

荔枝湾惨案后，何思敬被迫离穗抵香港，即在《大众日报》上揭露广东国民党当局迫害爱国师生的事实，并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曾振声报告广州抗日救亡运动及爱国师生遭受迫害的情况。与此同时，广州爱国学生通过各种社会力量营救被捕同学。2月15日，中大385名学生联名上书邹鲁，要求邹鲁向省会公安局查明冯道先失踪下落和准许朝鲜籍同学李苏民注册上课。中大全体朝鲜籍同学17人也联名上书邹鲁，声明与李苏民同进退。学生家长也纷纷通过社会关系干预。在社会和学校各方面压力下，邹鲁不得不以中大校长的名义，出面到警察局交涉，保释被捕同学，并答允一些被“通缉”和“不准注册”的同学回校注册上课。广雅中学原要

开除的 10 个爱国学生，也得以改为转学到惠州省立三中就读，但中大纠察队队长冯道先却于 7 月 19 日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广州市内，各校爱国学生普遍在校内成立了有较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组织——抗日大会或抗日救国会。原有的各个左翼组织又有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一批新的秘密进步团体如抗日五人团、抗日十人团、救亡前哨社等，也纷纷建立。在各大中学校内组织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更是数不胜数。在香港，洪飏（周楠）、石辟澜、唐章等人成立了“香港救国会”。他们在《大众日报》副刊开展抗日宣传，通过举办工人夜校、读书会，深入发动群众投身抗日运动。5 月底，何思敬、洪飏、石辟澜、方少逸、吴超炯等人参加了“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何思敬、陈汝棠、李章达等人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并在广州设立秘密的“广州救亡协进会”。穗港两地进步抗日社团的建立和发展，团结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并秘密地或者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把群众抗日运动推向纵深发展。

1936 年 4 月 1 日，“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正式成立。这是以左翼分子为骨干力量，发动和组织了 226 个同学和 20 多个教授参加工作，经学校当局认可的公开合法组织。他们以石牌附近 10 个乡为实验区域，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做社会调查，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和培养青年农民骨干等工作。在此前后，中大、勳大部分进步学生深入土华乡，龙眼洞为农民举办夜校，组织歌咏团等，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这一带打下了较好的群众抗日基础。这是广州爱国青年学生争取学校当局的支持，以公开合法方式深入乡村发动宣传群众，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培养农民骨干，坚持

和深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成功尝试。同年5月底，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南来广州，应邀在石牌中大作题为“粉碎大陆政策”的讲演，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5月底，广东学生代表方少逸、吴超炯参加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之后，又同广东各界代表一起，参加由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实践活动提高了左翼组织及进步同学对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有可能在陈济棠的白色恐怖统治底下，进一步学会利用合法的、公开的社团，发动群众，扎实地把抗日救国工作做好。

但斗争是曲折的。“荔枝湾惨案”后，西南政府一面高喊抗日，一面仍力图把学生运动置于他们的控制下。他们在中学推行读经复古，毕业班要集中统一命题考试（简称“会考”），目的是要学生埋头读书，读死书，不问国事。引起广大爱国学生的不满和抵制。部分学生先后通过办刊物写文章以至发传单反对“会考”。要求实行抗战教育，开放抗日自由。1936年6月1日，西南当局以反蒋抗日为旗号，出兵湖南，发动事变，在广州组织群众集会拥护他们的行动。广雅、大中、知用、教忠、女师、执信等校学生利用这一时机，在6月8日发动1000多同学到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提出：一、请政府即日出兵收复失地；二、开放抗日言论、行动自由；三、废除会考，实行抗战教育。这次李宗仁亲自接见代表，表示接纳或转达。但就在李宗仁接见的前一天和当天黄昏，陈济棠的便衣侦缉便埋伏在珠光里——请愿学生联络地点秘密抓人，钱兴等40多名爱国学生被捕。“珠光里事件”使广州学生运动再一次受到损失，但也再一次使广东当局的反动嘴脸暴露在人们面前，也教育了爱国学生在今后的抗日救国活动

中更要讲究斗争策略。

## (五)

“一二·九”运动唤起了民众，壮大了革命青年队伍，为中共广东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南来香港任救国会南总组织部部长，首先在香港、广州和广西等地一些抗日救亡组织中开展工作，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薛在香港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又通过由他发展入党的中大学生张直心在“突进社”成员中发展党员，随后建立中大党支部。同年5月，“中青”主要负责人王均予从广州经上海到天津，向北方局汇报了广州工作情况，恢复了组织关系，于7月回到广州，以中国青年同盟盟员为主要建党对象，首批发展中国青年同盟领导人麦浦费、林振华入党，随后在中大、勳大、广雅等大中学校建立党支部，不久，又在东莞、新会、中山、高要等县建立党支部，至年底，共发展党员100多人。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领导广东及南方几省的工作。12月，根据南临委指示，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均予任书记。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从“反蒋抗日”、“迫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中共广州组织按照北方局的指示，使左翼组织和广州青运逐步摆脱过去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逐步学会统一战线工作，运用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形式，深入细致和比较广泛地发动群众，为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奋斗。

1936年7月，“南总”常委吴涵真同广州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协商，以青年会名义举办“广州民众歌咏团”。个别中共党员和部分青年骨干认为，歌咏团这一公开合法的文化娱乐性质的群众团体，是广泛联系、团结、教育群众的好形式，决定通过各校进步学生串连、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把团员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并在团员中培养进步骨干，吸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个别吸收入党。在中共党员和各左翼学生组织的推动下，1000多名青年学生、工人、店员、职员和教师参加了歌咏团。他们在歌咏团里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结合时局学习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通过参加歌咏团的活动，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广州青年学生，从实践中进一步学会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6年8月，广州地区的几名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发起组织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艺协”）。它团结各方面不同专业的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和青年文艺爱好者，其中分为理论、小说、诗歌、翻译、新文字、形象艺术、戏剧等7个组，先后参加的有400多人。他们学习研究进步理论和文艺书刊，关心和讨论国内外大事，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公开宣传抗日救国。“艺协”初步将广州原有的分散的、小型的青年社团，以及愿为抗日救亡运动贡献力量的零散的青年文化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成为具有较广泛统一战线意义的进步文化学术界的公开抗日群众组织，使广州青年更好地运用文化艺术的武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消息传来，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即联络各文化团体于11月8日在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追悼鲁迅先



生大会。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广州民众歌咏团、世界语研究会、大众文学社、锋社等数十个团体和大、中学生 1000 多人参加大会。各界进步爱国人士代表在会上沉痛陈词，中大朝鲜籍学生金昌华和东北流亡学生赵君哲声泪俱下的讲演，引起了全场悲愤。追悼会变成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大会，激励着广州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顽强、勇敢地战斗。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逮捕了蒋介石，发出通电，提出 8 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说明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为了加强在青年群众中的统战工作，中共广州市委提出了“走出秘密狭隘的进步群众小圈子，大力发动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决定解散“中青”和“突进社”，把这些秘密组织中具备入党条件的成员陆续吸收入党。同时，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委会”，联络各大、中学校进步学生，争取各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力求以公开合法的学生自治会指导各校的抗日运动。与此同时，中共组织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广州创办《在抗战旗帜下》半月刊。翌年 5 月，中共广州市委指导进步学生创办《游击队》增月刊。这两个半公开发行的刊物，大力宣传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共广州组织重建后的上述种种措施和活动，使党与各阶层青年的联系更为广泛，把自“一二·九”运动爆发以来的广州青年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为抗战爆发后组织千千万万青年奔赴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

曾 生

### “一二·九”运动前夕的广州学生运动

1933年7月，我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后，直接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读书。中山大学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华南最高学府。据中山大学校史记载：该校在大革命时期，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有党员六七十人；1926年，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员300人左右。有许多学生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著名的北伐战争。这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德珩等革命文豪和著名学者，先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或讲课。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随即于4月15日，在广州、汕头等地进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中山大学革命力量遭受摧残，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遭受反动派的无理逮捕和杀害。鲁迅先生为此愤然辞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职务，经香港到了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广州地区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各种进步团体都遭到极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到我上中山大学时，广州已没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但仍有何思敬、何干之等个别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在青年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中山大学除何思敬外，还

有邓初民等进步教授，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

“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一段时间，广州的青年学生对蒋介石还认识不清，总希望他抗日。可是，事实上他对外一直是军事上撤退，外交上妥协；对内则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事实教育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逐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们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在这社会黑暗、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时候，广大爱国青年不断追求进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共产党员及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教育下，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在行动上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和进行募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及宣传抗日等活动。1932年春节前后，我们中山大学附中的学生还组织过下乡宣传活动。与此同时，爱国青年还纷纷组织读书会、文艺社团等形式的进步群众团体，秘密地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开始时是三五个人，或10多人自由结合，各自开展活动，各不相属。1932年下半年，我还在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就与附中的同学钱兴、粟稔、韩瑶初、钟远蕃、罗宗皇、禰万禾、张凤楼、黎伯枢、黎元杰等10多人，成立了学习进步书籍的读书会。据后来了解，除中山大学外，勳勤大学、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执信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也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学习革命书刊，交流学习心得，甚至出版进步刊物。饶彰风、杜埃出版了一个《天皇星》的进步文艺刊物。在1933年至1935年间，从上海、北平、香港等地通过各种途径，大量的进步书刊在广州发行。如《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月报》，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都是当时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我

们读书会平时各自阅读进步书籍，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每周开一两次讨论会。为研讨救国的真理，我们经常从书本上的理论问题联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在1933年前后，我们读书会曾多次请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何干之（当时叫谭秀峰），参加我们在惠如茶楼等地进行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等问题的讨论。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精辟分析，对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很有帮助。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员都直接升入中山大学的大学部，我和粟稔、罗宗皇、禩万禾等读文学院；钱兴、韩瑶初、钟远蕃等读法学院。绝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为广州“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1934年冬，有一天钱兴约我到石牌中山大学新校的甘蔗园谈话，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位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由于没有组织关系，他暂时还不能吸收党员，建立党组织。但是，他现在组织了一个进步的革命秘密组织叫“中国青年同盟”（下简称“中青”），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表示同意。钱兴就介绍我参加了“中青”。

“中青”的发起和组织人王均予，原是上海党中央秘密刊物的发行工作人员。在发行工作中以“读者会”的形式同一些进步青年建立了联系。由于上海党组织受破坏，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从上海来到广州，找到勳勤大学的学生、“读书会”的会员邱萃藻。在邱萃藻的帮助下，王均予在广州开始了革命工作。王均予通过邱萃藻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在广州建立起“中青”。他首先在中山大学、勳勤大学吸收了邱萃藻、钱兴等人参加。随后，以中山大学、勳勤大学和国民大学为主要阵地，在中山大学附中、勳勤大学附中、广雅中

学、女子师范、执信中学、知用中学、教中、市一中及燕塘军校等广州许多学校都发展了“中青”的成员或组织。同时，在东莞、中山、新会、肇庆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中青”的组织。到1935年底广州“一二·九”运动前夕，“中青”成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中青”成为发动和组织广州“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和广州市的部分大、中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也先后成立了“突进社”、“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力社”等进步组织。在广州恢复了党的组织后，这些团体便成了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也是广州“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或骨干。

“中青”是以党的宗旨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秘密组织。参加“中青”必须是政治面目清楚，信仰共产主义、严守组织纪律的进步分子。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地下组织。组织成员之间是单线联系的。中山大学的“中青”支部，当时我只知道钱兴是负责人，由他与我单线联系。后来，我才从钱兴那里和李驹良的回忆文章以及广州市青年运动史的资料中，了解到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成员有钱兴、粟稔、李驹良、金昌华、韩瑶初和我等人。

1934年冬，由于一批进步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担任了在中山大学旧校高中部教室举办的中山大学平民夜校的校长。黄焕秋、刘秉钧等进步同学担任教员。学生有二三百人。该校不仅为贫苦大众子弟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成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场所。我参加了“中青”以后，组织上分工要我办好这间平民夜校，以夜校为阵地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青”为了组织和领导中山大学乃至全广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有一个秘密活动的场所。我就以中山大学平民夜校校长的名义，以教师中午或晚上休息的

需要为理由，向学校当局要了几间木屋，作为我们秘密活动的场所。我们就在这里油印宣传品，筹划学生运动。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的青年学生运动，由于当时主要是靠党的政策的影响和个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及进步教师的积极宣传、组织和指导，还没有党组织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所以，这时期广州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各种力量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但是，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步组织力量，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个总方向是对的。它为广州“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动和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 中山大学“双十二”示威大游行

1935年秋，随着日军在华北侵略活动的加紧，全国抗日斗争的热潮也逐渐高涨。八九月间，广州的进步青年，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明确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向。“中青”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中青”的组织和成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加紧工作。中山大学的“中青”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加紧在校内的活动，用各种宣传方式来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斗争。当时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报纸上载有抗日救亡斗争或日军侵略暴行的消息剪下来，加以编排，用红笔加上醒目的标题，在各宿舍、

饭堂、阅报室张贴。这些剪报两三天出一次，对同学们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有时也编写壁报，记得其中有一篇集体创作的《抗日问答》，由于有理有据，形式活泼，吸引了很多观众。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不断印发油印报，登一些较长的文章，把党的抗日主张，用通俗的文字写成文章，刻印出来。钱兴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并亲自去做。这些工作是在非常机密、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白天黑夜地干，没有拼命苦干的精神是做不出来的。有时白天刻写蜡板没有适当的地方，就到石碑的茶山去干。这座山在石碑中山大学附近，站在山顶能看得很远，有不可靠的人走来时，可及时转移或隐蔽。钱兴就经常在这里赶刻宣传抗日的文章，他以石头做桌子，坐在地上刻，在烈日下经常一刻几个钟头。这些宣传品的印刷，多数是在我们平民夜校教师休息的木屋内进行。这些油印报，在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同学中流传广泛。对激发广州地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天晚上，我在平民夜校教师休息的木屋里休息，钱兴找我研究如何贯彻上级的指示，要我们动员同学们起来反对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做好宣传工作之外，应立即开展组织工作。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社会系和教育系3年级、法学院法律系4年级、政治系3年级分别成立了抗日会。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全校同学立即行动起来，联合全校、全市的爱国师生共同奋斗。政治系3年级的学生在钱兴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还在石碑中山大学校内举行了一次抗日游行。这几个班的抗日会是随后中山大学

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的先行组织，也是广州“一二·九”运动的滩头阵地。在此期间，各进步团体还邀请进步教授邓初民、何思敬等来举行抗日演讲会。经过这些活动，广大青年学生日益觉醒起来，积极要求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但是，广州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和落后、反动的势力作尖锐复杂的斗争。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在石牌的中山大学学生立即轰动起来。他们激动地奔走相告，各宿舍、饭堂门前到处出现了加上红圈和鼓动口号的剪报墙报，报道北平学生示威的情况，号召同学们积极响应，立即行动起来。

10日晚上，中山大学全校各班的班代表在文学院宿舍召开会议，讨论全校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召开全校抗日大会问题。在这次会上，进步的同学和由中山大学校董、广东省民政厅厅长林翼中操纵的“抗声社”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抗声社”成员不愿意召开全校的抗日大会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以班代表会议的名义发表宣言，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企图以此阻止中山大学大规模地开展抗日运动。但是，进步的同学早就估计到“抗声社”成员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在召集这次班代表会议时，就动员了许多同学在会场周围旁听。当会上发生争论的时候，旁听的同学一致呼吁代表们必须通过决议，在翌日（11日）上午召开抗日



大会，大规模地开展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在群情激昂的压力下，班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在 11 日举行全校抗日大会，“抗声社”成员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据“抗声社”成员李树写的材料记载：“抗声社”是林翼中想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指使他的爪牙在中山大学组织的一个半公开的所谓“抗日”群众团体的御用组织。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活动，主要是由中山大学助教、“广东地方自治人员训练所”负责人张仲绛主持。他们经常所做的是，研究如何竞选各系、各年级、各班的代表，和各系所组织的学术性的研究会、各地方的同乡会等组织的代表，借此把持这些组织的领导权，逐步争取广大师生的支持，把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赶下台，由林翼中兼任校长。1936 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倒台之后，林翼中、张仲绛相继出国，“抗声社”自动解体。但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他们在中山大学网罗的人数已不少，分布在全校各个学院，各系许多班的代表都是他们的人。当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大规模兴起，并酝酿召开全校抗日大会时，他们就蓄谋破坏，立即开会“研究如何争当大会的主席，操纵大会，使运动不致扩大”。

10 日深夜，文学院、法学院几个班级成立的救国会和各院系的进步同学组成的“夜呼队”，每队约二三十人，分别到文、法、理、工、农各学院的学生宿舍前，齐声高呼：“明天上午在大礼堂开抗日大会，请同学们一致参加！抗日救国，不落后人！”宿舍里的学生有的已经睡了，也从床上爬起来鼓掌响应，并高呼抗日口号，此起彼落，非常热烈。

11 日上午，中山大学各学院的学生纷纷向大礼堂集中，在市内的医学院和附中也派代表参加，一共 3000 多人、举行

了隆重的抗日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吁请政府领导抗战，并决定12日到广州市区举行示威游行。但在这次大会上，“抗声社”成员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竭力篡夺抗日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事先串通一气，提名文学院的“抗声社”骨干李树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且当选。“抗声社”成员把持了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的席位，对中山大学和整个广州市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都起到了阻挠和破坏的作用。

12月12日上午，中山大学全体师生3000多人的抗日游行队伍，从石牌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河、黄花路到达东山时，医学院和中山大学附中的1000多学生也参加进来了。4000多人的抗日示威大军象一股洪流涌向市中心。由于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使得每一个具爱国良心的青年学生都积压着无限的悲愤，待机发泄出来，又由于事前做了大量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所以，中山大学的學生几乎全部都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了。游行队伍以“国立中山大学抗日示威大游行”的门旗为前导，同学们迈着有力的步伐，手持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等抗日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游行队伍经过马路时，许多群众站在两旁，以兴奋赞同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壮烈的口号声和歌声，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很多人向游行队伍热烈欢呼鼓掌。当游行队伍经过长堤，进入六二三路时，同学们脚踏着帝国主义曾经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当年“沙基惨案”帝国主义开枪扫射爱国游行队伍的惨景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面对着帝国主义分子霸占着的沙面租界区，同学们义愤填膺，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

对妥协投降！”等口号，两旁的群众也一齐高呼口号，向示威游行队伍热烈鼓掌。示威游行一直到下午4点钟。中山大学的学生徒步回到石牌时，已夜幕降临。

中山大学的“双十二”示威大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抗日运动沉寂的空气，使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走向一个高涨的时期。

## 争取领导权

中山大学“双十二”抗日示威大游行之后，“抗声社”成员原以为发表了宣言，举行了这次游行就算了。可是，广大同学的抗日热情却进一步高涨起来，纷纷要求再开大会，扩大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抗声社”成员眼看无法控制局势，害怕运动进一步扩大，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13日上午，中山大学学生2000多人又在石牌新校大礼堂召开抗日大会，决定自动停课一周，联合全市学生自动停课宣传，联络全市学生扩大示威游行。对于大会决定要做的工作，把持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的“抗声社”成员消极怠工，不予执行。中山大学积极抗日的进步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到市内各学校进行联络和宣传演讲。从13日到16日，中山大学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分5个大队，133个小队，每队设队长1人，队员10余人，分头到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中央公园、近郊芳村和佛山等地进行演讲和张贴抗日标语等活动。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广州市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个宣传队、联络队在群众中和各学校中广泛深入地播下了抗日的种子，不少学校如勳勤大学、广雅中学、市立女子师范等学校，都纷纷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对于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怕得要死，急忙于15日下午2时，在省参议会礼堂，召集全市中学生自治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拼凑成立了御用组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推出市一中代表梁祖翹为主席团主席。他们鼓吹“读书救国”，妄图瓦解爱国学生的斗志，还指使中山大学“抗声社”成员继续把持中山大学抗日大会的主席团，敷衍群众，阻挠运动。在其主子的指使下，“学联”装模作样地召开所谓“抗日”大会，国民党省党部和教育厅的官员出席训话，胡说什么“游行无济于事”，“有效的抗日就是埋头读书”。他们拒绝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会议和介绍示威游行的经过。反动当局还布置各校的校长“要管好学生，不要让事态扩大”。于是，广雅中学学生由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当局明令禁止。知用中学一些班级的学生召开抗日会，被校方勒令解散，发起人受到记大过处分。反动当局还通令各校，凡组织抗日会的，要经过国民党市党部的批准。同时，反动当局为镇压和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还拼凑一个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在一些大、中学校也设立了御用“救国会”，这些御用组织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收买的反动学生把持。这些被收买了的反动学生，平日专门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给反动当局打报告；当学生爱国运动高涨时，他们又利用“救国会”的招牌来竭力进行破坏。我们中山大学联络宣传队的工作，就遭到过这帮反动分子的破坏。如中山大学的联络宣传大队到法学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时，这些反动分子公然出来阻挠，不准中山大学联络宣传队进去。但法学院的广大学生却不顾这些流氓的阻挠，自动集合起来，热烈欢迎中山大学宣传队。“广州学生救国会”的头目、国民党公安局的“侦缉”黄培才更是猖狂。当中山大

学和广州市各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四处出动，扬言要用手枪来对付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地继续发展。16日上午，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再次召开抗日大会，通过了“停课10天，下乡扩大抗日宣传”的决议。这项决议是广东国民党当局授意他们的走卒提出来的。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扩大抗日宣传运动的提案呢？原来，反动当局看见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分害怕，但一时又不敢采取公开的镇压手段，于是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诡计，想假借“下乡扩大宣传”的名目，把各学校的学生驱散到各县去，暂时扑灭广州市这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地区日趋高涨的抗日火焰，同时，再通过其爪牙破坏各学校各县的抗日宣传队的工作，并指令各县政府和国民党党部禁止学生的抗日活动。“抗声社”成员认真执行了其主子的旨意，他们一方面赞成停课下乡宣传的提案，一方面又实行怠工，不去组织队伍到各县进行宣传工作，任由学生自流分散回乡。有一些进步学生较多，真正进行抗日活动的队伍，在各县则遭到国民党党部的恐吓和驱逐。如有一个抗日宣传队在回到县里进行工作时，该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竟带他们去“参观”县里的监狱，指着那阴森的监狱对同学们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安心读书，听政府的约束，而要搞什么抗日运动的话，那你们就要准备尝尝铁窗风味。”中山大学附中有一队下乡宣传的同学，竟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押解回校。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付爱国青年学生和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是多么阴险毒辣啊！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继续

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我和钱兴、粟稔、金昌华等进步同学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如何进一步开展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都觉得广州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刚起来，为什么“抗声社”的成员突然又极力主张动员全部同学下乡去进行发动抗日宣传呢？既然他们主张下乡扩大宣传，他们又为什么不去组织同学下乡？这里肯定有问题。为了防他们借下乡宣传的办法，来扑灭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我们不能下乡，要坚持在广州继续做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我们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学生运动的情况，觉得存在几个明显的弱点：

第一、中山大学抗日大会的主席团为“抗声社”所把持，进步同学还没有完全掌握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而他们把持主席团的位置，实行“包而不办”的消极怠工，这情况严重妨碍了中山大学和广州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二、中山大学广大师生目前已初步发动起来，尤其是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但没有建立全校经常性的领导机构，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来担负抗日救亡运动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使之能继续坚持和发展。

第三、目前主要是中山大学学生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广州市大多数大、中学校的学生，还是刚刚发动起来，只是分散地在进行抗日活动，还没有组成全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构和进行联合行动。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决定今后要努力团结全市爱国师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广州市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对把持中山大学抗日大会主席团阻挠抗日运动的“抗声社”成员，要给予彻底的揭露，把他们从抗日大会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把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完全掌握过来。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们就紧张地行动起来，在学生群众和教职员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团结工作。为了争夺抗日大会主席团的席位，我们分头到各院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同学中揭露“抗声社”成员把持抗日大会主席团席位消极怠工的情况，组织同学们选举各院的进步同学为院的代表。

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我们认为条件成熟了，便于12月30日，在石牌中山大学礼堂召集全校同学开了一个十分成功的抗日大会。会上同学们严厉斥责“抗声社”成员把持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的席位，实行“包而不办”，消极怠工的行径。大会一致决议撤销他们在抗日大会主席团中的席位，重新由各院分别选出代表组织主席团。当即由各院选出我（文学院）和钟远蕃（法学院）、李寿康（农学院）、张凤楼（工学院）、张万久（理学院）、陈柏昌（附中）和教师代表张农等人为代表，组成新的主席团，并推举我担任主席团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如下几项重要决议：①通电全国，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反对华北自治；②筹组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以大会主席团成员为筹备委员；③定于31日举行广州市抗日示威大游行，继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鼓舞和坚定同学们的斗争意志，30日晚上，在石牌中山大学文学院前面举行四五百人参加的野火会。会上由朝鲜籍同学金昌华作了沉痛的演说（1934年至1935年间，邹鲁为了装饰他的抗日招牌，曾收容了五六十个朝鲜籍的学生在中山大学就读，其中有不少优秀的革命青年，金昌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七七”抗战爆发后，他到了西安，后在山西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他详细地叙述了日本侵略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屠杀朝鲜和中国人民的惨状，说到悲痛处，讲演者和听众都流下了热泪。金昌华最后呼吁同学们一定要坚持

抗日斗争，亡国奴当不得！同学们响应金昌华的沉痛呼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抗日救国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2月31日，中山大学的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由于有部分同学下乡宣传去了，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比上次少些。但游行队伍途经沙河和黄花路等地时，汇合了庚戌、执信女中、广雅中学、知用中学、中山大学附中、教中、女师等学校的部分同学参加，游行总人数仍达四五千。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打听到中山大学的学生31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消息时，立即下命令全市学校停课放假，有的学校封锁校门，不准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活动。游行队伍在市内的主要马路示威游行，开展街头宣传活动之后，下午2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设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对抗日表明态度。西南政务委员会听到学生要来请愿，立即在门前布满武装军警，还摆出救火用的水龙头。游行队伍在门口等了一会，不见有人出来接见。当即推选包括我在内的6人代表（中大3人、执信、庚戌、市三中各1人），由我带领向当局交涉。在我们走到政府大门时，政府的官老爷怕得要死，指挥军警对我们一个个搜身检查。当我们代表全广州的爱国学生向政府当局提出为何禁止学生抗日运动和示威游行，要求取消一切压制民众自由的法令，给予学生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等的质问和要求时，当局的头头不见人影，只派了一位秘书谢宣邦出来接见我们。谢对代表们提出的质问和要求的问题，一个都不敢回答，只是口头上敷衍一番，说一定将同学们的意见转达常务委员们。游行队伍早已不耐烦了，大家十分气愤，不断高呼口号。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使



同学们进一步看清“西南政务委员会”当局的反动本质。当谢宜邦的话还未讲完时，就有同学高喊：“政府当局不理我们，我们走，向人民请愿去！”我回到了游行队伍，即带领队伍向市中心游行，沿途又有一些群众加入队伍。“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政策！”“消灭汉奸，收复失地！”的口号声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震荡五羊城！游行一直进行到夜晚。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回到石碑时，已是夜色苍茫了。同学们宣传和游行了一整天，连饭也顾不得吃，但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都为以抗日救国的行动送走了1935年而感到快慰。同学们互相激励，要在新的一年里开展新的斗争。

## 成立抗敌会

1936年一开始，中山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潮的推动，和进步教师何思敬、邓初民以及广东“中青”负责人王均予等的影响和指导下，决定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也随之而来：一方面，由于进步同学所掌握的中山大学学生抗日大会主席团（也就是全校抗日会筹委会）迅速和全市各校的学生取得联系，积极准备举行全市学生的抗日示威大游行和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学生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高涨，引起了广东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加紧策划加以压制和破坏广州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刚从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迫不及待

地跳出来，充当压制和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

邹鲁，广东省大埔县人，是一个投机的反动政客。他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曾打起“抗日”、“倒蒋”的旗号，以欺骗群众，扩充势力。1935年11月，蒋介石派戴季陶，马超俊到广州，邀请邹鲁等人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蒋介石积极拉拢邹鲁，在政治上安排邹鲁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国府委员，在经济上答应给100万元作为中山大学的建校基金。邹鲁被蒋介石收买后，即从“反蒋”转变为“护蒋”，他表示对蒋介石“非特不能再说推翻的话，而且应该极力拥护他”，<sup>①</sup>从而充当了蒋介石的走卒。

邹鲁政治态度的转变，加上中山大学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陈济棠对邹鲁的不满，指斥邹鲁办学无方，竟让学生“大闹学潮”。邹鲁为了讨好新旧主子，就卖尽气力来破坏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位老奸巨滑的政客，对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这样的办法：一方面，他继续标榜自己一向“抗日”，强调全校师生员工必须在“抗日”的校长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否则便是“捣乱”行为；另一方面，他为了从组织上控制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取消由学生选举产生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备委员会，代之以教职员占多数，完全受他操纵的中山大学抗日会。为了迅速扑灭中山大学的抗日火焰，他刚从南京回来，即发出通告，决定于1月6日在中山大学大礼堂召集全校员生大会，由校长“训话”。他连夜召集教职员会议，策划如何扑灭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

邹鲁从南京回来之后，关于他被蒋介石所收买的消息，我

---

<sup>①</sup> 邹鲁：《回顾录》第二册第544—457页

们已有所闻。邹鲁召集全校员生“训话”的通告公布之后，进步同学已预料到邹鲁会来破坏抗日救亡运动，一场尖锐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为此，钱兴去请示了王均予。他回来之后找了我、粟稔、李驹良、金昌华、钟远蕃等进步同学，认真研究并决定了要利用邹鲁“训话”的机会，召开全校员生的抗日大会，正式成立全校的抗日会，并决定举行广州全市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成立全市学生的抗日联合会等事宜。1月6日前夕，进步同学们彻夜紧张地工作，在大礼堂和各教室张贴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针对邹鲁的干将、法学院院长郑彦棻平日破坏抗日运动的行为，同学们画了他的漫画像贴在大礼堂，题上“汉奸教授”四个大字，并在四周贴满了“打倒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汉奸教授”的标语。这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广大师生员工的抗日爱国热情；同时，也是对反动教授和校长邹鲁的警告。为了维持大会秩序，防止特务分子捣乱，在抗日会筹委会的领导下，组成了100多人的纠察队，由文学院学生冯道先担任总队长。5日晚，纠察队员彻夜守卫大礼堂，防止张贴的标语、漫画被坏分子撕掉。

6日早晨，中山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向大礼堂集中。在市区的医学院、附中的代表和部分师生也赶来参加大会。3000多人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同学们看到四周张贴的标语、漫画，心情激动，都预感到一场尖锐的斗争就要来临。9时许，邹鲁带着一帮亲信和警卫分乘几辆汽车来到大礼堂门前。他进入大礼堂后，一看那么多标语、漫画，这么多情绪激昂的学生，心里着实一惊，但仍故作镇定，迈步踏上主席台，进行对全校员生“训话”。

开始，同学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想了解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邹鲁先说他到南京向蒋介石交涉中山大学建校

基金的问题。以往凡大会讲话中提到蒋介石时，他总是破口大骂“蒋贼”。但这次“训话”谈到蒋介石时，则说：“蒋、蒋、蒋……”，老是说不出下文，说了好几个“蒋”，才说出“蒋先生”。我们一听，就相信“邹鲁被蒋介石收买”的传闻是确实的了。他吹了一通如何争取蒋介石答应给100万元中山大学作建校基金之后，接着就讲到大家所热切关心的抗日问题。他吹嘘自己一向如何主张抗日，说这次“晋京”就是要“催促”蒋先生实行抗日政策。当邹鲁替蒋介石宣传，说蒋介石也已经“准备”抗日时，同学们一听就恼火了，会场开始骚动，不断发出“嘘、嘘”声。邹鲁见用软的办法不灵，骗不了学生，就用压的办法，立即板起脸孔，摆起校长的架势，指斥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过火”了，“行为越轨了”。宣布会后他要亲自来“领导”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要解散由学生选举产生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委会，成立由学校领导的抗日会。他把话讲完，立即就宣布散会。同学们非常气愤，全场哗然，不肯散会，并高呼“我们要继续开抗日大会，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坚持抗日运动，反对包办抗日”等口号。邹鲁在主席台上非常狼狈，他再次宣布散会，要学生散去，但同学们不肯走，坚持要开抗日大会。这时被进步同学指斥为汉奸教授的法学院院长郑彦棻，跳上主席台，为邹鲁帮腔，说什么学生要“服从”邹校长“领导抗日”。同学们平时已对这位郑某人的反动言行痛恨极了，现在他又出来为反动校长帮腔，更加气愤。没等他说上两句，全场就发出“赶快滚下去”的怒骂声。郑彦棻碰了个大钉子，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下来。接着文学院院长范琦硬着头皮走上主席台，摆起洋博士的架势发表演说，“劝告”学生要“服从”政府，要“服从”邹校长的领导，如何如何。说不到两分钟，也给愤怒

的同学们轰了下去。邹鲁看见他的爪牙一个个被学生轰下了台，恼羞成怒，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在主席台上突然大肆咆哮，公然拍着桌子指着台下几千名学生辱骂说：“你们这是抗日爱国吗？你们是亡国学生！”正在这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出现了僵局的时候，为同学们欢迎的邓初民教授站了出来，大声地面向同学们说：“同学们！请允许我向你们发出一个诺言，如果同学们因抗日救国而流血的话，那我一定要与亲爱的同学们流血在一起！”邓初民教授坚定的抗日态度，给同学们极大的鼓舞，大会发出了热烈的鼓掌声。接着他又说：“同学们今天的抗日救国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你们的呼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但是，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大业，应不分党派，不分阶级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现在，谁不准抗日，谁就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就要打倒谁；谁积极抗日，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要拥护谁。邹校长和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是抗日的，我们要拥护。邹校长什么时候不抗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倒他。”邓初民教授这番话是很有策略的，他既肯定了学生的抗日行动，教育学生要注意斗争策略，争取了学生的信任；同时，又说：“邹校长和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是抗日的，我们要拥护。邹校长什么时候不抗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倒他。”这就套住了邹鲁和他的爪牙，同时又警告了他们。邓初民教授的讲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打破了会场的僵局，使会场的紧张气氛变得十分热烈，使大会得以继续开下去，而邹鲁也不敢溜走。我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站起来，面向同学们，一边招手，一边走上主席台，一边高声地喊：“同学们！我们继续开全校的员生抗日大会，请抗日会的筹备委员上台来！”由进步同学组成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委会的委员一个个迈步走上了主席台之后，我就宣布筹委会的委员是今天大会

主席团的成员。我话还未讲完，邹鲁即站起来说：“我有意见！”我没等他讲下去，立即接着说：“邹校长也是当然主席团成员。”说完，我主动对邹鲁说：“请邹校长宣布开会。”但邹鲁不肯，他恶狠狠地摆手说：“你去宣布吧！”

我走到主席台前向全校的师生员工宣布：“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大会现在开始！”会场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接着，我作了简单的动员：“亲爱的教职员同志们！同学们！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到了危急的时刻了！北平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已经英勇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但遭到各地政府当局的压迫，国民党南京政府继续执行对日妥协政策，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救国运动，要动员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行动起来，一致抗日。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生存，为了全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我们要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阻挠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讲完，我就请同学们和到会的教职员对今后如何开展抗日运动提出建议，让大会讨论，以决定我们今后的计划。同学们纷纷提出提案。主席团把同学们交上来的提案归纳为如下几大提案：

1. 立即正式成立中山大员生工友抗日救国会，领导今后的抗日运动；
2. 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停课一周，扩大抗日示威游行；
4. 联合全市学生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
5. 由学校对学生的保证金内，每人抽出一元作为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经费；
6. 为保证抗日运动顺利进行，抗日救国会成立联络宣传和纠察队。

上述提案大会都一致地通过了。但是，在讨论第一提案，即成立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人数和名额分配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这个关系到由谁来领导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问题提出之后，邹鲁又跳出来，施展其卑鄙的政治伎俩，企图达到其操纵和破坏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大会主席团根据同学们的意见，提出全校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和附中各选委员5人，教职员也选委员五人，校长为当然委员，共41人组成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的方案。邹鲁不同意，他提出学生和教职员各选25名，校长为当然委员。这个方案的用意很明显，如获通过，邹鲁便会在教职员中指派他的爪牙充当委员，加上他自己，便可以利用多数来控制抗日救国会，从而压制和取消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方案一提出，不等师生考虑，就立即一手拉开我这主持大会的主席，而站到台前，使出国民党操纵会场的看家本领，大声说：“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讨论，现在付之表决，就是学生代表25人，教职员代表25人，校长为当然代表。”没有等师生发言，立即宣布：“无异议，通过！”当时，我感到这问题太重要了，它关系到中山大学今后的抗日救亡运动能否继续开展的大问题。于是，我就立即走到主席台前，用广大学生的力量来抵制校长的压力。我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大声地对同学们说：“邹校长的意见是在3000多学生中产生25个委员，在400多教职员中也同样产生25个委员，这样合不合理？同学们赞成还是反对？”台下的同学们纷纷站起来，大声反对邹鲁的提案，坚持同学们自己的提案。邹鲁见他的阴谋不得逞，又大肆咆哮，气冲冲地走到主席台前，指着我大声地骂：“你这是乱七八糟，已经通过了我的方案，为什么又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他气得似乎要发疯

了，竟高高地举起他的右手，想朝我的脸上打来。大概他立刻感到这是做不得的吧，便将手用力地拍在桌子上，又气愤地指着我说：“你、你、你这个亡国学生！”我看再不反击不行了，我就回敬他两句：“我们开大会讨论提案，总要征求到会群众的意见嘛！”同学们看见邹鲁这样横蛮，非常气愤，高声地喊：“我们一定坚持学生的方案！”这时，邹鲁的亲信中山大学教务长萧冠英站出来为邹鲁帮腔，他说：“我赞成邹校长的方案，因为教师是学生的师长，不能跟各院的同学们一样只选5个委员。”萧冠英说话的声音很小，同学们听不清说什么。坐在大礼堂前排的钱兴同学十分机灵，他马上站起来面向着全体员生大声地说：“萧教务长也赞成我们同学们的方案，教职员工只选5个委员。”同学们听到连萧冠英也反邹鲁的方案，就鼓掌欢呼起来。同学们的方案就这样全场通过了。邹鲁慑于群众的压力，也不敢再起来反对，就怒气冲冲地坐在一边。

方案决定下来，接着同学们就选出了各院的学生代表，教职员工中选出了邓初民、萧隽英教授等5人，正式成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敌会执行委员会<sup>①</sup>，推举我为主席。选举完毕之后，我向大会建议：“请邹校长领导我们全校师生员工举行抗日宣誓。”同学们立即起立鼓掌。邹鲁无可奈何地站起来，举起右手，领导全场师生员工宣誓：“我们中山大学全体员生一致抗日，谁不抗日，天诛地灭！”于是，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这场斗争的胜利，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我连夜主持召

---

<sup>①</sup> 由于南京政府还未对日宣战，为了争取合法存在，故公开不称抗日会，而称抗敌会。



开了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敌会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大会通过的各项提案和有关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事宜。会议冲破了重重阻力，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1. 由我负责向校长交涉，按大会决定领取抗经费；2. 推出代表负责组织联络宣传队，去联系全市各学校，准备组织全市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成立全市学生抗敌联合会；3. 定于1月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并成立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4. 决定把中山大学的校车拨归抗敌会使用，以便利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活动。

7日上午，我到校长办公室找邹鲁交涉领取抗经费问题。邹鲁看到我进入他的办公室，立即气冲冲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吭声。看他这样子，我想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又要耍什么花招了。果然不出所料，他沉着气走了一二分钟之后，突然走到我面前，用手指着我进行恐吓和威胁说：“我接到报告，你昨晚开秘密会议。你做共产党，进行非法活动，要杀头的啊！知道吗？”我立即反驳：“那是造谣。昨天我们开执委会，你没有来，但大家都清楚，不是什么秘密会议。今天我是根据大会和执委会的决定来向你领取抗经费的。”起初，他不肯给，气愤愤地说：“学校没有钱。”我严正地对他说：“邹校长！这是大会的决定，不拨款是不行的。如果你不给，我只好向全校的师生员工宣布你不肯给钱了。”他听后怕事情闹大，只好拿起笔批了1000毫洋作抗日的经费。有了这笔钱，又掌握了校车，我们开展宣传活动就好办了。抗敌会的人员赶忙写宣传大纲，印刷宣传品。钱兴一连几晚都在深夜二三点钟跑到广州市内，设法赶印出了大批抗日宣传大纲、传单和口号。中山大学的校车也忙碌地载着宣传队和联络人员往来于石牌和广州之间，紧张地准备9日的全市学生抗日

示威游行。

9日上午，中山大学学生3000多人，早餐后集合在石牌新校孙中山铜像前举行抗日宣誓大会，宣誓仪式由农学院教授张农主持。我代表主席团向到会的师生作了参加全市抗日示威大游行的动员报告之后，3000多人的示威游行队伍象一股洪流涌向市区。队伍到文明路中山大学操场时，中山大学附中学生1000多人加入了游行队伍。数以百计的宣传队随着游行队伍向市民宣传。纠察队沿途保护着游行队伍免受特务分子的袭击。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知道这天全市学生要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立即下令市内各学校放假，命令各学校的校长驱散学生，关闭校门，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是，由于我们事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各学校的广大学生都冲出校门，陆续赶来加入了游行队伍。特别是广雅中学1000多学生冲出校门，全体赶来参加游行和抗日大会。到中午时候，示威游行的学生达1万多人。约下午2时左右，示威游行的队伍汇集到长堤新填地广场（今省总工会一带）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我和钱兴等人先后发表了抗日救亡的演说。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并推举我任主席。大会还一致通过了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南京政府推行妥协投降政策等决议。宣传队深入到周围的市民、工人中去进行讲演，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最热情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的钱兴同学，他不断地向市民发表热情的演说，动员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参加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由于宣传队员们不断地动员市民参加大会，使参加大会的人数达到3万人左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等

口号声震动广州城，全城沸腾了。

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结束后，同学们继续在市内游行示威，开展宣传活动。下午5时左右，游行队伍到了惠爱西路（即今中山五路），反动的广东省教育厅就在这条马路旁的将军西路内。我和扛红旗的钟远蕃等人在前面率领队伍游行。我们抗日大会主席团原来是没有计划要到教育厅门前示威的，但当队伍走近将军西路继续向东前进时，后面游行队伍的同学们大声呼喊起来：“到教育厅去示威！”“我们要质问教育厅为什么我们每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就下令放假和封锁学校？”我听了同学们的要求之后，就停下来和其他几位领队简短交换一下意见，就决定率领队伍到教育厅门前示威。当队伍到教育厅门前时，教育厅大门关着。游行队伍在大门前不断地高呼：“反对法西斯奴化教育！”“我们要抗日爱国的自由！”等口号，和质问教育厅：“为什么我们每次举行抗日游行，教育厅都下令放假？”过了约十分钟，仍不见有人出来。因为教育厅一贯反动，一再压制和破坏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学们的心中积恨已深，这时更是气愤至极，队伍中有人大声喊道：“我们冲进去！”这话音未落，一位朝鲜籍的中山大学同学已跳墙进去，把大门打开了，几百名参加游行的学生立即象潮水般一涌而入。同学们一边冲，一边痛骂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教育厅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一下子把办公厅的办公台椅捣得七零八落，玻璃也砸烂了。最后有的同学还把教育厅的招牌拆下来当作胜利品，抬回文明路的中山大学操场。下午6时半左右，游行队伍回到文明路的中山大学操场集中后，宣告抗日示威大游行胜利结束。

这次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广州“一·九”抗日示威大游行，和前两次抗日示威游行相比较，有几个明显的特

点：

第一、参加人数多。参加游行的学生 1 万多人，连同参加抗日大会的市民和工人共达 3 万人左右；

第二、发动面广。不仅全市各大、中学校基本上都有学生参加，而且还有一万多市民和工人参加了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

第三、组织工作比较严密。尽管教育厅下令“放假”，驱散学生，封锁校门，命令各学校的校长不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但由于事前组织工作做得好，全市各校的游行队伍还是能冲出校门，按计划参加了全市的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在全市学生的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过程中，秩序比较好，没有出现混乱现象和意外事故；

第四、统一指挥。不仅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有统一指挥，全市的大会和示威游行，都在统一领导的指挥下进行。

上述特点不仅反映了广州青年学生抗日热情的空前高涨，而且也表明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分散、自发地进行，发展到集中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一·九”示威游行声势浩大，并冲击了教育厅，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号称“南天王”的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听到学生群众冲击了教育厅时，大为震怒地咆哮：“这不是造反吗？学生既然今天敢打教育厅，明天就敢打我的总司令部。”立即召集他的文臣武将、政客学阀，申斥一番，要他们想办法镇压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果然，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很快就撕掉其“支持抗日”的假面具，使出屠杀手段来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和过去血腥镇压革命运动一样，国民党反动当局马上派

出侦缉特务四处查捕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通缉我和钱兴等主要领导人员。1月10日，我们听说广雅中学被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抗敌会的纠察队立即集合了300多学生，分乘校车多辆前去援助。到达目的地和广雅中学的同学汇合后，才知道是一个谣言。大家热烈握手，相约以后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在中山大学的支援队伍准备回校时，忽然有一个自称是广州市“工会”派来的人，向金昌华打听我，说“工会”要和曾振声联系。金昌华见这个家伙神色慌张，一身流氓气，知道不是好东西。于是对他说：“你要找曾振声吗？我们带你去。”这家伙跟上车来，到了中山大学，金昌华等把他领到一个房子里，一连给他几个耳光，揭穿他是破坏学生运动的坏蛋，追问他找曾振声干什么？如不讲明，就交学生群众公审。那个特务被吓得求饶，承认他是公安局派来的“侦缉”，并说公安局要逮捕曾振声。同学们知道抓到了特务，纷纷赶来要求痛打这个坏蛋。学校当局知道此事，赶忙通知公安局派人来把特务带走。从此，特务们天天到处追捕我和钱兴等人，我们被迫转入秘密活动。不久，我到了香港，去寻找党的组织领导及进行新的工作和斗争。

1月13日，发生了“一·一三荔枝湾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侦缉、流氓、特务，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旗号，对国民大学等学校近1000名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学生，大打出手，打死打伤爱国学生数十人。惨案发生后，陈济棠立即宣布全市戒严，到处通缉搜捕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骨干。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迫逃亡。中山大学学生粟稔、张凤楼、冯道先、朱文畅、禩万禾等多人陆续遭到秘密逮捕。经过钱兴、金昌华、黄焕秋、罗范群等进步同学开展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粟稔、张凤楼、禩万禾等同学保释

回校，但冯道先、朱文畅同学惨遭杀害。广州市学生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广州市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一·九”全市学生抗日示威大游行，给广州市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激起了汹涌的抗日爱国热潮。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山大学抗敌会印发的宣传品，不仅散发到广东各地，而且还散发到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祖国西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它不仅对全国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配合的作用，而且对后来我党在广东和华南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人民武装，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可以永远作证。

## “一二·九”前后在广州勳勤大学 参加学生运动的回顾

邹 峯

我小时候受大革命的影响很深。当时，我们家乡很多优秀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员，因而，使我对共产党十分崇拜。读初中的阶段，我到广州湾法华中学读书，该校校长是法国人。因当时听说在该校毕业后，成绩好的可免费到法国留学。但到法华学校以后，看到法国的学生欺负中国人；该校教国文的是清朝的遗老。教的是孔孟之道。我们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对孔孟这一套已十分反感，因而觉得在这里读书不对路。不到一学期，我就离开了该校，回家乡就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们廉江的中学生组织起宣传队到处演剧，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初中毕业后，我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考上了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勳勤大学的工学院。在这里，我逐渐接触到了社会的工业情况，看到封建割据对工业发展的阻碍，还要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工业的原料又要靠向帝国主义进口。我国工业发展的出路何在？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就开始找一些进步的书刊阅读。当时有一个叫黄玄的同学，他经常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读。从读书中，我逐渐懂得，在当时的中国搞工业救国此路不通，必须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出路。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对广州影响很深。广州学生纷纷举行示威，响应北平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12日，我们勒大的进步同学事先作好了游行示威的准备。当时正是学校考试期间，我们打算利用学生不愿参加考试的心理，发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黄玄布置我们到荔湾集合，他爬上学校的大钟，边敲钟边呼喊同学们出来开会。同学们涌到礼堂后，黄玄即站出来，提出停课，参加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游行，得到了同学们的拥护。当晚我们缴了校警的枪，作好了游行的一切准备。翌日一早，游行队伍就集合出发了，当游行队伍走到西华路尾时，遭到特务的袭击，我的手臂也被狠狠打了一棍。我在这次游行中的任务是负责联系全班同学到惠爱路动物园重新集合游行。事情发生后，我立即带领全班同学到动物园附近。在这里，我碰到了早在这里等候的程福高同学，他暗示我那边有特务，要我赶快离开。晚上，我们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沿途看到国民党军队架起了机枪，从西华路一直到学校的路口都有。学校门口也设了国民党的岗哨，我们只好决定暂时不回校。这天遭镇压的还有荔湾那里的游行队伍。这次事件，人们后来称之为“荔枝湾惨案”。

荔枝湾惨案发生后，广州的进步学生运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我们这时都是以读书会、歌咏团这些形式进行活动，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当时我还没有加入“中青”，但已接受“中青”的秘密考察，不久，黄玄给我一张参加“中青”要填写的表，填表后才算加入了“中青”。据我所知，1936年加入“中青”的还有陈恩同志。

1936年暑假后，教育学院和工学院搬到石榴岗，这时因离市区较远，特务监视没那么严，学生运动又活跃起来。当



时我们同学中组织了一个“活路社”，以提倡文艺，写文章、诗歌，出壁报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并以“活路社”为基础搞了一个“乡村服务社”，到土华乡开办一间小学，由勳大同学轮流教课，还在土华一带搞演剧。骨干仍是李锦波、苏宏、秦子葵、王书光、廖文许等人，后来又吸收了陈能兴、林敬文参加。

这时，北方的共青团已解散，南方接到中央关于改造共青团的通知晚了一些，时间大约是在1936年底。有关上级组织根据改造共青团的通知和针对“中青”当时有关关门主义倾向，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抗日形势这一情况，决定把“中青”解散。当时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拼命找党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现在又要把它解散，思想上很难接受。解散“中青”这天，勳大“中青”成员在石榴岗划船到黄埔附近一个小岛上讨论，大约有30人左右，正式宣布把“中青”解散，主持的是李锦波或王书光。当时林振华也是“中青”的负责人，但他很少出面主持活动。会议也有广州其它学校的一些人参加。勳大“中青”成员现在还能记得其姓名的有：黄玄、李锦波、廖文许等人。在这次会上，宣布解散“中青”后，即讨论成立更广泛的群众组织。开始有人提议成立“民先”，但经讨论认为“民先”已受国民党注意，因而不采用这一名称。于是，决定组织“救亡先锋队”（简称“救先”和“广州学生救国联合筹备处”（简称“学筹”）“救先”不等于“抗先”，“抗先”是后来才成立的一个公开组织，而“救先”却是一个秘密的组织。当时进步力量较强的那些学校几乎都有人参加“救先”。“救先”在“学筹”领导下活动，“学筹”由几间主要的学校派代表组成秘书处作为领导机构。头一届勳大的代表是王书光（王文）。1937年暑假，王书

光毕业，由我续当勤大的学筹代表，与我同一届的其它学校的学筹代表有：中大的黄泽成，广雅的王万吉，女中代表吴凤珠，执信的容惠兰，仲凯农工的李果，市一中的陈良堡，市美的莫志军，真光女中的杨曼霞（现名何珍，曾在中央监委工作），女师的余惠珍，中大附中当时好像没人参加“学筹”。这段时间里，勤大党支部由我当书记，党员有：陈能兴，欧葆龄。李锦波代表上级组织领导我们支部。直到“救亡呼声社”成立，我的组织关系才转为个别领导，由一个在邮电局的工人联系我。

1937年上半年，“学筹”、“救先”积极分子准备成立市学联，正在做筹备工作。6月左右，正是放暑假期间，从北平回来的吴华同志在中大秘密报告民先的情况及分析当时的形势，“学筹”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积极争取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但受到国民党市党部的压制。他们搞了一个“广州学生抗敌御侮救亡会”（简称“学抗会”），动员学生个别报名参加，企图以此控制广州青年运动。我们根据党公开进行抗日活动的策略，凡有抗日的组织都想办法参加进去，很多人参加了“学抗会”。此时，省里搞了一个“御侮救亡会”，每一百会员就派出一个指导员作为领导。我们也动员了一批“救先”骨干分子参加，并争取得到指导员的名义，去组织工作。当时的榨油工会，码头工会，印刷工会实际都由我们所掌握。

广东省党部和谌小岑也想拉青年，成立全省性质的“广东青年抗日同志会”，成立后要各校，各县组织分会作为基层组织。于是，他预先准备了一批人作为该组织的骨干，打算在该会成立后，派他们到下面组织基层组织，以此来控制全省的青运。这一消息被卓炯（当时在公安局当训政处长）知

道，他透露出来，告知杨康华（当时名虞焕章）。杨康华立即把这消息告诉“学筹”的同志。我们学筹几个秘书连夜分头通知“学筹”的骨干，争取参加到“广东青年抗日同志会”中去。

翌日，“广东青年抗日同志会”召开成立大会，100多“学筹”积极分子到场。选举时选出的十几个执委几乎都是我们“学筹”的人。这十几个人中有：杨康华、卓炯、邓明达、龙世雄、黄泽成、王万吉、何希齐等人。我原来打算不参加这天的会议，以免暴露身份。后来王书光通知我到会场观察，以便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因此，这次成立大会我也参加了。谌小岑看到这么多人参加成立大会，十分高兴，认为要大搞一下，继续吸收会员。当时我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李锦波，我把这天大会的情况向他汇报后，他与我分析了卓炯、何希齐、谌小岑（他们都不是“学筹”的成员）等人的情况，并决定立即组织各校分会，把这些基层组织也掌握起来。

但是，一个星期后。国民党市党部CC派的邢心洲等人反对成立“抗日同志会”。他们警告谌小岑说：这个团体今天是你们的，但明天就不是你们的了（意指让共产党夺去）。谌小岑仍要继续搞，他们就勒令我们办公所在地那里的人不让我们在那里继续办公，迫使这团体解散。但谌小岑仍想利用我们的力量，因而多次召开我们几个执委的座谈会，借以维护我们这些人。后来，决定由我们几个执委组织起来，成立“救亡呼声社”，办一刊物，名为“救亡呼声”。谌小岑每期都有文章，但主要是我们的同志撰文，如易杨、我、卓炯、梁威林、吴华等人。同时，同学还利用“救亡呼声社”发展社员。后来平津一批流亡学生组成的平津同学会也参加到了“救亡呼声社”来，充实了我们的力量。

当时余俊贤也不甘寂寞，他利用勳大薛超、姚中雄搞“青年群社”，也办一刊物，名为“青年群”。救先”的中共党员黄玄、章沛、谭丕桓、李琼英、王磊等人加入了“青年群社”。

1937年底，我们认为这样搞还是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于是就有了组织“抗先”的酝酿。谌小岑对酝酿成立抗先也十分积极，他告诉我，国民党军委六部（当时是国民党领导群众或青运的一个部门）有一个计划，准备成立青年群众组织，如果把青年组织起来，成立抗先，很多物资都可以得到解决。要帐篷有帐篷，甚至可以得到枪枝。要我们放手去搞。这时，国民党正酝酿成立三青团。据我估计，谌小岑当时是打算把青年组织起来后，一旦三青团建立，他就要把这些青年组织变为三青团，这就能把广东的三青团组织抓在他的手上。这是他为什么如此积极支持筹建抗先的原因。我们也有自己的打算。我们认为，学联既然不能成立，形势发展又要求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武装或半武装的青年组织，因而也有成立“抗先”的愿望。于是，我们通过石榴岗的大露营来动员青年参加。露营会上，请了云广英来作报告，国民党省、市党部也有官员来参加。在露营会前，党指示我们，要赶快到群众中去，组织、发动群众，不要仅在我们几个人的小圈子中活动。当时工人群众只有榨油工会，印刷工会，苦力工会等几个组织为我们所掌握，以后要通过“抗先”来发动更多的群众进行抗日。

大露营后，“抗先”成立。当时我了解到土华一带农民有不少枪炮，我们曾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的情况较熟悉，于是，我与陈恩等人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土华独立支队的名义留在土华村搞抗日宣传，由邓明达当队长，我当副队长，陈

恩当政委。我们在土华搞演剧，唱歌，搞识字班，吸引了很多群众来参加抗先，十分热闹，我们把这里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后，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派了朱荣同志来加强我们的力量。当时搞活动需要钱，我利用在“救亡呼声社”当总务这个职务，在“救亡呼声社”的活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来供抗先活动使用。钱用完了，就通过邓明达向谌小岑要。

谌小岑听到我们在土华的活动十分高兴。他说：国民党四路军三〇五师要组织农民武装自卫团，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参加，你们青年人一个星期就能把这么多农民组织起来，值得好好总结经验，要我们马上把经验总结出来编写成小册了，由他出钱印发。

1938年2月底，谌小岑被国民党逮捕。在这之前，“救亡呼声社”的文章已受人攻击。有一天，有人把一本“救亡呼声”寄回来，在谌小岑写的一篇文章上划了红杠。谌小岑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有人认为开放民众天下就是共产党的了，试问，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共产党你要哪一个？”国民党顽固派的人就在这篇文章中划红杠，并批语：“投降共产党的媚词”。我们收到这本书后，拿给谌小岑看，他一笑了之。我们当时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大意，估计到可能会出事。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夜很深了，谌小岑的老婆慌慌张张跑到“救亡呼声社”来，把邓明达叫了出去，低声耳语几句后，邓明达就转了回来。邓明达回来后即告诉我说：“谌先生被扣留了”。我听到这消息后，立即警惕起来，连夜跑出去找我的领导人汇报。这人叫什么名字现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到他家后，是执信中学的周倩芳出来给我开门。我把情况向他汇报，问他形势是否会出现逆转，他与我分析了情况后认为暂时不会，要我把情况详细了解清楚后再向他汇报。

几天后,我才了解到蒋介石密令余汉谋把谌小岑扣留,其原因是没经上级同意,擅自在香港搞国际情报,并非为搞“救亡呼声社”。不久,谌小岑被押到武汉。

谌小岑被捕不久,约在 1938 年 3 月,我和方林(司徒艳)、方舒 3 人由省委派到延安,从此离开了广州。

1986 年 9 月

(整理人:黄穗生)

# 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

刘汝深、温焯华、  
温盛湘、谭丕桓、叶焜寰

## 一、火红的年代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浪。迅速得到全国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中山大学为中心，广雅、中大高中部和附中、女师、女中、市一中、教忠、大中、知用、执信、民大附中、勳勤大学工学院和附中等校为基本力量的广州广大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阻挠，走出校门，涌上街头，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从12月12日起，展开了持续1个多月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连续举行了4次示威游行，举行过有1万多群众参加的广州学生市民抗日大会，成立了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在第3次示威游行中，学生们激于义愤，冲进了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省教育厅，拆下教育厅的招牌，戳穿其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激励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

中大高中部和附中学生，在爱国斗争中有光辉的历史，在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参加了4次抗日示威游行，及

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的活动，在市区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参加广州民众歌咏团及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锋社话剧社的抗日话剧演出，1937年初由温盛湘、叶焜寰、张寿南（温焯华）等“中青”成员创办在书店公开发行的《游击队》，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青年学生中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

## 二、革命摇篮时期

中大附中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是经过“九·一八”反日运动的洗礼，逐步提高政治觉悟的过程。中大附中早在法政路时，附中学生已有进步思想萌芽。当时校里就有张海鳌、谭希吕、官亦民、崔真悟、莫宝铿等进步的老师任教，他们介绍进步刊物给同学阅读，平时接近同学，讲五四运动、鲁迅文学、新文化新文艺，谈民族危机、中国出路，对同学们教育很大。生物课老师丘峻，上课时衣袖上挂着袖筒，上写：“毋忘国耻，振兴中华”说：“愿同学们努力，奋发有为！”使同学深受感动，至今忆起，犹感亲切。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以中大为首的广州学生掀起抵制日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发生了“永汉路惨案”。中大附中参加这场爱国斗争，激发了爱国热情，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和农村宣传抗日。1933年以何干之、温盛刚、谭国标等人为主成立的“广州文总”、“社联”，他们在中大、女师、民大及中大附中等校发展组织及进行读书会活动，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团结一大批青年。中大高中部李克筠、吴华等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剧社”，开展抗日救亡话剧演出活动，对中大附中和大学部的同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时又发生过反对附中训育主任杨仲民的专横行径的斗



争，大长了进步同学的斗志。

附中同学当时喜读上海“左联”作家的文章，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苏联革命文学作品：《母亲》、《静静的顿河》、《我的大学》、《铁流》及鲁迅杂文、茅盾、巴金、丁玲、蒋光慈等人的文学作品。每当读完一本，就聚集在一起谈感想和心得，向往革命和光明，形成“读书会”的组织活动，涌现了许多爱国进步的活跃分子，“一二·九”运动后，都积极投身到革命行列。

### 三、站在广州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前列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前的全国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青年失业严重，民生困苦，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青年学生甚为苦恼，寻求出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端不满，要求反蒋抗日，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1934年秋，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被破坏后，党的组织活动暂时中断，但散处各方的个别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对广大青年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主义，介绍苏联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对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并没有停止。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何干之等著名学者担任中山大学、国民大学的教学工作。他们出色的讲授，吸引和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中大高中部就有很多同学跑到石牌中大大学部、民大听他们讲课，向往着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迫切要求共产党领导抗日救国，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1935年，在全国抗日高潮前夕的

时刻，王均予于是年7月从上海来到广州，建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青年同盟”。在广州一部分大学和中学以及东莞、中山、肇庆新会等县，建立“中青”组织。在中大高中部先后发展了一些成员，张寿南（温焯华）、陈柏昌、叶焜寰、刘汝琛、周匡人、谭丕桓、杨瑾英等，他们在广州“中青”领导人王均予、邱萃藻的指导下，在中大高中和附中广大的学生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许多同学的进步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涌现了一批先进分子，为中大高中和附中同学参加“一二·九”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作了组织和思想准备，“中青”成员和进步同学团结一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成为中大高中和附中学生爱国斗争的骨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四、风雷滚滚的日子

风雷滚滚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北平学生掀起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2月9日抗日示威大游行的消息，象一声巨雷传到广州。石牌中山大学的学生轰动起来了。以中大为中心的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浪涛翻腾，激动人心！

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中大高中部“中青”成员同进步同学一起奔走相告，引起了强烈反应，学校大院内沸腾起来。大钟楼门前，图书馆门口，西一楼下宿舍，教室、饭堂都贴出了海报，校内到处聚集着人群。他们在交谈、议论，在宣传、鼓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中青”成员和其他读书会的进步同学在共同目标下，汇集和团

结在一起，他们在中大高中“中青”负责人布置工作下以公开和秘密的形式展开活动，推动中大高中和附中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

12月10日晚，中大高中部在校寄宿同学在宿舍开会，讨论召开全校师生抗日救亡大会，并决定派人到石牌大学部联系。11日晨，接到大学部紧急通知我们派代表参加翌日在石牌举行的全校学生抗日大会。经过各班同学酝酿后，高中部由陈柏昌、周匡人、刘汝琛和叶焜寰参加大会，当时还有很多同学自动到石牌去。那次大会到会人数很多，礼堂坐满了人，部分教职员工也参加了。大会一致热烈通过“通电”，要求全国实行抗日，并决议即到广州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当天中午，高中部和附中张贴了海报，传达了大会决议。整个学校大院立即喧腾起来。当日石牌大学部“中青”负责人钱兴和钟远蕃分别和高中“中青”成员进步同学交谈，布置和发动、组织群众游行工作。高中部“中青”成员和进步同学分头到各班开展宣传鼓动，与同学们一起，准备游行旗帜标语和队伍前头的巨幅红布横额。

12月12日中午，中大大学部学生抗日示威游行队伍从石牌出发了。文明路中大高中部的上课大铁钟响起来，高中、附中的同学迅速地集合队伍，高举巨幅横额，挥舞着旗子、标语、传单，雄纠纠地从学校大门出发，到东较场汇合从石牌来的大军。附中教英语课的关恩左，数学科叶述武、语文课何文炯等老师热情地参加我们的游行，站在队伍的前列。同学们多年来被压抑着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心头怒愤一齐涌了出来，高唱救亡歌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响彻云霄。马路两旁群

众欢呼鼓掌。游行队伍到下午四时散队回校。

第一次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游行后，中大高中部同学在文明路中大校部召开了学生抗日大会，有进步教师参加，这是进一步发动中大高中、附中同学参加抗日运动的大会。当时国民党当局派特务来捣乱，激起同学们义愤，有几个同学挺身而出进行斗争，那些特务见势不妙，就灰溜溜地跑了，大会顺利地举行到结束。

这次示威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的沉寂空气，使华南地区群众运动开始一个新的高涨。

12月13日中大同学再次召开了抗日大会，决定组织宣传队。从13到16日一连几天，中大高中部和附中同学一同在市区街道和广场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组织队伍到广州各校串连，广雅、女师、勳大、民大、执信、教忠、知用、大中等校很快地行动起来。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使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12月17日石牌中大同学又召开抗日大会，通过“停课十天，下乡扩大抗日宣传”的决议。高中部和附中的同学组织队伍，到韶关、三水、佛山、惠州等地展开宣传。

下乡回来后，中大高中部“中青”成员周匡人、刘汝琛、叶焜寰等常到石牌大学部与钱兴、曾振声、粟稔、钟远蕃等“中青”成员联系，研究分析抗日运动形势。当时钱兴等住的宿舍经常聚集同学，成为当时学生爱国斗争的大本营。钱兴谈到国民党当局企图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指使“抗声社”分子把持学校抗日运动领导权，包而不办，对此，必须团结全体同学和教职员工进行斗争，把抗日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过来。

12月30日，石牌同学再召开大会，会上进步同学斥责“抗声社”破坏救亡运动。大会决议撤销他们在全校抗日大会主席团中的席位，选出以曾振声为首的新的中大抗日大会主席团，大会决议，筹组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12月31日举行第二次广州市学生抗日示威大游行和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30日晚在石牌举行了爱国野火会，12月31日第二次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游行，中大高中、附中同学积极参加了这次抗日游行。

1936年新年开始，中大同学又面临新的斗争。中大校长邹鲁从南京回来后，企图取消由进步同学掌握的中大抗日救国会筹委会，代之以教职员占多数，完全由邹鲁支配的中大抗日会，并定1月6日对学生“训话”。进步同学分析了中大形势，认为邹鲁企图从组织上控制学生运动，达到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决定在同学中揭露这个阴谋，准备利用邹鲁“训话”机会召开学生抗日大会，正式成立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并在石牌学校大院到处贴写标语：“反对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爱国同学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那时中大高中部主任刘克平亦叫高中部秘书瞿从圣，训育员王观舜分头向同学讲话，又请来大学部“抗声社”的学生黄弘通到附中来活动。瞿从圣说什么大学部有些学生受共产党利用，煽动学生闹事，扰乱政府救国方针。说什么学生的宣传要由政府和学校指导下进行，不能越轨。又说高中部亦有几个坏学生，专门造谣生事。同学们则报以顿脚、刷地和“嘘嘘”声。瞿在高中甲部三A班讲话时，同学们质问他：“学生爱国是不是犯法？宣传抗日是不是坏学生？”瞿理屈辞穷，非常尴尬。

1月6日早上，石牌中大礼堂挤满了3000多学生，中大医学院、中大高中部和附中学生都赶来了。礼堂贴满了标语漫画，当邹鲁“训话”讲到“蒋委员长抗日自有分数”时，同学们捺不住满腔怒火，不断发出“嘘嘘”声，使邹鲁异常狼狈。当他蛮横地宣布要成立由学校领导的抗日会，取消原由大会选出的筹委时，全场骚动起来，高呼口号“反对包办抗日！”邓初民教授上台讲话了，他慷慨陈词，更给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邹鲁和法学院院长郑彦棻企图控制和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粉碎了。就在这个大会上，由全体同学连同部分教职员工，选出中大抗日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会。当晚开了执委会议，高中部陈柏昌也参加了执委。会议决定组织1月9日广州市学生第三次抗日示威游行。

会后，中大高中部的周匡人、杨瑾英、叶焜寰等分别到女师、广雅、大中、教忠、民大附中等校联络发动。大学部与高中的“中青”成员也紧张地展开活动。

广东省教育厅侦知广州学生又要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下令市内各中学放假，企图驱散学生，封锁校门，但是，同学们警惕着当局的阴谋破坏，坚持不离校。8日晚，广雅的莫福枝匆匆来到中大高中部，找到叶焜寰等，讲广雅当局企图封锁校门，不让出来游行，派来警察巡逻，空气紧张。叶焜寰即陪同他到石牌找到钱兴，研究斗争办法。决定在广大同学中揭发当局放假是破坏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阴谋，要把同学组织起来，坚持不放假离校，积极参加抗日游行。

1月9日上午，中山大学同学3000多人高举横额、旗帜，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集中在文明路中大高中部大操场，加进高中、附中同学1000多人的队伍，继续游行。市女中、女师、执信、大中、教忠、知用、庚戌、仲元、市二中、民大

附中、勳大各学院和附中等校也有一批同学相继加入游行，特别是广雅中学 1000 多同学冲出校门和警察封锁线与游行大队汇合，使游行队伍多达 1 万多人。同学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先安内后攘外！”“反对内战，一致对外！”，队伍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马路上、墙壁上用石灰水写大字标语，纠察队挂上臂章沿途警卫。队伍到长提新填地广场，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号召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南京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等决议。同学们高唱救亡歌曲，附中学生演出街头话剧，钱兴沉痛地慷慨激昂地演讲，很多市民参加大会，人数激增到 3 万余人。会场上万旗挥动，群情激愤，口号声、救亡歌声、演讲声，交织在一起，新填地广场变成抗日的海洋。队伍游行到 5 点多钟，到达惠爱西路近“将军西”时，有些同学提出到教育厅示威，质问为何下令放假，封锁校门，阻挠学生爱国游行？经过商量后，队伍游行到教育厅，当时教育厅大门虚掩，空无一人，同学们高声呼喊教育厅长：“黄麟书出来答复！”并高呼口号。很久无人出来见面时，群众愤怒，有人大喊：“冲进去！”于是大家一面冲进去，一面大骂国民党政府压制爱国学生运动，一齐动手，把教育厅的办公楼的门窗玻璃打碎，中大附中 10 多个同学叠起人梯，爬上高处把教育厅招牌拆下来，抬回文明路中大高中大操场。

1 月 9 日广州市第三次学生示威游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共鸣，激发起爱国的心声。中大高中部高三丙班以班会名义，由班长领队组织 20 名同学下乡到韶关、始兴、南雄一带进行抗日宣传。他们虽然在途中被国民党强迫返回广州，但他们抗日爱国热情始终不渝。

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广东当局的震惊和仇视，要使出凶残的手段来血腥镇压了。首先派出大批流氓特务到中大、广雅等校监视学生行动，对进步同学跟踪盯梢，到处乱窜，打听曾振声、钱兴等同学的消息。在中大高中部则对学生加强管理，夜间，训育员巡视学生宿舍，防止学生抗日活动。

1月10日，民大附中为反对学校当局提前考试和放假，反对法西斯军训，由学生会主席唐凌鹰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议于1月13日发动示威游行。12日派同学到石牌中大和高中部要求支援，中大决定发动同学列队参加，高中部“中青”成员和他们见了面，并决定组织同学参加游行，约定在财厅前汇合，随后，他们又到勳大工学院、大中、教忠等校联络。

1月13日清早，民大附中同学举行全校学生大会。会后整队出发游行。九时许石牌中大近百人的队伍到达荔枝湾去汇合，合计约近900人。当游行队伍走到荔枝湾桥头，迎面来了几十人，打着“广州市民抗日锄奸团”的旗子，开始同学们以为是来参加游行的市民，但这帮流氓坏蛋一下子挤抢上来，扔下旗子，大喊“杀呵”，挥动铁棍、刀斧、亮出手枪冲过来就打。一时枪声大作，同学们英勇地与这帮匪徒搏斗。群众呼叫声、枪声、棍声交杂在一起，路人纷纷走避。学生队伍被冲散了。有几十个同学被打伤流血，民大附中有几个女同学伤重倒地，后抬进医院。有几个中大同学当场被抓去。中大高中部和附中正集队到财厅汇合，消息传来，不能去了。

“荔枝湾惨案”后，陈济棠发出紧急布告，宣布全市戒严，封锁港澳交通，出动大批军警日夜巡逻，石牌路上禁止市民来往。何思敬、邓初民等进步教授被迫逃亡。中大学生粟稔、



张凤楼等多人陆续被秘密逮捕，冯道先同学就是在这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中大高中部爱国学生的宿舍被封，又派宪兵到住房搜查，广州白色恐怖乌云满天。

事后，广州“中青”领导人王均予曾指出，要发动学生群众，组织“荔枝湾惨案”后援会，发表告民众书，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血腥罪行，援助受难者的家属。同时指出，要避开国民党大逮捕大屠杀的锋芒，发动爱国群众转移到农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张定邦、张寿南就带着10多人到东莞农村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达月余，1936年春张寿南返校时就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籍。

“荔枝湾惨案”后，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虽一时处于沉寂，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爱国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了。经过短时间沉寂，“中青”、“突进”成员和进步群众于1936年夏季以后，推动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活动，使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泛深入开展起来了。开办民众夜校，成立1000多人的民众歌咏团，创办话剧社，出版革命书刊，组织时事讨论会等，灵活运用这些形式和手段，开展抗日宣传，进一步团结广大青年。1936年夏秋相继建立了“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锋社话剧团”、“儿童剧团”、“世界语踏绿社”、“蓝白话剧社”等。1937年春出版的《游击队》月刊就是当时新的形势下创办起来的。中大高中、初中不少同学分别参加了“广州民众歌咏团”、“广州艺协”、“锋社”、“世界语”等团体的活动。

1936年7月前后，薛尚实、王均予在天津北方局领导下，

重新建立和发展广东党组织。“中青”、“突进”的积极分子多数被吸收入党，从此，“中青”和“突进”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广州青年抗日运动逐步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七·七抗战爆发，在我党领导下，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开展起来，抗日救亡运动就进入了公开合法阶段。当“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大高中和附中就成立了“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随后中大也成立了“中山大学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后他成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大附中的同学如陈恩、虞成章、王荣耀、温盛湘等都是当时活跃的积极分子，在党培育下涌现出来的优秀学运骨干。

中大高中部和附中的同学，经过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经受了斗争的考验，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在党的革命事业的伟大斗争中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1984年11月13日

## “一二·九”前后广雅学生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片断回忆

莫福枝

“一二·九”前，在广雅中学部分同学中，思想比较活跃，中国往何处去？个人的出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政治上，我们对陈济棠的反动政府深恶痛绝。对他们搞的“明德社”以至法西斯蒂（墨索里尼送过一架专机给蒋介石）统统都加以否定和鄙视。在广雅，则对操纵学生会的周祥光等人，都看作是林翼中、霍广河奴才。

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取缔的和朋友们认为进步的书刊都想方设法去搜集，拿到这些“禁书”就废寝忘餐地去阅读。当时，我们10多位同学组织一个公开的读书会，名叫“励社”，不到一个月，即被校方解散，理由是已有了学生自治会就不得再组织其他会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化整为零，分头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去寻找进步的读物。我通过在东莞读书时的初中同学张寿南（即温焯华），在财厅前的那间“神州国光社”书店（后改为秀山书记），经常搞到一些禁书，如日本河上肇的著作，《读书杂志》，任卓宣论中国革命和胡秋原、严灵峰、杨邨人等人写的文章和书籍，又从辛垦书店买到许多书，见啥吃啥，囫圇吞枣，煞费心机。其次通过各种关系去认识和结交要求进步的朋友。中大钱兴、粟稔、张克明等

人就是在这时认识的。从他们那里弄到了《国家与革命》、《辩证法讲义》、《世界语义》、《巴黎时报》等，并在钱兴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在钱兴等人的帮助和上海《读书生活》、《大众哲学》、《大众日报》等报刊的启发下，对所读的书刊逐步辨别了真伪，认识了任卓宣和辛垦书店出版的书刊及胡秋原、杨邨人等人的书许多都是有毒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广雅高初中许多班级的同学中，都有了读书会的活动，这些读书活动，使我们思想进步很快，为后来参加“一二·九”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首先由中大搞游行示威，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当时广雅管理很严，星期六晚才准学生回家住，其余时间都集中在校宿舍。这样，造成学生相对集中，思想交流较容易，进步同学在晚饭后散步时就可以谈思想、谈形势，互相交流情况。所以，广雅中学当时表面很平静，实际上思想是很活跃的。中大的游行示威对广雅影响很大，广雅同学群情激愤，摩拳擦掌，认为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中大第二次大游行后，钱兴来通知我们，1月9日到新填地开会，问我们是否参加。张寿南、陈柏昌也把到新填地开会的消息告知我们，我们知道消息后，就在各班串连好，8日晚，我们召集各班较进步的同学在广雅操场边的旧屋里开会，会议中认为要把中大游行的时间了解确切一些，以便响应。于是，派我与另一同学到文明路中大附中找张寿南、陈柏昌，又和附中的叶焜寰一道到中大找钱兴，但钱兴不在，却找到了钟远藩、韩瑶初等人，了解到游行时间是1月9日下午。于是，马上回校把游行的时间告知同学，共同作好了准备。

翌日，上午上课时，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活动已有所觉察，

放出谣言说：今天共产党在新填地发面包，收买贫民搞游行。企图恐吓学生。但我们进步的同学对学校当局这一套不予理采。首先布置了同学控制学校的3个电话。具体办法是：派3个同学到广州，分别不断向学校3个电话机挂电话，以此占用学校的电话线，使学校无法通过电话与外界联系，然后等游行时间一到，就发动同学冲出学校参加游行。

下午，广雅全体高中学生正在操场军训操练。利用这时高中学生都集中在操场这一机会，我们对同学说：军训操练目的是为了打日本，现在广州市正在进行抗日游行，我们快去参加！带头冲出学校。高中有几个同学平时与初中同学较熟悉，他们立即到课室通知初中的同学一起参加游行。结果，这次游行，广雅全校1000多学生都参加了。

到新填地后，中大的曾振声讲话，一些同学撒传单，高呼抗日口号，接着就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西门始散。当部分东行的队伍到达教育厅时，中大及附中的同学要求教育厅长黄麟书出来，打算质问他为什么不准学生搞抗日活动。但黄麟书不敢出来，附中的同学一怒之下，就把教育厅的招牌摘了下来，带回学校操场砸烂。我们广雅的同学则到现荔湾医院的地方（当时是一片空地），在哪里开了一个会，商量如何坚持抗日救国，然后回校。晚上，各班代表集中，商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决定：一、保持与中大的密切联系；二、成立广雅学生抗日救国会；三、要求学校同意我们下乡宣传抗日，搞抗战教育。会议过程中，有两个外面的人要求进校，声称前来找同乡。那同学说他们两人是公安局的侦辑。于是，同学们把他们赶走，把学校大门关了起来。由于出现了这件事情，同学们紧张起来，于是决定成立纠察队，推出高三的钟

文钜（现名钟达明）、高二的魏南金 2 人出来担任正副队长，挑选身体强壮、富有政治热情的同学当纠察队员，轮流在校内站岗放哨。把学校的童子军棍和一些铁棒作为武器武装起来。

翌日，1936 年 1 月 10 日早晨，我们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把昨晚班代表会上的决定向同学们宣布。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公安局的侦辑和武装警察正在集合，准备包围广雅中学。学校同学顿时紧张起来。有一同学打电话到中山抗日救国会，要求他们支援。于是，中大就由纠察队长冯道先带领两卡车中大的同学前来援助。在广雅门口，我们发现一个大汉坐在石桥上，还向中大的同学打听哪一位是曾振声。另一个人在学校的旁门要求进校，与学校纠察队纠缠不休。在路边还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来来往往，形迹可疑。广雅一些同学见状，就高呼：“有狗！”冯道先等中大同学闻声即跑了过来，首先抓住在石桥那大汉查问，见这人支支唔唔，中大的同学就把他抓上校车，带回中大去。后来，冯道先在荔湾惨案时被特务抓去秘密处决了。

几天后，学校总务长胡启从学校逃出来，把学校的情况告知校长霍广河，霍广河即打电话回校，同意学生下乡宣传的要求，并发还同学的伙食尾（伙食费余款）。我们立即进行编队，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宪兵司令利树宗带两连宪兵进驻广雅，我们知道后，为避免发生意外，立即通知同学出发下乡。为与下乡的各队同学保持联系，我们主席团的几个人集中在一起，开始在广州一个同学家里作为落脚点，后来到了香港，在叶纫锋姐的锁厂住了下来。寒假过后，我们回广州时，荔湾惨案已发生，我、梁茂鸿、余鲁南、伍丕舜、刘

伯怡、黄家驹等 10 人被学校开除。

荔湾惨案发生后，霍广河想软化学生，在校门搞了几间小食店，开麻将铺，让学生到社会上参加舞会，以转移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注意力。但适得其反，学生到社会上与广州的教忠、女中、女师等校进步同学来往密切；“中青”在青年会搞歌咏团，广雅不少同学参加了进去，这些，都使同学们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我们被学校开除后，霍广河答应我们，如果不继续在广州“招摇过市”，可帮我们转学到惠州三中。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到了惠州三中读书。在惠州三中，我们继续搞抗日宣传、搞壁报。学校觉得我们搞抗日活动影响了他们那一套教学秩序，于是孔校长又把我们赶走。

我们回到广州找霍广河，逼使霍同意我们参加毕业考试和送我们去会考，但不让我们上课。这时，我们每天到伍丕舜家里去聚会，交谈情况。

1936 年 6 月，广州学生准备搞反会考游行，反对奴化教育，要求实施抗战教育，我们从钱兴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也准备参加到这一斗争中去。游行的前一天，参加反会考的主要成员集中在广州珠光路珠光里梁××同学（十九路军少将梁华胜之子，当时是培正中学学生）家开会，被国民党特务知道，先后抓走了很多人。

国民党是通过一个在中山医学院当杂役的特务知道我们反会考的情况的。这人曾参加过省港罢工，熟悉我们秘密活动的方式。“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派他到中山医学院，他发觉药剂师马和德喜欢看大众生活等进步书籍，认为他是左倾分子，于是有意与马和德接近，还讲搞抗日仅我们两人

不行，要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干，于是，马和德就把梁茂鸿、刘伯怡、钟文钜等人介绍与他相认识，并约定找一天在越秀山的一间茶楼会面。但这天钟文钜、梁茂鸿都没去，只有刘伯怡等人去了，在这次约会中，那人提出成立红军第四支队，但刘等觉得与红军没有联系，用红军的名义活动不好，于是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先锋队。因此，刘伯怡、钟文钜、梁茂鸿等人后来被特务抓去了。

另外，在珠光里商量反会考的几次会议，这特务每次都去参加，把里面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报告。因此，特务就在反会考游行的前一天把各校搞反会考斗争的主要成员抓走了。广雅参加反会考会议的代表是钟文钜，他也在这一天被特务逮捕。叶纫锋见钟文钜去开会很久都未回来，就到珠光里找他，也被特务抓去。伍丕舜原想到珠光里打听反会考的消息，到那里后也被抓了。黄家驹翌日知道伍丕舜晚上没有回家，就到珠光里找他，结果也被抓去了。钱兴当天本来不是去开会的，他在中大的路上拾到一张托派的传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破坏学生运动，为通知开会的人员不要上托派的当，到珠光里去，也被抓走了。被抓的人中，马和德因经不起拷打而变节。

这次珠光里事件，广雅共被抓去6人。香港的《珠江日报》用大字报道这则消息，说广州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主要人物都已落网等。

1936年秋，我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读书。当时，陈济棠刚垮台。蒋介石势力统治了广东。新来的统治者比前任更狡猾更残忍。在青年方面，“一二·九”运动后，经过了多次大的群众运动和斗争，我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不断扩大，抗



日救亡运动出现了一个广泛深入发展的有利形势。

（整理人：黄穗生）

## “一二·九”前后大中中学 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

董世扬

大中中学是一间私立学校，学生多是只管读书不问政治。但是“九·一八”东北沦亡，华北危急，国难日益深重，而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贪污腐败，使爱国青年忧心如焚。在进步书刊的传播和要求革命的同学串连下，大中中学部分同学也觉醒起来，打破一潭死水的局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3年在初中读书的梁奇达、梁柏生（梁湘）、潘先廉、吴鹤筹、罗瑞香等同学在国家危难、政府腐败黑暗中找寻出路，先后受到同住学生公寓的同学和通过同乡的介绍认识勤勤大学进步同学林振华、邱萃藻的影响，接触进步书刊，进而组织读书会，并联合校外进步同学组织“春天文艺社”。邱萃藻和上海地下党负责发行工作的王均予有联系，经常收到党内的一些传单和报刊，在进步同学中传阅。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34年冬，梁奇达和梁柏生读了“论苏区目前形势和为发展五十万工农红军而奋斗”的传单，情绪激昂，跑回开平家乡拿了钱，准备跑到江西投红军去。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红军开始转移，才没有成行。

1935年夏，王均予因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跑到广州来，邱萃藻、梁柏生等负责帮助他掩蔽起来和给予生活的照顾。他们曾在越华路附近单独租了一套房子住在一起。王均予在广州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他们这一群先后参加了组织，梁奇达这时在大中毕业转学到江村师范，他参加了“中青”并在那里发展组织。梁柏生参加“中青”后负责刻印王均予通过各种关系接到的党内秘密材料，在“中青”和读书会中散发，在进步同学中传阅，扩大了影响，团结了一批同学。如读书会的邬维梓爱好打篮球，他就在大中的校队中影响了卢觉先（卢动）、张中等，组织他们参加读书会。梁柏生因负责关照王均予和刻印内部刊物工作，不便参加公开活动，只在同学中个别串连教育。后来王均予北上找到组织关系，汇报在广州的工作情况，得到批准回到广州建立地下党组织，首先便在“中青”的成员中发展党员。梁柏生参加党后，负责起联络工作，在香港地下党负责同志在广州找王均予，便先到大中中学找到梁柏生，弄清情况，没有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然后才引见王均予。

同在这一年春，原在广雅中学高二读书的章沛，由于参加邱萃藻组织的读书会等活动，受到班主任的注意，便转学到大中中学。他在班的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组织读书会，并联系校外的一些进步同学。他参加“中青”后，在同班同学中发展了容兆麟、叶文昭、叶镜澄等，并负责联系广雅、培桂中学的小组，和组织“星光文艺社”、“救亡工作者协会”等组织，出版秘密刊物。

这时，在大中中学“中青”有两个小组，各自在自己的周围同学中活动，团结教育一批同学。但由于保密的需要，他们没有横的联系，活动是分散的，也是比较掩蔽的。“一二·

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风暴卷到广州时，他们的读书会以各种形式进行活动，在同学中进行宣传，邬维梓、卢觉先那个读书会还跑到越秀山集体宣誓，誓死抗日救国。尽管大中中学是一间走读的学校（只有少数住宿），教育厅用放假等来破坏阻挠，但大中中学还是有部分同学参加了广州的第一、二次示威游行。在第二次游行后，邱萃藻曾在大中中学约了“中青”的两个小组成员开会，研究在校内组织班会、救国会等，以团结更多同学参加全部性行动。会后在校内的宣传和串连工作加强了，但由于当局的阻挠，只允许御用的学生会存在，全校的学生救国会没有组织起来。1936年1月9日的第三次游行，由于教育厅提前放假，同学四散回家，但仍有梁柏生等20多人参加。1月13日那天，我们串连了更多同学到省财政厅前集合，准备接应参加游行，后来得悉国民党特务暴徒在荔湾桥和西华路打人抓人，队伍才散去，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公开镇压，运动转向地下深入，大中中学的“中青”仍按原来的分散掩蔽活动。

在这段期间，初二乙班的同学开始觉醒起来。1935年春，初二乙班原来的语文教师教学很不得法，被同学轰了下来，请来了一位代课教师袁汉章（雁沙），他上我们的课，一改过去只选读古文而且照本宣科的教法，第一课选教白话文《父归》（焦菊隐作），分析文章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逐段讲解表达手法。这一下把我们吸引住了。以后他逐步引导我们看巴金、丁玲、鲁迅等小说，进一步又介绍我们看《大众生活》、《读书生活》和《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他虽然只代课一个学期，但已和黄森昌（黄森）、叶泽权、梁坤仪（梁燕云）、卢铁光、马凝华和我等10多个同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们常约袁先生到越秀山或白云山郊外，听他讲解国内外时

事。他由浅入深，向我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指出青年在民族危机中应有的责任。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一个坟地上，给我们讲解人生的道路，他指着坟墓说：“人终有一死，但要死得有意义，不要做这样庸庸碌碌的人，而应选择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在他的教育和辅导下，我开始啃社会科学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等，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有一次他和我们读到兴奋时，突然问我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没有等我们回答便把话题转开去。我们当时没有回答，但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共产党人。同年冬袁先生去了广西，我们为了怀念他，团结全班大多数同学组织了一个“海雁读书会”，后来还串连了甲、丙班同学参加。我们除了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外，还静静张贴这些报刊文章，和利用校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那时有公民课，任课老师陆韬是国民党南石头监狱的狱吏，我们对他特别憎恨，在他上课时，故意把门虚掩，在门上放粉笔刷，他推门进来，粉笔刷跌下，把他吓了一跳。有一次，梁坤仪和马凝华在他上课前在黑板写“监寇头！监寇头！！”监寇头!!!”，把他气坏了，他走到校长那里，给梁、马记过处分，黄森和我愤然同去把布告撕下。这些行动当然是很幼稚的，但却震动了学校。由于我们的活动只限于校内初三级，和高年级同学没有联系，和校外更没有联系，因此“一二·九”运动到来，我们即在校内出墙报扩大宣传，但广州的三次游行，我们知得较迟，只是部分同学参加。由于我们的言论和行动，自然引起梁柏生的注意，于是他利用我们同在一个小饭店搭食的机会，和我们结识上，动员我们参加他组织的行动，并且给我们传阅他的秘密刊物，很快就发展黄森昌、叶泽权、梁坤仪、马凝华和我参加“中青”，以后

我们将我们的“海雁读书会”十多位同学都吸收到“抗日五人团”。我们“中青”小组由梁柏生联系，经常碰头学习和研究工作，有了组织，大家学习工作更起劲，这时我们一方面扩大组织，在“中青”发展了在四会教书的袁汉章老师的得意学生陈友群和刘么亮，在“抗日五人团”我们把甲班和丙班参加我们读书会的何启刚、黄志勉、谭榕、关祉桃、关洪心、麦学贤等都吸收进来；另方面开始注意做学校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当时大中中学学生会主席肖守仁是陈济棠的市学联中学方面的头面人物，教育厅厅长黄麟书钦定派去南京请愿的中学代表，黄森昌去做他的工作，说服他同意在校刊多登抗日救亡和青年修养的文章，以后我们便利用这块阵地扩大宣传，后来我们组织反奴化教育反读经反会考请愿时，他也和我们一起参加。“一·一三”荔湾惨案后，陈济棠政府实行白色恐怖，为了钳制青年学生思想，在中学搞读四书五经，尊孔复古，并且在毕业班中搞全省统一命题集中考试（简称会考），实质是要学生埋头读死书、死读书、不问国事。这在日寇步步入侵、国难深重下的热血青年是绝不能同意的。于是一场反对读经、反对会考要求实行战时教育，争取开放抗日自由的斗争在一部分中学逐步展开。我们是毕业班，当然积极组织同学参加这一斗争。开始是通过壁报等写文章批评、揭露当局的阴谋，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我们大家凑钱，由黄森昌、卢铁光和我到香港去买油印机，我的住房便成了油印室，我们出版油印刊《火线上》，还不时刻印传单和《告同学书》等。为了赶在同学返校前散发，我们往往搞到深夜一二点，稍为休息，天未亮便赶回学校，将传单分发到每个课室书桌上。这样做了一二次，学校便在放学后把课室锁上。但这并没有难倒我们，我们把窗玻璃敲破一小角，弄开插销，跳

进去分发。1936年6月1日“西南事变”两广公开“抗日反蒋”，所谓出兵湖南、北上收复失地，并且发动群众集会支持他们。我们就利用这一时机，各校相约于6月8日组织一次请愿，那天参加的有广雅、大中、知用、教忠、执信、女中等1000多人，在越秀山脚集中后，便向省教育厅进发，到达时教厅早已关上大门，队伍便转向越华路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因为西南政府标榜抗日，这次李宗仁亲自接见，我们推选了肖守仁、黄森昌等为代表，各校代表事先商量提出：“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开放抗日言论、行动自由，废除读经、会考，实行战时教育。李宗仁对要求出兵、开放抗日表示接纳，对停止读经、会考则推诸省教育厅。代表出来传达后通知各校派代表晚上到珠光里开会。但是西南政府公开扫蒋抗日，骨子里还是顽固反共的。“一二·九”运动后陈济棠即派特务假装进步欺骗进步同学，组织所谓“中华革命先锋队”，打听进步同学的活动，他们对不是他们组织的群众行动起来，害怕极了，李宗仁白天接见学生代表，满口接纳，而在早一天晚上便衣警察便在珠光里布下埋伏逮捕到那里的同学，请愿后到那里开会的同学也一个个被抓走，先后被抓了40多人，这就是“珠光里事件”。这给广州学生运动一个沉重的打击，反读经、反会考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但西南当局两面派的行径没有吓倒我们，却教育了我们。我们除一面分别营救被捕同学外，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利用西南当局所谓组织学生下乡宣传的机会，在放假复习期间组织一个宣传队，由梁柏生和潘先廉带队到四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参加的有我们“中青”和“抗日五人团”10多人，先到陈友群教书的下寮乡落脚，然后逐乡宣传。虽然白天烈日当空，晚上蚊叮虫咬，但农民爱国的情感激舞教育了我们，最后回到四会县城。上船

前在县城发动青年学生举行一次火炬抗日宣传游行。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县城，吓惊了国民党县党部，后来我们才知道县党部书记长亲自带县警尾随监视，由于我们立即下船离去，他们才没有下手。但陈友群因此被革了职，跑到广州来。我们回到广州参加了会考，虽然我们都合格，但大中中学却不准我们升高中。我们这一群也就有的转了学，有的找职业，有的回了乡，但我们的组织没有散，书信联系或不时聚会一起，和梁柏生仍保持一定联系，直到他北上延安。反会考失败后大中中学沉寂过一个时候，梁柏生参加党后仍坚持在学校，通过进步同学组织读书和参加歌咏等活动，抗战开始，形势大好，大中中学的同学又活跃在救亡运动上，而我们被迫离校这一群，经过斗争的锻炼和教育，在梁柏生北上后，10多人也先后去了延安，留在广东的也都参加了革命队伍，献身革命事业。



## 回忆女师“一二·九”前后 学生救亡运动的情况

梁 绮

女师，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颇具规模的女子学府，主要是培养师资，分设有高中师范和专科班。难怪校歌中有：“翳彼女学，独沦暗黑，惟我学校树先声，养成师范，孕育群英，”之句。在1907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三年，能够设立这样的女子师范学堂，确实不简单。按当时教育制度，它比一般普通高中要求较严，入学后免收学杂费。生活较困难的家庭，都希望自己子女考入女师读书，以减轻家庭负担；但不少富户人家和有地位的官员，也愿送女儿报考女师，认为女师校风好，管教严。当然，很多同学是遵照校训埋头读书，但也有不少同学受进步老师和先进思潮的影响，投身革命活动。早在大革命时代，就有女师同学参加革命活动，例如：1924年“三八”节，在广州举行大会，是我国妇女第一次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就有女师师生积极参加大会活动。当时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924年4月5日女师举行建校17周年纪念大会，孙中山先生莅校作题为《女子须明白三民主义》的演讲，鼓励同学们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从此，定每年四月五日为建校纪念日。还有

学生张婉华、沈学修等参加党的外围学生组织“新学生社”并参加“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广东省妇女部代表邓颖超（部秘书长）等革命老前辈都曾到女师向师生讲演。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筹备工作，女师同学积极参加，并担任该会执行委员。1926年至1927年许广平曾担任女师训育主任，鲁迅先生也曾到女师演讲，对女师学生进行启蒙教育。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下，东三省沦为殖民地。消息传到广州，各校学生义愤填胸，纷纷起来罢课示威，向西南政府请愿，要求北上抗日。女师是最先组织起来的学校之一，各班级都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分别到顺德、南海、惠州、中山、东莞、台山等县城镇、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同时在校内组织抗日义勇军，由童子军教员担任教练。进步老师赵慕鸿、林叔真等结合国文教学，介绍学生阅读进步书刊。1932年秋进步教师谭秀峰（何干之）、谭国标来到女师任教，领导学生组织秘密读书会，办好校刊，指导学生参加演剧、讨论时事等活动。读书会是在秘密进行活动，但校刊，演戏和演说、辩论等活动却十分热闹，学生情绪十分高涨。在校寄宿的同学还在夜里排戏，演讲。校园里充满团结、活跃的气氛。由于进步老师在校内校外团结了各种进步人士和中大、广雅学生秘密组成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下设有社联、左联、剧联等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群众中做了不少工作，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动当局既害怕又仇恨，终于在1934年1月底，逮捕了谭国标老师和学生伍翠云、谭本基、徐侠梅、陈宛聪、黄惠清、朱瑞瑶、潘汉华等。校园里突然笼罩

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学校当局还一再威胁学生要规规矩矩读书。大部分学生敢怒不敢言，心里充满义愤，有些同学还偷偷到警察局探望被捕的同学，她们都相信这些老师同学是爱国英雄，暗下决心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后来谭秀峰、梁绥雄、谭锦芳、吴绚文等进步老师、同学被迫逃亡上海。以后传来谭国标老师和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做、何仁棠、郑挺秀等进步学生被杀害的消息。不少同学暗中痛哭了一场，决心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三三两两联系，偷偷传读进步书刊，这些都说明女师学生并没有被压下去。

1935年初，谭本基回女师复学，分配与我同级（原比我高一级）。他象一颗火种，又把女师抗日救亡的烽火点燃起来。她同我们几个同学继续搞起读书会，并常来我家里谈论读书心得和国内外形势。1935年夏秋之间，她介绍王均予、邱萃藻两位同志来我家里住，我同姐姐两人回校寄宿。这样，我同谭更亲近，八月，经邱萃藻介绍，我参加“中青”（中国青年同盟）。参加前经过多次谈话教育，明确要信仰共产主义，承认《共产党宣言》，要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身，要保守盟的秘密，要过组织生活或定期同领导人联系。我知道还有些同学参加，但不敢多问。我们除交谈形势，学习进步书刊、小说等，大家都盼望能早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当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发出《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停止内战，动员起来抗击日寇，收复一切失地等消息之后，我们在邱的领导下，巧妙地印制了时事新闻，介绍红军胜利消息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利用早晨弹琴的机会，分发到各教室里，许多同学争相传阅。正是这个时候，传来了北平“一二·九”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的消息，接着又知道广州中山大学同学发起响应，大家兴奋极了，找要

好的同学相告，但学校当局不准集会，对我们毕业班，更是强调快要考试，不准随便外出。当时女师还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学生会组织，我们“中青”成员以及进步热心同学互相串连，传递中大、广雅同学活动的讯息。在12月12日下午由谭本基和我约同二、三十位同学从大石街小学部分批出来参加中大游行队伍，小学部的老师邹剑卿、伍坤顺也来参加，大家手挽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倒列强等歌曲，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参加游行的同学情绪高涨，回校后，纷纷串连，并派出代表向老师和校方交涉要求成立女师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当时校长李雪英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学生应该好好读书。为了缓和同学们的情绪，她同意发出响应北平“一二·九”教育界爱国行动的通电和筹备成立学校抗日救国会，交由训育主任朱明光去筹办。结果，只发出通电，救国会却没有成立。本来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抓紧发动同学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思想上的关系和行动上的等待，错过了时机，特别是邱萃藻同志常提醒谭本基，不要太暴露，所以我们常有缩手缩脚的表现，使学校当局的敷衍欺骗行径得逞。我们工作方式又过于谨慎，只在个别同学中串连，准备配合中大行动。到12月31日，高、初中共有100多名同学冲出校门参加到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同学们十分愤激，大家进一步认请了陈济棠平时所说的“反蒋抗日”的假面具，在中大同学的带领下，转向市区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唱歌，许多市民还鼓掌支持。这次游行虽未获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却锻炼了同学们的斗志。同学们加强了串连联系，分发抗日传单。谭本基、李翠瑜、梁桂英、梁渭容、刘瑞环、陆冠莹、高兆好

等同学都积极传递、张贴介绍北平学生斗争情况的印刷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联军，组织国防政府，抗日救国”，“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常常在课室黑板上、墙壁上，操场上出现。这段时间谭本基和我经常替邱萃藻送东西往中大。王均予、邱萃藻、钱兴等人都在我家里（王、邱当时住在我家）开会商谈。并通知于1936年1月9日参加全市学生大游行。学校由于接到教育厅通知，宣布提前放假，宿舍由黄舍监动员学生回家。学校虽然冷冷清清，但经过串连，很多同学都答允参加。但到时有同学因家庭拖后腿，将定在中大附中（文明路）集合，集合时只有数十人，我们不管人多少，还是参加进大队伍，队伍出发到新填地，各学校又汇集在一起。汹涌滚滚的人流，沿路还有不少工人、市民参加，热烈的情况，真是空前，到西门口，女师的同学就分散回家。我本来约定和谭本基一道下乡宣传，后来因母亲病倒，无法成行。以后，知道1月13日在荔枝湾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派出特务、打手绑架、殴打同学，酿成“荔枝湾惨案”。接着又悉中大张凤楼等同学被捕，邱指示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暂时隐蔽。不久，王和邱搬离我家，但邱还经常约我联系谈工作。

五、六月间，毕业班准备全市会考。李翠瑜曾找我谈，说广雅等学校准备罢考，问我们是否响应？经同谭本基商议，认为考试是检阅学习，这难不倒我们，而且罢考绝不能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反而暴露了自己，认为无必要发动。为了了解反对会考是否“中青”布置，专门找老邱联系请示，邱同志认为女师是当局比较注意的学校，不宜搞，如果全市统一行动，可以响应。之后，广雅中学确实曾派学生来联系，但给学校当局挡了回去。会考之前，我们还参加到西南政务委

员会请愿，要求出兵北上抗日。

1936年秋，省教育厅组织了一些学校校长赴日参观，校长李雪英也去了。她回来后，大肆宣扬日本妇女的“贤妻良母教育”，鼓吹学习日本妇女搞好家务，侍候好丈夫，还要学生读经，提倡孔孟之道。学生穿衣袖不过肘，裙要过膝。学生当时展开了反对奴化教育运动，在校园里贴出反对奴化教育的大标语，并在演讲上质问学校“为什么要学日本”？“为什么要搞奴化教育？提出：“走出课堂”，“走出厨房”，“只有抗日救国才有出路”，“妇女才能得到解放”。在一些老师的支持下，要求把读经课改为语法、文法课。

会考之后，我同谭本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暑假期间，女师不少同学还参加广州民众歌咏团、锋社话剧团、艺术工作者协会等组织活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 市立第二中学学生响应 “一二·九”运动的情况

梁锦文

广州市市立第二中学是在 1934 年下半年改为女子中学的。当时广州的形势也与全国形势一样，人民都在谴责蒋介石不抗日、搞内战、政权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青年学生对时局更加敏感。蒋介石为了镇压和麻痹学生，于是宣布中学生要读四书五经，强调了孔子“忠君”的封建思想，并实行了男女分校。

1934 年上半年，我在观音山（即越秀山）脚的市立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念书。此前我在广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得到语文教员林叔真（男教员）的影响，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向往苏联革命。盼望我们国家将来也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到市一中后，我与同班女同学莫兰心及比我高一班的莫美心（她是莫兰心的姐姐）等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政治思想倾向一致。后来我们组织了罢课，反对读经及男女分校。但是，我们的力量很薄弱，组织发动工作不成熟，大多数同学还是去了上课。虽然学校后来不再增加读经课目，但我们全部女同学还是被分到市二中去上学了。

市二中位于广州西关，是有高初中班的完全中学，大约有 400 左右学生。因为都是刚从各校集中来的女学生，加之

该校教导主任容天量，训导主任汤卓元严厉的约束，该校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学生的作风也比较朴素，守“纪律”。汤卓元对学生的管教，完全是执行了国民党的镇压手段。在他的训话中总是骂共产党，为蒋介石不抗日辩护，要学生不谈政治，安份守己读书。在这种气氛下，市二中很平静。不久日寇疯狂向南侵入，形势迫人。学生们虽然仍很用功读书，但已开始三三两两地偷偷议论时事。因为莫兰心和我曾有市一中时的一段活动，而后莫兰心又住宿在我家，我们相议分别找进步朋友谈心，经常到永汉路（现北京北路）一间书店看书。为了带动同学们课外阅读进步书刊，我们节省生活费用买一些如《世界知识》之类的刊物给大家看，后来也引导了一些同学到书店看书。我们知道，有极少数同学为讨好汤卓元向汤汇报，我们不予理会；比较多数的同学，骂蒋介石，希望他下台，觉得共产党敢打日本鬼很好，但又受到反动宣传影响，对共产党抱着怀疑的态度，更害怕若说几句公道话，自己会受株连，这些同学暗中佩服进步的同学，表面不表态；极少数同学要求进步，向往共产主义，迫切希望找到关系能投身革命。我们常和这部份同学来往，谈论时局，（如看邹韬奋、鲁迅等的著作、苏联的《铁流》、《夏伯阳》等小说），讨论读书心得。不久，我和莫兰心、岑绮修、黎雍时等无形中成了一个秘密小组织。

1935年我念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时，高二年级的学科中增加了一门“军事救护”课，“军护训练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由陈汝棠先生担任，有两位教员，一位个子瘦长，戴眼镜，年约四十左右的叫陈鹤新，另一位是青年教员。课目内容有军事训练及军护知识。陈汝棠担任了部分课程，他上课时，是几个班合起来上大课，他上课讲得生动极了，既能把课讲得



易懂易记，又能做宣传工作。他给我们带来很多共产党抗日的消息，敢公开骂蒋家王朝的腐败，骂蒋介石不抗日，这些都说出了年青人心里屈藏着的话，每逢他来上大课，教室里都挤得满满的。莫兰心和我下了课就到办公室去找陈汝棠，有时到诊疗所找他，那里经常有不少年青人在聚会。后来，我、莫兰心、岑绮修、宋兆宁、徐静如还有中山大学学生虞焕章（杨康华）、乔右文、谈荣森、陈卓雄等定期在陈汝棠诊疗所学习《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等，不时传来一些新的抗日消息，这实际是一个读书会，但没有什么组织形式。市二中原先没有学生宿舍，我们想如果能住校，对我们的活动会更好，而且同学们走读的确有困难，因此我们要求学校增设宿舍，也许学校当局也考虑如果同学们住校就更好管教，就在学校大楼的后面搭起了六七间简易平房，每间可住8个人，设了一位女舍监。我们在宿舍与同学们团结得很好，慢慢地能和她们谈谈思想，大多数同学对要求抗日已敢公开表态。我们这几个人阅读的“违禁书籍”平常都放存在“军护办公室”，我们也感觉到汤卓元对我们有点注意，但他对寝室的突击检查，常是一无所获，我与那位女舍监搞得熟，她甚至开玩笑把我当干女儿，我生病她还给我做吃的，当时她认为我是一个又单纯又活泼，学习优良的学生。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动当局出动军警水龙镇压，爱国志士未死在抗日沙场，而竟被反动当局残酷屠杀！蒋介石对学生如此疯狂镇压，这更证明蒋家王朝在投靠帝国主义苟延残喘，是何等的惧怕抗日力量！消息传到了广州，广州学生也为此愤怒填胸，市二中也开始不平静了。我们在陈汝棠家油印传单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我、莫兰心、岑绮修三人将传单贴在学校附近街道，把传单放在教

室讲台上及同学的桌子上，起初是有选择地散发，譬如选比较好的老师上课时把传单放在讲台里，把传单放在思想比较进步较有活动能力的同学抽屉里，我们细心地观察油印读物迅速不见了，没人哗叫，连汤卓元也毫无表情！这启示我们，运动是深入人心的。我们的行动得到她们的欢迎，得到她们的掩护。以后我们还印发些小文章或小消息等。次数多了，我们发现有人比我们还早到教室，于是，我们改变方式，不再散发传单了，而是直接和那些收过传单的人交谈，她们都表示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认为我们也应有行动。

1936年1月9日，中山大学开学生大会继续联合市内各校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我们在陈汝棠家研究了市二中要开学生大会来响应中山大学的爱国行动，决定1月11日在市二中礼堂召开学生大会，一方面由虞焕章、乔右文、谈荣森、黄云耀、陈卓雄、连同曾溥、李驹良等组织中大同学来市二中支持我们的大会，另一方面我们在市二中把各班（初中同学好像只有三年级的参加）积极分子发动起来，由她们组织纠察队，莫兰心、岑绮修和一些同学准备标语布置会场等，我准备大会发言。我们的准备工作，都得到陈汝棠的指示和陈鹤新老师暗中帮助的。

1936年1月11日上午广州市市立第二中学支援“一二·九”学生运动大会召开了，参加大会的大约有300人。会前纠察队在大门把关（大门原已被校方锁起来），守住不让汤卓元与外面联系破坏。大会开始选出了主席团（好像5人组成，莫兰心、岑绮修和我还有2人名字忘了）我当大会主席代表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前，中山大学同学分乘4部校车也赶到参加开会，全场激动，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感谢和欢迎，群情奋发激昂。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开会后，中山大学同

学谈荣森即上台代表中山大学同学讲话，市二中同学除了有准备的讲演外，很多同学也主动上台发言，虽然她们的发言很短，但都是激动锋利。会场里响彻了口号声：“我们坚决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我们誓死保卫华南！”“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土去！”大会还通过给中山大学同学的慰问信。

会后同学们十分激动，情绪久久平静不下来，有些人提出我们也游行示威表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我们在陈汝棠家研究，认为可以组织一次游行。1月12日晚我们得到通知：明晨在国民大学集合游行。当晚我们组织了百余人，有一小队童子军维持秩序，我当领队。

1936年1月13日7时左右，我们在学校大操场整队，汤卓元匆匆忙忙赶来禁止我们出发，在大门口他拦住我们队伍出路，我们与他争论至动武，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抱头爬墙头逃走了。当时我们很满意我们的胜利，过后回忆我们放走了一个告密走狗，真应该把他捆起来，我们队伍在国民大学的操场集合，到会的有些广雅中学与外校的同学，还有几十个中山大学同学，他们在整个队伍的前头走，市二在后头走，沿途两旁站立的群众寄以希望的目光，有时当我们高呼口号时，他们也跟着我们举手，当我们走到荔湾桥头，听到前面同学们愤怒的呼喊，有些同学往后退，队伍被打乱了，前面传来消息说，军警宪兵正在逮捕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被逮捕失踪，很多学生受伤。后来听说中山大学同学冯道先被捕后牺牲了。在这种形势下，暂时我们不能继续游行了。我们于是宣布把队伍解散，我与莫兰心即回学校到军护办公室找到陈鹤新老师，他即打电话把事情告诉陈汝棠，决定让我们先到他家再作打算。我们即把宿舍里的书物搬到办公室，由陈老师帮我们运走。我们到陈汝棠诊所后，他即带我们到附

近居住的中大同学谈荣森家躲避。在我们离开市二中不到半小时，宪兵即冲进学校进行大搜查，教室、宿舍、厕所无处不搜遍，因为我们早有准备，这些披着人皮的鹰犬结果一无所得，但仍不罢休，在国民大学、广雅中学、市二中都派了宪兵驻校监视。学校开会，汤卓元提出要把我开除以警效尤，但大多数老师以至那位女舍监都为我辩护，说我一向是优秀学生，姑念一次，给予丙等品行，如若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即行开除，我在不少的老师和同学保护下才获得高中毕业。这不是我个人的幸运，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抗日人心所向。

# 在广东纺织厂参加抗日 救亡运动岁月追忆

钟 华

1934年秋，我随家人从上海到广州。为了维持生活，东挪西借，我家从六爷爷手中接过一个木器店，当时住在我家的，其中还有在家乡浙江或上海被国民党通缉逃到广州并失去党的关系的共产党员寿松涛同志、金城同志。

这期间，我受到金城同志的帮助，他给我讲解革命道理，启发我的阶级觉悟。同时，给我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看。如：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李公朴的《读书生活》等。通过学习，我初步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道理。初步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同时一些共产党人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我受到教育，在我思想上产生了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愿望。

1935年初，我（当时我名为钟浣声）考进广东纺织厂做工。这个工厂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开办的，丝、麻、棉、毛俱全，是当时广东最大的综合纺织厂。这个厂的职员和技工不少是从江浙聘请来的。进厂后，我被分在绢丝麻纱部（即车间）延展机工序做工。为了广泛接近工友和锻炼自己，我搬进工厂集体宿舍住。

广东纺织厂虽然是当时广州最大的大型纺织厂，机器设备比较先进，但是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根本不顾工人死活。劳动保护条件很差，各车间缺少通风设备，有的车间飞花满天，有的蒸气弥漫，还加杂着镪水等各种化学材料的有毒气体，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夏季，广东天气炎热，车间里温度更高，工人们汗如雨下，经常发生中暑休克；有的吸飞花过多，进厂几个月就开始吐血，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我们每天劳动 10 小时，每月只休息两天，还要扣发假日工资。工人进入工厂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进出厂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工人去厕所也要进行干涉。个别工人为生活所迫，拿了一小绉纱被厂方发现，也要在工厂大门口示众一周。工人的人身安全更是无人过问，细纺车上一个工友叫麦业勤，是一个很好的纺织工人，一个国民党特务要霸占她，并威胁她如不答应，就要用手枪打死她。她被逼得走头无路，最后自杀了！工人被压迫、被侮辱、被逼死的事实，使工友们对旧中国的腐朽制度增加了新的认识和仇恨。

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我认识了一些进步姐妹，其中有缫丝车间的保璞丽、潘秀珍，丝织车间的余四姐（余汝贞），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心。在“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的浪潮也波及广州，在“一二·九”运动的鼓励和影响下，我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及官僚资本压迫的愤恨和不满，迫切希望找到党的组织来领导我们，以便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936年初，经潘秀珍介绍认识了她的朋友周力夫，他就是我们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在周的启发和诱导下，经过酝酿讨论，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工人要想不受压迫欺侮，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力量，为此，就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于是，我们开始筹建地下工会，工会下设两个分

会。周并指定我和余四姐筹组第一分会，包括绢麻、丝织两个部；保璞丽和潘秀珍筹组第二分会，包括缫丝、毛纺两个车间。我和阿保分别担任第一、二分会书记，余和潘是委员。

工会架子初步搭起后，周力夫为了帮助我们提高认识，通知我们于1936年3月8日，和姐妹厂的女工一起，召开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会议。会议是在橡胶厂的一个工友家中召开的，我们纺织厂的潘秀珍、保璞丽、余四姐和我都参加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纪念三八节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十来人，除我们纺织厂和其他厂的女工外，还请了中山大学社会系学生雷瑞英（又名雷英）给我们讲解了三八节的来历和纪念三八节的意义，使我初步明白了世界各地劳动妇女斗争的历史，开始认识到处在当时的旧中国，妇女自身的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必须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起来的道理。为此，必须广泛团结工友，组织起来，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

纪念三八节会议后，为了团结工友，组织力量，建立地下工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我们车间组织工友向厂方进行了照发假日工资和改善烧毛工序劳保条件的斗争。但是厂方千方百计苛扣我们提出的条件，最后在工人的斗争下，答应照发假日工资。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是，使工友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建立地下工会创造了条件。

正当这时，我们的领导人地下党员周力夫被捕了。由于我们的幼稚，这件事事前并无察觉。1936年4月17日，我们正在上班，突然车间的负责人把我叫到厂部，阿保和棉纺织部的好几个工友都在那里，共十来人，国民党的警察站在旁

边。不由分说，警察就把我们强行押出厂门，推上囚车，送往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处关押起来。到了特别侦缉处，才知在我们被捕前，我们的领导人周某首先被捕，潘秀珍是在我们被捕的前一天下班回家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的，然后我们纺织厂的工人被捕。同案被捕的还有中山大学学生雷瑞英、梁荣生、冯道先，共被捕十多人。我们纺织厂被捕的工人中，有的根本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是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反动政策下，仅仅由于姓名相同而被逮捕。

我们是作为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的。所以敌人在审讯中首先追问我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并追问三八节开会的地点、人数、姓名和内容。敌人为了打开缺口，首先把年龄最小的阿保（15岁）叫去审讯，敌人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妄想从阿保口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阿保机智勇敢，在敌人面前连吵带骂，没有让敌人捞到任何东西。接着，敌人又审问中大学生雷瑞英，除审问她三八节开会的问题外，还审问她大学生组织读书会的背景和目的等问题。

敌人审问雷瑞英后，就开始审问我了。由于我是从上海来广州的，长的个子也较高，所以敌人把我当作审问的重点。因为审问阿保时她对敌人又喊又骂，我们在牢房里听得较清楚，也帮助我作了些对付敌人的思想准备。什么是共产党？敌人又追问：“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回答：不是。实际上，当时我确实还没有入党。“那你一个上海人跑到广州来干什么？”我就把随家来广州做生意，由于生意不好，商店倒闭，生活困难，所以才到工厂做工等说一遍。（因这时我家里的人及朋友早已离开广州了。）敌人仍然没有捞到什么东西，就这样结束了。



在敌人的牢房里，我们曾提出要敌人释放我们，为此与特务吵闹。有一次一个特务头目经过我们牢房门口，我们就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逮捕我们？把我们放出去。”他反问：你们为什么参加三八节会？我们说：“参加三八节会有什么罪？”中大学生雷瑞英就说：“蒋夫人还召开三八节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纪念？”（当时蒋介石的老婆曾利用三八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问得敌人张口结舌，恼羞成怒，最后威胁我们说：“再闹就拉出去枪毙你们！”一面嚷着一面灰溜溜地离开了牢房。

我们在敌人特别侦缉处被关押了十多天后就押送到女拘留所。到拘留所后，潘秀珍和雷瑞英被钉了脚镣。雷瑞英很坚强，潘秀珍钉上脚镣后却大哭一场。到拘留所后，我们又被审讯一次，还是原来审问的问题，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条件和方式欺骗敌人，以记不得、不知道、不认识、听不懂来进行搪塞，以便保守革命机密，保护没有被捕的战友，敌人还是没有捞到什么东西。

在特别侦缉处审讯我们时，我们曾偷看到敌人桌子上有一份名单，由于我们不了解男牢方面的审讯情况，但从被捕的顺序来看，我们被捕的原因，肯定是由于周的暴露或出卖。为了坚持斗争，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雷瑞英，阿保和我3个人经常共同商量，分析了狱中姐妹们的情况，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做好潘秀珍的工作。潘是周的爱人（这是我们被捕后才知道的），她对我们的底细又最了解，许多事周又是通过潘同我们联系的，但潘的情绪又比较消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应找潘谈心，鼓励她坚强，并晓以利害，告诉她要遵守革命秘密，不然暴露越多，不但害了别人，对她自己及其爱人均无好处，只会增加罪责。对其他思想上苦闷的姐妹，我们

也经常鼓励和安慰他们，在生活上多关心体贴，由于雷瑞英身体不好，我和阿保就多承担点房中的杂活，如拿饭、洗碗、倒马桶、搞卫生等。雷瑞英还给我们教唱《新女性》等革命歌曲，鼓舞我们革命斗争的信心。在共患难的生活里，更加增进了姐妹们的团结和友谊。

在拘留所，敌人对我们管得比别的政治犯严。有的政治犯允许出来放风，但我们除了拿饭、倒马桶外，成天被锁在房子里。为了了解外边的政治动向，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了要看书、看报、给我们放风等要求。敌人对我们这群青年女孩子的吵闹，怕得要死，不得不答应部分要求。最后，给我们拿来一些《三民主义》《圣经》之类的书，连国民党的报纸都不敢让我们看。为防止我们和其他犯人接触，把我们牢房门口的小块天地用栅栏隔开，让我们活动，算作放风。

我们在拘留所关押期间，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军阀陈济棠下台了，他的参谋长余汉谋投靠了蒋介石，掌握了实权。国民党反动政客胡汉民当了广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新军阀上台后，为了稳定局面，欺骗人民，在报纸上制造“大赦政治犯”的舆论。在1936年七八月间，我们纺织厂的工人及中大两个学生陆续取保释放。当然，敌人所谓“释放政治犯”，只是释放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是不肯轻易释放的。事后，我们才确切得知我们的被捕，的确是周某的叛变和出卖。但他并没有得到敌人宽恕，在陈济棠临下台前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了。另外被杀害的还有中大学生冯道先。

在出狱后的第二天，我冲破敌人“六个月内不准离开广州”的禁令，随一位同乡杨叔叔到了香港，住在当时任华南工委书记的宣侠父同志家。当时，金铃同志（宣侠父同志的

爱人)和金城同志都在那里,我向宣侠父等同志汇报了狱中的情况。在他们的鼓励教育下,我在香港《大众日报》上以《爱国有罪——广东纺织厂女工被捕经过》为题,写了一篇通讯,署名本报特约通讯员“莉莎”,向人民揭露了我们被捕的真相(约在1936年8月间)。

第一次参加三八节活动,我还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革命青年,在这次斗争中,使我经受了初步的锻炼和考验,增强了参加革命的信心和勇气。初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劳动妇女的彻底解放,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必须首先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1936年三八节,只是我投身革命的起步。四十六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33岁,虽然也经受过挫折,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经过拨乱反正,现在举国上下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共同努力。我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已经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党的干部,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的经历却使我终身难忘!

1982年3月1日

## 关于珠光里事件的回忆

阮群英

1936年珠光里的事件被逮捕的有40多人，参加开会的同志我认识的有钱兴（中大法学院学生）、叶锋（广雅学生）、马和德（中山医学院护士）、刘伯怡（广雅学生）、梁茂鸿（广雅学生）、钟文钜（广雅学生）、黄新（？）、梁佩珍（女、市二中学生、广西人）、李翠如（女师学生），我当时是教忠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期间我经常为曾生与钱兴带纸条做联络通讯工作。当时被捕的只有我和陈佩珍是女的。

1936年6月间的一天，钱兴告诉我晚上有个会要我去参加，地点是文明路黄新家的二楼，会议内容是争取抗日，反对会考。会后，约定明天下午两点钟举行游行示威，联络地点是珠光里的一间无人住的空平房。珠光里是一条小巷，平房离巷口很近，我们平时在那里秘密油印传单。散会后还交给我一卷散发的传单。

我第二天比往常提早到校，把传单带进学校张贴，我盼望着，等到下午一点多钟还没有动静，心里着急，手提着一个小藤书包，急急忙忙跑到珠光里，当我推开门进去时，见到两个穿黑绸衫的男人，从房里走出来，（他们的诡计是躲在房里等我们进一个抓一个）我一看就知道不是自己人，他们

问我来找谁？我说找朋友，他们就把我叫进去，查问我的姓名，翻我的书包，幸好我的书包没有留下传单（接任务时嘱咐过不能留下，要清掉）。他们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说：不是。他们又问我姓名，为什么到珠光里？又这么熟悉自己开门？我回答说：“我是找朋友的”。又问：“朋友叫什么名”？我就随便编一个名，说：叫“陈坤仪”，他们冷笑说：“你不老实”。并对爪牙说：“把她带走”。接着用囚车把我送到维新路公安局（是何萃当公安局长，他杀了很多人，很反动）。这时已四点多钟，让我坐在侦缉房间等候传审，我抬头看见对面一个铁栅牢中，已有装得满满一牢的男同学，他们比我先抓进来了（怪不得游行未成），钱兴、叶锋等已被抓进来了。不久，一个姓朱的科长（是个钩鼻佬，这是被捕的女工们骂他的）提审我，问我叫什么姓名，家在那里？我说：“父母都在福建厦门”。他一听冷笑说：“啊！福建最多共产党”，我大声说：“我不是共产党”，他又冷笑说：“哼！你还不承认。你快讲谁是共产党！你不讲就要杀头。现在两条路由你选择，你承认共产党并讲出谁是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朱又叫出一个女的指给我看，说：“她讲了已放她出来了，还给她事做哩”。这是引诱，我气愤地大声说：“我不是共产党杀死我也是这样的话”。又问：“你到珠光里干什么？”我咬定说：是找朋友。他骂我狡猾，立即传叫把刘伯怡带出来。问我是否相识？又问刘伯怡是否识我？我们互相都说不相识。他们就把刘伯怡吊起来（吊飞机），当着我的面用大木棍向刘伯怡的心口猛撞毒打，刘伯怡忍痛不吭声，表现很坚强，他们是以毒打刘伯怡来恐吓我，朱怒气冲冲又问：“你讲不讲？谁是共产党？”我看到刘伯怡受到残酷的折磨，反动派对一个爱国抗日救国学生竟如此惨无人道，我心头就冒火，对朱钩鼻佬愤恨

地大声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朱怒目敌视我大声嗥叫：“快拿手镣来”，要把我扣上手镣。面对敌人的恐吓，我大声说：“打死我也是这样！”朱更恼火喝道：“把刘伯怡带走”，刘伯怡被扣着手镣脚镣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移动着走了。朱又叫喊道：“把马和德带出来”。马也是扣着手镣脚镣被带出来了。朱问我“认得他吧？”我答：“不认识”。又问马和德，马和德低头细声说：“我见她有参加开会”。我见马和德已叛变，心里很冒火，就直接承认是参加抗日会议。气愤地说：“难道抗日有罪吗？”他见逼不出什么话来。大发雷霆目视我骂道：“你不讲就杀头”，他见恐吓威逼不行，把马和德带走了。后来又改变了态度按下火气和气地对我说：“你讲啦，讲了就放你出去”。我大声说：“我没有什么好讲。朱见审不出什么来，又恼火起来，把桌一拍，震动得笔都跌落地下了，骂我狡猾顽固。这时天色已黑，他大声喝道：“把她带走”。并告诉门卫，如有人来找我不要告诉我的下落，就这样把我送进牢房了。与我同牢房的有雷瑞英（中大学生），我不认识她，还有八、九个广州河南纺织厂的女工，名字记不起来了，雷瑞英是领导这些女工搞罢工斗争运动的，在牢房中她是大姐姐，她安慰我不要怕，晚上七时多陈佩珍也被抓进来了，她一进来就哈哈大笑，大声抗议说：“真岂有此理！为什么抗日也有罪！”

过了十多天时间的一天上午，忽然叫我和陈佩珍出去照相，临行时雷瑞英安慰我们不要怕。我们被带到狱中的一间房等着，他们用一块方形纸皮写着“反动”两个大字挂上我们的脖子上。照相后仍关进牢，因陈济棠下台，李洁芝上台，公安局长大赦政治犯，把我们释放了。出狱后才知道马和德被判10年徒刑，刘伯怡、梁茂鸿、钟文钜各被判5年徒刑，

关在南石头监狱。我和陈佩珍出狱后同去南石头探望他们（没有看到马和德）。我出狱后，教忠中学把我开除了！我就转学到执信中学读书。

# 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新篇章

——纪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

黄焕秋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游行示威，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呼喊出中国人民的心声，掀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广州得到中山大学学生的热烈支持。中山大学和广州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进行了三次抗日游行示威，并组织宣传队到各县市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6年1月13日广州青年学生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在荔湾遭受国民党西南当局的残酷镇压；到各县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的学生队伍，亦被迫返回广州。广州爱国青年学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开始转向扩大组织爱国学生进步力量，团结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山大学爱国青年学生积极支持学校成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并努力参加工作，体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指导，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开始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是由学校发起成立的，它得到中山大学爱国青年学生的积极支持，写下了中大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新篇章。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占华北，华北各地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得到全国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就在全中国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高潮中，在中大青年学生有着到农村去的迫切要求下，邹鲁校长委托教育研究所主任崔载阳教授和法学院院长郑彦棻教授负责草拟乡村实验区的计划，经过论证，并在全校征集意见。实验区的定名和计划内容，事先派人到石牌学校附近各乡村进行联络调查，进步教师和学生都积极提出意见并参加实际工作。

实验区的计划拟定之后，由邹鲁校长提交本校的学术政治讨论会讨论。邹鲁校长说：“现在到农村去，已经成了整个民族的要求”。学校通过的计划决定“以石牌附近十乡（岑村、长湴、下元岗、上元岗、东圃（东陂）、石牌、冼村、猎德、杨箕、寺贝底）为本校同学实验区域，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在实施办法上，决定在实验区之下设各分区，以一乡为一分区，每一分区服务工作由文、法、理、农、工、医6个学院若干人共同担任。同学自由参加，学校给予学分及其他奖励。各分区内设委员会，由各学校下乡服务同学共同组织，互推主席1人，综理该分区工作进行事宜。规定各学院分别开设有关乡村工作的特殊课目。例如乡村农产工作，

乡村教育工作，乡村水利工程等，以供他院同学有志于乡村工作服务者先后选修，学校设立乡村服务辅导委员会，由各学院教授两人及实验区主任参加，负责对实验区作审定计划，供给材料，解决困难，协助进修、视察工作等等辅导事宜。实验区还成立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农业问题研究委员会、合作问题委员会、农村社会问题研究委员会、戏剧研究委员会，推选对各项专题有研究的同学参加，并由校长在6个学院中，聘请了24位和乡村服务工作特别有关系的教授做实验区的顾问，负责指导各项乡村服务工作或负责研究解决某种乡村问题。学校并拨出开办费和经常费资助实验区的各项工作。

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于1936年4月1日正式成立。“中青”、“突进社”及其他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团结同学积极参加乡村服务实验区工作，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加紧锻炼自己。1936年10月统计，参加乡村服务实验区工作的同学共有262人，“中青”“突进社”等组织成员都成为各分区工作的骨干力量。暑假期间有不少同学仍坚持工作，中大附中等学校亦有不少同学参加。“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开始，乡村服务实验区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一直坚持到1938年10月日寇进攻广州时结束。

中大乡村服务实验区成立的指导思想，崔载阳教授标榜他的“从乡村建设以巩固民族生存基本力量”的信念。在学校讨论实验区的计划时，他说：“目前乡村服务的最高目的，……看能否找出一条能同时解决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即能同时实现民族统一阵线与能实行社会革命之路”。有人提出要学习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经营广西采取三位一体的制度，甚至有人提出“把这种‘到农村去’的运动，以中大为中心，逐步扩展开去，造成伟大的复兴民族的运动”，不少青年同学

对于这种乡运路线观点，有着明显的分歧意见，在实验区座谈会上，在教室里，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进行过多次的辩论，尽管意见有分歧，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有利于教育发动农民群众抗日救国，寻求有效的办法，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彼此相互尊重，团结合作，经常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方法，进步青年同学在实验区两年多工作过程中，实际上是起了主导作用，使实验区的工作蓬勃地发展起来，郑彦棻教授在乡村服务实验区报告书第二卷前言中，也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近来注意乡运者，对于乡运路线颇多争辩，其实历史路标已明示，在目前情势下，除抗敌工作外，其他工作，只应辅此而行，否则实无深意。此不独我个人意见为然，即本书搜载之论文数篇，亦俱阐明此旨”。

由于学校出面和石碑附近十个乡村联系和同学们的深入工作，各分区得到当地乡长、乡绅、父老和小学校长教师的联合支持，各项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开展。由于抗日救亡、保家卫国、团结对敌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不仅使中大因校地问题和附近乡村的矛盾得到缓和，村与村之间的隔阂，姓氏间之争，农民内部的恩恩怨怨，都逐步得到和解。1936年9月26日，乡村服务实验区举行十乡乡友联欢大会，各乡乡绅父老乡民和支持乡村实验区工作的农村积极分子被邀请参加，连同实验区的工作人员同学和各分区青年、妇女班的学生共1500多人参加联欢大会，锣鼓喧天，抗战的歌声四起，情绪激昂，并在礼堂前拍照留念。这次联欢大会，被称为中山大学建校以来的一件盛事。当年的这幅十乡乡友大联欢的照片，中大图书馆经历八年抗战，学校几度搬迁，能够保存下来，实是可贵。这幅照片纪录了中大青年学生和教师职工的辛劳成果，体现了中大青年学生与农民相结合，在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迈开了可喜一步。

## 二

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成立以来，实验区和各分区、各委员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中影响比较大，效果比较好，成绩比较显著的有3件事：一是农村社会调查，二是文化教育宣传发动工作，三是青年农民的培养。

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工作，对青年同学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

在实验区开办期间，实验区派出同学到10个乡村进行初步调查，了解各村的地理环境及社会概况。各分区工作开始，在各村社会概况调查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力量进一步深入调查，主要是采取挨户调查和个别访问的方法，有关重大的村史和社会情况，邀请少数熟识情况的人开座谈会。

各分区对各村的经济状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一、人口状态：包括各村的人口数量，各村人口的性别构成，各村人口的年龄构成，各村人口的职业构成，每家人口和文化程度，农业人口的阶级构成等；二、土地关系：包括地权分配，土地使用形态；三、农业经营：包括农产物种类及其价格变动（5年来的谷价比较，五种主要蔬菜类的价格变动，五种主要蔬菜类的价格指数），农具和肥料；四、佃耕制度与雇佣劳动：包括佃农制度，雇佣劳动；五、农家生活：包括农家支出费用的分配，农家负债数额等等。

同学们经过各村农村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对广州市郊区农村社会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并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同

学们亲自看到农民的生活困难重重，看到了农村贫困化的趋势；了解到广州市郊区农村在土地关系上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出都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依然保存着半封建的形态，土地变成商品，变成商业资本及官僚资本的投资对象，这股势力一天一天地增加，如在冼村的2000多亩田地中，不在本村的地主就占有400亩，占总亩数的15%。在上元岗村，不在本村的地主所有的田亩，占总亩数的13%，在其他各村也有类似的情况。各村中宗族所有地还占着很大的成份，集团地主势力很大，如在上元岗村的太公田有100亩，占总亩数的17%，在长湴，太公田约有1000亩，占全村总亩数60%。各村的农民，大多数是宗族所有地的佃农。10个乡村的统计，佃农的比率占55%，半自耕家的比率占26%，自耕农仅占10%，农业上的无产者，在农村人口中占着大多数。五年来农产物价格变动很大，谷价指数由100跌至73，蔬菜类的价格指数亦由100跌至76，农民的收入逐年减少。农民收入不能抵偿支出的在40%以上，能够稍有盈余的还不到10%，负债户越来越多。农民普遍有改善生活的要求。活生生的事实，使同学们领悟到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束缚，是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根源，不实行民主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农民抗日救国的伟大力量。同学们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对比，面对现实，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是正确的，明确了农村工作的意义和要求，大大提高了到农村去的工作积极性。

### 三

中大乡村服务实验区各分区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工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生动活泼，内容都密切结合抗战救亡和农村实际，受到农民的欢迎，对激发农民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增强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作方式有：民众夜校、阅书报处、壁报、读书会、知识传递队、知识传送训练班、歌咏队、戏剧队、游艺会、邻村访问会、乡民联欢大会、演讲比赛、国术研究会、运动会、棋类比赛、村友会、互助会、清洁运动、国耻纪念式、收获节、农产品展览会、农业问事处、服务代笔处、生活问题解答处、乡村公园……。工作的方式，各分区因各自的环境而有不同，农学院同学在各村推行速成堆肥法，消灭虫害，组织信用合作社等。医学院同学负责各农村卫生工作种牛痘开展灭鼠灭蝇运动。青年同学都发挥了专长和智慧进行工作。“七·七”抗战以后各分区增强了战略训练的课程如军事训练、救护知识等。

民众夜校和歌咏、戏剧队，是普遍进行的基本活动方式，是经常进行农民教育工作阵地，最受欢迎，效果最好。

1. 实验区各分村设立夜校共 11 间，全部学生在 1500 人以上，每校大都分为高、中、初 3 级，亦有分为高初级的，除了课外活动外，基本科目分语文训练、常识训练、生活指导三大门。民众夜校的活动同学们可以发挥自己和集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拘一格。如岑村长湓村夜校课程就有不同：常识、问题讨论，识字教育、国防音乐，演讲训练等。民众夜校的教材，除由实验区教育研究委员会负责选编、供应部分

课本外，多数是同学们自编自印的。无论是语文、常识、唱歌，都充满抗敌救亡的内容，甚至算术亦常以失地数字为题材，语文和常识歌咏教材，很多都注意到通俗化和结合乡土的实际，很有特色。如岑村分区，为了举行国难五月宣传大会，谱写了“岑村歌”，在民众夜校及群众大会上教唱，纪录如下：

### 岑 村 歌

1·2 3 5 | 4 3 2 1 0 | 5·6 7  $\dot{2}$  |  $\dot{1}$  7 6 5 0 |  
 我们岑村好弟兄，大家见面笑盈盈，

||:  $\dot{1}$  7  $\dot{1}$   $\dot{2}$   $\dot{1}$  5 | 6 5 4 5 0 | 1·2 3 5 | 4 3 2 1 0:||

1. 青山绿水是我的家乡，先祖由来自宋明，

2. 同心协力大家齐工作，彼此同是一家人，

我们岑村好弟兄 天灾人祸真频仍，

更有日本鬼子和汉奸，将我同胞任欺凌，

团结一致努力齐奋斗，争取胜利的光荣。

下元冈民众夜校教材书第二单元第一课，写得生动，有爱国爱乡土的感情，易记易上口，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 龙 眼 花

五月龙眼花头多，

大家唱个五花歌，

五月的家乡多么好，

田中禾尾渐渐高，

风下息凉同是主，  
大家谈天排排坐，  
我们做个太平民，  
世事不理总可过，  
但是如今时年错，  
难过！难过！  
会见不久倭奴来，  
田园芦荻燬炮火，  
如今挨饿犹余事，清清白白见祖宗，  
一旦身为亡国奴，  
祖宗百世尽污斲，（斲字无意）  
吃甚么的饭，饮甚么的水，  
敌人来了不自由，  
亲人生命任折磨，  
再生龙眼五月风，  
香香腻腻年年同，  
惟是家乡丧尽无居处，  
流离失所贱如虫，  
爱家爱乡爱祖宗，  
快把心意立定齐努力，  
抗战，抗战杀倭凶，  
大家杀完了倭凶。  
再来凉凉五月龙眼风。

下元冈民众夜校公民训练课教材教法别出心裁，生动活泼：

公民训练 5月14日  
五月是悲壮的，



我们应该开个会来纪念，怎样准备呢？  
通知全村的人来参加，还请些什么人来？  
秩序要好，自己先要守会场规则，  
我们先写好了标语贴在标内，  
想：写些什么好，  
我们唱歌，  
叫口号  
叫些什么口号？  
想想看！  
推出几个人来预备好吗？  
好！现在来推。

在夜校上这一课时不采取课堂的讲演形式，而采取边读课文边讨论的方式，将预定于明天晚上举行的五月国耻纪念大会应该进行筹备的事情，应在课堂上解决了。全体学生都明白为了纪念这个悲壮的五月举行全村大会的意义，懂得开会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大家都努力做好所分配的工作，大会开得很成功。

有几个分区实行文化战士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推动识字的青年和日校的小学生参加。“即知即传”，亦收到一定的效果。

2. 歌咏戏剧活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实验区戏剧研究会工作很出色，各分区歌咏、戏剧活动也取得很好的成绩。

石碑附近十个乡村课堂里田野上到处飘扬着抗战歌声，国防音乐是夜校的一门课程，青年班、妇女班、少年班人人都会唱救亡歌曲，村村都有歌咏队，独唱，合唱，经常举行村与村的互访，比赛唱歌，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长湓村青

年歌咏队合唱、独唱都受到表扬，他们不但能唱，字音清楚，节奏分明，而且能将歌词中的感情表达出来，有感染力，主要是在教歌时将歌词的意义解释清楚，唱者领会较深。有些分区还自编歌曲，唱粤曲，木鱼，用农民喜见乐闻的曲调，歌唱抗日救亡，团结御侮，歌唱抗日英雄，歌唱本地的好人好事。有的乡村农民自编自唱，在援绥群众大会和十村联欢大会上，广大农民群众歌唱抗日歌曲形成新的高潮，带动了整个实验区歌咏运动。

实验区戏剧研究委员会在组织同学演出戏剧和推动农村戏剧工作的发展，起了卓著的作用。

戏剧研究委员会团聚了一群爱好戏剧艺术的青年同学，由中国戏剧界的先进作家洪深教授担任顾问，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开拓农村戏剧工作，演出民族解放斗争和配合农村大众改善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在学校和各村演出《五奎桥》《打回老家去》《汉奸的子孙》《平步登天》《撤退赵家庄》等剧目，当时适合广东农村演出的剧本很少，为了开展农村抗战教育的急需，戏剧研究委员会在全校发出通告征求农村剧本提出简则如下：要求剧本的内容能配合当前抗战形势加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民族意识，暴露农村大众痛苦的泉源或破除农村一切迷信和陋习，提出农村大众的真正出路，以适合广东农村大众，在生活体验中能理解的事实，内容要现实，趣味要浓厚，情节要动人，描写要生动。布景简单，道具最好能在农村中容易找到的。演员人数不宜太多，以能适合上演于小舞台为最宜。对话要力求通俗易懂。幕数以独幕最佳，最多不要超过三幕。在很短期间内，征集了不少剧本。实验区的工作人员和青年同学编写的有《抗敌》、《一个爱国的儿童》、《一个爱国的母亲》、《复仇》、《贺新年》、《钓鱼》、《争

公道》、《百灵庙之夜》、《为国牺牲》、《新的女性》、《两个小先生》等剧本。为支援四川省水灾，编写了《一袋米》、《饥饿》两个剧本。吕志澄同学一人写了《农村一家庭》、《绥东一家庭》、《绥东一伤兵》、《何老大拜年》、《村中之夜》等五个剧本，提供各村在绥绥群众大会上演出。戏剧研究委员会协助各分区进行戏剧训练，成绩很好，各分区如寺贝底村、扬箕村、岑村、长湓、车陂及元冈等村的农民，均能自己演出话剧。各村青年农民和小学老师也写了剧本，自编自演，乡村姑娘也登台演出。其中有石碑村的《米贵》、《太平犬》、《求人难》，扬箕村的《联合救国》、《烟毒》，元冈村的《赌博之害》，寺贝底村《守财奴》。

为庆祝实验区成立一周年，洪深教授亲自导演《五奎桥》，以中大实验剧团的名义，在校内和广州市演出，并参加筹款赈川大公演。香港九龙各界发起大公演筹款，中大实验剧团应邀前往香港参加公演，演出《一袋米》及《饥饿》两剧，收到很好的效果。

## 四

中大乡村服务实验区各分区重视青年农民的培养，积累了不少经验。

青年同学到农村去，在各村开展工作，对于当时农村工作重点是什么？依靠谁？这些重大问题，是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明确的。

在实验区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各分区要办一个青年班，各项工作要依托青年班的学员来进行，并提出要“注意发现

有才干的青年，训练之使成农村基本人才”。但是，在农村工作中，要紧紧抓好青年农民的培养，形成一支有思想觉悟，政治上要求进步，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骨干队伍，作为农村工作的依靠力量，这些道理要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和理解。如有些分区在开办民众夜校时，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先办什么班？后办什么班？没有很好考虑，一开始就办了尽是少年儿童参加的识字班，忙得晕头转向。后来在实验区总结交流经验时，才知道走了弯路。有些分区如长洼等村，一开始着重依托本村青年农民办起书报处，办起青年班或读书会，将农村中读过小学的青年农民组织起来，讲时事，讲爱国故事、革命故事，比较系统的学习政治常识，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讲民族解放斗争史，讲当前民族危机，讲抗日救国和实行民主改善农民生活的关系等等，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讲一些农业生产科学知识，唱抗日歌曲。青年班或读书会办了一定时间，再开办识字班，招收失学青少年读书，由青年班或读书会的成员负责招生工作，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和邻居到夜校读书识字。这些识字班、妇女班，都由本村青年班中挑选文化水平较高、表达能力好、作风好、责任心强的学员担任教学工作，妇女班的政治课则多由分区的女同学担任讲授。各分区的工作同学就可以集中力量做青年农民的培养工作，辅导青年班的学员做好识字班备课或教学检查等各项工作，或利用初级班上课时，进行家庭访问。

元冈村青年班将教学和筹备举行村友大会开展社会活动，培养青年农民的组织领导能力，举行演讲比赛，培养青年班学员的表达能力。组织各村互访，对培养青年农民骨干和增进村民之间的团结友谊，以至相互学习促进工作，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有些村举办农产品展览，组织青年班学员进行农村经济调查，收集优良品种，推广快速堆肥方法，宣传改良耕作技术等，对培养青年农民骨干提高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密切联系农民群众，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分区组织歌咏队，举行歌咏比赛，成立剧团（队）排演有教育意义的话剧，在各村演出，对于宣传发动群众和锻炼培养青年农民干部，调动全村青年农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或大或小的有组织的行动。有演员有后台工作人员，有人负责联络招待工作，也有人负责茶水供应等等。组织一次演出，事情很具体，工作要协调，最能培养青年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

岑村、长湓、元冈、洗村等分区重视农村青年妇女的培养工作，各分区成立妇女识字班、有的分区成立妇女团，农村妇女教育培养工作，难度比较大，中大女同学参加各分区工作的很多人都负责妇女班的教学，进行家庭访问，有的参加戏剧演出。参加洗村分区工作的女同学，为了培养农村青年妇女骨干，还能到农民家里做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经过识字班的教育和救护训练，经过大小集会的实际工作，涌现了一批青年女积极分子，有些青年妇女还参加戏剧演出，大大改变了农村一向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

重视做好各村小学校长、老师的工作，对帮助乡村服务工作的开展和培养农村青年队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因为夜校和文化活动的地方，借用小学的校舍，要取得小学的支持，更因为小学校长和老师对农村青年的情况最熟悉，其中不少人曾在小学读书，在校学习情况和成长过程都很了解。如长湓等农村青年积极分子的挑选和青年班（高级班）的成立，都得到小学老师很多的帮助。

实验区各分区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农村工作不能搞包办代替，要培养本地青年和农民当家作主，逐步建立起各村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核心力量，工作得到蓬勃的发展。由于同学因毕业或工作需要，各分区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如何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坚持下去，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各分区必须做好工作纪录和做好交接班的工作。长湓等村工作做得比较好，1937年广东抗先队成立时，在长湓村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抗先队员建立抗先队组织，为在长湓村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基础。在日寇侵占广州期间，长湓村和龙眼洞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将他们的家乡作为东江纵队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

# 我所知道的中国青年同盟

温焯华

“中国青年同盟”是王均予同志于1935年7月从上海到广州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我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继续深入侵略华北，而国民党政府则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广大青年群众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端不满，纷纷要求反蒋抗日，以拯救民族危亡；另一方面是中共广东省委于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全省各地党的组织活动暂时中断，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反共投降政策和禁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但还有一些党员仍在进行革命活动，还有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断对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宣传活动，如何干之、何思敬、邓初民等教授在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勤勤大学和女子师范等学校，对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苏联和中央苏区的情况，使越来越多的青年日渐觉醒，向往苏联和瑞金苏区。爱国热情日益高涨，迫切要求共产党领导抗日救国，实现民族解放，为争取民主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王均予同志在广州发起组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青年同盟”。

王均予同志曾于1926年在湖北宜昌参加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于1932年在上海由柯尔达同志介绍重新入党。1933年至1934年先后在上海党中央出版部任科长。这期间，他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各方面的群众关系，大量推销党的秘密书刊及发行马列主义书籍。随着革命工作发展的需要，他创办了《时代文化》半月刊，把这个刊物秘密发行全国各地。他又通过《时代文化》的发行关系，组织各地《时代文化》读者会，作为联系各地读者和开展工作的组织形式。《时代文化》停刊后，他为了不因停刊而影响工作的开展，经党组织同意，先把上海读者会改为“中国青年同盟”。藉以维持读者会的工作，继续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扩大推销党的宣传品，参加一般革命活动。1935年，上海党中央机关前后两次被敌破坏。王与上级组织中断了联系，经王所在的党组织研究，决定他到广州来活动。他利用《时代文化》读者会的关系来到广州，找到读者会广州方面的负责人、勤勤大学学生邱萃藻。王与邱研究，认为应如上海那样，将广州读者会改为“中国青年同盟广州分盟”、又称“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简称“中青”。

“中青”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它的组织形式、组织生活宣传按照地下党秘密工作的一套做法，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参加“中青”的人，必须是政治面目清楚，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严守组织纪律的进步分子。参加组织的人，是逐个被吸收进来的。在小组确定为发展对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和教育，小组讨论同意吸收时，就由一至二个盟员介绍，并经领导批准，才正式成为“中青”盟员。盟员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必要时过两次，组织生活，其内容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和讨论工作问



题，学习马列著作和秘密书刊。有两个盟员以上的单位，就建立小组过组织生活，有的则是个别单线联系，除了同一小组的盟员互相认识外，不同小组的盟员之间都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上级对下级领导多是单线联系，规定每个盟员不能暴露组织情况和自身的政治面目。

“中青”的主要工作是团结教育青年，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报刊，研究时事政策，宣传我党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出版过一期《旗竿》刊物，所有经费均由盟员捐助。

“中青”的革命活动，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5年“一二·九”之前，主要是建立和发展组织，初期以王均予、邱萃藻、林振华（勤勤大学学生）为领导核心，物色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个别考查、教育，个别发展，开始时，以中山大学、勤勤大学、国民大学、中大高中部、广雅中学的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为发展对象。如发展了中大的钱兴、曾振声（曾生）、粟稔，国民大学的张定邦（张靖宇），中大高中部的张寿南（温焯华）；广雅中学的尹卓辉等。以这些学校的骨干为基础，向广州各大、中学校发展，如岭南大学，中大高中部、初中部、勤大附中、民大附中、广雅中学、女师、大中、知用、执信、仲恺、庚戌、教忠、一中等校，都有“中青”盟员，其中以中大的“中青”组织起主导作用。同时，还注意向外县青年中发展组织，如东莞、中山、新会、合浦、肇庆等都有“中青”组织，其中东莞、中山的组织较强。

建立和发展组织的方法，是组织半秘密性的进步青年读书会，通过读书会团结教育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向青年宣传我党的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

度好，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读书会是为发展“中青”组织打下思想基础，也是为后来动员群众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阶段是“一二·九”运动后，各地“中青”盟员积极参加并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广州“一二·九”抗日运动。首先是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大高中部的“中青”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他们同进步同学一起奔走相告，把报纸刊登的日寇侵略消息和北平学生示威游行的情况剪下张贴，出海报召开抗日大会。中大高中部“中青”派代表参加石牌中大全校抗日大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洪流，大会决定于12日到广州市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中大的“中青”和“突进社”及进步青年为骨干的中大学生都参加了，与各校青年汇合，形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抗日示威队伍。这就是1935年12月12日广州青年学生举行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4000多抗日大军由石牌出发，浩浩荡荡奔向市中心，沿途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等口号，邓初民教授自始至终参加了游行。

第二，“中青”盟员和进步青年组成宣传队、讲演队到广州市内进行抗日宣传，并组织联络员分头到市内各大中学校进行串连发动工作，深入地播下抗日种子，进一步推动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举行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但是宣传联络工作遭到反动分子的破坏，广东当局利用“广州学生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如广州法学院的“学生救国会”竟然不准中大学生联络队到该校进行宣传联络工作，胡说什么法学院学生自己会进行抗日活动，但

是法学院广大学生不顾阻挠而自动集合起来，热烈欢迎中大学生联络队进校。

第三，进行争取抗日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大学生团结在“中青”和“突进社”的周围，与国民党民政厅长林翼中的御用工具“抗声社”开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12月30日，中大学生在石牌大礼堂再次举行全校抗日大会，会上严厉斥责“抗声社”把持抗日机构，实行“包而不办”的怠工罪行，大会一致决议撤消他们在大会主席团的席位，重新选出曾振声、张凤楼等代表组成主席团，由曾振声任中大抗日大会主席团主席。从此，中大的左派力量掌握了抗日的领导权，对促进广州学生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中青”与“突进社”及其他进步分子组织第二次第三次抗日示威游行。我们经过20多天来的宣传联络工作，使广大青年学生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更积极参加抗日运动，斗志更加坚强了，中大抗日会决定于12月31日举行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广大学生是在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中进行的。省教育厅得知中大学生定于31日举行示威游行，立即下令各校停课放假，不准学生留校，广雅部分学生被锁在校内，他们在中大同学的支持下，冲出校门，与执信、知用、大中、教忠、女师、庚戌等校学生汇合起来，参加游行。虽然有部分学生受阻未能参加，但队伍仍达四、五千人之多。这次游行队伍，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在市区进行抗日宣传，另一方面派出曾振声等6名代表，向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提出质问和要求：一、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禁止学生参加抗日运动？二、两广政府平时叫嚷“抗日”，为何日寇大举侵犯我华北却不表示抗日态度？三、立即取消压制民众抗日自由的一切法令，保障民众享有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在戒备森严之下，西南政务委员会只派出一个秘书来接见学生代表，敷衍了一番，说什么将把你们的意见“转达”上去。西南政务委员会这种消极抗日的态度，群众极为不满，也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认识到必须继续加强抗日斗争，进一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日运动中去。这次游行一直坚持到晚上，一天来，学生们虽然很疲劳和饥饿，但人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并准备投入新的斗争行列。

广州学生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后，中大和各校学生的抗日运动继续高涨，共同准备举行第三次示威游行。中大于1936年1月6日召开全校抗日大会，会上，开展反对校长邹鲁假抗日的斗争，得到邓初民教授热烈支持，取得了胜利，继而组成以曾振声为首的中山大学抗日会执行委员会，并定于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省教育厅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立即下令各校放假，封锁校门，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是由于我们事先对各校学生做好宣传联络工作，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游行的阴谋异常愤慨，特别是广雅中学1000多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出校门，与中大及其高中部、初中部、执信、市女中、女师、庚戌、民大附中、仲恺等校学生汇合起来达万人。他们充满战斗激情参加游行。同学们高呼激动人心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南京政府妥协投降！”“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示威队伍到达长堤新填地广场时，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并通电号召全国学生继续开展抗日运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南京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同时，宣传队员向周围市民、工人讲演，尤其是中大法学院学生钱兴在广场上发表沉痛和激昂

慷慨的演说，博得在场群众的热烈掌声，这次大会人数达3万多人。

抗日大会之后，游行队伍到省教育厅前示威，教育厅大门虚掩不见人影，愤怒的学生高声质问教育厅为什么要阻挠学生参加抗日运动？要厅长黄麟书出来回答，许久，教育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于是学生冲进去把教育厅办公大楼的桌、花瓶和玻璃窗等打得粉碎，并把教育厅的招牌拆下来，抬回中大高中部操场，当众砸烂。

1月9日的抗日示威大游行，是广州广大青年群众抗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的革命行动，使整个广东各地的抗日运动高涨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群众运动的阴谋，他们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国民党的震惊，陈济棠大为震怒，密令省、市公安局变本加厉地镇压学生抗日运动，派出许多特务窜到中大刺探曾振声、钱兴等人的行动，并要逮捕何思敬教授，准备使出凶残手段对付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于是制造了1936年1月13日血腥的荔枝湾惨案。

1月10日，国民大学附中为反对学校当局提前考试和放假，反对法西斯军训，由学生会主席唐凌鹰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议于1月13日发动示威游行，12日派人到中大和中大高中部要求支援，当时“中青”成员认为目前举行游行不是时机，但是现在广大学生已发动起来了，应予以支持。中大决定组织近百同学前去参加。9时许，这支队伍到达荔枝湾汇合，各校合计八、九百名学生，当游行队伍刚刚走到桥头，迎面来了50多个流氓打手，打着“广州市民抗日锄奸团”的旗子，开始同学们还以为是市民来参加游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这班流氓抢上桥来。扔下旗子，大喊“杀呵！”挥

动铁棍、斧子，拔出手枪冲过来就打，一时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革命同学与这帮匪徒英勇搏斗，有几十个同学流血受伤，其中有5个民大附中的女生重伤倒地，被抬进医院救治。有几个中大同学被抓去，中大纠察队长冯道先负伤被捕。

荔枝湾惨案的第二天，陈济棠发出紧急布告，宣布全市戒严，封锁省、港澳交通，大批军警日夜巡逻，石牌路上禁止市民来往，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迫逃亡，中大同学粟稔、张凤楼等多人陆续被秘密逮捕。中大高中部爱国学生的宿舍被查封。广州白色恐怖乌云满天，被捕的同学在狱中遭受严刑酷打，受到非人的待遇，冯道先、朱文畅等同学被杀害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特务多次拷问粟稔等人：“是不是共产党？是谁带头打教育厅的？为什么要打教育厅？”粟等理直气壮回答他们：“因为反动的国民党教育厅多次破坏抗日运动，大家太愤激了！”

荔枝湾惨案后，广州的“中青”领导人王均予指出，要发动群众组织“荔枝湾惨案后援会”，发表告民众书，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血腥罪行，营救被捕同学和援助受难者家属。同时指出，要避开国民党大逮捕大屠杀的锋芒，进行更有成效的斗争，“中青”要组织爱国群众转移到农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大钱兴同学继续活动，去营救被捕同学，进行合法斗争，用中大全体学生名义发出通告，揭露反动政府逮捕3批学生名单，迫使邹鲁向当局放人，最后邹鲁被迫亲自坐车到广州市公安局保出了粟稔、张凤楼等人，从荔枝湾惨案告诉我们：国民党当局镇压抗日运动虽然一时得逞，但最后抗日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第三阶段是1936年春夏，这期间“中青”的工作是推动广州学生抗日运动朝着纵深和横向发展。

荔枝湾惨案后，广州学生大规模的抗日运动表面上被压而沉静下来，但是广大青年经过“一二·九”爱国运动受到教育和锻炼，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日益深入人心，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爱国，要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要求参加革命组织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了适应广大青年的要求，“中青”的领导人就提出，在青年中组织“抗日十人团”。每10个人为一团，成为“中青”外围的秘密组织，是“中青”的后备力量，由“中青”盟员来领导，团与团之间无组织联系。由于入团条件很严，不能适应群众的要求，所以“十人团”的发展很慢，先后只吸收团员百余人左右。“中青”通过“十人团”的考察和教育，才个别吸收参加“中青”。一些青年抱怨说：“中青”关了大门又关二门。1936年春夏间，“中青”工作基本上仍是以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方式进行，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未能开创青年工作的新局面。

1936年夏后，“中青”工作有所转变，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指导思想，开始纠正组织上关门主义的错误，注意运用统战策略，利用公开的合法形式，组织、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工作突出的表现是于1936年7月间“中青”、“突进社”共同与其他抗日力量，发动广大爱国青年，建立了由广州基督教男青年会主办的“广州民众歌咏团”，这个歌咏团开始由100多人而发展到1150人的一个大型歌咏团。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小部分是店员、工人、青年农民。广州党组织于1936年重新建立起来后，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战政策。这个千余人的歌咏团是由“中青”的李木子、吴奔流和“突进社”的徐青及其他进步人士组成领导小组，掌握歌咏团的领导权，同时取得广州儿童书

店负责人吴涵真、广州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余瑞尧及何安东、陈世鸿、俞安斌等音乐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歌咏团是以教唱抗战歌曲为主，如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流亡三部曲》、《开路先锋》、《大路歌》、《渔光曲》、《夜半歌声》等革命歌曲。通过教唱和学习革命歌曲，达到以革命音乐艺术陶冶性情，激发爱国热情，追求真理，从中教育培养一批进步力量，通过他们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歌咏团的活动，总团部下属小组，除了每周集体教唱外，各自集会组织学习讨论，漫谈抗战歌词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革命理论等等，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各种活动，把广大青年引向提高政治觉悟，逐步发展进步力量，吸收到读书会中来或参加“中青”中去。实践证明：“广州民众歌咏团”是党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发展进步势力，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时期撒下革命火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这时，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运动又继续高涨。在我党领导下，采取统战形式，建立了许多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如建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锋社话剧团”、“儿童剧团”、“世界语踏绿社”等等，使抗日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更加广泛深入开展起来。

第四阶段于1936年7月后，“中青”盟员主要是进行发展党员工作。1936年4月，王均予同志接到原来同他在上海工作的易吉光同志来信通知他到天津去，与北方局联系。王到了天津，由北方局李大章同志接见他。王向李汇报了他在广东工作的情况后，党的组织关系得到了恢复。北方局指示他回广东建党，以“中青”盟员为建党基础，建立和发展广东党组织。王7月回广州后，就着手进行建党工作，首先在



“中青”组织中，逐个审查挑选吸收党员，邱萃藻、林振华、钱兴、曾振声（曾生）、粟稔、张定邦（张靖宇）、张寿南（温焯华）、王作尧、刘汝深、陈柏昌、叶焜寰、尹卓辉、李士洋、梁嘉、杨谨英、周明、金昌华、梁湘、陈翔南、梁奇达等等都是1936年八、九月间先后入党的。入党时都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都没有候补期。中山大学、勤勤大学、中大高中部、中大初中部、大中中学、知用中学、执信中学、仲恺中学、女师、女中等等大中学校先后建立了党组织。同时在东莞、中山、新会等县建立了党支部。此后，“中青”就在党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王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取消“抗日十人团”组织，团员则分别加入“中青”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少数团员参加党组织。随后，王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的要求，把“中国青年同盟”改称为“中国抗日青年同盟”。1936年9月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王均予根据“南临委”的指示于1936年10月间成立了“中共广州市工作委员会”，王均予、罗范群、邱萃藻、林振华、周明等为市委委员，王任市委书记。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由邱萃藻负责，林振华、张定邦、张寿南等人参加外县工委。1936年底薛尚实根据中共关于根本改造青年团的决定精神，指示王均予解散“中青”。王于1936年底执行南委指示，解散“中青”。王鉴于过去上海和广东党组织屡遭破坏的教训，对发展党组织谨小慎微，不敢积极发展，除了多数“中青”盟员基本被吸收入党外，仍有一些盟员和不少有入党条件的左倾积极分子没有被吸收入党。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7月至年底，发展党员约100人。由于王的建党思想还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因此发展党的组织不能适应党的

要求，但王对党员很重视党的秘密工作教育、党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注意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所以建党以来，党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党组织是纯洁的坚强的。

历史实践表明：“中青”在王均予同志尚未恢复组织关系之前，是以党的政治思想为指导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组织。在王均予恢复了组织关系之后，“中青”就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党的外围秘密组织，它的革命活动，对于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恢复和发展广东党组织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 三十年代突进社的 组织和活动情况

张直心 杜 埃 刘天行 黄焕秋

“突进社”是三十年代我们党领导广东省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成立于1935年10月。这个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对当时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和广东党组织的重建，都曾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 一、突进社的组成和发展及 成为党的外围组织的经过

1. “突进社”是于1935年10月开始在中山大学组成的。“突进社”的组成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我党的政治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后来在我党的组织领导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早在1932年间，广州曾组织领导有“左联”、“社联”等，“突进社”的成员张直心、杜埃、李静音、徐青、陈维岳等曾经是“左联”或“社联”的成员，后来“左联”等组织因国民党的镇压而停止了活动，但小组成员相互之间仍有来往。大家对国民党的镇压都非常愤慨。1935年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严重，民族危

机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在我党《八一宣言》发表后，在中山大学进步教授何思敬的教育和指导下，我们就产生了组织“突进社”的念头。当时，何思敬在中山大学是知名的左翼进步教授（是1932年入党的党员），他的讲话和演讲，对我们都有很大启发和影响。张直心等常到何思敬教授家里，何对张直心说，要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先组织骨干力量。这就是组织“突进社”的起因。

2. 关于怎样进行组织问题。张直心当时首先考虑到过去参加“左联”和“社联”读书会的成员，杜埃、陈维岳等可能会赞成；想到同班同学吴超炯和叶乃勋也可能赞成。张直心和他们个别谈话，得到他们同意。张直心再请示何思敬，何思敬指示人数暂时不要太多，要慎重，且不要公开。于是决定以秘密形式组织骨干力量。“突进社”成立时，在中大学生第九宿舍开过两次会，在野外开过一次会，主要讨论和决定了下列几个问题：一是讨论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搞反革命内战已经不得人心，东北沦陷后又采取不抵抗主义，人心丧尽，从淞沪抗战、内蒙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福建人民政府等事件看，国民党蒋介石已遭到全国人民唾弃，中国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中国人民要不作亡国奴，必须进行抗日救亡斗争，这正是我们组织行动起来的时候。二是讨论了组织的名称、宗旨、参加组织的条件和活动形式等。决定组织“突进社”，由张直心负责主持；吴超炯负责组织；杜埃负责宣传；叶乃勋负责对外联络；陈维岳负责筹措经费，于1935年10月间正式成立。

“突进社”的宗旨是要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团结进步青年，迅速突破国民党的种种压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故命名“突进社”。

“突进社”组织上是秘密的，规定入社者必须，①为共产主义奋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苏维埃，拥护红军，拥护抗日；②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经常过组织生活；③遵守秘密原则；④提防国民党反动派汉奸特务的破坏。“突进社”活动为个别联系和组成小组（以“读书会”形式）两种方式秘密进行。主要骨干的活动地点，除中大学生宿舍外，杜埃、陈维岳、张直心、余萍等还在广州东山百子路旁苗圃内合建一间茅棚，取名“准庐”，作为活动场所。

3. “突进社”的组织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迅速扩大的。由中大校内到校外，陆续发展了许多骨干成员，如中大的饶彰风（又名蒲特）、黄焕秋、刘秉钧（现名刘天行）、余铭艳（现名余明炎）、陈树功等，广州大学的余盼贤（现名余明）、余萍、李丽娥、执信中学的李静音、广雅中学的黄万吉、黄泽成，越山中学的罗明（又名罗×钊），广州市二职的崔镇年（已牺牲）；广州市南京中学的陈文汉；中大附小教师徐青、杨槐等。

4. “突进社”的组织领导：前期（从1935年10月至1936年3月间）是受何思敬的指导，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月间何思敬因遭国民党迫害而移居香港。不久，他在香港主持全国救国会华南分会工作。是年春节前，张直心去香港向他汇报工作，何思敬提出吸收“突进社”作为这个分会的团体成员。在此期间，张直心曾与吴超炯商量，觉得“突进社”要有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有正确的革命方向，估计请何思敬帮忙可能找到。于是张直心向何思敬表露想找党及想入党的愿望，问他赞成不赞成。何说：“我们学习社会科学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革命，变革社会。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要有革命的理论又要有革命的实践。对于想参加共

产党，何表示赞成。张直心就提出请他帮忙。何思敬表示可代为设法。春节后不久（在3月间），张直心往香港，见到何思敬时，问他找党的事情如何。何思敬说，最近北方来了一个人可能是C.P，我已将你的情况向他介绍，我可通知他明天上午来我家和你见面。次日，张直心在何思敬家等了不久，他就来了。何思敬介绍和他认识，说他是老杨（即薛尚实，是北方局派来南方进行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工作的）。薛尚实和张直心见面后，薛随即与张离开何思敬家到九龙宋王台谈话。薛对张说：“何思敬教授说你是他的高徒，并将你的情况详细对我讲了。”薛问张是不是托何思敬教授找党的关系。张答是有这回事。薛对张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我相信你，我对你公开我的政治面目，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薛问张有关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及广州市民和工人方面的情况。特别问得详细的是“突进社”的情况：如成员多少、骨干是哪些人，经常进行哪些活动，活动范围、对象、组织形式等。张一一对薛作了汇报。薛听后对张说：“革命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做了共产党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严守组织秘密，随时准备为革命为党作出牺牲，问题是能否做到。张向薛表示决心参加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于是，薛尚实吸收张直心为中共党员，预备期3个月，并说明要3个月预备期满后才有资格发展党员。另外，薛尚实对“突进社”的意见是：1. 以“突进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在“突进社”的成员中培养党员发展对象；2. 抓紧“突进社”骨干工作，使之成为首批建党对象；3. 仍采用秘密活动方式，但必须继续发展社员；4. 要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工作等，最后，薛规定每月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并约定找他的方法是把约见的信放入九龙弥敦道金如旅店旅客信插内。张直心和薛尚实这

次谈话，历3小时，“突进社”从这个时候（1936年3月）开始，就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突进社”的后期。从此“突进社”按照薛尚实的指示进行各项工作，至1936年8月，“突进社”主要骨干被吸收入党，薛尚实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建立了党支部，张直心任党支部书记。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突进社”又有些成员先后被吸收入党，有些成员参加了抗日先锋队。

## 二、突进社的主要活动

“突进社”建立之后开展了多方面的抗日救亡宣传和革命活动，主要有：

一、积极推动中山大学和外校青年抗日救亡活动；

（一）“一二·九”学生运动前，“突进社”曾秘密刻印我党《八一宣言》，宋庆龄等人的《保障人权同盟宣言》，《救国六大纲领》，日军阴谋灭亡我国的秘密文件《田中奏章》等宣传品，秘密散发。

（二）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突进社”与“中青”和其他进步组织都积极活动、响应、号召社员在进步同学中进行串联。12月12日，中山大学全校学生开大会和到市区示威游行，“突进社”成员都参加了。12月31日，中大举行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我社成员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和宣传、纠察工作。

二、出版刊物，刊名《突进》，由饶彰风负责编辑，杜埃等人参加，是小报形式（4版8开）半公开不定期的刊物，出版地点广州百子路“准庐”，后因反动派突击搜查“准庐”，在出版三期后停刊。

三、组织下乡宣传队。1936年1月，组织下乡宣传队，前往外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一行动，我们曾研究分析当时情况，认为在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已采取高压手段，大中小学提前放假，活动已受到限制，不如把救亡运动推动到各县各乡去，唤起广大乡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张直心为“突进社”宣传队队长，队员有杜埃、陈文汉、李静音、余明、徐青、余萍、吴超炯等人。留校的继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回乡的社员，都参加了宣传队。宣传队先后到汕头、潮州两市发动学生进行游行，成立救亡组织（当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提前放假，宣传队先期赶到），后又到大埔县，在大埔县城演出由徐青编写的街头话剧，领导群众举行火炬游行，唱抗日歌曲。当时“突进社”社员饶彰风在大埔任小学校长，也参加组织这个活动。“突进社”其他成员吴超炯、叶乃勋等则前往新兴、恩平等地进行宣传。1936年春节前后，广州发生“一—三”荔湾惨案，下乡宣传队先后返回广州。

#### 四、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除出版《突进》刊物外，黄焕秋、刘天行等人还利用班会名义，邀约进步同学金昌华、俞福亲等及文学院同学钟骞、张克明等出版过《解放》刊物，共发行四期，每期达2000份，公开散发。同班同学朱文畅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在班内举行追悼会，还出版了“悼念专刊”，控诉反动派镇压群众的罪行。

（二）参加组织民众歌咏团，歌咏团是“突进社”与其他救亡人士、团体成员共同于1936年夏发起组织的。“突进社”成员徐青是歌咏团的领导成员之一，李静音和“中青”成员俞福亲也在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歌咏团，发动了女青年数百人参加两个歌咏队，掀起了抗日歌咏活动的热潮。



(三) 积极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活动，当时“突进社”成员在中大校外积极进行工作，以黄焕秋、徐青、刘秉钧为主。曾由徐青陪同陶行知先生来中大作报告。当时“新文字广州分会”和“上海新文字学会”有密切联系，叶籁士是上海新文字学会的负责人；黄焕秋是“广州分会”的负责人，徐青也是主要工作人员，并出版有《突击》刊物（以“中国新文字学会广州分会”名义出版）。

(四) 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办识字班和夜校宣传革命和抗日，培养救亡干部并为发展党组织创造条件。

1936年暑假，张直心、杜埃、吴超炯、李静音、徐青、徐萍等通过龙眼洞实验小学校长李德和在龙眼洞长湴村办农民夜校；黄焕秋、刘秉钧、余明炎等也约邀其他进步同学先后到岑村、长湴村办夜校，参加识字班的青年，后来有些成为在龙眼洞长湴等乡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骨干，为发展党组织准备了条件。“突进社”成员李静音还到广州橡胶厂和榨油厂发动女工举办识字班。

如上所述，“突进社”在“一二·九”运动之后按党中央指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去开展工作的，北平“一二·九”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当时南方广州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不是巧合，而恰恰说明当时广州青年左翼外围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是受到党的影响和指导的。

(五) 参加组织领导鲁迅先生追悼会。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不幸逝世。消息传来，我们十分悲痛。为了纪念鲁迅，发扬其革命精神，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前进，“突进社”和“中青”以及广州文化教育界进步团体组织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悼会。黄焕秋参加了筹备工作，徐青为主席团成员，杜埃担任大会发言记录，黄焕秋代表新文字广州分会致

悼词，“中青”成员金昌华等人在大会演讲，会后有纪念专刊（现存广州鲁迅纪念馆）。会后反动派将饶彰风、杜埃、徐青等列入黑名单，经党组织探悉，立即通知他们去香港暂避。

在举行这次追悼会之前，“突进社”的主要骨干张直心、饶彰风、杜埃、吴超炯等人在“准庐”商议，主张这次追悼会的要求是：“1. 宣传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2. 通过大会宣传我党《八一宣言》的主张；3. 通过大会揭露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及戡乱救国的反动本质。同时，研究了这次大会可能发生坏人破坏，因为蒋介石 C. C 派的陈达仁所组织的“努力社”也混进了这个追悼会，企图争夺大会的领导权。我们的对策是：在召开追悼会的预备会时，要争取担任大会的职务，争取担任主席团成员，争取在大会发言，使大会成为我们的讲坛。另一方面，决定分工掌握：会场内由饶彰风、杜埃、黄焕秋、徐青负责，会场外由张直心、吴超炯负责。举行大会时，“突进社”的成员参加大会，另安排一些人在大会会场两侧的走廊，准备如有坏人捣乱会场，则与之进行斗争。在大会开始后，发现有不少可疑分子在走廊两侧窜来窜去，可能他们看到会场内人多势大，不敢动手，因为我们有所准备，保证了追悼会顺利进行，收到预期的效果。

（六）1938年春，党支部和“突进社”，为了准备武装斗争，经南委负责人薛尚实同意，举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薛尚实派云广英同志担任讲课，参加学习的有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南京中学等校的党员和“突进社”社员约20人。这个训练班开办之前，张直心向云广英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这个班本来打算开两门课，一门是政治课，一门是游击战。后因找不到合适的人讲政治课，于是只开一门课——游击战。学习结束时，参加学习的人谈心得，都认为收

益不少。

(七)1937年上半年,筹措经费支持南委在香港九龙弥敦道开办了一间小学,名叫“暨南小学”。当时薛尚实对张直心说,办这间小学的目的:一是可以解决几个工作同志的生活,二是可作为党的交通接头地点。“突进社”成员陈维岳、李静音夫妇将海外老父亲寄来的结婚费用港币一千元拿出来作为南委办这间小学的经费(陈、李两同志在经济上对组织的资助是不少的,他靠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平日省吃俭用,帮助贫穷同志解决困难,当他担负了“突进”的财务工作后,“突进”出版的经费和负责人往返省港的交通费用,全部由他个人负担支付)。

五、“突进社”与其他救亡组织的关系:

(一)参加“全国救国会华南分会”的筹备工作及抗日救亡活动。

在“全国救国会华南分会”的筹备期间,“突进社”主要成员张直心和饶彰风参加了工作。1935年5月,吴超炯代表广州青年学生秘密前往上海参加了全国救国会的会议。1936年8月,刘秉钧参加了何思敬率领的全国救国会华南分会代表团秘密前往广西南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二)1936年,叶乃勋曾参加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的工作,分工负责部务,在这个筹备会中还有张平思(即王均予)代表“中青”担任组织,另一个代表“力社”担任宣传。有七八个团体参加。

(三)1936年3月间,薛尚实介绍王均予(当时名叫张平思)与张直心认识,并对张直心说,以后在工作上可与王均予联系,使工作取得步调一致,此后,“突进社”所进行的工作也常与“中青”在一起,当时两个组织及以后成立的两个

党的支部是平行的关系。

### 三、关于突进社在广东党组织重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突进社”的成立及其组织活动，在思想上使其成员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逐渐地成熟起来，在组织上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党员和干部。

自从1936年3月，薛尚实吸收了张直心入党后，指示张直心把“突进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并在其中发展党员。张直心吸收“突进社”主要骨干杜埃、吴超炯、叶乃勋、陈维岳、李静音入党。1936年8月，薛尚实到中山大学，在张直心的宿舍建立了党的支部，张直心任书记。党支部建立后，薛尚实对张直心说，南方党经多次破坏，现在基础薄弱，急待发展，但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必须大胆而又慎重，防止坏人混入。并指示党的工作不限于中大，可以发展到市内和郊区，后又指示在国民党军队中也可以发展，但要绝对保密，只能单线联系。以后党支部在“突进社”的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饶彰风、刘秉钧、黄焕秋、余明、陈文汉、郑鲁秀、周薇雨、余明炎、徐青等人均在此时先后入党。“突进社”的主要成员均成为中共党员。在上述党员中，饶彰风输送到南委担任秘书，徐青、余萍担任交通工作，杜埃、余明调去香港搞文化界工作，杜埃成为香港文化界中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在东莞龙江小学、宝安布吉、增城正果等地发展了党员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进一步开展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吸收了十几个党员，如何扬、黄花蒂、练锡鸿（即练铁）、姚纪昭、邓檀祥、列胡西（健行）、范一平、李俊山、

张达平、康平等，他们绝大多数是党的忠诚战士。“突进社”主要成员及其发展的党员，此后就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活动。

# 追忆马列主义行动团

杨康华

马列主义行动团，是由中山大学李群杰等追求革命的学生发起组成的秘密左翼团体。李群杰是云南纳西族人，1927年在云南丽江中学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和荣先、杨子仁、和柳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学组织“新丽读书会”，共同阅读《新青年》杂志、《独秀文集》、《胡适文集》及鲁迅的《呐喊》等名著，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这是丽江纳西族青年中第一个进步组织。以后群杰到北平民国大学读书，进一步受到中共党员黄松龄教授的启发诱导，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1932年秋来广州就读于中山大学，一心倾向党倾向革命，积极设法找党。他同广东、江西、湖南等同学多方接触，共同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真酝酿，他和一批志向相投的同学于1935年九十月间在白云山摩星岭成立了“马列主义行动团”。其宗旨是：信奉和宣传马列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卖国的反动统治，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从斗争中找党的关系，为中国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1936年二三月间，该组织得到中共老党员陈勉恕的直接领导，被认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从而使其在中大及校外陆续有所发展。

大部分成员于1937年初至“七七”抗战爆发前后入了党，这个团体亦随之消解了。

## 一、血荐轩辕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中山大学为首的广州各校学生激于义愤，掀起了反侵略的“反日运动”怒潮，同工人、妇女、教育、文化各界联合举行了多次请愿示威游行，要求对日绝交，出兵抗战，收复失地，抵制日货。群众运动如火和荼，规模越来越大。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各反蒋派系的代表人物，早已在当年夏天云集广州，为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反对囚禁胡汉民，成立了“西南政府”，同南京分庭抗礼。他们为争夺地盘和在中央分赃，标榜“反蒋抗日”，但其本质也是反共反人民的。1931年10月10日晚，广州各界群众作反日提灯游行。散队后，群众和中大学生在永汉路（今北京路）检查并焚烧了“新世界”商店日货。该店老板杜煊泰（永汉警察分局局长）恃势抓人，激起公愤，群众包围分局并要求放人。陈济棠派出警察、保安队进行镇压。爱国同胞伤亡枕藉，被捕甚多，演成“永汉惨案”（亦称“双十惨案”）。翌晨，中大同学紧急集会，列队游行，高举血衣作红旗，高呼“枪毙杜煊泰！”突破军警重重防线，冲到“西南政府”请愿，并会同各界反日会提出惩凶、放人、抚恤，及保障爱国权利等要求。当局软硬兼施，把群众斗争压到地下去。岁末，蒋介石滥捕爱国学生，在珍珠桥畔屠杀全国各地赴京请愿同学，血染大道通衢，浮尸秦淮河上，白色恐怖遍于国中。“一·二八”淞护抗战军兴，人民振奋，奔走呼号，全力支援。蒋汪南京政府口称“长期抵

抗”，实则进行叛卖勾当，终于在5月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政权对日屈膝投降，对抗日军民进行高压，对苏区连续进行疯狂军事“围剿”，对白区实行残酷文化“围剿”。同胞在流血，大地在呻吟，祖国在哭泣！

在这国难日亟、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中国往何处去？青年学生往何处去？明哲保身、莫谈国事者有之；悲观失望、迷惘颓唐者有之；安分守己、埋头书卷者有之；纸醉金迷、趋炎附势者有之。但是，青年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他们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革命传统，不少人抱着血荐轩辕的决心，锐意找寻救国救民的途径，广州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青年学生同爱国主义者组织起来，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有“中大抗日剧社”，“中大文艺研究会”、“踏绿社”等等，还有各种秘密的小团体和读书会，公演抗日进步话剧，出版《新启蒙》、《世界情势》、《天皇星》、《广州文艺》等刊物，阅读革命文件、书籍、报刊，举行革命问题讨论会，印刷与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在风雨如晦的漫漫长夜中，这些在党影响下点燃的革命星火吓慌了敌人，却推动了许多寻求政治出路的群众奋勇向前。其时，中大高中部几个十六七岁的同学黄云耀、李燕胜、虞焕章（即杨康华）、乔右文、谈荣森等人，曾分别受过进步教师崔真吾、张海鳌、陈此生和许杰的影响，经过参加“反日运动”激烈斗争洗礼，都加入了“中大文艺研究会”（黄、虞、谈三人还担任了该会的干事），同已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凌伯骥、赖寅做等合作，也同“抗日剧社”主要成员吴丞华、李克筠、肖宜越、黄志潜、邓克强等有所接触，但对马克思主义还不懂得。我们爱国，要救国，但应怎么办？大家在初中念书时，对《总理遗嘱》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印象颇深，敬佩孙中山的为人



及其主张。我们当时都认为要救国救民，就得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去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实行民主，帮助工农，改善民生。1932年夏，燕胜将返加拿大助父亲料理店务，黄、李、虞三人经多次讨论，决定组织一个秘密小团体，取名“新中国”，买三枚心形象牙戒指刻上凸型（即 New Ghina 第一个字母结合成图案）及周边，作为徽号及纪念，于夜间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怀着血荐轩辕的决心宣誓：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争取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相约以后发展新成员及秘密通讯办法。赤子的身心全部奉献给您了，祖国啊，母亲！

## 二、“天火”在燃烧

这几颗渴求改变现实的幼稚心灵，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是反动当局所不容的，要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靠什么力量呢？这个命怎么个革法呢？经过苦思，我们决定找书本研究，同信得过的人交换见解。我们向相熟的图书馆员秘密借阅“禁书”，向进步同学索取秘本，埋头贪婪地阅读，从唯心论的《革命的发展》到易懂的《历史唯物论浅说》，从公开发行的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过去》、《现状》、《未来》到辗转传阅的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从《墨索里尼》到《马克思传》，从市上发售的《生活》周刊到秘密得来的《北方战旗》等等。普罗米修斯偷来的“天火”照亮了人间，进步书刊的“天火”使人们的脑袋瓜逐渐开窍。虔诚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转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

暑期过后，虞、谈等人从高中乙部（理科）转考到法学院政治系。广州有个名叫“梁心”的“学者”，写了一本《中

国必亡论》。我们对此十分愤怒，通过同班朝鲜同学韩泰宙，在他们所办的刊物《韩声》上著文严加驳斥。我们班中有几位外省同学，如李群杰、张箐、曾缚等，都给我们思想认识带来了新的东西：特别是李群杰对经济学教授提出公开批评，指出了课本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的谬误，在班内影响很大。我们经过多次接触，常常交谈读书和对事的见解，过往渐密。李群杰为大家开列了一个阅读马列的书目，如《社会学入门》、《西洋史要》、《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古代社会》、《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哲学之贫困》、《资本论大纲》、《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史的一元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唯物史观》、《思想起源论》、《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和《列宁主义概论》等等。大家千方百计去寻找这些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秘密地交流心得体会。我们还写信给在加拿大的李燕胜，要他购买英文本的“列宁小丛书”寄来研究。大家经过认真钻研。个别交谈或三五成群地秘密讨论，逐渐从不知到知，懂得了革命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列主义了。张、曾两位把在江西耳闻目睹的土地革命战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红军与白军，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残酷，工农群众的疾苦和斗争等等，活龙活现地给大家作了介绍，更加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天火”在燃烧，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日军吞占热河。进窥察冀，爱国军民长城浴血奋战，蒋介石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和“言抗日者格杀勿赦”的反动行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合作抗日提出3个条件，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杨杏佛、史量才的被刺杀、鲁迅和白区内左翼文化的战斗，东北义勇军浴血奋战，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民众抗日同盟军”的

斗争，李、陈、蒋、蔡发动“闽变”组府抗日反蒋，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名发布我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等，激发了人心。这期间，广州连续发生几起不幸事件，“文总”、“社联”、“左联”及“剧联”等革命组织遭受破坏，几十人被捕，负责人温盛刚（中共党员）、谭国标、郑挺秀、凌伯骥、赖寅做、何仁棠及龚明等壮烈牺牲；“抗日剧社”被取缔，领导骨干李克筠入狱，吴丞华、肖宜越、黄志潜，陆剑声等出走；培正中学教师共产党员陈黄光（即陈再华）被捕从容就义等等。但是革命者是吓不倒杀不绝的！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更多的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和人民解放，奋不顾身，在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天火”在燃烧，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不是停留在课堂里、书本上讲革命，而要在行动上为革命作贡献，从书本和房间里走出来，团结、组织、战斗、找党。

开初，我们分别在何思敬（中共党员）、邓初民（全国“社联”成立时主要负责人）指导下，组成两个马列读书小组，拿起笔杆子，分别在《新宇宙》半月刊（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等在中大主办），李子诵主编的《诚报》副刊，“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共产党员宣侠父、梅龚彬、钱铁如等在其中起了重要政治作用）在香港办的《大众日报》，桂系在香港办的《珠江日报》等报刊上，用李杰夫、圣贤愁、挺进、余卓瑛、黎嗽、严秀娴、谈素娴、余惠娴等笔名写文章。也翻译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以及《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部分章节，在《新宇宙》上登载。此外还推动一些同学去听马克思主义者何思敬、邓初民等老师授课和讲演，以扩大影响，其时，上海辛垦书店刊行的理论杂志

《二十世纪》，在一部分学生中颇有影响，任白戈著的《政治形态论》被判为“禁书”，克劳什维茨的《战争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以及一批法国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的翻译本等等，也是大家爱读的。任白戈、杨伯恺和王达夫等，大家都知道是革命的；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叶青的反动政治面目当时还未揭露，他叫唤大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要专搞理论宣传，反对革命活动。我们认为他这种主张是错误的。但是，社会系一个冒充进步的教授祝百英却为他大吹法螺，讲他的“光荣历史”（却隐瞒了是叛徒），透露他有个“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乔右文去函索阅，大家一看原来是一套托派纲领。于是就向祝提出质问，并向受蒙蔽的同学做工作，建议大家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批判叶青的文章，看北平出版的“骆驼丛书”，温健公的《哲学概论》等等。在我们集资出版的《学生战线》刊物上，以及在《大众日报》副刊上，“行动团”的同志都写了批判叶青谬论的文章。

形势发展得很快，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长征北上准备直接抗日，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签署“何梅协定”，出卖冀察，这使我们都感到光用笔杆子战斗不够了，必须组织起来投身革命活动。其时，我们有些成员趁参加“中大政治考察团”（实为政治系升上四年级同学作毕业前北上游览）之便，到上海找任白戈和北平找温健公，希望找到党的关系。但都没有碰上，可巧在上海买到一本书，里面登载不少我党的文件，介绍我党的主张、组织原则以及发展党员等情况。返穗后分别在两个小组内研究，要学着干。随后，我们又从外文报刊，如英文的《国际通讯》，日文的《中央公论》等，看到共产国际第七次

大会的讯息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中共代表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言论。9、10月间，李群杰（云南，纳西族，政治系四年级），王甲纲（云南，数天系三年级）、张箐（江西，医学院三年级），李驹良（江西，法律系四年级）、曾铸（江西，政治系四年级）及虞焕章（广东，政治系四年级）共6个人，跑到白云山摩星岭上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取名为“马列主义行动团”，其意义是要以实际行动为马列主义奋斗终身，不仅要学习和宣传马列理论，而且要按之进行革命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继续积极找党组织，争取参加共产党，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爱国者一道，为反对蒋介石卖国的反动统治，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斗争；通过志同道合的亲友，物色和培养为马列主义奋斗的同志，组成各种形式的秘密小组或个别联系，彼此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开展各种抗日政治组织的联络，在联合中坚持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最后，一致推举李群杰为马列主义行动团的负责人。随后，虞又邀一批广东籍同学：农学院的黄云耀，文学院的乔右文，医学院的陈卓雄，法学院的谈荣森、赵宝贤、黄乃正等组成另一个马列主义小组。不久，黄乃正自动退出，农学院的李康寿参加进来了。后来还有一些人参加进来，而且与其他一些青年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教忠中学女子高中部有徐静如（即张逸）、李琼英（即胡明）她们联系着郑希蕴、李静筠、陈坤仪等；在省女师有陈顺燕、简玉璇、虞倩章、黎万欢等；中大附中虞成章也联系一些求进步的同学。从此，我们的“行动团”成了迎接暴风雨到来勇敢搏击的海燕群中一个小分队。

### 三、搏击暴风雨的海燕

“何梅协定”让日本攫取了我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蒋介石于6月6日又发表《中日关系之回转》一文，公开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同意其“东亚共荣圈”的政策，“华北政府特殊化”岌岌不可终日，国命民脉危如垒卵。何思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在11月下旬写了《悲壮的民族叙事诗》的《序曲：抗战的号召》刊登在《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和《新宇宙》上，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号召：“这是千钧一发的危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武装起来，抗战起来，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乾坤一掷，乾坤再造”，“整个国民，全体同胞”，“一齐参加神圣的抗战，共同创造历史的前站”“最后的胜利是必定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这些用心血写成的诗句，字字铿锵，激动人心。真是气吞海岳震撼南天，不啻为中大学生员工奋起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革命的、爱国的师长们如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张农、黎东方等，在“一二·九运动暴风雨到来之前，向行将为国家民族存亡而拼搏的海燕们做了多少工作啊！我们这个小分队深深受到教育和激励。何、邓两位老师还分别向“中青”、“突进”等各左翼秘密组织的成员作恳谈，召开过一些主要负责人员的秘密会议，和“力社”负责人国民党左派陈汝棠商讨筹划抗日救亡的行动。“一二·九”消息传来，爱国同学无不热血沸腾，各秘密组织不约而同地到处张贴有关的报纸文章，书写标语，呼吁响应。先进分子在农、文、法等学院先后发起号召一些班级大会，都决定促成全校性班级学生代表会议，进而召开全校学生抗日救国大会。同心相应，同气相求，我们这个小分

队的成员，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积极协同其他秘密组织成员一致行动。虽然彼此间都还各不知道叫个什么组织，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自然而然地共同战斗了。11日晚上，我们在法学院的成员由李群杰、李驹良、虞焕章联同陈铭勋（政四，陈铭枢之弟），“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盟员等，汇合政三钱兴（中大“中青”主要负责人）、韩瑶初、钟远蕃等，在法学院宿舍逐房发动参加全院学生大会。12日晨，在大会上李（群杰）、李（驹良）、谈、虞和钟、陈等驳斥了林冀中派和邹鲁派学生的谬论，击溃他们的阻挠破坏，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全院人员即到学校大礼堂和文学院同学汇合。农、理、工各院同学蜂拥而来，不少教职工也相继到会，全校学生抗日救国大会召开了。大会决定下午列队到市区示威游行，并推选农学院张农教授为总领队。下午1时，两千多名同学，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工包括一些知名教授和院长等多人，从石牌步行30多里到文明路（今延安路）旧校，汇合医学院和附中高中、初中部及附小队伍共约5000多人，途中还有一些教忠、女师等校同学参加进来，浩浩荡荡，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通过市中心经沙基，向盘据沙面的帝国主义势力示威。这次抗日示威游行，是“永汉惨案”后四年多来破天荒第一遭，震荡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激励了全市学生和各阶层的民气。

从12月13日到30日这半个多月，我们“团”为了同学们学习实弹射击，请陈铭勋、范汝超从广东中区绥靖公署借来步枪数支，在石牌校园内的茶山学习射击。我们“团”还协同各秘密组织作战，联络各校。12月16日抗日会筹委会宣传部会议规定，除一般宣传以外，再组织五个别动队到市内各校宣传，推定霍赐影、钟远蕃、虞焕章、赵君哲、禩万和

5人负责，努力争取爱国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广泛支持，同广东当局在校内外控制抗日救亡运动作斗争。终于在12月30日将把持大会主席团的林翼中派学生赶下台，由曾振声（即曾生）、李康寿、钟远蕃、张凤楼、张万久、陈柏昌等左翼分子和真诚的爱国者掌握实权。31日，中大及附中联同校外爱国分子向当局“请愿”抗日，执信、市三中、仲元、庚戌的队伍以及教忠、大中、女师、知用等校一些同学前来汇合。我们“行动团”的成员在游行队伍中，也举了一幅“请愿示威”的横额，各人手执标语小旗，呐喊着前进。当走到永汉路时，中大文学院进步学生领袖罗宗煌（即罗哲明）跑来告知：请愿代表增加三人，即罗、陈铭勋和虞焕章。游行队伍到“西南政务委员会”面前，铁门深闭，一队士兵持枪隔门相对，我们代表入内交涉，政府要员避而不见。在门外的队伍等得不耐烦了，鼓噪着要冲进去，门内士兵枪头上了刺刀在对峙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代表跑出来，向队伍高声宣布：当局要员见不到，我们把“请愿”的要求留交给他们；抗日救国要靠人民，我们向人民“请愿”去。在一阵愤激的掌声中，队伍离开警卫森严的衙门，走向大道，与沿途所经的学校同学联系，向群众作宣传。这次向政府“请愿”变为市内一部分大、中学校爱国学生的联合示威游行，参加者对抗日要依靠谁，得到了现实的教育。

1936年1月初，同学们知道校长邹鲁返穗后召开大会，向全校学生、员工“训话”。左翼各组织预感到面临着微妙、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准备将“训话”会转为抗日大会。各组织主要负责人分别向何思敬、邓初民老师求教，我们“团”也由群杰专访邓初民，右文与焕章一同拜谒何思敬。何、邓两老师都指出运动要坚持，要扩大团结面，要加强统战工作，不



单各左翼秘密组织要密切协同，而且要联合“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要团结爱国师生员工，争取一切可能因素成为助力，以利于运动的发展和深入。这些见解对我们各左翼组织都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团”的成员按此精神开展活动，积极协同各秘密组织进行战斗。

1月6日下午2时，邹鲁在大礼堂的“训话会”召开了。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粉碎了林派以“反邹”来破坏抗日运动的阴谋，战胜了邹鲁企图控制包办的救国工作的妄想。有几个为邹鲁帮腔的院长和教授的讲话都被激愤的同学赶下台来。在情况紧张会场热沸的情况下，邓初民老师走上台前庄重表明，坚决支持学生抗日救国才合乎统一战线的原则；校长抗日，我们拥护；反之可以打倒，我们大家都应该欢迎校长来支持领导抗日救国等等。这一席话转变了会场气氛，掌声如雷。全校抗日救国大会正式开始了，通过了重要决议，如：组织以学生代表为主体的全校学生员工抗日救国委员会；联合市内各校在1月9日举行第三次抗日大示威，成立广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抗日宣传队，分赴省内、外各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等。最后，由校长率领各委员在主席台上举手宣誓就职。各左翼组织团结爱国力量，使会议开得很成功，既体现了党的政策，也使抗日救国的正气得到伸张。

1月9日下午，中大及附校四千多人进入市区，广雅中学全校一千多学生冲出校门赶来汇合，执信、庚戌、仲元、教忠、市三中、市职、女师、知用、女中、大中等校，都组织了或大或小的队伍陆续参加进来，声势越来越大。一万多人的队伍，加上市民共约三万人集中在长堤新填地广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曾振声当大会主席，大会通过：成立“广州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卖国政策；呼

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出兵收复失地。会后又进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六二三路回到大西门时，大部分刚散队，还一部分同学要到大东门才解散。当途经广东教育厅附近时，队伍中一些人叫喊着要到教育厅去质问，要求支持学生抗日运动，不得以放假和封锁校门来阻挠破坏。教育厅官员走避一空。同学们极为愤怒，高喊：“冲进去”，一拥而上，捣毁了教育厅的门窗玻璃和一些办公用具，并把教育厅的招牌摘下来，抬回文明路中大高中部操场，以示胜利。这是广东当局压制抗日运动的倒行逆施所迫出来的，同学们出于爱国激情而发生的一切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毕竟授人以柄，被反动当局藉以密谋公开镇压，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市内各校学生要求救国自由的怒火在继续燃烧。1月10日，广雅中学举行抗日大会，被军警包围。中大抗救会闻讯，立即组织同学开校车前往支援，并抓了警察局派去破坏的“侦缉”。当天晚上，我们“团”广东人小组乔、黄、谈、虞4人，同卓雄约好往谒其五叔陈汝棠。陈为国民党左派，当时在教育厅任军事救护训练处处长。李群杰曾在邓初民家里与之会晤，觉得陈老对抗日赤胆忠心，非一般国民党官员可比。9日大游行时，我曾问陈卓雄，据云“五叔最听赵先生（中共老党员陈勉恕的代号）的话。”我们意识到这是找党的好线索。彼此一见，陈老即说，许多事情留待以后再谈，现在先商量一个斗争任务：明晨市二中（荔湾附近女校）召开抗日大会，校方把铁门锁了，不让走读生回校同寄宿生汇合，你们能否组织力量前往支援？我等二话没说，五人即连夜返抵石牌，先找到几十个热心同学及校车一辆，尽早先赴市二中相助！并由外省人小组李、曾等找学校“抗救会”钟远蕃，组织三辆校车前往支援。天微明，我等即乘车飞驰市二中，和该校内

同学合力斩关夺锁，大开校门，汇集走读生在操场上举行抗日大会。在该校学生领袖梁锦文、莫兰心等宣布开会和讲演后，谈荣森、钟远蕃先后代表中大学生和抗救会致词祝贺，表明为抗日救国团结战斗到底。市二中学生抗日会终于胜利成立了，这又进一步激励了邻近学校的救国热情。

学生抗日救国的战斗火焰越烧越旺，地处荔湾附近的国民大学附属中学又动起来了。该校进步分子唐凌鹰（曾参加过“文总”的“左联”读书会）的左翼秘密小组和“反帝反法西斯同盟”小组王文等人，联合市二中、培英等校，决定于1月13日作示威游行。这“同盟”要其分布在一些学校的成员发动同学参加，并且找勳勤大学邱萃藻（“中青”重要领导人之一）布置几间学校内“中青”成员和进步分子率队响应，要地处西村的勳勤大学工学院，市内大中和教忠等校部分学生，汇合于财政厅前。同时又找到“中大抗救会”派队到民大附中一同举行大会。中大因下乡宣传队已大批出发，同学回家度假者也不少，留校的不多，由抗救会纠察队长冯道先（反帝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梁荣生（即梁嘉，是该盟中大小组负责人）率领几十人前往。抗救会的代表陈铭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也去了。我们“行动团”在校的李驹良、王甲刚、乔右文等人参加了。民大附中抗日大会由唐凌鹰等人组成主席团，会后即同中大同学一齐列队出发，市二中、培英、岭南分校等队伍也赶来。近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到荔湾桥附近时遭到广东当局的血腥镇压。他们用侦缉和黑社会打手近百人，扛着“广州市民抗日救国锄奸团”的旗子。插入爱国学生队伍中，铁尺木棍齐飞，杂以枪声卜卜。同学们赤手空拳，一边抵抗一边走避，受伤及被捕多人。勳大工学院队伍行进到西华路口也遭袭击，只得折回。市内几间学

校的小队伍闻讯，只得分散隐蔽起来。广州学生第四次抗日游行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这就是“荔湾惨案”。公开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被压到地下去了，白色恐怖随之弥漫。但是，敢于迎着暴风飞翔的海燕，并不惧怕，并不屈服。血的教训使战士们更加机智起来，更广泛、更深入到群众当中，为祖国的命运而英勇搏击！

#### 四、春华滋发

在广东当局公开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荔湾惨案”中，当局绑架了冯道先、吴近保等人。他们诡称游行学生同“锄奸团”发生“冲突”，以此来欺骗社会。他们还诬蔑学生受人“挟持利用”、“荒废学业”、“越出常轨”、“扰乱治安”，并立即戒严，封锁交通要道，到学校搜捕爱国师生。名教授何思敬、邓初民住家接连遭到搜查捣乱，迫得相继走避香港。曾振声、钱兴、罗宗煌等也被迫走避他方。李群杰则奉抗救会指示，往云南去联系学运。当局在几个月内，先后逮捕了好几批进步同学，如翔万和、粟稔、张凤楼、李驹良、梁荣生、雷瑞英、李康寿以及朱文畅等。陈济棠还通过“西南政务委员会”训令：“派员组织救国义勇队及救国看护队严加训练”各校员生，“即派宪兵司令利树宗兼总队长”，以石牌中山大学为总部及第一大队部，省广雅中学为第二大队部，市立第二中学为第三大队部“。好家伙，对抗日运动搞得最红火的学校实施军事控制，要组织所谓“广东省会学生救国工作设计委员会”，来“设计”、“指导”、“调查”、“训练”学生的救国工作，把爱国员生抗日运动的手脚全捆起来；还强令下乡宣传学生一律“须在二月底以前补考完竣……未经考试

者取消学籍”，把许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学生开除出校或不许注册上课。教育部还训令。要“制裁罢课与破坏纪律之行动”；“校内校外尤不得容许任何团体为煽动罢课或干涉学校行政或妨碍社会秩序之举，地方军政机关，查有此种煽动行为之团体应予以制裁”，“集会，无论人数多寡，应先呈校核准派员在蒞临指导，方得开会，如违者将召集人及参加人一律予以严重处分”。陈济棠则更“抱整理教育之热心的宏愿”，把中大附中，高、初中和附小抢过去。创名“中山小学”，自任校长，实行军事管制。这还有一点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么？

在这厉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公开抗日救亡的群众性行动被压下去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广大同学经过党所领导的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洗礼，在血的教训中磨炼，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了，更多的人要求进步走向革命，采用各种适当方式组织起来，为国家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疾风知劲草，各秘密左翼团体建立了许多新的秘密组织，如抗日“五人团”、“十人团”，或各种名义的“读书会”，利用各种公开合法形式如班会、学生会、同乡会、学术研究会、时事讨论会、新文字研究会等，寓爱国主义于各种活动之中，团结和影响更多的群众。为营救被捕同学，各左翼组织要求当局撤销对爱国学生的通缉令。同时还广泛发动师生和家长，利用社会关系和各种形式，要求学校负责保释被捕者出狱，保护学生安全和上课的权利，何思敬老师在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广东当局的倒行逆施，要中大抗救会代表向群众报告学生抗日救国和遭受迫害的经过。上述这些斗争，“行动团”在穗成员和所联系的进步爱国学生都积极参加了。在这些强大压力和社会公正舆论下，校长和当局不得不猩猩作态，逐步改变

丧失人心的错误做法。被捕同学绝大部分获释了，被通缉和  
不许注册的同学也先后取得继续上学的权利。所可痛惜的是，  
反帝反法西斯同盟盟员、中大纠察队的冯道先，以及在警察  
子弟学校兼课进行活动、赤胆忠心舍己救人的革命战士朱文  
畅，在陈济棠下台滚蛋之前后，都被残酷地秘密杀害了，丹  
砂粉碎丹仍在，烈火焚炼见真金，革命精神与日月同辉，他  
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上！

群杰于2月间从昆明返穗，介绍了在云南同革命者和爱  
国青年的接触，发生密切联系并初步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乡  
宣传的“行动团”成员也都各自作了不少工作。这都显示出  
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的前景。虞焕章在1月参加了驰援市二中  
的当天，胃溃疡大出血，遵医嘱卧床治疗匝月，到能走动时  
便去拜访陈汝棠，向他请教。陈老推心置腹，历述几十年来  
思想发展过程和革命生涯，嘉许我们的活动，坦诚相告其抱  
负和活动，以及同一些抗日及反蒋人士往来的情况，说明因  
自己社会地位和工作面广，顾不过来，要把市二中梁、莫等  
人秘密读书会及省女中宋兆玲等人的关系转交给我们去联  
系；特别是详细讲述了同“赵先生”（陈勉恕）长期以来的革  
命友谊，表明了自己一切都听从赵先生所传达的党的主张办  
事等等，情恳意切。虞提出我们亟盼面见赵先生，一诉衷曲  
和要求入党。陈老慨然允诺，并说明赵很慎重，只能先约见  
一人。

二三月间，赵由香港来穗，与虞晤于陈老私人诊所（即  
陈家中），作意夕畅谈。赵即吸收虞入党，并约定以后往港联  
系办法，先后对工作问题讲过一些要点：（一）由赵单线领导，  
定期汇报及请示工作，这个具体情况要保密；（二）马列主义  
行动团，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多经考验，条件成熟者分别

介绍入党；（三）打破关门和“第二党”的作风，原成员发现有志相投者，可分别组织形式不同的读书会，读书会要从对象水平出发，经典著作一下子不易读通，可以从较通俗的进步书刊入手，三五人即可编成小组，亦可单线联络，不发生横向关系，加强秘密工作以策安全；（四）尽量运用公开合法形式，团结更多青年学生，活动内容与方法要多种多样，不要冒险，积聚救亡力量；（五）设法到工农中去锻炼自己，建立劳动群众组织；（六）广泛交朋友，加强同其他秘密组织联系，开展同各抗日党派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这些指示，我们先后做了以下工作。

（一）组织上：（1）中大附中虞成章同阎广泰、李展、司徒艳、容振华等组织秘密读书会，后来又增加了钟惠娴、吴凤珠等；还联系了王荣耀、周杰生、徐可贞、简锡焯；同创办《游击队》的温盛湘、梁琪俊也有密切联系。在初中部，饶奕昌、黎灏滕、崔楷、洪佩兰等组织了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话剧剧社。（2）教忠中学，徐静如、李琼英、郑希楹（后转学执信女中，另在该校搞读书会，同李静筠、司徒贞、陈坤仪等组成女生部读书会，郑希楹又介绍了男生白玉森、吕廷璋来联系；到8月间，男生部卢子贤、张铭勋（即张江明）同女生部主要成员构成了一个核心组织，成员续有发展。（3）省立女师，陈顺燕、虞倩章、黎万欢、简玉璇等组成读书会，同谭本基、张妙龄等有密切联系；后又发展了虞佩章、蔡萍、蔡佩莹、戴茹初等人另成立小组。（4）市二中，梁锦文、莫兰心同岑绮修、黎雍时、符候贞等组成读书会。（5）市美，由卢子贤介绍周薇雨来联系，她在该校也参加了其他进步分子组织的国际时事讨论会。（6）军队方面，同杨泰湖、周少峰单线联系；在燕塘军校中，由徐甫津同几个进步分子也

组成秘密小组。

(二) 在联系其他进步组织上，做了如下工作；(1) 经汤宝锴介绍，虞焕章加入了由中大、民大、勳大、广大、女师等校学生及一些小学教师共十多个进步分子组成的秘密读书会，其成员有汤宝锴、李锦波、黎文煦、吴奔流、郑海燕、李秀清、李玉如、钟文杰，钟文钜等等。又通过龙世雄加入了秘密的“救亡前哨社”，同其核心人物陈真（陈道）、李德和、李家鼎、陈践明等经常谈论形势、工作和读书。(2) 乔右文化名严秀娴参加发起组织“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经乔、龙两人介绍，虞主要参加罗宗煌、宋绿漪等主持的“理论组”（又称“时事讨论组”）活动，结识了许多进步人物如钟霁、郑重、黎元杰、许以庄等几十人；也到其他六个组参加过活动。我们“行动团”及所组织读书会成员，在穗的大都参加了“民众歌咏团”的活动。(4) 李群杰发起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哲学研究会”，参加者除李、虞、乔和谈荣森之外，重要人员有“学海书院”的卓炯，有中大文学院的徐舜英、徐碧翹，还特意约请中大哲学系的王贻非（原名徐德美）加入，争取其摆脱叶青的影响。

(三) 到工农群众中去。黄云耀、谈荣森、陈卓雄、乔右文、李康寿都参加了中大在石牌附近十个乡的“乡村服务实验区”工作，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会社、进行扫盲、文化娱乐和军事训练。黄云耀等还联系同在中大初中读书时班会“虹社”同学，集资在顺德县北滘、西海附近的睦州创办了一个“三三农场”，向附近农民开展工作，使该地后来成为我党南顺工委及林锵云率领的抗日游击队主要活动基地之一。此外，卢子贤和虞焕章先后到广九铁路青年工人中活动，后来推动组成“绿光剧社”一同演救亡话剧，谈论时事，介



绍阅读进步书刊等，为发展党员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 统一战线活动。(1) 这年夏天，由陈铭勋邀请群杰、焕章和胡人任（均毕业班同学），一同前往港见陈铭勋，加入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并同梅龚彬、詹天籁等交谈推进抗日和统战工作。后来还在铭勋家里举行会议，成立“同盟”的广州委员会，由铭勋负责，方秉维（方少逸）、罗宗煌、沈瑶英、胡沥、焕章以及一位姓韩的留日归国学生为委员。(2) 陈汝棠介绍群杰和焕章到港“南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见李章达、何思敬、梅龚彬、江公怀等，商谈推进救亡运动。(3) 冬，卓炯介绍焕章参加一个秘密读书会，其成员多数是第三党人（全国解放后改称“农工民主党”）。随后，我党“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老孔（薛尚实）介绍叶兆南（孙大光）来穗，共同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叶和虞（笔名陆非）都为第三党办的《南针》杂志撰稿和做些编辑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李伯球后来提出：成立秘密的“广东青年革命同志会”，以抗日救国和搞社会主义为宗旨，作为我党助手和服从党的领导，参加者有：李伯球、陈伊林、邱某等，均为第三党人；叶和虞都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救亡工作者出现；卓炯和何希齐当时都是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炯后来还通过关系，使我们一些党员和左翼分子认识湛小岑（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这些都为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成立“救亡呼声社”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及同进步文化界联合各方人士争取成立公开的“文教”（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起了积极的作用。(4) 秋，中大黄泽成邀同附中虞成章、教忠徐静如，女师虞倩章，女中余慧，还有市一中、广雅，知用等校的进步学生代表，拟发组织“救亡先锋队”，又转而筹办秘密学联，教忠女生先后由徐静如、李静筠出席，男生张

铭勋、卢子贤参加。及后，广州市秘密学联正式成立，“行动团”在校读书会成员都积极参加活动。(5)冬，陈汝棠在其诊所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南总”原来拟定由“中青”、“突进”、“力社”等进步组织派出代表组成“广东救国会筹备会”，因张平思不积极参加而流产了；决定在广州成立一个“南总”辖下的秘密的“广州救亡协进会”，协调广州各方的救亡活动。这次会议参加者还有黄新元（“全救”代表）、韩孚（有人误为“章汉夫”，他后来公开用名陈文信及陈予彤，是“全救”干事，联系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界一些救国组织）、洪飏（周楠，原负责香港工人救国会，“全救”委员，代表广州职工）、虞焕章（联系广州青年、文化和统战活动）、黄泽成（学生救亡联合会代表）、黄梅棣（妇女方面代表）。陈汝棠说明“南总”指定他负责，但他不便参加这些经常性活动，由虞代表他出席。这样，实际上“救亡协进会”成为一个5人小组，由韩主持，每周秘密开会，沟通情况，商讨开展活动。

由荔湾惨案到六一事变，广州地区如在严冬，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表面上似乎是被逼沉寂下来了。然而，情况正如鲁迅所说“寒凝大地发春华”。让我再略述一下前后发生的一些较重大的事情吧。

还在春寒料峭之时，广东陈济棠当局为了欺骗群众和同南京斗法，曾公开组织所谓“广州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赴京“请愿抗日”。成员都是钦定的，“代表”了谁呢？对此同学们很愤慨。其时，江公怀冒充“中共中央委员”，到中大学生中活动，提出要组织队伍，到该“代表团”集合出发地点痛打一顿。我们都觉得他这一主张太“左”，是冒险行动，是办不到的，而且也是不应该的。如果这样干，只能使革命力量遭受更大损失，不仅争取不到群众，还会失去社会同情，我

们拒绝这样干。但我们又不能沉默，于是以广州爱国学生名义，散发油印宣传品，揭穿当局阴谋，并指斥那些“代表”是“走狗”，事后，陈勉恕、何思敬都严肃和恳切地对我们指出：党的政策是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争取群众和利用矛盾。江公怀的主张是错误的，他并不是共产党，是“生产党”，不听他是对的，揭穿当道者骗局也是应该的。但是，骂“代表”为“走狗”，在政策和策略上都不妥当；应该正面说理，敦促“代表”真正表达广州学生抗日救国的意愿和要求，才能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扩大正义呼声，取得社会同情。我深感受到统战政策上的教育。

六一事变，即两广当局“请缨抗日”出兵湖南，是蒋介石五次“围剿”肆意摧残苏区，我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准备直接抗日以后，蒋氏蓄意乘机消灭“两广”地方实力派所迫出来的。这既是南京与“两广”长期对抗的表面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法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曲折地反射出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蒋氏要作“内战”的讨伐，“两广”军队也剑拔弩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在法学院从来不授课的“教授”黄季陆（西南政要之一），特地邀请政四同学到他家中座谈，信口雌黄一顿之后，怂恿我们打起旗子到两军对阵之间叫喊和平，以遂联合抗日之愿等等。多数同学默不作声。“行动团”成员和一些积极救亡的同学先后发话：抗日救国，人心所向；同学们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奋斗，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是铁尺棍棒，是逮捕坐牢。最近在珠光里又抓了一大批讨论救亡工作准备抗日游行的学生，当局得首先释放一切被囚的爱国者和“政治犯”，要抗日就得发动人民群众。现在连集会的权利都没有，说是不得受人“煽惑利用”；“各界示威游行”的人员全是指定遣派，甚

至还是用钱买来的，连学生自愿集队都不准，怎能结队到两军阵前叫喊呢？看来，还得由教授和当局要人亲自出马才行。这些话，使得教授只好打哈哈。大家吃了他准备的冰淇淋就散了，没上当。没多久，黄光锐率空军飞宁，余汉谋倒戈返穗，陈济棠溜之大吉。桂系李、白，则团结内部，联络各方，秣马厉兵严阵以待。其时，我党中央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策略上正在由“抗日反蒋”转为“迫蒋抗日”，派出特使前往广西，并通过救国会代表进行活动。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得人心，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舆论一致要求和平，使箭在弦上的蒋桂战争得以和平解决。这一年的5、6月间，“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和发表宣言。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合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要求》，都很振奋人心。8月下旬，我党中央致书国民党，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出双方各派代表谈判，以实现国共合作。9月中旬，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更加激励民气。10月间，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逝世，中外同声沉痛追悼。11月上旬，我党“南委”派蒲特（饶彰风）来穗，通过广州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民众歌咏团、新文字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和许多文学、美术、诗歌、话剧等几十个团体联同发起，假座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有1000多人参加的追悼鲁迅大会。许多演讲者都表示要发扬鲁迅革命精神，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扩大救国联合战线，实现抗日以挽危亡而奋斗。11月中旬，广州文化界发表宣言，响应北平文化界八大要求，参加者有21个团体2000多人。我们同许多群众团体都积极参加了支援绥远抗战的宣言和募捐活动。下旬，“全救”领袖七君子被捕，广

州救亡团体同全国各地一样表示坚决抗议。12月，“西安事变”发生，大家欢呼和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倒蒋反共内战的阻谋，热诚拥护中共中央提议召集和平会议的通电。经我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进行艰巨工作，战胜各种险阻，实现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局势遂由“迫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了。这半年，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短兵相接，赢得了时局的重大转折，争取展现国共重新合作准备抗战的新局面。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党要求左翼团体彻底转变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做法，把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正确地区别和联系起来，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做好思想政治和宣传组织工作。我们“行动团”配合各左翼兄弟组织，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抓住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空隙，运用统战关系，建立了一批公开合法群众团体，阅读公开发售的进步书刊，秘密传递和阅读我党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以及我党“南委”半公开出版的铅印刊物《大路》，使党的声音传达到更广泛的爱国群众中去。我们联同温盛湘、龙世雄通过相熟的印刷店，秘密印行“南委”政治交通莫西凡从广西取来的列宁著作《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书，还翻印了署名“维它”（即翟秋白）翻译的《战术与策略》，并写了简短前言，驳斥国民党对翟秋白烈士的诬蔑。我们还由卢子贤、张铭勋、虞成章、温盛湘、饶奕昌、徐静如、李琼英等办了一个名为《学生战线》的刊物，以中学生为对象，内容有时论、书评、通讯和批判叶青的文章，由陈汝棠和我们集资出了三期，也起了些宣传作用。

1936年暑期前，“行动团”在中大本科的成员多数毕业

了，分别在自己找到的社会职业掩护下，继续进行秘密和公开的活动。李群杰返昆明去，活动了几个月后来穗、港商量工作。他经“南委”吸收入党，于1937年春被派返昆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昆明特别支部，1938年任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江西同学返赣，进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搞秘密工作。其他有到蒋军中或赣南地区搞秘密工作的。未毕业的大、中学生和军队成员都在当地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大部分在抗战前入了党。这样，“马列主义行动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在新形势下也就自然消解了。

#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与广州学生运动片断回忆

方少逸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成立于1935年秋天，它对推动两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积极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并把在淞沪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围攻江西的红军。但十九路军经过淞沪抗日战争的教育，认为国难当头，不应再打内战，故此对抗日反蒋的情绪更为激涨，终于在1933年冬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对抗并派代表去江西与中共中央达成相互支持，互不侵犯的协议。中共也派出潘汉年为政治代表、张云逸为军事代表驻福州。但福建人民政府刚成立，就遭到蒋介石大军围攻，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初，他们曾打算组织“生产人民党”<sup>①</sup>，但尚未正式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就被摧毁，“生产人民党”也就胎死腹中了。蒋军占领福州后，李济深和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

---

<sup>①</sup> 生产人民党领导人是陈铭枢。因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所有领导人都联名发表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故联合第三党黄琪翔等筹备成立“生产人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核心组织。

错等就先后撤退去香港，有些出国考察，有的回乡隐居，有些军师长则投靠蒋介石，有些则逃回广东，潘汉年则同梅龚彬一起去了香港。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由闽西进入广东时，却被陈济棠逮捕枪毙。蔡廷锴对此非常气愤。十九路军几个残部回到广东不久，也被陈济棠下令缴械，从此十九路军完全解体了。

中共认为十九路军是一股反蒋抗日的力量，由于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使部队解体，人员离散，很是可惜，应帮助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潘汉年到港后，就指示梅龚彬要加强与李、陈、蒋、蔡联系，把他们重新组织。不久，又先后派宣侠父、金城、陈希周、胡鄂公等人到港，和他们一道工作。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协商，终于组织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它的公开领导人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不公开的还有冯玉祥、徐谦、方振武、陈友仁等。总部设在香港。下设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后来还加设一个海外部由蔡廷锴负责，秘书长是李章达。大同盟的主张，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贯彻《八一宣言》的精神。大同盟的组织，以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为主，也吸收一些从闽变退来香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如胡兰畦江公怀等。其中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如梅龚彬、金城、宣侠父、陈希周等，但他们都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此外陈辛人、林望中、江木兰、陈子谷、郑德、康康等也是中共党员。大同盟成立后，提出八条行动纲领。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支持广州中山大学师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二是协助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三是创办《大众日报》和《民族战线》月刊。<sup>①</sup>在广州还出版《在抗战旗帜之

---

<sup>①</sup> 见梅龚彬回忆录第903。



下》半月刊。此外在九龙弥敦道开设了一间半岛书店，经理是杨铁如。该店专卖进步书刊，并公开出售中共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及共产国际的中文版各种小册子。《大众日报》主笔是任毕明，《民族战线》月刊主编是梅龚彬，《在抗战旗帜之下》半月刊主编是方少逸。

以上是“大同盟”成立初期的简况。详情另文叙述。

1933年我考入中山大学社会系，何思敬、邓初民都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当时同班同学张克明和我们都想找寻党组织，便请求何思敬指引。但当时广东党组织被破坏还未恢复，何老师建议我们先参加“大同盟”，他说有些老同志都在“大同盟”工作。他介绍我去找梅龚彬。我就按址到香港湾仔山村道五号找到梅公，得到他亲切接待，我们谈到广州学生运动，谈到对战局的看法和希望，一直谈到深夜，因为我是何思敬介绍的，他表示对我信任，并让我参加了“大同盟”，他希望我每周能去港一二次。从此我就在梅公领导下工作。最初他派我在宣传部搞发行工作。

“大同盟”宣传部由梅龚彬主持，设在摩罗庙街五号，这所房子是陈铭枢的，梅公住二楼，我和陈辛人等住一楼，同住的还有康康和陈子谷等。我在“大同盟”宣传部搞发行工作不久，过了一段时间，梅公就叫我回广州负责“大同盟”广州支部工作。“大同盟”广州支部有两部分盟员，一部分是原十九路军的中层军官，另一部分是进步学生骨干。中大同学张克明、黄杏文、陈铭勋、罗宗煌、余所亚等都是“大同盟”的成员。虞焕章（即杨康华）、李群杰曾因陈铭勋陪同他们到香港与“大同盟”的负责人陈铭枢见面谈话，此后便参与广州“大同盟”支部的领导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曾在大石街陈铭勋家开过一次有7个人参加的会，除陈铭勋报告陪同

虞焕章去港的经过外，还有虞焕章、罗宗煌、方少逸，一个姓胡的同学及一个姓韩的留日归国学生。荔湾惨案发生后，罗宗煌转够到东山他姐夫吴逸志（薛岳的参谋长）家暂避，我们“大同盟”几个同志曾到他的住地开过一次会。此外，我也经常与“突进社”的张直心、吴超炯、叶乃勋、刘天行等人接触和研究工作，并与“中青”的粟稔有密切联系，因为我和他们这些人都是直接与何思敬有联系和来往的。

“大同盟”在广州有两个联络点，一个秘密的，在东山农林下路中大农科同学会二楼，即现在东山电车总站后面那栋两层小楼房。当时附近都是菜地，很少房屋。同学会在楼下办公，二楼有几个房间出租给同学住用，我们就租一间作为秘密联络地点，但知道的人很少。何思敬老师是知道的，他因事曾请他的夫人王爱英到该处找过我几次。另一处半公开的地址在文明路中大木屋区俄罗斯路，即原抗日剧社后面那排木屋中的一个房间，当时我与黄杏文同住。我由石牌回广州时，一定先到此处，但晚上则多数在东山农科同学会二楼过夜。

“大同盟”直接参与了广州学生抗日运动。我当时是以“大同盟”广州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广州学运活动的，中大学运的骨干如钱兴、曾振声、李群杰、粟稔、张直心、叶乃勋、吴超炯、黄焕秋、虞焕章等都知道“大同盟”在广州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当中不少人，包括一些中共党员如虞焕章也曾参加到“大同盟”中来，并通过这些进步组织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杜埃和石辟澜亦曾当过“大同盟”主办的《大众日报》副刊的编辑，但时间不长。

中大的进步学生骨干都很尊敬何思敬老师。何老师与中共党员梅龚彬、宣侠父、金城等人有联系，是“大同盟”领

导层的重要“客员”。他对广州学生运动是采取主动积极支持的态度的，故不论是“突进社”、“中青”、“马列主义行动团”、“大同盟广州支部”等的负责人都直接与他有关系，并且得到他的指导，如“一二·九”示威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大家都向何老师请教。何老师直接参与学运的领导，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情况得到证实：一、邹鲁在中大公开指责当时的学运是何思敬煽动起来的，而何老师自己也曾写道：“邹鲁在陈济棠面前说我是共产党……其实我当时没有一点意思用学生群众去推翻陈济棠政权，我不过想以学生群众的力量来推动抗日。”<sup>①</sup>二、陈济棠当时也认为中大学运是何思敬搞起来的，故准备逮捕他，幸得“大同盟”的上层人士从内部得知此事，立即通知他赶快离开广州。三、何到香港后住大坑道十九路军处长杨建平家，由他夫人王爱英师母转知我立即到香港去见他，除中大同学外，还有广雅中学的张镒英。约见的地点有时是在杨建平家，有时在跑马地山村道5号，这所房子是蔡廷锴借给“大同盟”接见有关人员的半公开的场所。由此可见，何老师离开广州后仍领导着广州学运工作。

“大同盟”机关报——香港《大众日报》以及在广州地区办的刊物《在抗战旗帜之下》半月刊，不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且也着重报道广州学生运动的情况。“学运新闻的版面”比香港任何报纸都要大，还经常针对学生运动的一些问题发表短评或社论。我们每天都将香港《大众日报》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剪贴在宿舍门口，并用红笔圈点，以吸引同学阅读，这对当时是起了很大鼓舞作用的。相信当年住在石牌中大文学

---

① 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辑，何思敬写的《回忆李章达先生》。

院宿舍或法学院宿舍的同学，都会记得这些事情。

《在抗战旗帜之下》由我负责主编，从写稿、组稿、校对、印刷到发行等工作，都是由我和张克明两人包干。李维夫、维夫、王逸夫、逸夫等名字都是我发表文章的笔名（我原名方秉维）。为这个刊物写稿的还有中大其他同学如黄焕秋、张克明、黄杏文等，此外在港的何思敬（笔名何畏）、薛尚实、陈辛人、郭布谷等都有写文章。每期最后两页是用“广拉”（广州话拉丁化文字）写的文章，是由黄焕秋编的。封面是由木刻家余所亚设计的。

《在抗战旗帜之下》公开的主编署名“李宏祥”，原是我的化名。出版地点写“上海江湾路”也是假造的，目的是取得印刷方便和蒙蔽广州特务的耳目，其实该刊是由西湖路文光印刷厂承印，都是在晚上排字、拼版，我们晚上亲自去校对。刊物办得还算短小泼辣。在广州我们是交给永汉北路财政厅前新民书店代售，此外还分送汕头中马路新生书店、广西南宁大夏书店、北平东安门华兴书店代售，并分寄各学生进步组织及各地大专学校的图书馆。一部分则带往香港及暹罗（泰国）发售。但出版了4期就被迫停刊。<sup>①</sup>新民书店告诉我该刊已被特务全部没收，不能再出售了。原因是我们从第二期起在文章中就出现“共产党”、“红军”、“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字样，并转载巴黎救国时报的一些文章。该刊被没收后，我们就把它改名为《知识往来》继续出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们在1937年7月26日出版了1期《芦沟桥抗战特辑》，刊登了一组欢呼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文

---

<sup>①</sup> 现在北京图书馆仍藏有该刊创刊号及第二期，上海复旦大学还藏有《统一战线》第二三卷各期，广西图书馆还藏有《统一战线》几期。

章，满腔热情地歌颂举国一致全面抗战的希望实现了。这一期也是最后一期。

《在抗战旗帜之下》虽是一个小刊物，但文章短小精干，有针对性，例如在36年12月16日出版那期，刊登了《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一文，是薛尚实以笔名杨益青发表的。总结了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为三个阶段：第一阶级是督促政府出兵抗日的阶段；第二是深人民间唤起民众的阶段；第三是建立广大的救亡联合战线的阶段。全文分析得很透彻，如实总结了一年的学运工作，是一篇极具指导性文件。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在抗战旗帜之下》，他仍以杨益青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论革命发源地的学生运动》这篇文章是上一期《一年来的学生运动》的继续。从三个阶段深入分析为三个时期：第一是热情支配着行动时期；第二是恐怖时期；第三是沉着应战时期。详细分析了从“一二·一二”到“一·一三”荔湾惨案整个运动过程的优缺点，如实指出成绩与教训，议论是深刻的，对以后学运工作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文章。又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押，国人皆曰可杀。但党却主张和平解决。这一主张一时不易为人所接受，当时广州一些学生也不例外。因此，我们通过《在抗战旗帜之下》大力宣传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在西安事变之后第四天，即12月16日出版那期，我就以笔名王逸夫刊登了一篇《陕西事变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阐述了在日寇刀尖已紧刺到我们胸前的时候，大家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立即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而奋斗。在国无宁日的当儿，我们万分希望蒋委员长生命安全。这篇文章，解决了不少人对党的和平政策的疑虑。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第二厅厅长刘健群正在中山大学演讲时，他提出：“目前能对日作

战的军队只有 80 万，单靠 80 万军队不能对日作战”的谬论。我们立即著文驳斥，指出单靠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当然不够，必须全民武装起来，必须与东北抗日联军及红军联合起来，共同作战。这些文章明确宣传了党的主张。当年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国人群起责难，却被蒋介石以高压手段把群众呼声压了下去。曾出现一段沉寂的局面。一些人甚至怀着悲观失望的心情度过除夕。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请何思敬以何畏的笔名写了一篇《新年的希望》，刊登在 1937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在抗战旗帜之下》。文章一开头就说：“民国二十六年了，中华民族前途怎样？民族的前途没有什么悲观的必要，最后的胜利始终在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手中，只要不断向前奋斗，最后胜利非他莫属”。他不但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同时还鼓舞青年学生要做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他又说：“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何必寄希望于个人的生死成败而喜怒哀乐！在战略上理胜则兵胜，理不胜则兵不胜……”何老这篇文章，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广大革命青年，对一些悲观失望的人，很有启发教育的作用。历史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文章发表后只有半年，“七七”抗战就开始了。

总之，“大同盟”几个宣传报刊和书店，都尽了最大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并且得到了一定的效果。

1936 年 5 月中旬，在上海筹备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当时，陶行知到了广州，住在太平南路新亚酒店。由梅龚彬通知我到新亚酒店见陶行知。陶告诉我说，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即将在上海召开，叫我准备去上海参加，学生代表除我之外，还有吴超炯。我和吴到香港“大同盟”宣传部见梅龚彬，知道广东代表共有 5 人，即文化界代表何思

敬、文艺界代表石辟澜（当时在《大众日报》当副刊编辑）、工人代表洪飏（周楠）、学生代表吴起炯和我。<sup>①</sup>我们5人是分头搭船去上海的。梅龚彬除给我100元港币作为我和吴的路费外，还告诉我到上海联络接头的暗号和地点。到沪后，才知道还有李年达和吴涵真也来参加。

到上海后，我和吴超炯住在四川路新亚酒店。其余各人则另住他处。随即到基督教青年会接头报到。报到处通知我们：29日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成立大会。学联全体代表都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大会。<sup>②</sup>5月31日到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华北、华南、长江流域二十多个省市六十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参加，其中除共产党外，还有属于国民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参加。<sup>③</sup>会议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 and 南京、上海、厦门、香港等地的救国会代表的报告，何思敬亦在会上发言，发言者计有卅余单位，各地报告至晚上8时，继而讨论大会宣言，各代表分节详细讨论，直至夜晚11时多才终止。

第二日（6月1日）大会继续进行，讨论大会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对于劳工、农民、妇女、侨胞问题均详细讨论及修正，同时对于抗日地主，均主张加以保护。大会认为在抗日第一原则下，各阶层内部问题，无不可以迎刃而解。大会全场一致通过政治纲领后，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

---

① 《救国会》第8页。

② 《救国会》第7页。

③ 《救国会》第95页。

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等 14 人为常务委员。

大会结束后，据传特务已注意我们的会议，故要求各地代表立即疏散离沪，以免遭不测。我仍与吴超炯同行。由何思敬送来两张船票给我们，我还记得坐的是荷兰船，船名叫：“兰尼加拉”，船行 5 天才返抵香港。石辟澜留在上海当全教会的干事。何思敬回港后，住在“大同盟”宣传部宿舍，开始着手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南方总部（简称“南总”）。“全教会”成立宣言很长，把《八一宣言》中提出的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共同抗日的精神全都写进去。我记得何思敬回港后，首先就把宣言摘要印成小册子。当时参加筹备“南总”的除何思敬外，还有连贯、饶彰风、吴涵真、李章达、梅龚彬、苏惠、杜君慧、薛尚实等。

我们从上海回到香港时，两广“六一事变”已经发生。广东的陈济棠由于其部下余汉谋、黄光锐被蒋介石收买，倒戈反陈，接着李汉魂也“封金挂印”而去，故陈济棠很快就垮台，只身乘英国军舰出走香港。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则由广州退回广西，继续以北上抗日为名进行反蒋以自保。李、白比陈济棠聪明一些，他知道“全教会”已经成立，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就派陈劭先去上海请“全教会”以及“南总”代表到南宁“共商国事”。此外，反蒋的其他地方当局以及主张抗日的各党派也被邀到桂。中共中央亦派了云广英同志（化名为林秀先）经天津往港转南宁，他曾与李、白及李济深见面，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反对内战，保存国力，发动群众，一致抗日的主张。“全教会”派杨东莼为代表前往南宁，也申明“全教会”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认为在日寇加紧侵略我国的时候，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当时到南宁的还有“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李



济深、梅龚彬，第三党的章伯钧，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中华职工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托派等也有代表参加。此外，胡鄂公、邓初民、陈辛人、林蒂、彭泽湘、刘芦隐、张文、杜畏之等也到了南宁。“救国会”方面，除由杨东莼代表全国救国会参加外，“救国会南总”的何思敬、杜君慧也有参加。广州学生界代表则有张凤楼、方少逸、罗范群、刘天行等。在出发前，梅龚彬在“大同盟”宣传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要求“大同盟”的同志到桂后，一定要坚持《八一宣言》所订的“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原则。<sup>①</sup>

当时，蒋介石调动大军包围了广西，陈诚力主乘势解决桂系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日益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此时又传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已与红军有了谅解的消息，其时日寇侵略更甚，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更高，这些情况，都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不敢在西南大肆用兵。而广西方面，口头上反蒋抗日虽然叫得很响，但阶级本质决定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也无能力使各抗日党派及各地方实力派结成有力的联盟，而且也自知以一省之力与蒋介石作战，是无法取胜的。此时“救国会”也极力宣传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迫蒋，反对内战。杨东莼还通过刘斐对李、白晓以利害，分析成立反蒋政府的得失。凡此种种，使得蒋桂双方最后和解，一场由国民党内部矛盾引起的已经剑拔弩张的内战，才终于消弥下来。

由南宁回到广州，我们仍继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内战，一致对外。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我

---

<sup>①</sup> 《梅龚彬回忆录》第91页。

得到“大同盟”宣传部梅龚彬的指示，要拥护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不要附和和要求枪杀蒋介石的意见。故我在事变第四天，即12月16日出版的《在抗战旗帜之下》以王逸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西安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的文章，“主张要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不要因此而引起内战，予日寇进一步入侵的机会”，该文发表后曾引起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国人皆曰可杀的蒋介石，为何还提倡要保留他的性命？直至周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后，大家才逐步理解党的和平解决方式，目的是迫蒋抗日。最后获得成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虽然蒋介石反悔，扣押了张学良。但到了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进攻芦沟桥战争后，迫使蒋介石退无可退，乃召开庐山会议，决定全民抗战，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取得全国抗战胜利。

在庐山会议决定全民抗战后，我们就在《知识往来》（在《在抗战旗帜之下》被禁后，我们改用“知识往来”名字继续出版）发表了芦沟桥抗战特辑。这一期我们组织几篇文章欢呼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歌颂前线壮士的英勇抗敌。

抗战开始之后，“大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先后被邀请到了南京。庐山会议开后，全面抗战之局已成，陈铭枢和一部分人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抗日，于1937年10月20日自动宣布“大同盟”全面结束。我们所办的报刊也就停刊了。<sup>①</sup>

---

<sup>①</sup> 见《团结报》第484期。

## 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点滴回忆

梁 嘉

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于1932年1月进兵上海，1935年又策动华北事变，通过所谓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加紧对华北的争夺。而国民党统治者则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广大爱国青年深感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抗战，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十分不满，纷纷组织起来下乡宣传抗日。记得我在这一年暑假回到家乡，一有空便独自跑到大街上贴抗日标语，向群众演讲，宣传抗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要组织起来，建立抗日团体，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因此，中大同学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读书会，秘密传阅和学习进步书籍。至1935年夏，王均予从上海到广州，建立中国青年同盟。它与“突进社”一起，逐渐成为中大学生的秘密核心组织。我所参加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的。

1935年秋，我的同班同学冯道先和周力夫（周学谦）一起找我谈话，主要是讲青年学生应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动员我加入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也讲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大学生参加中国青年同盟的情况。随后，我们在中大法学院对面山头召开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大会，明确成立本盟

的目的是团结反帝反法西斯的抗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大同盟的盟员在这一山头上又开过两三次会，都是谈论当前的抗日形势。经常参加开会的有雷瑞英、程肇芳、金石声等人。河南纺织厂的几个女工和土华乡几个农民也曾参加大同盟的会议。大同盟要求盟员多交朋友，所有活动都是围绕抗日宣传。入盟只要经盟员介绍即可，无需履行别的特殊手续。后来，我和冯道先，雷瑞英负责领导纺织厂女工和土华乡农民开展活动。在广州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几次大游行中，我们的盟员都积极参加。

1936年1月13日“荔湾惨案”后，大同盟停止了活动。主要原因是大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冯道先、周力夫先后被捕，随后，我和雷瑞英、张凤楼、李康寿等中大同学也于三四月间被捕，狱中，我见到纺织厂10多名女盟员，她们被关押在我斜对面的一间牢房里。我们后来都先后被保释出狱，但冯道先却于7月19日被当局秘密处决，周力夫则下落不明。

# 广州反帝反封建大同盟片断

王文魁

广州人民1935年组织“反帝反封建大同盟”时的历史形势是极为严峻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英、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分割占据我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广州人民起来组织“大同盟”和它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极力效法德意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的镇压政策，这又是广州人民起来组织“大同盟”要和它们作斗争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封建势力却成为这些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基础，它们依附在这些反动势力的庇护之下求得苟安，处处为虎作伥，仗势欺人，也是“大同盟”反对的对象。“大同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法西斯、反封建和拥护抗日。由于当时广州在国民党反动军阀陈济棠及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掩蔽、保护和积蓄力量，它采用分散、掩蔽和秘密的活动方式，以单线联系和小组形式相结合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

“大同盟”成立初期的领导中，记得其中有钱兴、冯道先、周学谦，其他的人就记不得了，这些人也不一定准确。它当

时所要发展吸收的成员是：坚决反帝、反法西斯、反封建和拥护抗日的爱国进步的教师、学生、工人和社会贤达开明人士等。我由周学谦、钱兴介绍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是我的联系人。不久，我介绍了中大附中的周伯明、王仪真2人，国民大学附中高中班的梁惠明等4人参加了这个组织，中大附中方面的工作由周伯明、王仪真2人负责，我是他的联系人，有时也介绍钱兴和他们联系。国民大学附中的4人成立了小组进行活动，我也是梁惠明的联系人。周学谦在广州河南纺织厂发展到了一批工人加入大同盟。至于其他各校、各厂（如广州河南纺织厂、橡胶厂等）及社会上的成员，联系人状况、组织人数等已记不起来了。

“大同盟”拥护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坚决支持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各种主张和积极响应，并于1936年“一·一三”全市学生在荔湾国民大学礼堂召开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陈济棠的政府给予抗日自由，实行民主，反对法西斯压迫大会，并组织示威游行时，他们的成员都积极参加。这次游行被陈济棠反动政府破坏和镇压，逮捕了許多人，“大同盟”参加游行的人当中，也有被捕的。

当时“大同盟”一个任务就是大力向广大人民进行抗日、反帝、反法西斯、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并以此来提高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及这些反动势力的种种罪恶行为的认识，推动人民特别是教师、学生和工人起来和它们进行斗争，采用油印小传单，印发“大同盟”小报和周报等。然后由各小组成员分工秘密散发，或者夜间秘密到处张贴。当时中大附中由周伯明去进行，国民大学附中由梁惠明那个小组去组织进行，其他由周学谦、钱兴等负责组织。或者采用邮寄的办法，把宣传品直接寄到所要宣传对象的手中。

另一个任务是推动所有成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积极争取参加到所在单位、学校、工厂的各种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社会团体中去，交朋友，做工作，进行宣传，相机发动这些组织如学生会等，做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如国民大学附中高三班，学校的反动军事教官用法西斯高压手段，无理强迫该班学生剪发剃光头，引起全班同学的公愤。该校“大同盟”的小组，利用学生组织，发动高三班同学罢课，其他各班舆论声援，反对反动教育的法西斯暴行，反对学校教学不民主，迫使该校反动教官公开承认了错误，学校答应民主管理学校。这一胜利，对全校学生鼓励很大。香港的《大众日报》报道了这一斗争胜利的消息，并表示支持。

再一任务就是揭发当时反动军阀陈济棠及其反动政府的统治罪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和他们作斗争，要求他们给予广州人民抗日言论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等。

“大同盟”为了开展攻势，还在1936年2月间，由钱兴、周学谦布置，由我，周伯明、梁惠明等具体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我们印发大批宣传材料，并组织了大批力量，到处散发这些宣传品，造成声势，影响较大，震动了陈济棠反动政府。他们曾因此放出大批密探到处侦察。

# 回忆社会主义青年行动团

李康寿

1935年北平“一二·九”青年学生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大城市均先后响应。广州地区首先由中山大学发动，并联络各大中学校，举行多次大游行。当运动初步发动起来后，又即组织9支宣传队，于1936年1月上旬分赴外县，拟把救亡运动逐步向全省扩展。

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镇压政策，发生“一·一三”荔湾惨案；勒令各县宣传队解散，返回广州；逮捕大批青年学生骨干分子；禁止学生集会游行。在当局的高压政策面前，广大学生青年没有被吓倒，经过酝酿，运动由公开的轰轰烈烈的形式转向地下的扎实细致的形式深入发展。各种秘密的小组织和地下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青年行动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6年4月间组织起来的。

我是参加去惠阳县的那个宣传队的。回校后，救亡活动被禁止，同学们满腔革命热情无处表达，今后怎么办？在反复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最坚决的，党要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是最理想的，因此，必须得到党的领导，在还未找到党之前，我们自己应先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在此认识下，于一个晚上，在宿舍里举行了



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行动团（以下简称行动团）还对列宁像举行宣誓，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琦，李见心，霍赐影，叶汉生，梁痕影和我6人。不久，又邀余铭艳，张多庆，杨志英参加。五、六月间，又邀黄埔海军学校的黄景文、陈守仁参加，共11人。

组织分工是：书记陈琦，组织部余铭艳、宣传部霍赐影、训练部李康寿，后增加副书记由余铭艳担任。

行动团还决定：通过社会关系，用秘密读书会的名义发展组织。当时先后组织起来的有以黄裕梅、凌云衢为首的仲凯农校读书会，约七、八人；以谢恩坤（大众书店店员）为首的书店店员读书会，约六、七人；还有女子中学的读书会四、五人，如孔庆余，邓宝珠，张雪馨等，黄埔海军学校的读书会，规模较大，最多时达20多人。

行动团的会议制度是颇为严谨认真的，规定每星期天上午举行一次会议，汇报情况、讨论问题、研究工作、作出决定、分头执行。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中心，学习马列理论、讨论时事政治，是我们的重点。开会地点多在李见心家或在霍赐影家。海校因为情况特殊，黄、陈两位每月来和我们碰头一次。我们学习讨论过“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任务”问题“统一战线和联合战线”问题等，也曾对当时推行新生活运动进行分析揭露，油印成传单秘密散发。

行动团开始筹办出版一个油印刊物，取名《紫外线》，一张日报大小，折为8页16面，内容主要是针对当前国内省内问题发表简短评论，阐述我们的见解。放在财厅前一间图书公司门市部寄售，数天后便给反动当局查禁没收了，《紫外线》只出版了第一期。后又在《公评报》的副刊版上主编了一个副刊，定名《国际知识》，每星期出版一期，连续出版了

20 多期。每期的文章，都是先定好题目，由《行动团》的成员分工撰写的。

各个读书会是不知行动团这个组织的。行动团由有关成员分别与各读书会进行联系。负责与仲凯农校和店员两读书会联系的是李康寿，与女子中学读书会联系的，开始是陈琦，后是霍赐影，后又是余铭艳，海校读书会就直接由陈守仁、黄景文联系。读书会的主要活动任务有二，一是加强自我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二是团结周围同学、同事，传播进步思想。

在这里，海校读书会有特别介绍的必要。陈守仁与李见心是培正中学的同学，在 1932 年，即受中共党员、语文教师陈黄光的影响教育。到海军学校读书时，与黄景文等几同学一起组织秘密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6 年夏，由李见心和我介绍陈、黄参加行动团。这时，海校读书会又有所发展，每班都有同学参加，读书会已形成全校性的群众秘密组织了。他们一直都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仍然在活动，直到 1939 年海校宣布解散为止。

1936 年七八月间，于光远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岭南大学任教，带了黄汉炎的介绍信来找我，他给我两份材料，一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章程，一是民先队员须知，意图在广州地区建立民先组织。他每星期都与我约会一次。

11 月间，于光远提议把我们所联系的人员联合起来，扩大组织。乃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太平餐馆二楼召开会议。霍赐影、谢恩坤、黄裕梅，凌云衢参加了。于光远所联系的人，我现只记得有力伯皖，还有一个是在邮政局工作的，共 10 多人。会议由于光远主持，决定成立力社，正副社长由于

和我担任，设若干个部，由霍赐影，力伯皖等担任负责人，并决定出版一个刊物，取名《一条心》，这个刊物的出版者就叫一条心社。

这时，各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小组织，开始转向互相渗透、互相推动、互相联结的道路。在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配合下，逐步向更大的统一组织推进。在这种新形势下，反动当局为了阻止和破坏抗日救亡活动，就加紧特务活动。1936年底，即有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遭到逮捕。1937年1月，力社成员谢恩坤被捕，接着，黄裕梅、凌云衢、霍赐影和我，也被捕了。1937年5月我们出狱。“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社会主义青年行动团在1937年下旬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由余铭艳主持，决定自动解散；动员全体成员分别参加到全民抗战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做出各自的贡献。

## “行社”读书会与广雅中学学生运动

李文浩

1935年春，广雅中学一批进步同学，为加强团结，学习革命理论，组织成立“行社”读书会。

读书会开始时曾争取到学校的支持。广雅原来有一个好校风，课外活动很丰富，除课堂学习外，还有多种课外学习和活动，如文艺讲座，新闻讲座，速记、摄影、乐队、歌咏、养蜂、园艺等等。学校初时以为是学生的自学要求，故予支持，拨了一间小房给读书会为活动地方，成立会上派校务委员出席讲话。

最初参加读书会的有：莫福枝、张镒英（张仲明）、黄泽成、廖衡（廖行）、苏秉镒、钟文钜（钟达明）、叶纫锋（叶锋）、林华康、李文浩、张思乔、王浩阮、邓业荣、梅挺芳、黄家驹、刘伯怡、郑志锐、伍丕舜等人。

读书会成立不久，学校发觉我们思想左倾，学马列主义，又不为它控制，便借口加强课内学习，把小房收回去，要读书会停办。但是“行社”读书会已深印我们心中，大家思想相投，感情深厚，仍然联系不散。

读书会不能集体公开活动，改为分散个别来往，互相借阅进步书刊，研讨理论，等等。有一段时间记得见面就探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一些禁读的革命书籍，如《国家与革

命》、《论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等书都曾在成员中传阅。在这样互相教育影响下，逐步提高了对社会和革命的认识，加深了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

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国家救亡危在旦夕。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北平学生率先响应，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大学生随即响应，于一二·一二”及“一二·三十一”两次举行示威游行。

广雅中学远处市郊西村，学生全部寄宿学校管理极严，功课繁重，学习紧张，平日不许走出校门，只星期六晚和星期日放假可以外出，学生同校外和社会十分隔漠。“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声惊雷，震撼了广雅高峻的围墙。中大爱国进步学生钱兴、张克明等同“行社”读书会的同学莫福枝、张镡英等取得了联系，开始推动广雅的学生运动。1936年1月9日中大联合广雅以及附中、教中、知用等中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广雅全体学生1000多人参加，连同中大及其他中学共达万多人，声势浩大，使广东国民党统治当局惊慌失措。

广雅参加这次游行，事前做了充分准备。“行社”的同学在同中大取得联系后，立即联络读书会的成员和平日较为了解的其他进步同学，很快取得高三级各班和其他高、初中部分爱国同学的赞同支持。我们提出“国家岌岌可危，北平和中大同学游行示威，要求抗日救亡，我们热血青年岂能坐视？”当时学校正计划集中全校学生在大礼堂举行学期“大考”，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便因势利导，动员同学挣脱枷锁，走出校门，参加抗日游行。对校方则严密封锁消息，与校方关系密切的学生也严予保密。为防止学校与外界联系破坏游行，对学校的4部电话也分派专人监视，并布置4个家有电

话的同学于发动游行时打电话回校，使电话“占线”，以切断学校同外面的联系。当然这是青年人天真的办法，但可说明同学们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为进一步落实，游行前夕，莫福技和黄泽成再次同中大联系，找到钟远蕃、韩瑶初和叶焜寰，约定集合的地点和时间。

1月9日9时许，我们打响大钟，集合队伍。大钟横放在高架上，用绳拉动旋转锤响，新手拉不顺，钟声凌乱，同平日的节奏不同，同学们就把这次爱国行动称为“打乱钟”，印象至为深刻。同学们听到钟声，纷纷齐集。其时，高中二年级同学正在大操场军事训练，我们举着大旗来到操场，便招呼军训中的同学拉出队伍；军训教官欲加阻止，喝问“干什么去”？同学们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抗日！你不赞成吗？”军训教官默然，不敢反对。“行社”读书会和高三级同学领头大踏步走出大门，校务委员（学校负责人）站在一旁眼睁睁不敢阻拦。大队沿西增公路、西华路、长庚路、入惠爱路（中山路）、折向南永汉路（北京路）、泰康路至长堤新填地广场（今省总工会附近）。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群情激昂，气势雄壮。街上许多群众驻足观看，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些人和我们一起高喊口号。在“新填地”广场举行大会，推选中大同学曾振声（即曾生）为主席，钟远蕃、罗宗煌等同学在大会上演讲。曾等慷慨陈词，指出国家正处危急存亡，日寇铁蹄纵横，而蒋介石仍采“不抵抗主义”，妥协退让，只顾内战。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大家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坚决拥护。

大会后，广雅中学的队伍往西游行回校，途中驻黄沙转

入荔湾东路，在黎铎医院附近空地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决定从即日起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唤起群众，抗日救亡。

队伍回到学校已近黄昏。晚饭后，同学们集合在大礼堂开会，并请全校教职员工参加，他们大多数都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大会一致宣誓，誓词内容大致是：“余誓以至诚，抗日救亡，如有违背，甘受处分。”

同时关闭学校大门，不许擅自出入。国民党当局连夜派侦缉（特务）和宪兵企图进入学校，见校门关闭，遂守在门外。我们发现后很紧张，立即组织“打狗队”（纠察队）值班把守。翌日，膳堂管理员开横门出外采购，忽然有人擅入声称找人，但本人竟不认识，这时正好中大冯道先领纠察队坐车前来支援，发现一个便衣侦缉企图捣乱，便把他捉住带回石牌中大审问。

关闭校门这种对抗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必须设法解决。经过商议，决定打开校门，大伙出去，估计当局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镇压学生。经过一天二夜，至1月1日晨，我们突然打开校门，一群群学生蜂拥而出，受当局注意的同学也夹在中间一同离开。宪兵队即进入学校，召集尚未离校的学生训话，责备学生“不应上街游行，要专心读书，不得过问国事”，宣布学校提前放寒假，令学生立即离校回家。对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同学则要严厉制裁，开除学籍。同学们一致认为爱国无罪，于是，据理力争。他们生怕引起公愤，才勉强改为令离校借读，保留学籍，回校参加毕业考试。被勒令往惠州中学借读的有莫福枝、张鑑英、伍丕舜、黄家驹、丘秀传、黎文轸、余鲁南等人。另刘伯怡和梁茂鸿二人则允在本市八桂中学借读。他们就这样用分裂学生的办法来破坏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行社”的同学一部分被迫离校，另一部分留在学校的同学要继续推动广雅中学学生运动深入发展，因此，感到责任更重了。适应当时反动当局对学生运动严加控制的形势，“行社”一改过去的松散状态，采取秘密方式积极行动。为避免暴露，大都在校外集会，多数在张思乔的家里，有时在钟文钜（钟达明）的家里。他们两家都有很好的条件。张家有五进深数十间屋，并有后门和横门分布不同街巷；钟家是独立小楼房，周围田野，十分僻静。作为同学聚会，家人也不怀疑。我们常常在这些地方学习、开会。这时“行社”的成员有些变化，仍积极参加“行社”活动的有莫福枝、黄泽成、钟文钜、苏秉镒、廖衡、张思乔、李文浩、叶纫锋、林华康、王浩阮、梅挺芳、梁茂鸿、伍丕舜、刘伯怡、黄家驹等。“行社”曾一度扩大到校外社会上去活动，派人与女师、女中、培正等校一些进步的同学接过头，曾吸收了张思乔的堂弟张思亮参加，但以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没有扩大。

1936年以后，被学生运动吓破了胆的国民党当局，对学生加紧压制。他们企应用封建伦理来麻痹和束缚学生，竭力宣扬“国粹”，推行“读经”。语文课本内容尽是“四书”、“五经”，文字佶屈聱牙，深奥难懂。要学生埋头死读书，不准谈论国事。又实行毕业会考，一科不及格不得毕业。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和恐惧，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无理苛求，是实行奴化教育，把学生束缚在故纸堆中，忘记了国家兴亡大事，其目的是欲扼杀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广州市爱国进步学生又酝酿行动，要粉碎这个阴谋。“行社”又紧张地投入战斗，派钟文钜同广州市“地下学联”和各校联系，采取联合行动；同时加紧推动校内各班同学，争取了大部分班级的赞同。



1936年6月8日，广雅中学又一次敲响大钟，集合同学游行。由于事前做好联络，又涉及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听闻乱响的钟声，同学们就纷纷到大操场集合。这在响应“一二·九”运动时已有了经验，“打乱钟”即是集合游行了。队伍出长庚路后即先后会合知用、女中、大中、中大附中等校学生共上千人，浩浩荡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的“奴化教育”，反对“读经”、反对“会考”，要求实施抗战教育，“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这一次游行，虽然受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严重打击，但所谓“读经运动”破产了，学校也不敢对学生过份约束。

为破坏学生运动，反动当局却加紧镇压手段。就在学生发动游行前夕，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进行秘密逮捕，即骇人听闻的“珠光里事件”。

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阴险无耻栽赃陷害的罪恶行径。先是派出特务伪装革命，自称什么“中共支书”，结识了中大医学院青年药剂师马和德，从而认识广雅中学的梁茂鸿、刘伯怡和钟文钜，骗取了信任，然后提出成立什么“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队”进行陷害。梁和刘以当前抗日救国时期，提出成立“中华抗日先锋队”。那特务则故作姿态，坚持要成立“中华革命先锋队”，说““这样才算革命”，最后只得依他。钟文钜没有参加开会，只说过“你们搞成算我一份”。他们常在珠光里梁茂鸿住处聚集和开会。反动当局得知学生即要举行游行，就先下毒手，妄图镇压。它们以马、梁等搞“反动组织活动”为借口，于游行前在珠光里进行逮捕，以为这样可以破坏学生示威游行。先逮捕了马和德、梁茂鸿和刘伯怡，并在那里潜伏，钟文钜、伍丕舜、黄家驹、叶纫锋等先后去那里找人又遭逮捕，中大的钱兴前去找人他们也被逮捕。爱国

学生先后被捕达 40 多人。国民党反动政府急以“中华革命先锋队”为共党组织，判处马和德、梁茂鸿、刘伯怡以及钟文钜 5 年徒刑。其后军阀倒台，大部分学生才被释放。钟文钜则由家里变卖财产以 3000 元银洋托有关系者赎出。梁茂鸿等直到国共合作抗战之后才得获释。

反动派的滥肆逮捕镇压，只是暴露了其阴险狰狞的咀脸，根本阻不住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潮，学生仍然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奴化教育”，“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行社”同志在这次大逮捕中受到严重损失，被捕达 6 人之多；但大家并不气妥，而是更坚定勇敢地承担起重任，继续同群众一起进行斗争。

1936 年秋，“行社”绝大部分同志考入中山大学，“行社”又作为一个进步组织成为中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力量。

# 我所知道的力社

杨康华

“力社”是在老共产党员陈勉恕直接指导下，由高明县第三小学（简称“三小”）名誉校长陈汝棠发起，以该校毕业生和教师为基础所组成的进步群众团体。陈汝棠是国民党老左派，全国救国会在香港设立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及其辖下的“广州救亡协进会”，他都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和“力社”在“一二·九”前后抗日救亡运动中，起过颇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陈汝棠是高明县合水区人，生于1892年。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三·二九”之役。1919年赴沪见孙中山时，认识了参加《新青年》刊行工作的陈勉恕，成了莫逆之交，此后，听从指导成为党的亲密战友。孙中山当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大本营中将军医总监兼陆军部军区司司长。他拥护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赞成我党主张，支持革命工作。蒋介石、汪精卫搞“四·一二”、“七·一五”政变，他极为愤怒。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在穗利用社会关系掩蔽陈勉恕、曾国钧等同志，帮助他们安全脱险转往港、沪等地。1929年，他创办高明“三小”，聘马克思主义者陈此生（陈勉恕胞弟）为教务主任，并保释杨锦虹、曾统、陈权等（均在广州起义前后被捕）出狱，连同一批进步分子介绍到校任教，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和革命思想。1933年秋，陈汝棠组织成立“力社”，把没有能升学又没有工作的毕业生组织起来，每日上山垦荒种植，晚间学习，讨论进步书刊。1934年，共产党员李守纯奉派到“三小”任教，加强领导。1935年，陈勉恕经香港到合水，检查“三小”和“力社”的工作，他召集会议，讨论部署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力社”组织。他亲自带领“力社”青年和学校教师，向农民讲革命道理，办起农民夜校，组织“沧江剧团”演进步话剧。“力社”组织逐步从高明推展到高要、鹤山、新兴等几个县的农村，先后成立了80多个分社。1936年发展了第一批党员，经上级指示成立“西江工作委员会”，由李守纯负责，因此，全国救国会“南总”成立时，“力社”是个属下的组成单位，陈为“南总”及“广州救亡协进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陈汝棠并没有在广州发展“力社”这个组织，但他的世交和同乡子侄、青年学生，在思想上受其影响者不少，大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5年他到日本考察归国之后，担任了广东省、市各高中女生军事救护训练的领导和监察，手下一批教官在政治上是听他话的，女子高中如市二中、女中、女师等校的进步分子，在教官及陈本人亲自面谈与指导下，也组织了一些大小不等的“读书会”。他同市美、知用、教忠等校一些进步学生和“读书会”的负责人也有直接接触。他按陈勉恕的指导，宣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及我党《八一宣言》精神。这些进步学生及秘密组织的成员，经常到他家里同他商谈时局和工作，后来都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他同“中青”、“突进社”、“马列主义行动团”等秘密左翼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同何思敬、邓初民等进步教授，以及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上层人物，都有交往和磋商，推动抗日

救亡运动。当时各进步组织都还处于秘密状态，其成员在抗日救亡大方向上行动是一致的，但在组织上是彼此不清楚的。因而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和逐步高涨时，有些秘密组织和进步分子，曾经把在广州同陈汝棠关系较密切的青年学生和救亡积极分子，看作是属于“力社”这个组织，这在那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奇怪的。

# 回忆“一二·九”运动前后 广州建党活动经过<sup>①</sup>

王均予

1932年8月，我调上海中央出版部发行科工作，集中力量在学生群众中秘密推销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等马列主义书籍，和党在上海出版的《红旗》杂志和《红军捷报》，在学校内找到代销人，定期送书刊给代销人，经代销人向进步学生经销。当时在上海的暨南、复旦、大厦等9间学校都有代销人。然后经过在上海的进步学生的介绍，卖书关系又发展到上海以外，在北京、天津、武汉、澳门、厦门、广州、磁县、行唐、镇平以及南洋等地的有些学校都有代销人。其中关系较密切的有太原的李雪峰，河北省磁县行唐一带的张霖之和广州的麦蒲费。麦是勤勤大学学生。为了加强和外地读者的联系，帮助推销工作，在1933年4月间，我自编了一张小报叫《时代文化》，秘密印刷，秘密发行，主要是向上海以外发行。内容是报导上海出版消息，介绍马列主义书籍，登载上海和外地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答复读者来信；学习时事政治，也报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暴动

---

<sup>①</sup> 本文节选自王均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材料，同王均予于1937年写给中央的报告内容基本一致，但时间和某些情节略有出入。

的消息，是一个为发行科服务，联系各地读者，组织读者的工具，通过这张报纸的发行路线，在上海以外的某些城市的青年学生中，依靠代销人，把当地经常购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读者组织起来，组成《时代文化》读者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广州读者会的头麦蒲费，读者主要是勤勤、中大、中大附中、大中中学等校学生。

1934年秋，《时代文化》因无力续办而停刊（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上级派何干之来编报，何嫌这张报纸“水平太低”，编了一期就拖下来，七拖八拖就拖垮了）。报纸停刊了，读者会可能散，发行科党小组考虑怎样不使各地读者会的组织因报纸停刊而解散，商量提出用一个组织名称，同发行书刊的工作结合起来，以保持组织关系，因而想出了用“中国青年同盟”这个组织名称来代替读者会名称，仍然保持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党的报刊的关系。这样改名，当时估计到有困难，会受损失，我就加紧尽力去工作。这个时期，我的工作特别紧张，要向各地读者会写信，说明改名原因，征求意见，推动组织。通信是很多的，不管有无回信，总是一封一封的写出去。经过一番努力，后来这个组织保持下来的有太原、广州和上海的大场3处，这就是“中青”的由来。这个“中青”无总部、无纲领、章程，仍在发行科领导下，维持外地读者的联系，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我来广州后又改名“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经过整顿和发展，为重建广州市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广州“中青”的负责人是麦蒲费，早在1933年，我在发行科就和他发生了秘密的通讯关系，以后麦蒲费是读者会的负责人，后来是广州“中青”的负责人，他长期为发行科在广州青年学生中推销马列主义书籍，发行党在上海出版的

《红旗》杂志和《红军捷报》等宣传品，他在广州中大、勳勤大学和某些中学中团结一批拥护共产党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在发行科领导下的党的外围组织——广州“中青”。

1935年7月，出版部和上级断了联系，通知发行科自己维持工作，等待接关系。发行科党小组共3个人：王平、我、易吉光，由王平领导，王平是出版部派来领导发行科的，王平传达了出版部的决定后，党小组讨论自己维持工作的办法，决定王平、易吉光留上海和出版部联系。因为广州“中青”原来就在发行科领导下与我有近3年的工作关系，就决定我到广州，帮助开展广州“中青”的工作，继续维持发行科的工作，同上海党小组的王平和易吉光保持联系。当时出版部本身并未发生问题，王平仍和出版部联系，并仍领导发行科。我到广州后，一直同上海发行科党小组保持联系，向他们报告工作情况，接受他们的意见和寄来的马列主义书籍，直到1936年接上北方局的关系为止。

我来广州，就是以“中青”负责人的身份来的，虽然我没有对麦等透露我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透露领导“中青”的是出版部发行科等关系，由于从1933年起，麦在广州组织《时代文化》读者会，就同我建立了秘密的通讯关系，不但长期从上海供给他们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而且有《红旗》和《红军捷报》，麦等当然会推想到是共产党的关系，因此我的到来，就得到他们的欢迎。

我离上海之前，用秘密通讯告知麦。到广州后，先住在长提一间小旅馆，写信告知麦，他到旅馆来看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已是有过近3年关系的老朋友。我告诉他来广州帮助开展“中青”工作，要在“中青”现在基础上，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麦表示欢迎。立即去找房子和



我一起住，连我个人的生活费用，也由麦供给。

1934年底，广州读者会已改名“中青”，但工作未开展，我来广州时，“中青”不过二十来人，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学生，主要分散在勳勤、中大两间大学，总负责人是麦蒲费，中大负责人是钱兴，虽然有了“中青”这个组织名称，但“中青”和成员的关系，还处于志愿结合的状态中，没形成领导核心，还局限于少数先进分子的分散活动，没形成行动一致的组织力量，同时组织太小，骨干分子还未和群众广泛联系起来。我住定后，和麦一起整顿发展“中青”组织，由麦介绍，我陆续认识了原有“中青”的成员，有勳勤的林振华，中大的钱兴、曾生、粟稔，以及梁湘、梁奇达、李锦波、黄书光、周明等。我根据5月在上海看到的党内文件，提出反蒋抗日任务，同麦、钱讨论一些措施：1. 建立“中青”的领导核心，由我和麦、钱3人形成的上层领导核心，集体讨论工作，对有“中青”成员的学校，建立组织联系，取得行动一致。2. 扩大宣传教育，逐步发展组织，建立组织生活，逐步克服自由散漫状态。3. 确定了宣传中心，围绕着抗日反蒋这个口号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传红军长征胜利，宣传党的《八一宣言》。4. 建立外县工作基础，5. 取得与何思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联系。以上几项，通过麦、钱分头进行。经过一段工作，在一些学校撒下了种子。8月经麦介绍，我认识了陈健，他组织有一个青年学生读书会，有10多个青年，那时陈健说他要去上海，把他领导的青年托“中青”代管，我认识了他们的头：张定邦、温焯华。陈走后，张、温带领其他的人加入了“中青”。由张定邦介绍，我又陆续认识了东莞的王作尧、王次华、王士钊、张广业；王作尧又介绍我认识了王启光；周明介绍了新会的陈翔南；麦又发展了

中山的孙康；梁奇达因进行学生工作被学校开除，他去高要活动，“中青”跟着发展到上述地方。到1935年底，“中青”发展到百余人。

“中青”的工作主要是搞学生运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学习时事政治。因为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从1933年起就没有党组织活动了（这是我在上海听何干之讲的），有了“中青”这个组织，进步青年很愿意参加，不过因为处于地下状态，还不能大量发展。“中青”发展人员由“中青”盟员发现了愿意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卖国行为的，就主动吸收，因为它是个群众组织，只要是愿意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青年就可以吸收。加入后要过小组生活，盟员加入多是用代号。

在发展“中青”的同时，中大存在一个“突进”社。“中青”当时的口号是反蒋抗日，“突进”的口号也是反蒋抗日，所以两个组织在政治上能合作。“突进”的活动只限于中大校内。

1935年底，北京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广州学生极为兴奋，我和麦、钱紧急碰头讨论，估计学生群众的情绪，依靠“中青”这个骨干组织，布置以中大、勤勤为主，联系“突进”分头串连，组织基本力量，发起响应，举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宣传，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公开斗争，争取抗日救亡的自由。示威游行的宣言和口号，是我和麦、钱共同拟定的，并由我和麦刻印好交给钱兴，主要口号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在准备期间，中大林翼中派企图控制主席团，群众不支持，结果由曾生当选了主席团主席。经过酝酿准备，从12月16日到12月31日，连续举行了3次有各校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声势很大，从运动中发动群众，参加的学生一次比一次多。在准备第三次示威游行时，我和麦、钱商定，经过3次示威游行后，就暂时停止，转入发展组织。并准备利用寒假到来的机会，通过学生放假回家，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到中小城镇、农村和全省各县去，并把“中青”组织发展到广大地区去。

12月31日下午，第三次游行散队后，部分学生在返校途中，路过教育厅，一时义愤砸了教育厅，其中有部分中大学生在内。当时广州各大学中，中大内部较复杂，各派系的政治斗争较集中，其他学校就比较隐蔽，因而陈济棠把打击目标放在中大。由于“中青”采取秘密组织活动的方式，陈济棠不知道广州有个“中青”。曾生是中大学生游行示威的总指挥，钱兴在中大是比较暴露的活动分子。1月3日陈济棠派兵进驻中大，同时下令通缉何思敬、曾生和钱兴，企图镇压学生运动。何、曾、钱逃到香港去了。运动受了打击，主要是把原定的寒假下乡宣传活动的计划打垮了，在群众被迫分散的情况下，就来不及布置了。但“中青”组织毫无损失，组织也未暴露。“中青”成员经过这场斗争，更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性，斗争积极性更高，组织纪律性更强了，也更激起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热情，从运动中锻炼了骨干，在青年学生中起了很大的宣传组织作用。“中青”组织也由广州发展到外县——东莞、中山、新会、高要。东莞也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示威游行作为回答。到1935年底，“中青”成员就发展到百人以上，转入内部教育和扩大宣传。

1936年4月，易吉光在天津和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并讲了我在广州工作的情况，得北方局同意，由易通知我去天津接党的关系。我到天津，由易介绍见到李大章，李当时是北

方局的宣传部长。我在旅馆向李大章汇报了我到广州的原因和在广州发展“中青”，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汇报了和何思敬及“突进”社的关系，谈了两三次才谈完。隔了两三天，李再来，向我讲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方针，并给了一本党内文件《火线》叫我学习。这期《火线》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李口头讲的两个问题。我在旅馆学习文件，这才正式从党的领导上接受了统一战线政策。约隔了四五天，李又来，收回文件。他说广州已长期没有党的组织，青年学生在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经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已经有了群众基础，“中青”成员可以作为建党对象，叫我回广州就可以开始建党。我提出了3点要求：1. 派一个广东的同志来领导，因为我不懂广东话，工作不方便；2. 以后按时发给党内文件；3. 我在广州是靠几个学生供给，希望给我工作经费。李答复说第一点可以考虑，第二点同意，第三点以后再说。又隔了两、三天，李又来，说已决定派一个广东同志回广东工作，名叫孔（后来才知道就是薛尚实），以后我就归老孔领导。交给我约定和老孔见面的暗号，我就搬到另一间旅馆（大方旅馆）等老孔来找。我搬去的当晚，老孔就来了，对好暗号后，我就向老孔汇报工作，因为他已有所了解，所以比向李大章汇报讲得简单，老孔问了情况后，也给我讲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方针，也交给我几份《火线》，不是一本，是从《火线》上拆下来的，和李给我的文件问题相同，但不同期。我在大方旅馆只住了一晚，就回原住的旅馆，以后再和老孔见面，是约在公园里。老孔也交给我回广州建党的任务，说“中青”盟员都可以吸收入党。这一点和李讲的是有区别的。我向老孔讲，我对李大章提的三点要求，第一、第二点已经解决了，第三点还未答复，老孔说

回去再说。

我是4月离开广州的，经上海到天津已经是5月了，等人和谈话，拖了很长时间。我和老孔见面期间，广州发生了两广军阀（广东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借抗日救国为名，举兵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我担心“中青”上当，支持他们，除先写信回广州，叫“中青”不要参加外，也向老孔提出来，要求快回广州，老孔才叫我先走，说他随后就来，我给了他在广州的地址，是我和麦蒲费同住的双槐洞、狮子桥（德宣路，今省人委建筑物一带）。我向老孔提出工作经费问题，他说到广州再说，当时只给我15元，刚够船费，老孔后来说，他给了我50元是不确的。在广州，他一直没给我一点经费。我在天津等买直达广州的船票，船行12天，回到广州已是6月底了。

回到广州，两广事变还未结束，“中青”、“突进”和广州学生看穿了他们借抗日打内战的把戏，没有上当，都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回来后就着手建党，首先向“中青”骨干麦蒲费等讲了在天津接上了党的关系，准备在广州建党，他们都十分高兴，并向他们讲解新学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方针。从此我就在“中青”骨干中开始发展党员。首先和我接触的“中青”骨干个别谈话，逐个吸收入党，因为当时只有我自己是党员，最初入党的人，由我介绍，也由我批准吸收，7月就吸收了麦蒲费、钱兴、林振华、张定邦、温焯华等入党，由我个人介绍，也由我批准，都是一个一个谈话，一个一个吸收，对这几个党员说明没有候补期，以便他们入党后就能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接着我就训练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和其余“中青”骨干谈话，到9月间，陆续吸收了李驹良、

杨瑾英、粟稔、曾生、李木子、黄书光、梁奇达、王作尧、周明等入党，再以后就没直接参加发展党员的工作了，凡有“中青”组织的地区，都先后发展了党员。东莞的王士钊、王次华、张广业。中山的孙康、新会的陈翔南也先后入了党。在当时地下活动情况下，入党手续，不填表，以免失密，不写自传，不可能作社会调查，但要经过个别谈话，举行入党宣誓。有的有监誓人，有的没有，看情况而定，一般规定有3个月的候补期，但转正手续可能不完全，入党后要过党组织生活。人数较多的成立党支部，如中大、勳勤，人数少的成立党小组，也有只有一个人的就单线联系。由麦蒲费、钱兴、张定邦等分头领导。建党工作由党直接领导，“中青”在事实上就停止发展了。

开始建党时，因为是一个一个吸收的，发展较慢，到9月初，正在通知我吸收的这批新党员继续开展吸收党员工作的时候，老孔来广州找到我，问我回来后的工作情况，我说开始建党，已经有10多个党员，作为下一步发展党的骨干，老孔一听很不满意，批评我还是关门主义，说“中青”盟员可以一组一组吸收入党，我认为必须一个一个吸收，但也加快了速度。到1936年底，党员发展到百人以上，“中青”骨干90%以上都入了党。

不久老孔又来，这时我已开始接到天津寄来的《火线》，给老孔看了。

约在9月底，老孔第三次来广州，他告诉我，他在香港成立了南〔临〕委，他任书记，说广州已发展了几十个党员，叫我成立广州市委，指定我任市委书记，由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麦蒲费任宣传，派他自己在香港吸收的党员罗范群任组织（罗是中大学生，没参加过“中青”和“突进”，是1936年

9月才在香港入党的党员)，市委归南[临]委领导。10月初，我召集罗、麦开会，成立了广州市委。从此，广州就有了党的领导机构，南委、市委建立了上下级的关系。

市委是在“中青”的基础上吸收党员的，广州建党开始以后，跟着原有“中青”关系，党组织也发展到东莞、中山、新会和高要等地，为了便于领导，在市委领导下设立了一个“外县工作委员会”，由麦负责，张定邦、温焯华帮助，他们三个人跑外县。广州市内的党组织大部分由罗范群管；小部分原来是麦的关系的，如勳勤大学党支部，仍由麦领导。对香港老孔的联系，也由罗负责，我管全面。这时有了党组织，我自己因说话不方便，多注意研究时事、政治，不直接跑关系。曾生、钱兴在香港工作，党的关系转到香港老孔那边去了。

市委从1936年10月成立，一直到1937年10月我离开广州去延安时止，市委就只是我和麦、罗三个人，以及“外县工委”张、温两人。没有组织过什么“青委”、“妇委”、“职工委”等机构，也没有别的人参加市委的工作。

# 抗战爆发前勳勤大学 党组织概况

李木子（锦波）

1935年秋季，我考入广东省勳勤大学教育学院读书。勳大包括3个学院，即教育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

1935年下半年，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又逐渐高涨起来，因为这个时候日本正步步加紧侵略中国。日本军阀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华北五省濒于沦陷。但是蒋介石政权仍然叫嚷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实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这就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在低沉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逐渐高涨起来。到了是年12月，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州的情形也是如此。

那时，我们一群青年学生怀着一股爱国热情，积极寻找抗日救亡的道路。我们强烈反对蒋介石执行卖国投降政策，感觉到依靠国民党不可能实现抗日救国的愿望。但出路在那里呢？我们阅读了很多流行的进步刊物及马列主义著作，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统治广州的陈济棠，由于他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因而也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号。陈济棠用主要力量对付蒋介石的特务组织“蓝衣社”，认



为“蓝色比红色更危险”。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当时广州市面的书摊上，有各种各样的进步杂志和马列著作出售。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大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等。这些书籍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我与同学秦紫葵、黄书光、云昌遇、苏铨、区保龄等一班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活路社”，目的是学习进步书籍和马列著作。当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我们看后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正确，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坚决抗日的政党。《八一宣言》这篇文献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我们阅读后感到精神振奋。那时候，国民党造谣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托派叶青编的刊物《理论与批判》在广州也很流行。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一小册子也出现在青年学生的手中，在一般学生群众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比较，终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

1935年9月，秦紫葵经同学陈翔南介绍，认识了王均予。随后，秦紫葵又将我介绍给王均予。王均予亲自吸收我和秦紫葵参加中国青年同盟（即：“中青”）。王均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中青”的领导人，他建立“中青”是为以后发展党组织作准备。参加“中青”必须在政治上有明确的态度，那就是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学习马列主义，走革命的道路。后来我又介绍云昌遇和苏铨加入了“中青”，黄书光也加入了“中青”。这样，勤大教育学院一共有5个“中青”成员。这就为后来建立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1935年12月到次年1月初，广州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而连续举行了几次抗日示威大游行，勤大一些学生

也积极参加了，受到很大的锻炼。其中发生在1936年1月9日的那一次，学生队伍冲进了省教育厅，摘下了省教育厅的牌子。事后，王均予曾召集勳大“中青”成员开会。王均予说：打教育厅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应遵照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国民党广东地方实力派不对学生运动设置障碍，尽量不要与他们公开对立。尤其使王均予不满的是，带头打教育厅的还是一些“中青”成员。王均予说要总结教训，以后不要出现类似的现象。

1936年6月，王均予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后，便在“中青”成员中发展党员。王均予介绍我和秦紫葵入党。我和秦又介绍苏铨和云昌遇入党。黄书光在这时也参加了党，他由谁介绍入党，我不清楚。之后，区保龄、廖文熙也入了党。这样，勳大教育学院便一共有7名党员。工学院方面也发展了几个党员。其中有邹优瑞、黄玄、陈能兴等。邹、黄两人入党的途径也是首先加入“中青”然后参加党的。陈能兴是苏铨发展入党的。勳大3个学院原来分别设有不同地点：教育学院前身是广州市立师范学院，地点在汉民路（现北京路）粤秀书院；工学院前身是省立工专，地点在西村增埗；商学院是新成立的，地点在光孝路。1936年八九月间，教育学院和工学院迁入石榴岗新校舍。10月间，王均予指示勳大教育学院和工学院两部分学员合编为一个党支部，并指定秦紫葵和我为支部负责人（但没有说明是支部书记职务）。党支部下分两个党小组。教育学院的党员为一个党小组，秦紫葵担任小组长；工学院的党员为一个党小组，邹优瑞（峇）、陈能兴先后任组长。勳大党支部由王均予领导。到1937年暑假时，由罗范群领导。因勳大的商学院一直没有迁往石榴岗。故我们没能在商学院中发展党员。

勳勤大学还有两个广州学生运动领导人——麦蒲费和林振华。他们是“中青”早期成员，也是王均予最早发展的党员。但他们两个人的主要活动不在勳大，也不参加我们的党支部活动。林振华与我们同住一个学生宿舍，他偶尔回校上课，总是在课室里抄写自己的东西。有一次，王均予对我们说：“林振华想到陕北苏区。但广东需要人，我们不同意他去。他有点不高兴。”麦蒲费只在学校里挂了个名，他几乎没有在学校上过课。

勳大党支部建立之后，王均予布置给我们几个任务：一是要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二是要扩大发展勳大的党组织。他还指示我们要尽量争取校方高层人士同情和支持学运。为了在社会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土华乡开办了一所乡村服务社，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

另外，我们还参加了“广州民众歌咏团”的活动。该团本来由广州基督教育年会主办的，其本意是通过歌咏活动聚集青年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当时“中青”领导人指示我们，凡有群众的地方，都应派人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于是，各大、中学校的“中青”中，有不少人参加歌咏团。

我们意图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组织吸引青年，推动他们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歌咏团聘请何安乐、陈世雄教唱歌，每周三个晚上集合唱歌，参加者十分踊跃，多达1000人以上，在进步青年的倡议下，歌咏团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等。参加歌咏团活动的人虽然为数众多，但它只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我们想把它改组成为一个有组织规章的团体。有一天，参加歌咏团活动的中青成员聚集在汉民路一间书店里开会。我们经过研究，提出建立歌咏团干事会。这个建议果然得到大数人赞成而得以实现。经

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吴奔流、李木子、汤宝楷、徐青等（还有几个人记不清楚）组成干事会。干事会以下，全团成员编成二十多个小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活动内容除每周三个晚上的歌咏活动外，还增加不定期假日郊游活动。每小组又以组长牵头，组织小组活动。这样一来，歌咏团就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从中培养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并为后来的抗日文化团体“艺协”的组成起过催生作用。

1937年暑假期间，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回乡，其中一部分党员学生也回乡去了。市委为统一领导留下的学生党员的工作，决定成立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由罗范群、张靖宇（张定邦）、李木子三人组成，罗范群为领导。罗召集我们开过几次会（大概每周开一次），我们分析了时局的变化，研究了一旦广州沦陷，应如何组织学生党员转移到农村去的应变办法。我们分头把学工委的一些决定传达到各校的支部。罗范群派我联系勳大党支部、小教党小组和一名姓钟的学生党员（名字忘记了）。小教（小学教师）党支部有吴奔流、李秀清、汤宝楷三名党员。吴奔流是负责人。

1937年暑假过后，我因在勳大毕业，到台山县国民大学附中任职。我利用假期回勳大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1938年2月，罗范群代表党组织将我调到开平县，参与该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开平。

（陆传光、卜穗文记录整理）

# 三十年代广州学 运及地下党斗争情况片断

李士洋

## 一、关于广雅“中青”和学生运动

我于1934年考入广雅中学，念高中一年级。1935年9月，同班同学尹焯辉介绍我加入“中青”。尹焯辉对我影响比较大，他把《社会学概论》、《母亲》、《生死场》等进步书籍拿给我看。那年中秋节，我同尹焯辉辩论了一场，我主张科学救国，尹主张革命救国。最后我被说服了。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尹焯辉介绍我参加“中青”时对我讲：“中青”全称叫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秘密革命组织。参加“中青”要经过严格手续，要填写申请表，要有“中青”盟员作介绍人，还要宣誓。我参加“中青”后，由尹焯辉联系我，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人。“中青”组织非常严密，内部实行单线联系，没有横的联系，所以广雅中学一共有多少“中青”盟员我不清楚。“一二·九”运动后，我发展胡泽群参加“中青”，由我负责联系胡。尹焯辉除发展我之外，还可能发展其他同学参加“中青”。因为没有横向的联系，所以实际情况不清楚。另外，“中青”领导人邱萃

藻同广雅高三同学黄文康有直接联系，黄毕业时同我联系，把初三级的“抗日五人团”名单交给我，所以我知道黄文康也是广雅“中青”成员。黄文康交给我的“抗日五人团”名单中，有陈枫、吴冷西等人。1936年，我发展陈枫参加“中青”，陈又发展其他“抗日五人团”成员加入“中青”。

我参加“中青”后，尹焯辉每星期都要同我联系一次，这是“中青”组织生活。内容多是谈政治形势和研究发展对象，还经常传阅一些秘密文件。一次，尹焯辉交一份秘密文件给我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们当时看到的是32开小油印本，这可能是“中青”秘密翻印的。

1936年9月，“中青”名称改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仍简称“中青”，并大量发展盟员。为适应形势需要，成立了“中青”广雅区委，由尹焯辉任书记。这个区委还领导西村一些学校（如勳大附中）的“中青”。胡泽群同志回忆说应叫“西村区委”。这个问题陈恩同志可能清楚。

胡泽群同志写的《1936、1937年广雅中学的学生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的情况》（载《广州党史资料》第十一期），谈到广雅学生参加1936年1月9日全市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事。关于这次示威游行，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事前，“中青”已秘密通知我们要积极发动同学参加游行。代表广雅出面同中大等校联系的，是高三级黄文康同学。黄文康在全国解放后曾对我说：当时“中青”有严密布置，不让我们低年级同学站在第一线是有意把我们隐蔽下来以免全部暴露。1月9日那天，高年级学生集中在操场军训，在黄文康等同学带领下，乘军训机会整队拉出校门。其他低年级同学则由“中青”等一些进步同学带头，分小批陆陆续续走出校门。这

时，一位姓何的校务委员带着一批班主任站在校门口企图拦阻，但拦阻不住。结果，全校学生 1500 多人，有 1200 多人参加了游行。没有参加游行的多是初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当日，我们在汉民路（现北京路）与中大等校游行队伍汇合，经南关、长堤，到达西濠口召开大会，曾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队伍经太平路、六二三路、下九路北上，到陈家祠附近，广雅学生留下召开大会，选举班代表。其他游行队伍则继续前进，后来到教育厅前示威，听说还摘下了教育厅的招牌。但广雅学生当时离开了游行队伍，所以没参加声讨教育厅行动。

## 二、关于“学筹会”（地下学联）

1936 年 9 月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同尹焯辉到青年会参加歌咏团活动，尹把我拉到厕所里，给我看一份秘密文件。这个文件有 32 开大小，题目是《为重建广东党组织而斗争》，下面署名是：“中共广东工作委员会”。尹又叫我写入党申请书，准备参加共产党。到了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中午，张定邦来到广雅，把我和尹焯辉带到校内湖心亭，这时四周无人，张定邦为我们举行了入党仪式。张作为入党介绍人和监督人，我同尹焯辉同时举行人党宣誓。我们的手微微举起，跟着张定邦念完誓词。誓词中印象最深一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36 年 9 月，尹焯辉对我说，经过广州各学生进步团体协商，打算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学筹会”）。待时机成熟时，即以此为基础，成立全市性的学生团体，像上海的“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那样。“学筹会”名称公开，组织秘密，由 30 多间有进步学生团体

的大、中学校推选代表组成。有人又称“学筹会”为“地下学联。”

当时，广雅也推选代表参加“学筹会”。广雅“中青”经过商量，打算推我为代表。当时，我们认为魏南金同学是“力社”的人，我们就推选代表参加“学筹会”一事同魏南金协商。征求魏的意见，魏亦表示同意我当代表。

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黄书光召集“学筹会”代表中的“中青”成员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教忠中学的王磊，勳大附中的陈恩，女师的邹××（后来据陈冠莹说她是钱兴的爱人<sup>①</sup>）等，还有其他学校的代表记不清楚了。黄书光说：在各个进步学生团体中，“中青”的人最多，“学筹会”应由“中青”掌握，要使“学筹会”按我们的主张办。会议决定：选举“学筹会”领导人时，推选罗范群为主席，推选“中青”的黄书光、李士洋负责组织工作。我们当时认为罗范群是“突进社”的人，推选他当主席是故意架空他，让“中青”的人管组织是掌握实权。另外，还打算推举中大学生钟××（名字忘记了）负责宣传工作。

一个星期后，“学筹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地点在越华路一条小巷中的一间小学内。参加大会的有30多人，坐满了一间教室。大多数是“中青”成员。会上首先选出若干委员（或叫理事），然后再从中选出五人为“学筹会”常委。当选常委的5个人是罗范群、黄书光、李士洋、钟××（还有一名记不起来了）。我们几名常委分工是这样的：罗范群为主席，黄书光、李士洋管组织，钟××管宣传。这个选举结果，完

---

<sup>①</sup> 经与钱爱人邹剑卿同志核实，参加“学筹会”会议与李士洋联系的都不是她，可能是女师的谭本基或李静音——编者。



全实现了上一次黄书光召集我们开会的意图。

参加“学筹会”成立会议不久，尹焯辉通知我们到中大一间学生宿舍开会。我按时到达，见到罗范群已在。原来这个房间是罗范群、杜渐蓬和钟××等人的宿舍。不一会，邱萃藻和黄书光也来了。之后，邱把罗范群、黄书光和我带到宿舍后面的山岗上开会。会上，老邱宣布由罗范群、黄书光、李士洋3人组成“学筹会”党支部，罗范群为党支部书记。我和黄书光才知道罗范群原来是自己人。自此以后，“学筹会”党支部领导“学筹会”一切工作，真正的“学筹会”常委却从来没有开过会。党支部的几个人分头联系各校的“学联”小组。罗范群联系中大；黄书光联系执信、教忠、知用、勳大和勳大附中；我联系女师、法政学院、广雅。我每个星期与女师联系一次，与我接头的女同学是邹××，戴眼镜的，当时，参加“学筹会”的各间学校都成立了“学联”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负责人。

“学筹会”党支部每星期开一次会。开会地点有两处，一是位于永汉路（现北京路）附近的市师，一是小北路的合浦学生同乡会。邱萃藻每次都来参加。他是代表党组织领导“学筹会”工作的。章汉夫是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代表，他于1936年的11月到广州，他也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在支部会上，我们把了解到各校情况向邱萃藻汇报，邱对很多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然后，我们又把支部会议的意图传达给各校的“学联”小组。

“学筹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各校发展组织，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没有搞过大规模的政治行动。1933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我们想搞游行，但又不知上级的意图，故没搞成。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国民党搞庆祝游行。我

接到上级指示，不参加这种游行。1936年11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起捐款援助绥远的傅作义将军抗战。“学筹会”支部也发动广州学生捐款。当时，广雅中学的右派学生企图侵吞学生会的出版经费。我在支部会议上把这个情况向邱萃藻作了汇报。经研究，我们乘机把这笔出版费拿出来，作为援助绥远的抗战捐款。

1936年12月，“学筹会”党支部认为应由“学筹会”统一领导各校的进步学生运动，建议解散各进步学生团体（包括“中青”、“突进社”在内）。因我不久即离开“学筹会”，故后来的情况不清楚。

（卜稳文、黄穗生、陆传光整理）

## 在省立女子中学参加 中共组织前后情况回忆

余 慧

1936年暑假我考上省立女子中学读高中。我初中在教忠中学读书，因为教忠属私立中学，收费比较高，而当时我家经济不富裕，因此，我一心扑在书本学习，渴望高中考上公立学校，自己认为要用功读书，将来学成能自食其力，不依靠别人。在课余时间我很喜欢看进步电影：《新女性》、《渔光曲》、《桃李劫》等；爱看冰心、巴金、矛盾的文学作品。对旧社会满目苍痍，民不聊生，贫富悬殊，男尊女卑，自己甚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一枪不发，把东三省送给日寇，对当局腐败无能，自己非常愤慨。

“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广东广大学生群众热血沸腾，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国民党当局极力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学们极为愤怒。有一次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教育长令各校放假，驱散学生，封锁校门，广州学生到教育厅找厅长质问。但教育厅官员走避一空，大门紧闭，同学们愤怒之下抬走了教育厅的招牌。我听到这事，感到十分痛快，拍手叫好。

1936年1月13日，发生了荔枝湾惨案。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广东当局血腥镇压，几十人负伤，血洒荔

湾桥头。我看了传单，心里十分愤怒，学生抗日救亡有何罪过，大敌当前，不打日寇，反而对爱国学生滥施毒打，十足汉奸嘴脸。

1936年暑假，广州成立民众歌咏团，地点在青年会，我和姐姐余慧珍一起去参加，进入会场马上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台上可能是中大的学生在演讲，谈到日寇频频侵略我们领土，国家危在旦夕，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凡是热血青年应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演讲者大声疾呼，台下听众深受感动，我是在民众歌咏团接受启蒙教育的。我十分积极参加歌咏团各项活动，歌咏团组织比较严密，把团员编成小组进行活动。我参加的小组成员有陈念华、陈兴中、洪文亮、洪文开、谭士伟、余慧珍等10多人，每周都到郊外开小组会，谈论国家大事，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抨击蒋介石不打日寇，专打红军，所谓要“先安内后攘外”。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谈论为什么捉了蒋介石，又把他放走呢？原来捉蒋是为了迫蒋抗日。陈念华经常找我谈心，对我进行个别教育，还给我看党的《八一宣言》，是个油印文件。我自参加歌咏团后，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要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黑暗透顶，实在令人失望。

1937年5月，陈念华同志介绍我入党，监督人是汤士（汤宝楷）同志，他当时讲：“从今日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那时入党没有候补期）。我当时很激动，暗下决心，做个党员，就要为党工作一辈子。入党后，由老麦同志领导，编入汪梅同志小组过组织生活。“七·七事变”后，组织上要我参加学生抗日救亡会工作。当时学抗会有陈能兴、陈恩、吴风珠、司徒艳等一批进步学生。在学抗会工作十分热闹，向

群众进行演戏、唱歌、举行游行示威等各种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由于广州遭受日寇大轰炸，好几间公立学校都迁到农村上课。女中迁到顺德良滘。暑假后，党组织要我回学校读书，在学校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女中当时只有我一个党员，我本来很想留在广州学抗会工作的，但党组织决定，我是坚决执行的。我的组织关系转给梁嘉同志，由他领导。

女中开学后，当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广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学校还是老样子，平静如水，一点抗日气氛也没有。女中学生从城市生活转到农村生活有许多不便地方，加上学校当局对学生生活关心不够，食水许多黄泥很不卫生，食饭不是分开每人一份，而是8人一桌，大家感到很不便，我们睡双层木架床，农村的旧祠堂阁楼比较低矮，当地坏人晚上伸只脚下来，吓得同学们大叫大闹，气氛十分可怕。在这样环境下，同学们意见纷纷，当时我和同班同学商量，要向学校当局提出意见，要求改善学习环境，要求建立学生抗日救亡组织。很快获得同学支持，高二两个班同学赞同后，联系高三级同学，大家同意就写了份书面意见，由我面交邓不奴校长。邓校长骂了我一顿。我讲：这是同学们大家的意见。当时，由于我们年轻，没有斗争经验，提出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罢食。事后，我向梁嘉同志汇报，他表扬我工作开展比较快，但告诉我，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要采用过火行动，不要提出罢食之类。有些事情可以团结同学自己进行。我回学校和同学们酝酿怎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建议晚上同学们自己组织起来，如有事就打响锣。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学校有些教职员也同情我们。

为了更好开展女中抗日救亡工作，经研究建立女中抗日

救亡工作团。内部分工：教育、宣传等，教育方面办了妇女儿童识字班，有个阵地经常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宣传方面比较活跃，组织过许多活动，经常学唱歌、学演戏。

1937年秋，淞沪会战很激烈，全国动员保卫大上海，学校奉命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并慰问各地驻军。学校为了鼓励学生下乡活动，规定参加这次宣传的学生将来算考试成绩的60%。因为番禺县政府中我们同学有个朋友，到那里工作比较方便，就选了番禺县。我们到番禺南村、石榴进行工作。向群众宣传要积极起来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大上海，并向驻军进行慰问，以鼓舞斗志。还参加了番禺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大游行。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我们串联了广雅、女师等学校学生，集中到顺德大良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发传单、贴标语，控诉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我们要为南京军民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群情十分激动，效果很好。

我们有些同学会演戏，特别是余志生（余珍）演戏内行，她当指导。我们先后排练了《张家店》、《东北一角》、《打鬼子去》等几个戏剧。我们学会演戏后，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增加了新内容，更能吸引群众，效果更好。我们曾经在学校附近进行过多次演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效果都比较满意。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同学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1937年秋，我介绍徐华淑、黄惠珍两位同学入党，建立了女中学生党支部，我当支部书记，随着工作不断发展，我们支部在1937年冬到1938年春再发展了几个党员：余志生、邓宝珠（邓宝）、梁××、程佩贞等。1937年秋，党组织告诉我，黄

云耀老师是党员，如有事可以和他商谈，由于有黄老师在教职员中进行工作，对我们工作开展帮助很大。

为了发展初中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组织高初中姊妹班联欢活动。增进友谊，加强团结，带动了不少初中同学和我们一起工作。

大约 1938 年春，我们知道日寇在战场上向八路军施放毒气后，满怀对八路军热爱之情，以党员为核心，再加上一批进步同学：孔庆余、李雪英、徐廉英、张月婵、梁玉兰、李素娴等组织起来，进行义演募捐支援八路军，购置防毒面具。从顺德乐从圩、龙江圩，到县城大良，再到中山石岐。在剧场上我们有募捐箱，随缘乐助。经过这段演出，收到 800 元。这是十分难得的，充分说明广大群众抗日热情很高。学校当局知道我们义演收到一笔款，要我们捐给抗日部队就可以了。我们认为捐给抗日部队让人不放心，钱是我们千辛万苦演戏得来的，一定要捐给八路军。我亲自将 800 元送到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云广英同志那里，拿回收据后，贴在学生会报告版上。

除了在学校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外，我们还进行如下工作。1937 年秋，党组织要我和对面里滘村小学老师范同志联系，协助开展女工工作，当时，顺德缫丝厂大多数是女工，有次我和同学到村里缫丝厂参观，看到女工在烟雾弥漫的开水里缫丝。手指汤得通红，有些童工不够高，还要站在小凳上操作。我十分难过，眼泪忍不住纷纷流下。我暗下决心要帮助女工学文化，提高觉悟，使他们懂得怎样才能解放。后来，我和范老师商量，决定开办女工夜校，我们同学当老师，每晚我们轮流到里滘上课。女工对我们十分热情，晚上我们就睡在女仔屋里，和她们谈心。我们到女工夜校上课是秘密的。

不能让学校当局知道，以免引起麻烦，由于有大批进步同学支持，办女工夜校事情，学校一直不知道。许多女工通过夜校学习，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范老师还发展了女工党员。1938年我曾经到范老师那里，请他找两位女工党员到省委机关工作。他介绍了霍静娴、霍静然给我。1938年暑假，我们一些进步同学帮助女工在顺德良滘建立了缫丝女工工会。在成立大会上女工自己主持，选出了工会负责人。大会还表演文娱节目，热热闹闹庆祝一番。

1938年暑假，我们高二结业，准备升高三时，学校当局把我们3个党员：余慧英（余慧）、徐华淑、余志生开除学籍，理由是行为不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学生，反而有罪被开除学籍。我们据理力争，上告教育厅。后来，学校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我们3人没有回校读书，都由党组织另外安排工作。学校工作由黄惠珍负责继续进行。1938年秋，国民党当局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到连县星子集训。黄惠珍和同学们一起去了连县，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在党组织的指引下，我们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在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下，成长了大批先进分子。她们后来都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为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回忆教忠中学党支部的 建立及活动情况

王 磊 张江明 袁鸿飞  
方 学 林 榆 陈坤仪

抗战前和抗战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市教忠中学党组织带领广大学生青年，展开了蓬蓬勃勃的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成为那时广州市青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回顾当年经过的历程，看看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前景不禁心潮澎湃，充满喜悦的激情，现就回忆所及，记下当年的一些情况。

## 一、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建立党组织

三十年代，教忠中学是广州市一间老牌子的私立中学（现改称为广州市第十三中学）。校址在闹市中心的文德路。学校分男女两部分。男女分班上课。就读的学生有广州市的，也有来自省内各县的，校长是沈伯宏，而实权掌握在他的妹妹，女生部主任沈芷芳手里。

教忠中学，在广州学校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和党组织都是比较早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多

次受破坏，后来全省党组织停止活动了。1935年下半年，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杂志发行网负责人王均予同志，因上海党组织被破坏而转来广州，他通过原来杂志发行网关系与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取得联系，进行活动，建立了一个进步团体——“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一说叫“中国青年共产主义同盟”）简称“中青”，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7月，王均予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在“中青”和学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同志到香港开展工作，在香港和广州进步青年中发展党组织，1936年下半年，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州市委相继成立，南临委由薛尚实任书记。教忠中学的党组织就是在南临委和市委的领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先是属于王均予领导的张定邦、王作尧等通过东莞同乡的关系，在教忠中学发展“中青”盟员。王作尧的妹妹王彩琪、弟弟王步尧和王磊一起在教忠中学读书，大家都是东莞同乡，同住在东莞“明伦堂”建的“学馆”中。他们是同乡、同学和邻居，志趣相投，互相了解。张定邦、王作尧和王彩琪同志对王磊等进行教育，宣传红军和共产党的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对党的认识，后来，王彩琪把喜欢阅读进步书刊的教忠中学同学——王磊、王步尧、方学（房学箕）组织起来，成立秘密读书会，由她作指导，同年下半年，由王彩琪介绍，王磊、王步尧和方学都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青”。不久，王彩琪离开教忠中学，改由张定邦同志直接和王磊单线联系。另一方面，中大进步学生虞焕章（杨康华）在教忠中学兼任教员，他在中大同学中组织马列主义行动团，学习革命书籍，寻找党

组织的领导。在教忠中学任教期间，虞焕章对张逸（徐静如）、胡明（李琼英）等教忠女生进行培养教育。而教忠男生卢子贤、张江明（张铭勋），由于参加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歌咏团和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艺协”）活动，认识了杨康华同志。教忠中学男女生严格分开，很少有机会接触。这时，通过杨康华同志，男女生便联系起来，统一行动了。虞焕章政治上坚强，立场坚定，观察问题敏锐，对人热情诚恳，密切联系群众。他组织和指导卢子贤、张江明、胡明、张逸等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概论》，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等。经常分析形势，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和投降卖国的不抵抗主义，阐明党的纲领、政策；还介绍卢子贤、张江明和陈汝棠认识，参加《学生战线》等刊物的编写工作，以进行培养、锻炼、提高。

卢子贤、张江明和王磊是同级同班同学，大家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参加了教忠秘密读书会。接着，又由王磊介绍参加了“中青”。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广州的青年学生立即热烈响应，连续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游行。

12月12日，中大和中大附中学生4000多人，首先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名教授邓初民等也积极参加，教忠中学学生在“中青”成员王磊带领下，以读书会成员为骨干在校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鼓舞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还将传单在教忠校内主楼的楼顶撒下来。在同学中引起极大震动。

12月31日，广州学生以中大学生为主体，举行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为了破坏游行，立即下令

全市各学校停课放假。封锁校门，不准学生停留校内。虽然教忠学校当局也执行了这个命令，警告学生不准参加游行。但是教忠的“中青”和读书会成员，以及一些积极抗日、意志坚强的同学，冲破了阻力，和执信、广雅、知用、大中、女师、庚戌等中学的部分同学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大家手持标语，沿途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一致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等口号，游行队伍派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他们对抗日运动，对华北自治表明态度；并对教育厅下令停课，封锁学校行动提出质问。

1936年1月9日，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侦知后，重施故技，下令市内各学校放假，封锁校门，驱散学生，教忠中学学生事先有了准备，进行了秘密串联，所以这一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比上一次多。情绪也更激昂。1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在长堤新填地广场举行了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大会由曾生（曾振声）同志主持，决议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一致通过，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外交政策，大会后继续在市内进行示威游行。

广州青年学生汹涌的爱国热潮和对反动统治的痛恨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惊，广东统治者遂从暗中破坏转为公开镇压。1936年1月13日，广东国民大学和附中学生又举行一次抗日示威游行。中大、勤大和女二中等学校近千人前往支援。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组织了一批武装特务，持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招牌，对参加游行的、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实行毒打和屠杀，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被逮捕。这就是“一·一三荔枝湾惨案”。那一天，王磊等

“中青”成员也带领一批教忠同学到中央公园前集中，准备参加游行，后来接到通知，说有特务破坏，游行停止举行，教忠队伍才解散。

接着国民党广东当局对广州学生运动实行全面镇压，宣布全市戒严，秘密逮捕进步学生。白色恐怖笼罩了广州城。王磊无奈到东莞农村暂避了一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表面上暂时趋向沉寂。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不但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而且使广大的青年学生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教忠中学的进步同学团结得更紧了，秘密读书会的成员也有扩大。大家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坚决抗日，才能挽救国家危亡。

1936年10月间，经王作尧同志介绍，张定邦同志监督，王磊首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王步尧、方学跟着参加了党。组成了党小组。仍由张定邦同志和王磊单线联系。

一直指导教忠中学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虞焕章于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卢子贤、张江明向他提出参党的请求，他当即同意作介绍人，于是，卢子贤、张江明和张逸、胡明一起参党。后来，为了使教忠中学的党组织统一起来，更好地进行工作和斗争，经“南委”研究，决定把虞焕章同志发展的党员转由广州市委领导。因此，1937年2月，卢子贤、胡明、张逸、张江明等在虞焕章家里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由广州市委青年部长张定邦同志作监督人，王磊作为接收新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仪式。

这里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和学习的是胡明和卢子贤同志。胡明同志为人爽朗乐观，热情活泼，精明干练，助人为乐，政治上坚强，又写得一笔好颜体字，打得一手好篮球，在同学中声望高；后来她去了延安，和薄一波同志结婚，解放后任

轻工部二轻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死去。卢子贤同志作风豪放，热情诚恳，对党忠诚，勇敢正直，大胆泼辣，有魄力、有胆识，抗战时去新四军，1938年冬担任连指导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教忠中学党的队伍扩大后，成立了党支部，王磊担任支部书记，张江明担任宣传委员。从此，教忠中学的学生运动有了党组织的具体领导，秘密读书会越来越扩大，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1937年暑假后，教忠中学学校当局因王磊撒传单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变相开除手法，不准王磊注册入学。王磊被迫停学，由党组织调出参加市委学运小组工作。教忠党支部改由张江明任支部书记，由市委梁嘉同志领导。

## 二、教忠中学读书会始末

教忠中学读书会抗战前和抗战开始时，以“中青”成员和党员为骨干，团结、组织教育了大批进步同学，成为党的外围，在抗日救亡的各项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为教忠中学中共支部的建立、发展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先后参加读书会的成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绝大多数都陆续成为党员。

在抗战前，读书会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大约隔二、三个星期就利用一个星期天，采取旅游的形式到越秀山上，珠江河面去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讨论红军北上抗日；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讨论哲学、经济学等命题。当时大家一致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教忠秘密读书会参加党领导下的广州秘密“学联”。秘密学联的会议，早期多由王磊参加，后期则由张江明出席。会议内容主要是分析形势，研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也部署一些全市性的工作和行动。张江明还跨学校参加中山大学附中由王炎光、徐可贞、简锡焯等组成的读书会。

为了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了反对国民党“尊孔读经”实行毕业会考以压制学生运动的政策，党组织通过读书会散发了不少传单。当时卢子贤认识的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周微雨、梁可明，她们写的美术字清秀端正，负责秘密刻写油印传单，为抗日活动作出积极贡献。

抗战开始后，党决定斗争方法由秘密转向公开，教忠中学读书会也由秘密活动形式转向半公开，那时教忠女中部同学陈坤仪住在惠爱中路（现中山四路）任葵坊。离教忠不远。她一个人据有一座祖传的两进独家独户。在她那里聚会、活动都很方便，大家称之为“大本营”。那时教忠读书会成员一下课就往“大本营”跑。商讨抗日救亡工作，有时干脆连课也不上，到这里自学，有段时间为了工作方便，张江明、方学、林榆、袁鸿飞（袁锋）、胡明、李静（李静筠）等索性搬到“大本营”里住，一群志同道合的十八九岁的青年人，聚在一起谈工作，谈思想，有说有笑。高兴起来，大家齐唱一曲《春天里》，有时林榆还发挥他的演剧才能，披起白被单表演《夜半歌声》。

抗战开始后，生活书店、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等进步书店，大量出售马列经典著作、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写的各种小册子和社会科学基础读物。读书会的成员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

病》、《列宁主义基础》、《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持久战》及《论党》、《红色文献》、《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入门》等书。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大家的抗日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读书会还不定期在“大本营”举行讨论会。讨论的问题是教忠中学党支部事先拟定的，目的是通过讨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澄清某些模糊思想和错误观点，待读书会成员思想明确后，再对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例如，当时流行国共合作是共产党阴谋手段的说法，读书会就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苏联进驻波兰，引起当时一些青年思想混乱。读书会就作了专题讨论。

1938年五、六月间，日寇对广州大肆轰炸，一天晚上“大本营”中弹被炸毁，幸而那天晚上住在“大本营”的人都因事离开，没有造成伤亡，由于那时读书会成员都已参加了青年群社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通过群众组织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被炸后，读书会也就停止了活动。

在教忠中学通过参加读书会和抗日救亡的各种活动，在抗战前或抗战初先后参加共产党的有：王彩琪、王磊、王步尧、方学、胡明、张逸、卢子贤、张江明、李静、陈坤仪、陈联新、袁鸿飞、陈慧娟、林榆、陈水清、戴旭光、张思忠、阮群英、余慧、饶奕昌等人（可能还有些记不起来）。

### 三、争夺教忠学生自治会领导权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炮声响了，出现了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的新形势，教忠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在教忠中学党支部领导下，首先进行了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

教忠中学学生自治会，名为学生自治组织，其实是学校当局的御用机构。学校把从学生中收取来的自治会费任意使用，并不用到学生会的正常活动之中。实际上大部分被学校中饱了。自治会的领导权向来由学校当局认为信得过的一些人把持。这些人也自甘做学校当局在学生中的耳目。

教忠中学党支部决定要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夺取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来展开全校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通过这个斗争来发动群众。党支部的意图首先在读书会成员中贯彻。在“大本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做法，决定由读书会成员在同学中广泛进行串连，大造舆论：要求改选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要求公布自治会的经费收支帐目，把会费移作抗日救亡活动经费。学校当局既害怕自治会领导权旁落，以后无法控制，也害怕公布自治会费收支帐，因为这笔帐实在见不得人。但是，由于很多同学不满学校中饱自治会费，纷纷响应我们的意见，学校当局被迫宣布了召开改选自治会领导机构大会的日期，意图扬汤止沸。

在改选大会前夕，党支部在读书会成员会议上，研究了斗争方法，作了周密的布置，要求力争把胡明等进步同学选进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里。认为不妨将体育部让出，而必须将与群众活动有关的学术部等掌握过来。胡明是校队女篮队员，在同学中较有声望，估计会容易当选，也较易为学校接受。

改选大会举行时，由于我们做了动员串连工作，到会的男女同学很多，把会场挤得满满的。会议由训育主任和原来自治会主席主持，他们提出采用口头介绍候选人后实行投票

选举办法。话音刚落，学校预先布置的一些人就高叫赞成，并七嘴八舌地介绍起候选人来，想操纵选举。我们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有这一招，用票选办法在票数上可能进行舞弊。于是由袁鸿飞先发难，反对票选，要求逐个介绍候选人，逐个举手表决；为了打乱他们阵脚，按原定对策，又提出在选举前先请主席公布上届自治会费收支帐目。一石激起千重浪。同学们热烈鼓掌，齐声拥护。接着党员胡明等读书会成员发言支持，和对方进行了面对面辩论。经过一番争论，在同学们热烈拥护声中，训育主任不得不避重就轻，撇开公布自治会费收支帐目的这件事，同意用我们所主张的选举方法进行选举。我们终于把预定的胡明等同学选进了自治会领导机构，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因为在改选会上，挫败学校继续把持自治会企图的发难人是袁鸿飞，所以在散会离场时，为学校所利用的一个大个子就动手打他。走在旁边的读书会成员陈水清也是一个大个子，见状立即举手招架，其他读书会成员和一些同学也聚拢来斥责打人行为。他见众怒难犯，才不敢再动手。

当广州学生准备举行纪念“一二·九”两周年抗日示威大游行时，我们用学生自治会名义召开了动员大会，邀请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民先代表，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吴华同志向教忠中学同学作报告。吴华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号召同学们发扬“一二·九”精神，动员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他的富有思想内容的生动讲述，大大鼓舞了同学们的抗日救亡热情。在我们用学生自治会名义要求下，学校当局也同意停课一天，让同学们参加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那一天，教忠中学参加游行的同学很多，盛况空前，对比两年前，学校当局执行国民党教

育厅命令停课一天，来阻挠学生响应“一二·九”示威游行的情景，教忠中学的学运随着历史的伟大潮流阔步前进了。

学校当局虽不敢再正面压制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但某些人仍在暗中进行破坏、阻挠。他们一方面散布流言，指名说一些进步同学是“赤党”，告诫群众不要和进步同学来往，妄图孤立、分化；另一方面在新学期开始时，不准袁鸿飞注册，拒绝他继续在教忠借读（袁原是圣心中学在教忠借读生），意图削弱斗争力量，他们的意图当然不能达到。

#### 四、从青年群社到广东省抗日先锋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广州市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我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斗争方法，也由秘密团体转向公开活动，鼓励参加公开的青年群众合法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展开抗日救亡工作。教忠中学的党员、读书会成员和一些同学主要参加了广州青年群社，是这个社各项活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张逸同志由党组织调去开展工人夜校和女工工作。

广州青年群社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余俊贤支持组成的。他自任社长，由他提供经费和社址。当时国民党在广州的各派系在抗战的烽火下，不敢再公开压制青年的抗日救亡要求，于是企图通过成立一些青年团体，如学生抗敌御侮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等来控制广州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并藉此掌握一些青年，培植自己派系的势力。余俊贤等的一厢情愿却在客观上为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参加青年群社的都是要求抗日，要求进步的青年，主要是广州各中学，如教忠、金陵、大中等校的中学生。

余俊贤虽然派了一些人做坐探，窃据了部分职位，但社员青年都鄙视他们，对他们敬而远之，把他们挂空了。在青年群社里，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社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王磊、陈中夫、谭丕桓、黄玄等人手中（黄玄原是党支部书记，因事先未经组织批准参加CC，后被市委开除党籍，改由王磊同志任支部书记），完全按照党的指示来开展工作。教忠中学的党员胡明、张江明等都是社里的骨干分子。

青年群社出版一本铅印的，名为《青年群》的不定期刊物，由谭丕桓同志主编。张江明、袁鸿飞被选为编委之一。这本刊物主要刊载宣传抗战、进步、团结的政论和文艺作品。袁鸿飞曾针对当时国民党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谬论，写了一篇关于革命三民主义的文章，国民党省党部派驻青年群社的指导员看后，指责文章内容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说这篇文章完全是共产党论调。袁鸿飞争辩说，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应精诚团结，自己只知道说中国人的心中话，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论调。那时国民党的反共面目还不敢公开暴露，结果只作些词句修改，仍在《青年群》上刊登。

1937年12月中，广东党组织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张江明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38年元旦，广州市8个青年团体发出宣言，号召有革命传统的全省青年集合到抗日先锋队中来。青年群社是8个发起团体之一，所以参加青年群社的教忠中学同学在抗先一成立时都参加了。

在此前后，中共北方局派于光远同志到广东准备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几间学校派代表成立“民先”筹委。教忠中学由张江明参加。后经中共广东省委研究，考虑“民先”已经暴露，广东已经建立“抗先”，不宜于

再成立“民先”。

那时，武装保卫华南的口号提了出来，教忠中学的抗先队员排了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记得好象是《八百壮士》），由陈水清和胡明担任男女主角，曾在净慧公园民众教育馆舞台和河南海幢寺里的会场公演，配合武装保卫华南的宣传。演出前和演出时，为了排练和公演，往往忙到深夜才回家，但谁也不觉得疲劳，在寂静的马路上，总是洋溢着我们愉快的歌声和谈笑声。

学习军事技术，学习游击战争理论，准备武装保卫华南，当时成为广大青年的共同要求，抗先总队部工委会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军事，邀请了八路军驻广东省办事处的云广英同志上军事课和政治工作课。他生动的讲述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故事；讲述游击队如何从无到有，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建立革命根据地；讲述游击队怎样同人民鱼和水一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讲述八路军和新四军如何经历艰苦的斗争历程而一步步地胜利发展。每一次讲话，会场上都人头攒动，坐无虚席，连通道和窗前都挤满了人。有一次，叶剑英同志也来讲课，大家争睹他的风采，情绪异常热烈。他热情亲切，循循善诱地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阐明八路军的英勇战绩，论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深地嵌印在每个青年的心坎里，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教忠中学的抗先队员都聚精会神听讲，细心笔记，在回家路上还兴高彩烈地谈论讲话内容。

抗先总队部工委会还有计划地举行军事演习，有时各队单独进行，有时大规模地联合举行。教忠中学抗先队经常演习地点是越秀山。当东方发亮，红霞刚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演习，在战斗中迎接初升的太阳。在演习完毕后，还往往

就地举行时事讨论，研究国际和国内重大政治问题，使军事学习和政治学习结合起来。当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心愿：到延安去，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到前线去，拿起武器消灭敌人。后来，方学和卢子贤幸运地实现了愿望，先后分别去了延安和新四军。

1938年5月至6月的1个月里，日寇对广州进行大规模轰炸，在市区里，大批房屋被炸毁，不少市民被炸伤、炸死。教忠中学的抗先队响应抗先总队部工委的号召，积极参加了防空救护工作。经过几天时间的防空救护训练后，大家就勇敢地去执行任务。每当警报发出，教忠中学抗先队员就集中起来，在指定地段担任防空救护工作，负责维持秩序，指导市民疏散掩蔽，侦察暗藏汉奸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动，协助捉拿汉奸。空袭过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救护工作，在倒塌的房屋救出被震昏的、受伤的市民，替重伤的包扎好伤口，送去医院治疗，并通过现场情景，向群众宣传敌人的暴行，宣传动员起来武装保卫华南，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

1938年“八·一三”周年纪念时，广州举行了爱国献金运动，号召群众有钱出钱，行动起来支援抗战。青年群社所负责管理的中央公园前的献金台，分配教忠中学的抗先队员负责接待和宣传工作。我们看到一些衣服破烂的工人来献出自己一元几角的血汗钱，看到黄包车夫汗淋淋地把刚赚到的几十个铜元献出来，看到一些儿童来献上自己一角几分糖果钱，看到一些妇女来献上自己心爱的金首饰时，热血不禁沸腾，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设在西濠口的献金口，规定有一天专为八路军、新四军献金，教忠中学的抗先队员在特定的那一天到那里献了金。

1938年夏秋间的一天，为了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封闭

新华日报广州分馆和非法取缔“民先”、“青救”和“蚁社”3个进步的青年抗日团体的倒行逆施行为，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名义，在现永汉戏院对面的哥伦布西餐室五楼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招待各报刊记者和各界抗日团体负责人，阐明我党坚决抗日、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言行。事先估计到国民党特务一定会进行捣乱，教忠中学党支部接到通知，动员党员和抗先的骨干分子参加招待会，协助维持会场秩序，对付特务捣乱，保护廖承志同志的安全。当晚，哥伦布西餐室五楼挤满了人。10多个国民党特务占了中间两张桌子。每人面前放1本《三民主义》或《总裁言论》，摆出有意挑衅的架势。共产党员和抗先队员有意识地围坐在他们四周，把他们紧紧包围在中间。招待会由廖承志同志主持。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左”的和右的两面手法，企图挑起事端达到捣乱会场目的。他们有的以“左”的伪装出现，提出反对国民党强迫学生军训，搞法西斯压迫；有的以右的面目出现，污蔑共产党破坏团结，搞封建割据，是汉奸行为。廖承志同志站到凳子上用广州话讲话，阐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指出：现在全国抗战，人人都有保家卫国的职责，青年学生应该参加军训，学会一些军事知识。至于军训中的缺点，可以向当局提出意见要求改善，揭穿了国民党特务存心挑拨的阴谋。廖承志同志又理直气壮地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日，团结抗战的主张，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最民主的地区；如果日寇打到广东来，我们共产党员一定到前线浴血奋战。他要求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抗战到底，并揭露真正破坏团结抗战的是国民党中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和对共产党进行造谣污蔑的人，他的爽朗而有顿挫的声调，鞭辟入里的分析，深深抓住

了听众的心弦，赢得了长时间热烈鼓掌。在场群众都用愤怒的目光瞪着特务们，他们慑于群众的威力和廖承志同志义正词严的痛斥，不敢再捣乱，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这次招待会宣传了党的主张，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 五、到农村去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积极组织与号召各学校中的党员、抗先队员以及青年学生，利用寒假、暑假和其他时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深入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指示，教忠中学的党员和抗先队员，在1937年冬的寒假和1938年夏的暑假，先后两次到顺德西海和路尾围一带工作。

1937年冬，广州市学联和广东省抗日先锋队号召组织学生寒假回乡服务团。继承“一二·九”运动的革命传统，到农村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教忠中学进步学生，由党支部书记张江明、支委胡明、李静等同志带领，组成教忠中学学生寒假回乡服务团，到顺德县西海、路尾围工作。参加的男女同学约20人。分为两个组：李静等到路尾围；胡明等大部分留在西海。这些人中有中共党员，有抗先队员，也有一般群众。因为抗先队员占参加者绝大多数，所以抗先工委给了一个独立第二队的番号。

参加教忠学生寒假回乡服务团的，现在记得的有：张江明、胡明、李静、陈坤仪、容碧、陈水清、林榆、方学、陈光中、梁静山、袁鸿飞、李鸿标、司徒贞、戴旭光等（还有些记不起来）。

到达顺德西海乡后，由当地乡政府安排集中住在涌边一



间大祠堂里。服务团全体成员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革命积极性，立即投身抗日宣传活动，贴标语，出墙报，演话剧，动员群众起来抗日救亡。晚上则在驻地祠堂的大厅上表演歌咏，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每晚汽灯一亮就有不少农民前来，一些妇女和小孩也来凑热闹。服务团成员轮流向农民讲解国家大事，说明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事迹，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在晚上的口头宣传中，农民群众都很有兴趣地听我们演讲。我们发现有一个中年农民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中等个子，身体健壮，额上布满饱经风霜的皱纹，眉宇间流露出朴质与热情，他一连几晚，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迟，对我们讲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事迹似乎格外感兴趣，间中还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解答。我们和他攀谈起来，知道在进乡时，他接待过我们，叫陈九，以租种耕围为生。我们就叫他九叔。有时他深夜不走，说话吞吞吐吐，象有满怀心事而又不肯随便向别人吐露。这种现象引起了我们注意，在党支部和服务团工作会议上都作研究，决定进一步和他交往，取得他信任，揭开这个谜。

顺德在大革命时期，有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展开过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农民斗争。九叔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顺德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大革命失败后，农会会员受到残酷的屠杀，他幸免于难，被迫出外流亡了一个时期。经过我们一段时间深入工作，九叔开始信任我们，有一天下午对我们表示有事商量。这一次由胡明等几个和他交谈，九叔这才把自己的经历和路尾围农民正处在地主夺佃危运中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原来西海、路尾围一带的田地绝大部分为地主所占有，路尾围的田地全部属于地主的，围里耕种的几十户农民都是贫苦佃农。他们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里规定：当农民承租到地主土地的时候，才可以在属于地主所有的围基上搭盖茅屋居住。如果地主收回田地，农民不但生活无着，而且还得马上搬家，陷人流离失所的境地，所以这里的佃农又叫“水流柴”（象在水上漂流的木柴一样居无定处）。路尾围附近的和隆围有五百亩桑基鱼塘，是碧江大地主苏照林的田产，一向由路尾围农民和部分西海农民承耕。那时原租约已满期，地主苏照林要加租，不答应加租就夺佃。路尾围农民在残酷剥削下，已经是“挂起禾镰无米煮”，如再加租就更无法生活；若不答应加租，有六十户农民将失去耕地。由于路尾围农民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大革命时期已有党组织活动，农民运动很活跃，所以这里农民有革命传统，富有斗争精神。而九叔为人正直，有组织能力，是全围农民公认的带头人，他也是和隆围承耕农民之一。当时他正为不知怎样领导农民进行斗争而苦恼。

回乡服务团里的党支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由张江明主持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必须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保障佃权。一方面农民应该交租，另一方面地主不能加租夺佃。我们要坚决支持路尾围农民反加租、反夺佃斗争。讨论后马上派党员回广州向省委青年部和广州市委汇报请示（这时教忠中学党支部由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同志领导，同省委青年部也有联系）。上级党组织决定以回乡服务团名义支持和领导农民这一正义斗争，同时指出在斗争中要充分发动农民斗争，采取合法的形式，运用国民党的有关法令和孙中山三

民主义中有关土地的主张，同对方进行说理说法斗争。

于是，回乡服务团一方面向九叔和路尾围农民明确表示了态度，和他们研究了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和地主据理力争。同时加强服务团在路尾围的工作人员，增派方学、林榆等到那里工作，协助农民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由胡明等作为服务团的代表去见国民党顺德县党部书记长，要求县党部出来主持公道。这个县党部书记长不但不肯主持公道，反而训斥我们多管闲事。后来派李静、袁鸿飞回广州，向党组织汇报。通过青年群众和抗先的关系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余俊贤的工作，请他给予支持。余俊贤为了拉拢青年，树立自己的势力，同意由省党部发函件指令顺德县党部妥善处理。

为了揭露地主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二五减租”政策，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争取社会同情和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服务团组织了路尾和西海农民到顺德县政府、县党部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农民的租佃权。那一天路尾围和西海数百名农民，扶老携幼举着标语在县政府所在地大良的街上游行。服务团成员也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了请愿和游行。

在省、市委的正确领导，党支部的认真贯彻和西海、路尾围农民坚决斗争下，碧江大地主苏照林被迫让步。同意由顺德县党部主持，主佃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在此之前曾由三区区长欧兆万主持在陈村举行过一次谈判。双方各持己见，谈判破裂）。在谈判前两天，先进行了练兵，由服务团的同志扮演地主和农民代表杨森、陈九等进行谈判演习，假扮的地主提出各种刁难的问题，由农民代表据理争论。谈判那天，农民方面由杨森、罗享、陈九、梁虾、梁安、郭胜、梁锦等当代表。服务团方面全体成员都参加，个别用公开身份参加，大

多是穿上农民的衣服，以农民面目出现。谈判地点是碧江地主家里。大地主苏照林由丫环、帐房簇拥着睡在烟床上抽鸦片，天井里站着几个佩带驳壳枪、挂着子弹带的人护卫，态度十分高傲、气焰很嚣张，故意问服务团的代表是什么人，去干什么。我们说明身份后，他就疾色厉声地说：他们主佃纠纷，不关我们事，拒绝我们参加谈判。我们当即严词驳斥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主佃纠纷不单纯是地主和农民双方的事。农民生活无着就无法抗日救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抗日救亡，理应过问。我们拿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主张，以及抗战建国纲领的有关规定，同他进行说理斗争，认为一定要保障工农生活，执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绝不允许地主加租夺佃，使农民生活无着，影响抗日救亡大业。杨林、罗享、陈九代表西海、路尾围农民坚决表示，不惜鱼死网破，誓死不加租、不退佃。地主被我们驳得理屈词穷，又见农民态度强硬，才开始软化，最后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做好做歹，调解一番，地主才答应不加租、不夺佃，照旧由原佃户承耕。一场斗争胜利结束。

西海、路尾农民反夺佃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抗日积极性，很快建立了西海、路尾围农民抗敌后援会和抗先等组织，有二百多人参加；也密切了农民和我们的关系，尤其是路尾围的农民更把我们看作亲人，那里的工作也格外顺利，还成立了儿童团和歌咏队。《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的歌声响彻了田头村间上空。

服务团在西海工作时，还到附近的桃村、陈村、碧江、古坝等进行抗日宣传，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服务团第一次在西海大约工作两个月，最后举行了一次

西海各界抗日救亡动员大会，除了西海、路尾围农民抗敌后援会全体会员、西海小学全体师生外，西海乡各家各户都有人参加。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近千人的队伍举着彩旗，高呼口号，浩浩荡荡游遍了西海的大街小巷。在游行队伍里，有农民表演的狮鼓，还有服务团扮演的化妆活报剧，沿途群众围观如堵。据说这是西海空前的一次大集会、大游行。

这段农村工作的实践，首先给教忠中学的党员和回乡服务团成员以很大教育。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农村和中国农民的认识；深刻体会了农民反抗压迫剥削的坚强意志，抗日爱国的无比热情和勤劳朴素的作风。其次，通过这段工作，建立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顺德县第一个恢复活动的党支部。回乡服务团党支部在路尾围工作过程中，发现有3个大革命失败后在西海、路尾围隐蔽起来的党员。他们是省港罢工工会干部杨森，曾在省农民协会工作的罗享（罗善余）以及曾是乡农会委员兼农军队长的梁虾。经过服务团里党支部研究和向上级党组织请求后，恢复了他们的关系。正式恢复了党组织活动。接着又发展了陈九入党，成立了西海、路尾围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开头由教忠中学党支部负责联系，广雅中学迁到顺德后，省委指示这个党支部改由广雅党组织负责联系。一九三八年夏，由张江明把这个党支部关系转交给了广雅中学的王万吉同志。当时王万吉同志是中共南顺工委负责人之一。以后，这个党支部在地方党委领导下有很大发展，吸收了一批党员，也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保卫家乡，扩大革命力量的带头人和组织者。当日寇铁蹄践踏珠江地区时，西海农民奋起保卫家乡。西海成为珠江纵队一支队前身——广游二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农民群众与游击健儿结成铁的阵线，击退日寇多次袭击，取得著名的西海大捷的胜利。

利。路尾围更成了我党活动可靠的堡垒村，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时，一连三天的会议就在那里的茅屋搁楼举行。我党在顺德组织武装队伍也经常把西海、路尾围作为基地。

# 冯道先传略

黄穗生

冯道先字德新，1905年生于广东合浦县闸口乡山背村一户小康之家。在家中兄弟5人中，冯道先排行第一，为长子。他从小聪明好学，自小学到中学，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20年秋，冯道先远离家乡，来到廉州省立第十一中学（后改名为廉州中学）就读。由于他待人热情有礼，学习成绩又好，故年年都被同学推选为一班之长。1923年秋，冯道先中学毕业，随即考进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此时，他家道中落，生活境遇窘迫，在高师仅读一年便不得已而忍痛弃学，回到家乡当小学教师。他21岁这一年，与北海一女子结为夫妻，后生下两子。

冯道先平日喜读新兴社会科学，思想进步。在中学时代，他目睹家乡旧教育制度之腐败，认为非加以根本的改造而不能造福于国家。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在师长陈铭枢率领下攻占合浦，提倡反帝反封建，推行国民革命，于是，思想进步、年刚20岁的青年教师被任命为合浦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为实现打破封建制度，创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抱负，冯道先与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加入国民党，并以学校为阵地，推行革命教育，倡导妇女解放。他激进的革命活动，招致来农村封建势力的迫害。一些思想陈腐的乡绅对冯道先恶意中伤，使

他不得不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派农讲所学员苏其礼到合浦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冯道先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投身农民革命运动。他认定封建迷信是农民接受新思想的障碍，故联合一班进步青年朋友和学生宣传科学，反对迷信，捣毁菩萨，没收庙宇，把县城和石康等地庵堂庙宇里的许多泥菩萨砸烂，清除这些长期愚弄农民大众的封建偶像。他还在闸口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与乡村土豪劣绅作斗争。

然而不久，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了，“清党”的黑风恶浪很快卷进合浦。这一年9月，冯道先因积极参加农民革命运动，被国民党右派指控“信仰社会主义”而逮捕入狱，其家人也因而受牵连，父亲被打入牢房，家中仅有的几亩瘦田被霸耕，两头耕牛被抢走。在亲友的营救下，冯道先渡过一个多月的牢狱生涯后获释。为生计，他不得已再度离开家乡到了新会县，先后任县立中学、师范学校教师，女子中学代理校长等职。在新会县任教期间，冯道先仍致力于国民教育。他教三民主义，强调“国内各弱小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完全解放”；他教国文，选用的教材是郭沫若的《牧羊的少女》等新兴的革命文学。1929年，冯道先受聘于合浦一中任教，他一面教书，一面筹办“绿波书社”，向进步青年推荐进步书籍，宣传革命思想。他曾对一些知己者说：“现阶段的教育制度，根本不能给我们以活的知识，我们要自己努力去求知，最要紧的是把握正确的理论。世界是理论与实践的产物。”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冯道先在乡亲好友的资助下，于1933年秋再到广州，入中山大学社会系就读。这时，经过大



革命暴风雨洗礼的冯道先政治上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以其待人诚恳热情及对时事精辟的分析、深刻的见解，很快为同学们所敬重，人们都尊敬地称呼他为冯大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破东北三省，并随时威迫华北。冯道先眼看祖国大好河山日渐沦丧，同胞饱受亡国之苦，深感中华民族的危亡到了最后关头，抗日救亡不能再犹豫了。他常对同班好友说：“在反动的汉奸支持下是不会抗日的，抗日的责任只有广大民众才能担负起来！”

1935年春，冯道先与钱兴、周学谦等人组成“反帝反封建大同盟”，为推动群众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工作。大同盟很快在中山大学、中大附中、国民大学等校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并吸收了纺织厂、橡胶厂一批工人入盟。大同盟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国，而在陈济棠统治下的广州，抗日救国被视为非法，因此，为了保护 and 积蓄抗日力量，冯道先等人决定采用分散隐蔽的秘密活动方式，以单线联系和小组活动相结合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广州学生迅速作出响应，12月12日，中山大学学生2000多人举行抗日集合，并列队从石牌步行至广州示威游行。各校也纷纷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随后，广州学生又于12月31日和1936年1月9日再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冯道先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负责中大抗日救国会《抗日月刊》的编辑工作，为宣传发动群众，他常常通宵达旦地修改文稿、撰写文章。他还被委任中大抗日救国会组织部校外联络员，并担任中大学生纠察队队长。每一次集合或游行前，冯道先总是积极联络各校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盟员和爱国学生，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集会或游行期间，他又

率领中大几十名纠察队员维持秩序，请同学作抗日救国的演讲宣传。他工作踏实，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同学们夸奖他，他总是说：“只要各人都能尽点心力，对于整个的救亡运动有所贡献，旁的所谓权利、风头都尽可以不必过问了。”

中大学生经过3次抗日示威游行后，校抗日救国会组织同学下乡宣传，以便使抗日救亡运动从中心城市推向广大的农村。冯道先受命与百多名同学一起留校负责后方事务。1936年1月11日，冯道先等留校人员接到位于广州荔枝湾的国民大学同学邀请参加该校抗日救国大会的来信，函称定于13日上午10时开会，会后联同各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冯道先与留校同学阅信后，认为抗日救国义不容辞，决定选派六七十人前往参加。12日，冯道先仔细地计划参加游行事宜，直至深夜，仍为安排游行的工作而来回奔走。

1月13日上午，冯道先率领中大同学，分乘3辆校车浩浩荡荡驶往国民大学。抗日救国大会后，同学们列队走出校门向市中心进发，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冯道先手执号筒，时而带领同学高呼抗日口号，时而指挥队伍有秩序地行进。队伍行至荔湾桥头时，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国民党特务、侦缉以及雇佣的打手，乔装打扮成“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插进游行队伍，然后掏出铁尺，抡起竹竿，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大打出手。冯道先凭着他刚健的体魄，赤手空拳与几名手执武器的打手搏斗，毫无惧色。1000多名爱国学生也一齐奋力还击。经半小时的搏斗，“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终于显得力不能支，遂拔出手枪射击，驱散学生。混乱之中，冯道先、吴近保、杨鉴培等人被绑架。他们先是被秘密关押在白云山能仁寺内，后又转移到黄冈、芳村、省公安局等地，途中两个多月，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荔湾惨案”发生后，中大全体留校同学在石牌召开紧急会议，随即赴西南政务委员会质问惨案发生的真相，并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同学。中大爱国师生又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营救被捕同学。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吴近保、杨鉴培等人，但冯道先却仍被关押在省公安局。7月19日，陈济棠倒台前夕，广东省公局长何肇亲自下令，将冯道先秘密枪杀于广州市郊黄花岗。

冯道先为抗日救国而遭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消息传出，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无不为之感到悲愤。11月25日，中山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及广州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在中大礼堂为冯道先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运动捐躯的英勇斗士；愤怒控诉反动派屠杀爱国民众的罪行。

# 邱萃藻传略

温盛湘

邱萃藻又名郁文，党内曾用名马超、麦蒲费、柏舒。1914年11月29日，他出生在南雄县全安乡廓公岭村一个封建大家庭，父亲和两位叔父都是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家热心办地方教育事业，在20年代后期办起私立英明中学，直到日军占南雄时停办。萃藻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幼年在家塾就学。1927年下半年，他随两个叔父到广州，考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初级班，1930年上半年毕业，后考入广州市立第一中学高中班。他虽然学习理科，却用较多的时间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文学书籍，并爱好写作新诗，从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扩大侵略战争，武装进攻上海。虽然在抗日军民坚决抵抗下，有所打击日军嚣张气焰，但是，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紧迫。特别是全国青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促使邱萃藻加深认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邱萃藻还从1932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的“福建事变”及广州“文总”、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等左翼抗日团体活动中，

得到启发，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上半年，邱萃藻在广州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考进勤勤大学。这时，他与上海的临时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长王均予取得联系，成为王均予负责出版发行的《时代文化》读者会在广州方面的负责人。《时代文化》读者会本身是一个读书会，同时又是中共领导下秘密推销党的刊物和马列书籍的地下发行网，由此，邱萃藻得到《红旗》、《红军捷报》等进步报刊，以及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领会，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热切向往和追求。

1935年，上海临时中共中央被破坏。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王均予以7月底只身转移到广州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到广州以后，首先找到了邱萃藻。邱萃藻节约生活和求学费用，安排王均予的生活，并积极协助王均予在广州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经邱萃藻的介绍，王均予认识了勤勤大学的林振华、中山大学的钱兴、曾生、粟稔，以及梁湘、梁奇达、李锦波、黄书光、周明等一批进步学生骨干，他们大多数都是原《时代文化》读者会的会员。8月，邱萃藻和王均予商议决定，在原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青年同盟”（又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简称“中青”）。“中青”不再是党的地下发行网，而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秘密青年革命组织，邱萃藻还与王均予、钱兴一起，根据当时看到的党内文件中提出的反蒋抗日任务，讨论决定了广州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发展“中青”组织的一些具体措施：（一）由王、邱、钱3人形成“中青”的领导核心，集体讨论工作，在有“中青”盟员的学校建立组织联系，取

得行动一致。(二)扩大宣传教育,逐步发展组织,建立组织生活制度,逐步克服自由散漫的状态。(三)围绕抗日反蒋这个口号开展抗日宣传,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传红军长征胜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四)建立外县工作的基础。(五)取得与中山大学进步教授和其他群众团体的联系。经过邱萃藻等人的共同努力,至1935年底,“中青”的组织已遍布广州的中山大学、勳勤大学、中大附中、广雅中学等大中学校,以及广州外围的东莞、中山、新会、江门、合浦、高要、石井等地,盟员达140多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3000多人冒着北国零下20多度严寒,手挽着手,高呼口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封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消息传到广州后,邱萃藻立即与“中青”成员和其它秘密的革命组织一起,发动群众热烈响应,在广州先后举行了“一二·一二”、“一二·卅一”、“一·九”、“一·一三”等4次抗日示威游行。第一次游行时散发的宣言,就是由邱萃藻和王均予、钱兴3人共同起草,在广州市大石街秘密刻写油印的。前3次游行,邱萃藻都积极参加,并在队伍前后来回奔走指挥。1936年1月13日,国民党当局派出侦缉、特务,雇佣了一批打手,打着“广州市民抗日救国锄奸团”的旗号,在荔湾桥袭击学生,使数十名学生受伤,制造了“荔湾惨案”。之后,邱萃藻一方通过各大中学校的“中青”盟员组织发动群众,向策划这一惨案的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又布置青运、学运的骨干转移农村,开展抗日宣传,促使广州抗日救亡运动向农村深入发展。

1936年5月,王均予到天津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先在“中

青”盟员中发展党员。7月，王均予回到广州，向邱萃藻讲述了在天津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的情况和准备在广州建党的设想。邱萃藻终于找到了一直苦苦寻求的共产党组织，十分高兴，当即向王均予诉说了自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很快，他就成为王均予在广州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的其中一员。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邱萃藻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勤勤大学建立中共支部之后，邱萃藻被委任支部书记。为使党的组织从广州中心城市向农村扩大发展，王均予决定设立外县工作委员会，由邱萃藻、张定邦、温焯华3人组成，邱萃藻为外县工委的主要负责人。邱萃藻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对工作更加认真和深入细致。有一次，他向周明了解情况，知道开平县长沙师范学校有几个思想进步的学生，立即请周明写了介绍信，派人往开平与他们接触，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不久就在开平建立起党的组织。在邱萃藻的领导下，外县工委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东莞、中山、新会、开平、南海等县先后建立起党的组织，发展党员100多人，从而为中共广东省委的重建打下了基础，也使党的工作从城市发展到了农村。

由于邱萃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当时的勤勤大学当局所不容，被开除学籍。1936年秋，邱萃藻考入广东法科学院，但因忙于革命工作时常缺课，故不久又被学院勒令退学。1937年初，邱萃藻转入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就读，以读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12月，经南临委同意，中共广州市委正式成立。新成立的广州市委由5人组成，王均予任书记，邱萃藻任宣传部长。革命

斗争的锻炼，使邱萃藻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党内很多人都认为要杀掉蒋介石，但邱萃藻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全国政治形势进行仔细的分析之后说：“估计党中央是不会同意杀掉蒋介石的，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杀了蒋介石，不仅不能促进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到来，相反，会招致更大的分裂，给日寇以进一步亡我的可乘之机，将会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后来的事实证明，邱萃藻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准确的。可见，他在政治上确实比当时一般年青人更为敏感和成熟。

1936年底，中共广州市委决定领导青年抗日团体打破以前小圈子活动方式，争取从秘密走向公开，从非法转为合法，从消除各团体间的门户之见到统一步伐。邱萃藻积极贯彻党的工作方针，在建筑、邮电、打铁、制鞋等各行各业的工人中广交朋友，以团结更多的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还积极组织和领导了当时的“浪潮剧社”、“广州民众歌咏团”以及“锋社”、“艺协”等以青年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团体，并经常亲自撰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进步青年编好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为《游击队》撰写和修改文稿。他有宣传组织群众的才能和魄力；对同志和蔼热情，平易近人的作风；对工作积极负责，认真细致的精神，在党内的青年同志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全国抗战爆发后，广州青年群情激奋，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去。邱萃藻和市青委的同志积极领导各校党支部，巧妙地利用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成立了许多青年抗日组织，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937年秋，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同志到广东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他从广东的



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由“救亡呼声社”、“学抗会”、“青年群社”等8个青年团体发起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作为广东省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统一组织。“抗先”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取得了合法地位，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抗先”在东、西、北江及粤中各县，发展成为拥有2万多青年成员的组织，为后来广东各县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准备了骨干力量。邱萃藻长期领导广州的青年学生工作，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他被委任为省委青委书记。在“抗先”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他都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为“抗先”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正当邱萃藻专心致志地进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工作时，他身患的恶疾发作。党组织对他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指示他回家乡去，一面医治疾病，一面指导南雄的抗日救亡运动。

邱萃藻虽然多年在广州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但他一直关注着家乡人民的抗日斗争。早在1936年间，邱萃藻就在广州“南雄旅省学生会”的学生中，吸收了张尚琼、邓勋芳、董永雄等一批南雄籍的先进青年加入“中青”。1937年6月，他一度返回南雄，与进步学生徐道昌、李宏华、李偕贤、邱应扬等人联系，组织读书会，筹办“抗战书店”，组建秘密的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8月，邱萃藻根据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认为“民先”是一个秘密的先进群众组织，不利于广泛团结青年群众参加救亡运动，遂指示南雄方面将“民先”改为“抗日同志会”。1938年春，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后，邱萃藻再次回到南雄，指示将“抗日同志会”改名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南雄县队”，以取得

公开合法的地位，更好地带领广大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秋，抗先队南雄县队筹备就绪并开展工作，队部设在县城宾阳门外的关帝庙，队员很快发展到500多人。

对家乡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邱萃藻也时刻记挂在心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曾写信给父亲，主张把家中的田产卖掉一半，将所得资金用于开办农民合作社。他在信中还提到，入社的贫苦农民真正有困难时，可以到合作社赊购生产、生活用品，有钱时才偿还欠款。如果真正赤贫，无力偿还欠款的，则可以减免，用合作社售出货物所得微利来填补欠款亏损。

这一次，邱萃藻因病回到家乡南雄，首先关注的仍是家乡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进展情况。他直接参与指导抗先队南雄县队的工作，使南雄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他们利用假日，在教师和学生中组织宣传队，到城镇、墟场、农村书写“坚持抗日持久战！”、“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妥协！”等标语，用演讲、出壁报、开展歌咏活动、演出话剧等形式，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还为慰问抗日伤病员募捐款项。当时，南雄县城成昌祥饼铺捐献了糕饼，在同盛戏院义卖，珠玑乡奥里元村农民举行木柴义卖，得款都用在慰问抗日伤病员方面。邱萃藻还支持南雄县抗先队队员集资开办抗战书店。抗战书店办起来以后，出售进步书刊，对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救亡运动，参加革命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39年下半年，抗先队南雄县队被国民党当局停发宣传经费，进而阻止抗先队工作，破坏抗先队声誉。上级党组织针对发生的情况，部署疏散了抗先队当中的党员骨干和活动积极分子，至此，抗先队南雄县队的工作才告终止。

邱萃藻回到南雄家中一面治病一面工作期间，还协助省

委训练党员干部的工作，为抗战和革命培养一批骨干。1939年冬，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组织大发展的情况，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以适应形势需要。省委得到邱萃藻的协助，由他争取他父亲同意，利用了他家的住房、物资等，在南雄县全安乡里岗岭炮楼办了一期县级以上党员干部训练班。这个班举办时间长达半年，办班期间，邱萃藻在后勤和保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家和附近的一些地方，是地下党活动的良好隐蔽点，党中央从延安派谢立全来广东工作，就曾经在他家隐蔽，住了一段时间。

邱萃藻回南雄时，曾在他家开办的英明中学兼教，平常则按照当时教育部门规定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授课，遇到体育课或课外活动时，则带学生到野外，既活动又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这间学校一些学生受到教育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0年1月，邱萃藻的病情日益严重，但是，他还经常为党的工作操心，过问工作。有时，上级领导同志或其他同志到他家居住，向他传达党内文件，与他研究工作，他总是认真对待。

1940年4、5月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人倡导的“工业合作运动”已有较大发展，还设立了“东南工合办事处”。办事处努力开展各地工业合作运动，借用邱萃藻家作办学的校舍，办了两期培养工业合作运动的“培黎技术学习班”（路易·艾黎的老师名“培黎”，办班用这名字有纪念意义），由共产党员毕平非、勇龙桂主持。邱家的人按照萃藻的嘱咐，给予办班的各种方便。

1940年12月16日（农历庚辰年11月18日）晚上，邱萃藻在家中病危，临终犹念及为党工作的同志，他向家人嘱

咐：“以后如果有我的朋友寻找到来，要热情接待……”

邱萃藻逝世时，年仅 26 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一生是为革命忠心耿耿奋斗的一生，他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

# 钱兴传略

禩倩红

钱兴原名钱发年，号发瑞。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怀集县（解放前属广西）诗洞凤南村。1922年，钱兴在协和乡（今安华乡）凤南初级小学读书；1926年升入怀集第一高级小学；翌年考入怀集县初级中学。钱兴为人正直，刻苦勤奋，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良，深为班主任兼国文课教师、地下共产党员梁一柱所喜爱，经常给他讲些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在梁一柱启发下，他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挽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的问题。为了表示自己“毕生要为复兴中华而奋斗”的抱负，他改名为“兴”。

1930年，钱兴初中毕业后，考进广州知用中学高中，一年后转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继续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钱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无比愤慨。他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国同学一起，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共同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秋，钱兴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他在校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和进步教师何思敬、邓初民等，受他们的影响与教育，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便与一些进步青年秘密组织“读书会”。他还与曾振声（即曾生）、粟稔等同学，在

市郊白云山上成立社会主义思想小组。这个小组联系着一个校外读书会（设在曾振声家里），广州各校一些进步同学都参加了这个读书会。读书会收藏了不少革命书刊和马列著作，供大家传阅，并经常就中国的前途及革命道路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钱兴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倡爱国青年应做创造新世界的“开路先锋”。邓初民称赞他的文章立论明确，切中时弊，读后“深受启发”。

1935年六七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局出版部工作人员王均予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和广雅等校进步青年学生中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其宗旨是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推销进步书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钱兴、曾振声、粟稔等首先加入了“中青”组织，再介绍其他进步青年加入。中山大学“中青”小组由钱兴任组长。他除组织“中青”小组成员学习革命理论外，还通过小组成员在同学中宣传中共的各项政策及抗日主张，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各种活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钱兴阅读《八一宣言》后，甚为振奋，从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他与曾振声、粟稔等同学一道，积极开展宣传《八一宣言》的活动。他们偏印了一份油印小报，刊载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以及其他有关文章，在师生中秘密散发。钱兴负责小报的刻印工作，还兼编印传单及撰写文章等等，为躲避特务的监视，只能在隐蔽简陋的条件下工作，但他从不叫苦。

同年1月间，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校内召开抗日大会，钱兴被选为大会主席，带领同学在校内举行示威游行。院

长郑彦叶闻讯前来阻止，说什么召开大会是非法的，应立即解散。钱兴反驳说：“我们爱国同学开会讨论关于抗日救国大事，为什么不合法？难道你们愿意国家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让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吗？”驳得郑无言以对，只得悻悻离去。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青年救亡运动。广州青年学生奋起响应。中山大学爱国师生员工的抗日情绪更为高昂。在“中青”等进步社团的领导下，经过钱兴等骨干分子的串连，中山大学于12月10日晚召开各班代表会议，决定11日举行全校抗日大会。会后，钱兴等马上发动进步同学组成几个“夜呼队”，分头到各宿舍通知：“明天上午在大礼堂开抗日大会”。

11日上午，抗日大会如期举行，三千多师生参加了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呼吁全国实行抗日的通电，并通过12日到广州市区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等项决议案。会后，钱兴等人便分头进行有关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日，全校师生（包括中大附中）共三千多人，从石牌向广州市区进发。他们沿途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口号，还散发了《告同胞书》等传单。途中，其他学校一千多学生也相继加入了游行队伍，不少观看的群众也跟着高呼口号。钱兴、曾振声是这次抗日示威游行的总指挥及带头人。此后数日，在钱兴、曾振声带领下，中山大学学生组成若干小组，分头到广州各主要街道、公共场所，以及芳村、佛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散发抗日传单和张贴抗日标语等活动。他们还到广州各学校进行联络，推动了广州地区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广州青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救亡运动，引起了广东统治当

局的恐惧。他们指使一些人在各校成立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抗声社”等团体，分裂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针对此情况，钱兴等认真总结了前一段活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当前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还不平衡，领导权也没有完全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为此，他们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各校的联络和发动工作，揭露统治当局操纵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同时，为了防范统治当局的迫害，他们作了相应的分工，由曾振声等人公开出面担任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钱兴则隐蔽进行工作，不公开担任抗日职务。

12月30日，中山大学再次召开抗日大会。由于钱兴、曾振声等骨干在会前做了较充分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效地粉碎了“抗声社”分子把持大会领导权的阴谋，同学们一致选举曾振声等五人为临时主席团，以曾振声为主席。钱兴则以一般同学的身份发言，建议再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12月31日，中山大学学生在校集队，出发到广州市区游行。沿途，为数众多的各校爱国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到达“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口时，曾振声等六名学生代表向当局提出爱国学生有抗日行动、言论、出版及集会等自由的要求。

1936年1月9日，中山大学与各校学生再一次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作为全市学生开展抗日活动的领导机构。曾振声当选为主席。从此，广州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便为曾振声、钱兴等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所掌握。

面对学生汹涌的抗日救亡浪潮，广东当局竟然用铁血手段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月13日，中山大学等校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市区荔湾桥时，突然遭到暴徒的围攻与殴打，当



场有百多名学生被殴伤，数名学生被绑架。之后，曾振声等数名学生被捕，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住宅被搜查。这就是骇人听闻的“荔湾惨案”。

惨案发生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不准钱兴等人注册上课，军警还四出搜查钱兴等人。钱兴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继续坚持斗争。他和其他进步同学一道，起草和油印抗议统治当局制造“荔湾惨案”的罪行；及时部署各校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成员转入地下；组织进步同学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抗日宣传，声讨统治当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罪行等等。钱兴还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积极营救被捕同学，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向学校交涉。与此同时，金昌华、罗范群、黄焕秋等三百多名中山大学学生联名上书校长邹鲁，要求向广东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同学，并收回不准钱兴等人注册上课的布告。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邹鲁只好把被捕学生保释出来，并恢复钱兴等人的学籍。

钱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同时也深切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救亡的重任，因此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在党组织的培育下，钱兴思想觉悟进一步升华。1936年8月，钱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7年初，钱兴奉调到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工作；同年三四月间，再调福建工作，先后担任厦门市委书记、漳州县委宣传部长。他在闽期间，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抗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40年冬，“南委”派钱兴到广西桂林，筹建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并任工委书记。以钱兴为首的省工委采取各项

措施，发展和调整各级党组织，以利斗争的开展和保护党的力量。省工委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

1942年7月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南委”机关及广西省工委先后遭到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被捕和杀害。钱兴却临危不惧，及时指挥其他同志安全转移，并对桂林今后工作做了具体布置，然后转移到灵川、钟山等地，在钟山建立了广西省工委临时机关，并设法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间接联系，继续坚持斗争。在此期间，省工委在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配合全国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兴曾先后到重庆、香港等地，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和请示工作。回广西后，便组织各地党的干部传达和学习上级的有关指示和文件。1947年4月7日，钱兴在横县召开各地区地下党负责人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广西当前斗争的总方针，即进一步发展壮大反蒋爱国的民主运动，放手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进一步建立和扩大解放区。会后，钱兴带领工委人员分赴各地，为完成新的斗争任务而奔忙。

1947年夏，钱兴奉命担任中共西江区工委副书记、粤桂湘边副政委职务，主要负责党的工作及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48年11月，钱兴在广宁县四雍地区反对敌人“围剿”的战斗中，光荣牺牲，终年39岁。

# 悲壮的民族叙事诗

何思敬

## 序曲 抗日之号召

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  
武装起来，  
抗战起来！  
这是千钧一发的危机，  
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武装起来，  
抗战起来，  
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  
负担着内外一切重压和侮辱，  
受尽了内外一切欺骗和弄作；  
冷刻的钢铁天天对着我们；  
强盗们的大炮骄耸着，  
强盗们的飞机狞笑着；  
“投降呢反抗？”——严厉的挑战，  
“统一和亲善”——无耻的私贩；  
半壁河山又去了一大块，  
青天白日又是一服安神丸。

这还不算是蹂躏？  
这还不算是侮辱？  
抗战，武装起来抗战，  
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  
怒唱着胜利的战歌，  
紧敲着悲壮的军鼓，  
大踏阔步，  
手舞足蹈，  
整个民族千千万万，  
千军万马旌旗摩天。  
抢前，抢前，  
武装起来抗战！  
抗战，抗战，  
武装起来抢前！  
奔向伟大的抗战！  
投向神圣的抗战！  
肃清一切奸诈，  
冲破一切阻碍，  
化五千年“光荣”为灰烬，  
搏百万年的永生，  
以百万里河山为战场，  
博万万人的作场，  
伟大的抗战，  
神圣的抗战。  
乾坤一掷，  
乾坤再造。  
抗战是现代中国唯一的叙事诗曲，

抗战是现代中国唯一的综合艺术，  
综合最高情感，  
综合最高理智，  
造成过去之终曲，  
作为未来之序奏。  
抗战，抗战，  
武装起来抗战，  
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  
大家起来创作，  
一齐起来表演，  
创作这世界史的表演，  
表演这世界史的创作。  
抗战，抗战，  
武装起来抗战，  
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  
工人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  
锻炼得意志坚韧筋肉隆隆，  
在英勇的抗战中  
做个坚强的主人公。  
科学家发明家以征服自然之初衷，  
一齐来到神圣的抗战中  
克服人类前史的矛盾。  
艺术家和诗人以最高贵的情热，  
一齐来完成这神圣的综合作品  
而展开艺术之前程。  
爱国军人须在这悲壮的诗剧中  
成就绝后的功业和光荣。

抗战，抗战，  
武装起来抗战，  
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  
整个国民，全体同胞，  
动员大众的本领，  
动员大众的头脑，  
一齐参加神圣的抗战，  
共同创造历史的前站！  
最后的胜利是必定的，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丧失的是什么？  
是枷锁。是过去。  
获得的是什么？  
是未来。是自由。

1935年11月22日

## 荔湾惨案发生的前前后后

穗 芒

荔湾惨案的发生，可以说是自“一二·一二”救亡运动爆发以来损失最大，牺牲最惨，同时也是最伟大最精彩的一幕。它是华南数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学生群众努力的结晶，它是华南爱国青年和汉奸作一次最伟大的决计。今天我们来追悼冯君（即冯道先——编者），一方面固然是对于死者伟大的牺牲有一点钦仰的表示，他方面就是要来重新估定我们“一二·一二”救亡运动的价值。敌人的手段是非常毒辣的，他们不但要残杀我们英勇的同学，消灭整个救亡运动的力量，而且要千方百计地来诬蔑我们，不说我们有什么的背景，便说我们的队伍中有反动分子参加在内（回忆当时我们数千英勇的同学排山倒海地向市内进发示威，那一个不是自动的，充满着满腔热忱的，同学们当还按记），希冀泯灭我们在救亡运动的历程一段光荣的历史。为使社会人士明了这次救亡运动的前因后果，现在得用泪珠和笔墨忍痛地追述在下面：

在华北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巡行之前一个月，我们这里已有抗日团体的组织，但是因为种种阻碍，毫无进展。迄民国廿四年十二月九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华北英勇的学生，在冰天雪地中，成群结队举行抗日示威大巡行，终于和在汉奸喉使下的警吠冲突。而在第一

次首先发难的大流血后，本校同学，一致主张明天开全体大会，因时间匆促，当晚即临时组织夜呼队，巡行校内各宿舍，大声疾呼，通告全体同学。一时抗日空气，弥漫了整个石牌，各同学殊常兴奋，大有枕戈待旦之概。此乃华南抗日救亡运动爆发的前夕事也。

12日上午开全体大会。是日，全校都张贴十万火急的紧急通告，和刺戟心目的标语，并发出悲壮的告同学书。10时，各学院的警钟，狂乱的响着，各宿舍的铃声，不断地悲鸣，同学们无不精神百倍，风起云涌地参加，抗日空气，异常紧张，乃宣布开全校员生工友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议决案10余项，都是最正确的救国图存的大计，如电请政府对日宣战案；通电质问政府压迫学生民众抗日运动之理由；要求民众抗日言论行动自由；本校全体员生工友立即举行示威大巡行；质问×××对日真正态度等案，迄12时许才宣布散会。

12日下午1时举行悲壮的抗日示威巡行。散会后，同学们匆促吃了午饭，马上到运动场集合，准备出发，各同学的爱国热情达于沸点，故在此数小时内竟动员了全校同学3000余人，约至1时半出发，步行往广州市（由石牌至广州市约30余华里），排山倒海般向市内巡行。全市民众，磨拳擦掌，甚至有些市民感动到流下眼泪。大家都自动狂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扑灭汉奸！”……这可见民众平日已深深地急伏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对于一切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及悲愤。一路巡行，途经沙面，群众的情绪特别紧张，路程走了数十里，虽在寒风凛烈中也不能冰冷同学们如火般的抗日热情。

13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是日大会要紧的事，就是要成立强有力的真正能够领导抗日运动的机关，一致议决成立全体



员生工友抗日会。不过因时间匆促，不能即席产生抗日会委员，只得先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一切工作。

16日再开大会，这天开会情绪更为热烈，各院教授多参加开会，发表抗日伟论，无不淋漓尽致，并有仲元中学派代表参加开会，希望与本校携手干救国工作。其中重要议决案为出版抗日日刊，全校动员到广州市作抗日宣传，以唤起民众……大家都热烈的讨论，连午饭都忘记吃，直到下午2时许，才宣告散会。

17日全体员生总动员出发抗日宣传，为使民众对于抗日运动有深刻的认识和唤醒民众自动起来抗日救国，不能不做广大的宣传。17日开始出发宣传，一连3天，民众异常欢迎，收效极大，并有特别宣传队的组织，专负责联络市内各校的重责。

31日再举行示威巡行。本校虽举行了一次巡行，抗日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但因有种种阻碍，表面上似要消沉下去，可是同学们都勇气百倍，冲破一切障碍重整旗鼓，大家都认为有再来一次示威巡行的必要，所以在31日又召开全体非常大会，讨论抗日工作，一致感于平、津、京、沪、汉各地不断地向前迈进，虽在水龙扫射，枪刀屠杀之下，仍不能挫他们的抗日勇气，本校员生爱国热忱，岂敢后人，因此在这天大会后，马上又举行第二次抗日示威巡行，并且联络市内各校参加（虽然教厅已令各校放假，遣散学生回家，但来参加的仍占半数以上），情形殊当热烈而悲壮。继到西南政务会请愿，要求准予民众抗日言论行动自由，及明示抗日态度和主张，不得要挟。大家旋即到市民队伍中去请他们参加巡行，市民参加者甚众。这种力量，足以威胁一切。这是这次巡行比上次更为伟大的地方。

6日又举行第二次非常大会。因为有很多重要的抗日工作要执行，所以仍有开大会的必要。这天正是校长召集全体员生训话大会，同学们就借此机会，当训话会开完以后，马上即转开员生工友大会，讨论扩大宣传重要议案，结果，一致议决下乡扩大宣传，做大规模唤醒群众的工作，我们知这抗日救国非配合一般民众不行。这天就正式成立本校员生抗日会并大家积极工作，拟定9日举行全体宣传队宣誓大会，准备下乡宣传。

9日12时举行全体宣传队宣传大会，并作第三次联合市内各大中学校示威大巡行。是日正午，警钟响了，各同学自动地跑到总理铜像前举行宣誓典礼，教授到者有邓初民、黎东方、张农诸先生。各教授分别致勉词后，遂一致议决作第三次抗日示威大巡行。各同学因惧于前次教厅消极破坏提前放假的大教训，即于前晚秘密派员到市内各中等以上学校，进行联络工作，而于巡行事密不宣布。不料，聪明绝顶的教厅，事先又得密报，无故令各校放假。可是市内各学校同学，不乏有热情有认识分子，虽然敌人用尽如何巧妙手段，终不能阻止他们抗日工作于万一。是日到来参加者，不下10余间学校，临时在珠江岸边空地举行全市学校抗日大会，决议示威巡行后，再到教育厅质问厅长请其解释无故放假的理由。巡行回来时已6时许，领着大队到教厅，时阍者据称厅长已返公馆，转叫其打电话，叫厅长来厅答复，阍者不允，继请其转知厅中高级职员出来代为答复，阍者又拒绝。这时，各同学以其故意阻难，群情汹涌，喝打之声蜂起，如此蛮横无理，非给他一个严重教训不可，于此即发生捣毁教厅事情，教厅招牌给群众抬来，游行过街，市民均鼓掌称快。

13日国民大学开会荔湾发生惨杀案。自从议决下乡宣传

以后，大多数同学已落乡工作，仅留百余名在校负责后方事务。先是12日忽以有几个同学被捕闻，各同学信疑参半，后果查知同学李、翔等君确已失踪。这时当局以替我们组织义勇军为名，已驻扎一营以上宪兵在校，各同学皆相顾失色。11日接民大同学的邀请开会信，据称定于13日上午10时开会，请我们届时派约莫百数十人参加。我们同学以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乃派六七十人前往参加。此次民大同学发动开抗日大会和作示威大巡行，据说事先已联络市中各校同意，地点在双门底财政厅前集合出发。我们六七十人，为了表示我们更热烈的抗日热情和表示我们愿意和民大同学会合工作起见，却浩浩荡荡地迳乘校车3辆到荔湾民大去。那里最先映入我们的眼帘使我们诧异惶惑的是3大队着便服、盖大衣、双目灼灼有光似贼的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当中大校车抵达时，他们就特别留意下车的中大同学，并且各人都露出一一种卑劣的，无耻的狰狞的微笑，好像在说：他们的功勋就快领到了。不过无论如何，当时我们不曾预料到在此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敢无法无天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至多也不过以为他们想藉此“广州市民锄奸团”的招牌，来掩护他们刺探消息或监视我们的行动罢了。然而我们还得做点“知彼知己”的工作，一位机警的同学跑上前去很客气很和蔼地跟他们中的一位带着傻气、烟容满脸的流氓谈话：

“你们市民多热诚可嘉，我们的示威巡行也抽空来参加呢！”

“唔，抽空不抽空，朋友叫着来，上头也命令着来……”

“唔，是今晨才预备来的吗？”

“唔，我可不知道。”

“那末，你们这些旗子从那里来的？”

“×××××分派下来给我们的。”

“你们一共几多人参加？”

“一百多人。”

一会儿，有几位同学交头接耳在说：

“你瞧！那儿的衰衰流氓中不是有两位仁兄前次曾在广雅中学给我们拉到石碑审讯，后来才给×××派人来具领回的吗？”

“当真，哦，他们躲到那边的生果店去了，他们俩上次被架回石碑给同学们敲问得怪难为情的。”

“那末，他们俩这次也‘躬逢其盛’干吗呢？”

好容易 10 时半了，民大的同学到队巡行了，大队刚跨过了附近的石桥，中大的几十位参加的代表此时在后面还没开步，忽然前面飞来一阵噪杂声，接着秩序就大乱起来。民大的纠察队被穷追，总领队遭毒打，女同学被侮辱，较小的同学也受威吓。原来这些“救国锄奸团”事先早有预备，三四大队早就埋伏在荔湾桥头左边呢。我们的几十位英勇同学义愤填胸，一切利害已不容我们再去计较，我们只知道用我们的集团力量来粉碎一切破坏我们抗日阵线的汉奸。我们马上集合大队冲上去作实力有效的援助，虽然我们此时有的只是一腔热血，赤手空拳。我们刚好冲到桥头的附近，几十条黑衣大汉已先发制人向我们扑上来了，30 分钟的混战肉搏后，因为英勇的同学个个都是满腔义愤，早具牺牲决心，哀兵必胜，终于他们有点露出不支和狼狈之态来了。不意他们因此却恼羞成怒，怀在大衣里边的手枪一齐拉出来，我们在暴力下觉得如此牺牲，太过无谓，迫不得已，最后只得化整为零。此时他们鼓其余勇向我们足足发了不下百余发的枪声，叫救叫杀之声响彻云霄。事后收队，计无恙而退回荔湾附近的岭

南大学分校的只有二三十人，其余死的重伤的失踪的不知多少，有些竟被拉上他们事先载着他们来屠杀我们的“巴士”，呼啸而去了。冯君就是此时被架去中的一个。

他们凯旋地回到多宝路，复过装接市二中初中部的女童军参加巡行的第四号校车。他们为了太仇视中大了，满以为那些乳臭未干的女童军也是中大的同学，不由分说，拔枪勒令司机停车，搜查一遍把车中的10几余无辜的幼小童军每一个饱尝了几回营南火腿，最后还把她们推倒在地上。

即日午后，中大留校的同学在石牌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全体赴西南政务委员会质问这次惨案的真相，并要求惩凶及即日释放被捕同学。当时接见我们的是陈总司令，他对此事似很重视，态度也仍诚恳，起先照例的说对我们这次爱国运动表示钦敬，继则说对惨案发生表示遗憾，最后他才说，据公安局迟报只是说中大生与市民冲突，枪杀市民2人，重伤数人；另一处的报告，是说荔湾拳术师比武冲突。准此，则此次责任的问题，殊成问题云云。但最后我们的陈总司令还算贤明，他答应我们替我们严密调查真相。即晚的广州晚报是这样的登载，标题为《今晨荔湾市民小冲突》。大意是说：中大生要民大生跟他们一起去巡行，民大学生要上课，不允，双方即起冲突”。又讯：“中大宣传队在荔湾宣传，不知如何，竟与市民口角，继而用武”。翌日的广州各日报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大生与市民救国锄奸团发生冲突，枪毙市民。”同日11时，勳大工学院同学应民大同学之邀赴财厅前集合示威巡行，途径西华路，又遇该“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被毒打及枪死多人，报章的登载也一样的说：“不知如何，又与市民冲突”。当局以为学生而敢枪伤枪毙“市民”，则其有意滋事及有背景可知，当晚即下戒严令，封锁各校，严搜宿舍，大捕

同学。本校同学秘密被捕者不下 10 余人，“因此学生逃港者以千计。”罪首祸魁的中山大学，更为疾视了。对此匪区（当时当局叫石牌为匪区），非加意封锁不可。校车不准往来，断绝交通，宪兵加驻到一营还不够，教导师特拨一团进校，每个交通路口，各山岗高处，宿舍门前，都满架水机关，如临大敌，真的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3 月 25 日的一幕滑稽把戏。我们正在苦闷着被捕同学不知如何下落的时候，忽然，看见报端有这样一个登载，当荔湾惨案发生时，被匪掳去的几个学生，幸蒙公安局侦缉察觉在某地方，派队驰去围攻，双方互战一小时，匪势不支退去，被捕学生幸得救出。但我们不明白匪掳去的学生，既经政府起获，为什么不准予保释，甚至竟罹枪毙之祸。关于所谓被匪掳去之经过，可参见天斤君从锄奸团的秘密囚禁到公安局的公开扣留一文。

7 月 19 日冯君道先就义前一瞥。7 月 18 日陈记倒闭。某大哥出来顶盘。蒙“皇恩”大赦，所有一切爱国犯，皆在被赦之列。7 月 19 日约莫下午 2 时许之光景，为要找人担保被捕同学，我们几个人到公安局去，忽然见一个好像冯君模样的被一群兵拥上了囚车，冯君就在此乌云惨淡中被架而去，归来后得冯君的死讯，才证明刚才所见就是冯君无疑。唉！冯君为了抗日救国运动已代表我们 5000 余同学作第一个牺牲者了。我们的后死者将作什么感想？！“不哭不笑，加深了解”，我们已经明白汉奸和帝国主义侵略分不开的，要生存就要抗日除奸，要抗日除奸就要不怕牺牲。一粒麦子，不落地死了，仍旧是一粒，落地地死了，将产生许多麦子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冯君的碧血是不会白流的，灿烂光明的花朵，得了冯君鲜血的灌溉，将要更为发荣滋长

地开放出来了。在坟墓中的沉默比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更为动人的时代到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虔诚地来接受冯君在坟墓中沉默的鼓励罢！

写于廿五、十一、十九日冯君殉难四周月纪念日。

（选自《追悼冯君道先纪念特刊》（1936年11月出版）

# 广州学生的怒潮

## 怒 潮

日本帝国主义无止息地侵略，国内的买办阶级也要把中国整个送给敌人，我们就眼巴巴看着做奴隶吗？不！华北的知识分子已起来争取民族的出路了，他们掀起了反帝的怒潮。华南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还没有深入华南，一般人所感觉到的亡国痛苦也轻微点。但是，我们就真看不见亡国的危机吗？我们就不赶快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吗？

1935年12月12日，中山大学的学生把广州沉寂的空气变成了紧张，他们掀起了全市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文学、史学两系首先发出救亡的呼声，召集全校同学，议决全校的学生参加抗敌示威大游行；并立刻组织纠察队，用迅速的方法把电话、宿舍、膳堂、交通……等封锁，恐怕学校当局干涉，这是我们的“先发制人”。

全校的学生2000多人在石牌校内集合，步行到广州（石牌距广州约30多里）。到了广州旧校（附属中学所在地），那时附属中学也召集2000多同学来参加，他们每个人都掂着拳头，极其兴奋。这时已经下午2时了。我们整齐的步伐，表现出每个人坚毅的精神。

经过每条马路，民众都站着看；我们壮烈的口号，扣动他们的心弦。穿过长堤，一群劳苦大众，向我们热烈的欢呼。



他们挺着胸儿，握着拳头，一副刚毅的脸子，瞧着我们这大队人马。

从长堤到六二三路，隔一条小河便是沙面，里面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剥削中国人民的机构——领事馆、洋行，和帝国主义的爪牙——买办阶级。“沙基惨案”这耻辱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浮出来了。怒气更盛，大家都发出怒吼：“冲过去吧！热血洗净这些耻辱吧！”我们的怒吼，把沙面里的洋鬼子通通都惊动出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促政府对日宣战！”“民众自动武装起来！”

同时，中山大学开全体员生工友大会，取消昔日的救国会，另行组织“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会”，罢课一星期，进行抗日工作，如下乡宣传，本市宣传，组织戏剧宣传队、男生义勇军、女生救护队等。又议决把同学的保证金扣一元，教职员的薪金扣十分之一，作为宣传和大会的费用。教职员呢？也不甘落后，在17日开会讨论救亡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联络全市教育界，组成抗日的联合阵线。

这时官方包办的“学生联合会”，也照例召集全市学生进行所谓抗日的工作。他们说：中山大学的抗日示威游行是“无补于事”的。整个会议给几个什么机关的代表“训话”占去了大半时间；议决的是什么呢？完全是一些什么“读书救国”等等。他们叫同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会，组织防空队，举办救国戏剧……用这些方式来救亡。最可恨的是他们拒绝中山大学的代表参加报告那天示威游行的经过，和大家握手结成联合阵线。“学生联合会”名义是全市的，实际上是少数人在包办，这可代表全市的抗日行为吗？不！决不！

知用中学普通科三年级丁班的同学，掀起了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怒潮。然而，当局用严厉的手段来压迫，该班的发起

同学立刻被训育主任记大过两次。咳，这亡国的教育！

救国何尝犯校规？何尝有越轨的行动？但这群“汉奸的候补者”，不要脸的奴才，用卑鄙的手腕来压迫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勤勤大学的同学分批出发各县宣传，他们携带着防毒模型去指导民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的救亡运动，被学校当局严厉禁止，说什么抗日也得经过学校的同意，和“学生联合会”一致，不能单独或自动联合他校来抗日。因此，中山大学派去联络的同学，刚入该校校门，就给学校当局赶了出来。听说有一位同学想发起抗日，被校方知道了，给学校派人跟着他，等于给学校抓了去。

其余的学校，大多数给学校压迫的压迫，解散的解散，想组织抗日会吧，须经过国民党党部的批准，这可办得到么？

中山大学依议决，20日要上课的，但附属中学方面的同学，以日本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的侵略，我们便不能把抗日的工作丢弃，为了唤醒大众，联络工农界，所以再议决罢课一星期，实行下乡宣传。20日那天，正在会议进行的时候，附属中学的主任刚由南京回来，一股气儿要同学上课，但给几位同学驳斥了。21日，他便威胁一班抗日代表全体辞职，通知各县政府保护（其实是解押）下乡的同学回校。而大学部的筹委会，有部分的人给收买了。故意破坏，甚至认为附属中学的继续抗日工作为不合法。学校便藉此来分散我们，降低我们的抗日情绪。初中部的同学给训育主任压迫得尤为厉害，学校要他们作“有效的抗日”，去埋头读书，拿“防毒救国”口号来做幌子，用麻醉的“告同学书”来诱惑他们，使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具体的对付方法，因此部分开始瓦解；至最后，各班抗日代表无形中辞职。

学校当局还更进一步的麻醉同学，当 1935 年最后一天，举行什么恳亲会、联欢会，附属中学的主任竟乐捐 200 元（记得附中抗日会因为经费无着，恳求学校暂借，主任说“无办法”）。并且他还列名参加教职员的 400 米赛跑、教职员拉绳比赛……来庆祝。晚上还开什么跳舞会，请来了大批的舞女。大部分的同学给他麻醉了，欢天喜地，去干他们的“恳亲会”；一部分前进的同学，气得挺直。

我们又准备进一步的示威。大学部的同学首先批评了筹委会的工作没做好。召开了非常会议，决定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这正是 1935 年中最后一天。

大学部同学由石牌出发，到旧校大操场会同各校出发。各校参加的有执信、仲元、市立第三、庚戌等中学；他们全是不顾校方的百般恐吓从学校中跑出来参加的，总共有 2000 多人。遂列队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请愿要点：一、质问西南政务委员会是否禁止全市学生参加抗日及示威游行？二、要求抗日行动、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三、请“西南政务委员会”表明最近对日外交态度。

在“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前等着，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监视我们的宪兵也越来越多。我们因为等了 1 点多钟，大家气得直了，几次都想冲进去。但宪兵们拿着黑漆漆的枪对着我们笑道：“请各位等一等！救国谁都要的”。

结果，始终没有“人”来答复我们。这时候，我们认为：唯一的请愿是向民众请愿，请他们和我们握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阵线。于是我们开始游行；所经过的各校，我们都派人去联络他们。可惜得很，他们的校长听到中山大学游行便赶快的“放假”了。

末后，我们联络了一群劳苦大众，冲到六二三路，沿途

高呼口号：

全国同胞武装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屈辱投降的卖国政策！  
扑灭汉奸！  
收复东北失地！  
.....

（《读书生活》第三卷第八期，1936年2月25日出版。）

# 论革命策源地的学生运动

杨益清

“一二·一二”是广州学生运动的开端。因为反对华北伪自治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北国青年首先燃起救亡的烽火，南国学生也于3天之内发动了伟大的响应。跟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学运也不断向前展开。国难一天未解除，学运也一天不停止。

广州学生运动也和各地的学运一样，都有着一般的共通的优点和缺点。工作中心的转移，也和各地一样，先是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其次是深人民间唤起民众，现在是转到建立救亡联合战线的阶段。不过在这中间所运用的战斗方式和技巧则有它特殊的地方。自然，无论哪一个地方的学生，都并非事前曾经学习过怎样干学生运动然后才去干的。不，他们是在努力学生运动的实践中才认识了学生运动，他们是在实践中找出自己的路线，发觉工作上的正确与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才能深切的理解学生运动，也只有越理解学生运动，才越能推进学生运动。为了推进广州的学运，我们对于过去战斗的经过应有明晰的了解。

一年来广州学运，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热情支配着行动时期；第二是恐怖时期；第三是沉着应战时期。

无疑的，广州学运是在亡国悲愤与救亡迫切底下爆发出

来的一个巨浪，是代表广东三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答复侵略者的有力的行动。可是在广州学运一开始，学生群众并没有深切地理解学运的本质及其任务，而运用适当的技巧以达到自己的要求。自从“一二·一二”在马路上出现了2000多个中大学生的抗敌示威游行开始，一直至到“一·一三”荔湾惨案发生为止，在这一个月间，每一次行动都是被忿怒和热情支配着的，完全没有估量到自己的力量和客观的情势，每次行动都没有确定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领导者亦不能把握群众的情绪，常常做了群众的尾巴。学生群众就好似“不羁之马”一样，任由情绪的奔放，而不能顾到实际的效果，以致做出了不必要的行动，而引起当局不必要的误会，以及无谓的牺牲。比方，因教育厅用放假的方式消极阻止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而演出捣毁教育厅的举动。虽然一方面表现出学生救亡热情的高涨；但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学生群众没有理解到学生运动是一种群众运动。学生群众不但不愿和地方当局对立，而且应利用广东特殊的有利条件，争取抗日运动的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和开展。当时广州学生没有把握着这一点，终于因仇恨地方当局而正面冲突，而遭受巨大的牺牲——演成悲惨的荔湾血案！

荔湾血案一发生，学生运动就被诬有政治背景，当局开始逮捕学生，同时下令全市宣布戒严，学校也被军队驻守，如临大敌，一部分下乡宣传的同学也一个个被军警押回学校，从此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就陷入于恐怖状态，学生运动在这高度的压力底下，也就暂时的压服下去了。

然而，西南当局虽极力镇压学生的抗日行动，但他自己却偏用“抗日”做幌子。尽管荔湾桥畔的鲜血还未干透，西南当局居然标榜起抗日旗帜来。本来这是学生运动的有利条

件，然而学生群众却又没有把握着这点，只重视着与当局的仇恨而忽视了自己主要的工作。当时只有少数学生的干部分子，似乎看到这一点，打算起来再干一番，可惜仍然因为他们没有把握着正确的救国阵线的立场，唯一的目标，光明正大的公开去干；反而强调了反对会考这一点，被害怕群众的当局又误认为同样是反对政府的行为。四十几个纯洁的爱国的中华儿女，就这样无辜被捕了。从此学运遂又趋沉寂。

忍痛的沉寂，引起了沉痛的反省。在几个月头的深长的反省中，一大部分的爱国的学生群众，都已经感觉到过去工作上的错误以及认清了今后的动向。他们认定过去工作上最大的错误是患了左倾幼稚病。因为大家都没有坚定的站在救国联合阵线的立场，他们只知道工农大众是抗敌救亡的主力军，却不理解这个民族解放的伟业，是要靠全民族各阶层各党派集中火力才能得到成功的。因此，在行动上稍为受到阻力就出于偏激。比方因请愿无结果，就高呼“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捣毁教育厅，随便骂学校当局为汉奸等等，左倾的可怕。同时，因行动之偏激，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时时都提防敌人的陷害，互相猜忌，于是工作方式上就表现出关门主义。在这两个大错底下，就限制了学运的开展。被工作的方式技巧决定了整个工作的效果。经过这番详细检讨之后，大家就决定了今后的策略——运用联合战线。

等到陈济棠下台之后，压抑学生运动的紧张局面，暂趋于和缓，爱国的学生于是从新吹响了救亡的号角。自是广州学运便由情绪高涨的激烈行动而转入沉着应战的新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主要的工作可以说是组织工作。在学生干部努力和推动之下产生的团体有广东各界救国筹备会、民众歌咏团、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妇女歌咏团、广州艺术工

作者协会，以及由 20 个以上的学校单位建立了领导广州学运的广州市学联筹备会，而且有几个单位已经在学校里建立起健全的学生救国筹备会或联合战线。这在工作上表现得十分丰富。假如我们来把它详细分析一下，也可以找出一些优点和缺点。不消说，运用联合战线是最重要的优点。此外，从工作上看出干部分子的努力；从参加各团体的分子的踊跃，表现出大多数学生群众的救亡热情；从组织本身表现出各校学生工作的联系；从各团体的工作中表现出在学运低潮中，学生群众能够从事于经常的切实的救亡工作并从此加紧自我训练，提高救亡意识；尤其是学筹的成立，表现出广州学运从此有一个统一的中心的领导。在缺点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出组织的不坚强，特别是学筹的不坚强。这是由于重视了校外的连系而忽略了各校学生本身的组织。因为学筹是靠学生群众来支持的，如果各单位学生没有组织，或者不坚强，就反映出学筹能力的薄弱。其次，在各个组织中，常有一个入负几个团体的工作的，这表现出干部分子的缺乏。干部分子的缺乏，组织的不坚强，又由于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没有密切的联系。不能经常的利用组织以推广教育工作，利用教育的收效扩大和加强组织。因为这一点做得不够，所以虽有组织亦觉得散漫。为了推广广州的学运，我们应该把握着一点：利用学筹的力量去建立各校的组织，利用教育来充实学筹的工作，争取广大的群众。群众教育程度的提高，间接帮助了组织的建立，也唯有有组织才能更有计划的去教育群众，训练干部。如何使学生群众与学筹紧密的联系起来，这是目前主要的课题。把各个学生的救亡工作和学筹的工作汇合起来，就形成广州学生运动的巨流。

（《在抗战旗帜之下》，1936 年 12 月出版）



# 我在广州国立中大时

邓初民

人物杂志社张知辛先生，遣函索稿，并指定我写我自己的事，苦无以应。忽忆及在广州中大一段往事，匆促写成此篇。事虽逼真，迹嫌自捧，读者谅之。

1925——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在上海过了一个时期的流亡生活，慢慢又走进了学院，书斋。然而在整个社会还是动乱的时候，学院书斋也是不会宁静的；一个动乱的社会，更不会把学院书斋供给一个现实的叛逆者，作为他的避乱所。

1934年上海各大学毕竟把我赶出门外了。我从上海到了广州。我被延聘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彼时中大校长邹海滨先生，同事中最知名者有张君劢、黄季陆先生，何思敬、萧隽英诸先生。中大共计6个学院，行选课制，学生不分院系，可以任意选听各院系教授之课。不知什么缘故，选听我所授之课的学生特别多，有时候最大之教室不能容。因此，令学校当局乃至同事间，都不免以特殊眼光看我，而我亦有惴惴不自安之感。

1935年末，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起，广州中大大学生首先响应，除罢课外，还发动示威巡行。“一二·一二”是中大最光荣的一天，几千学生摆起很长的行列，从中大新校址石碑步行30里到广州市，我亦参与其间，但这一天没有能

发动全广州市的学生参加。以后又举行过一次，一直到荔枝湾惨案发生才告一段落。抗日浪潮一时在南中国达到了最高峰。彼时邹校长适因公滞京，广东省政府当局陈伯南氏，尚未敢过事压迫；然对于邹校长办学校及管理学生之责，殊不见微言。邹校长虽亦向主抗日，闻报亦不免认为学生行动过火。因于返校之后，即召集教职员会议谋对策；当经决议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对学生加以晓喻；并组织中大全体师生抗日会，藉以约束学生之抗日过火行动；实际也就是想压迫学生的抗日运动，这种企图好像学生是彻底明白的。

1935年12月23日、24日之谱（确期记不清了），全体师生大会在中大新校址石碑临时大礼堂召开了。因新校全部房屋尚未完工，临时礼堂是茅草盖的，然亦大可容二三千人。开会前礼堂即由学生遍贴“压迫抗日者即是汉奸”，“打倒汉奸”，“杀尽汉奸教授”等标语，形势非常严重。一声铃响，礼堂内外都挤满了人，当即公推邹校长主席，致开会词。邹校长用先扬后抑方法，首先表示中大是抗日的，他本人是抗日的，今天要把中大抗日会组织起来，使中大成为抗日大本营。学生掌声雷动，一致热烈拥护。等到邹校长接着说，然而抗日不能有过火行动，抗日不能超越常轨，抗日不能……学生就一致发出了不含敬意的嘘声。最后使邹校长的话不能继续说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马当先，首先跳上主席台讲话的，我记得是法学院院长郑彦芬先生，其次是文学院院长范绮先生，再其次是理学院院长何衍濡先生；此外还有两位教授，但有的说到三句五句，就被学生哄下台来了；有的简直一句都不让说，就请他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秩序已不能维持，校长宣布散会，不走；宣布继续开会，不听。我在此时，原无一点勇气敢再出来讲什么话，而且下意识的认为学

生贴的标语，好像有几分也是对我的；但是思之再三，今天的僵局如不打开，以后就很难使广州学生的抗日运动继续下去，甚至于马上就要招致一个大压迫而完蛋。想到这里，我感觉到我有责任来挽救这一僵局。这样就从挤满了的人群中，不知不觉把一只足跨上了主席台，不料，在人丛中刚露出我的头顶，掌声就在四座响起来了。掌声一直继续到5分钟，这时，我才想到要说什么话。

我想：在这种场合，第一，必需把学生抓得住，否则也就要被他们把我半途赶下来。我开始就大声说：“抗日的血，我一定与亲爱的同学们流在一起！但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同学们相信我这句话，就让我把话说完，无论说得好坏，否则我便一句话说不下来。”我一面这样说，一面就作走下讲台的姿势。同学们同声喊叫了，我们相信邓先生，请邓先生说。邓先生的话我们是听的。第二，必需校长及同事们也抓得住，这样就不能专捧学生。接着我就批评学生们的错误，说他们刚才的举动对于校长院长教授是一种侮辱，是破坏抗日运动的统一战线；说邹校长及各院长教授都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我们要一致拥护；他们几时不抗日，我们几时打倒他们。最后说到今天开会的任务是要组织中大抗日会，抗日会不组织起来，不许散会。这样，中大暨附中几千学生就完全听了我的话，重新举出主席团，进行组织抗日会的事，并很和谱的选出了抗日会的负责人，由邹校长领导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圆满散会。

僵局是挽救过来了，学生们很高兴，高兴他们的胜利。邹校长也似乎觉得把这大会平安结束了，总是好的。不过同事们就因此集此于我，会后向邹校长慷慨陈词，说中大的抗日风潮，乃至全广州市的抗日潮（他们似乎是不把抗日运动当

做学生正当的爱国运动，而只当做一种学潮，或什么风潮的(也就是反对抗日的)，是什么人鼓动的，你该明白了吧？只有鼓动风潮的人才能收拾风潮。邓初民、何思敬一般人离不开中大，中大不会安静；不离开广州，广州不会安静。当晚便衣军警也就光顾我的住所了，就这样使我只好于深夜悄悄离开广州市的名胜东山。

在中大那个时期，学生是爱护我的，因此，选我的课的特别多；是信仰我的，因此，都愿听我讲的话。什么缘故呢？我现在明白了，没有什么别的，就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有几万万双眼睛注视的一件事，几万万颗心头怀的一件事，统治者为着私利不让大家做，不接受大众的要求，而偏于万难之中有人出来为这一件事，为满足大众的要求努力、奋斗，那么，大众就爱护他了，就信仰他了。这一件事，在战前就是“抗日救国”，在战后就是“和平民主。”只不过是这一件事上(那时是抗日救国)，在这一要求上，与广大的人民大众，与广大的青年学生是一致的，所以能获得中大全体学生之爱护、信仰。但毫不客气的说：中大学生及一切青年朋友，对于我的爱护、信仰，是大大超过了我所应得之份的。就是说：假令我也真有可供青年学生拥护、信仰之处，而他们对我的爱护信仰是大大超过了我份所应得的爱护信仰的。我对这点追忆起来，总是时时引为内疚，深深感觉不安。因此，这对于我好象是一种应偿的债务，使我一直不敢为非作歹；使我一直不敢轻于离开这广大的债权人。

然而那时我毕竟于深夜离开了广州，离开了我亲爱的中大同学，毕竟悄悄到了外人治下的香港。不久，即1936年1月12日，在广州毕竟出现了屠杀抗日学生示威游行的荔枝湾惨案，亦即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后著名的1936

年“一·一三”惨案。那些充溢着爱国热血的青年，和我相处两年之久的中大同学，有的当场把鲜血染红了荔枝湾的水，有的被挪到白云山头作了抗战前的祭品，有的被投入黑暗的监牢成了爱国犯。然而也有些漏网之鱼，终于冲破了鬼门关，走进了人民队伍，组织了华南抗日人民军，并且成了华南抗日人民军的骨干。人民抗日名将，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先生，也就是中大学生（据说原名曾振生）说不定也还是荔枝湾惨案中最勇敢的领队人之一哩。但是我呢？一直还是在过着学院书斋式的生活，没有死，也没有上过前线，更没把“抗日的血跟亲爱的同学流在一起”；诺言未践，急债未偿，回首前程，只有益增内疚而已！

1946. 11. 28 于陪都。

# 各报有关广州学生运动的报道选辑

黄穗生

## 一、《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选

市学联会定期召开学生代表会 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华北事件，北平学生举行反日示威巡行，在寒风冷雪中，被当地消防队用水射扫，异常愤激，特定于本月 15 日下午 2 时半举行全省中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讨论声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及会商今后本市学生救国运动方针。查该会代表大会已得市党部批准，可依期开会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12 日）

反对华北自治，中大学生巡行示威 国立中山大学各科学院及附属高中各级学生，以时局严重，为促进政府救亡，响应华北同学爱国运动起见，昨（12）日上午 10 时，该校各科学院学生 2000 余人，在石牌新校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一、举行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示威大巡行，公推农场主任张农任总领队。二、联赴西南政务会请愿。三、通电全国学生，一致声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四、电邹校长请中央决定抗敌讨逆大计。五、请西南出师北伐殷逆。至 12 时许散会，由总领队张农率领各学院全体学生由石牌新校舍出发，沿东山马路直抵文明路原日中大旧址齐集。二时许，继续召集中学部学生开会，一同出发，举行示威巡行，总领队领众先导，各学院

均有白布横额上书中大救国会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示威巡行等字样，各生各携小旗，沿途高呼口号，并散发告同学书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3日）

**学联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 北平15大学等学生，为表示爱护国家统一、反对假借民意破坏国土完整起见，特于9月联合15大学学生5000余人，向北平当局请愿反对自治运动，北平当局竟加以制止，并将学生用水喉扫射拘禁。11日，本市学生联合会特通电声援，原电云：清华大学学生转北平全市同学公鉴：顷阅报载，北平各大中学生9日向当局请愿，反对伪组织，要求团结救国，为平当局所制止，本会闻讯之下，不胜惶悚，际兹国家多故，亟应领导民众，挽救危亡，此为我学生应负之使命，亦应有之责任。此次请愿举动，纯属爱护国家、救亡图存，此后还希继续奋起，再接再厉。我市学生，誓为后盾，临电迫切，伏希垂察。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真（11）叩。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3日）

**广州学生筹备举行救国运动** 广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定明日（15）上午，假省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本市学生举行救国运动办法，各校代表经派定如下：钟启瑞（国民大学）、侯银章（国立法科学院）、吴恺如（勤勤工学院）、周祥光（广雅中学）、梁祖翘（市立一中）、江兆开（勤勤教育学院）萧守仁（大中中学）、张沛松（省立农工学校）、徐永桓（知用中学）、黄少霞（省立女师）、陈宣年（培英中学）、陈伦敦（培正中学）、湛锡祁（省立江师）、李伟颜（市立二中）、谢美嫦（南京中学）、何国光（省立体专）、萧宗

(复旦中学)、许金真(八桂中学)、李雄凌(青华中学)、邓华兴(青年会中学)、张玉清(思恩中学)、韩石麟(庚戌中学)、梁惠霖(私立体专)、刘国霖(仲恺农工)、黎寿昌(光汉医学)、陈开屏(越山中学)、黄嘉玉(长城中学)、崔炎焯(坤维女中)、黄光文(调济学校)。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4日)

**中大员生昨日复开抗敌大会** 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员生昨日(12)日召开抗敌大会,并举行示威大巡行,经志前报。至昨日(13)日上午9时许,该校各院系同学,复在石碑新校大礼堂召开抗敌大会,讨论一切进行。事先并邀集文明路旧校附中同学参加,计到会者有校内员生约2000余人。齐集后,先由主席团宣布开会理由,随开始会议,即席通过要案多项:一、即日组织义勇军,男生加紧军事训练,女生加紧看护工作。二、即日起扩大抗日宣传,办法如下:①自动停课一周;②联合全市学生自动停课宣传;③落乡宣传;④请广州市播音台供给本会播音时间;⑤出版抗敌周刊;⑥拟定宣传大纲。三、联络全市学校扩大示威运动。四、由中大发起组织广州全市学生抗敌会。五(略)六、函请新闻界以公平态度采取本会正确消息,以正民众视听。七、电中央政府及各省地方政府实行抵制敌货。(余略)除继续讨论取消全市学生救国会案,并决定组织中大员生抗敌会,交由主席团会同各学校派出代表共同负责筹备成立。至12时始行散会,并定下星期一上午9时再开全体员生工友大会,讨论救国抗敌一切进行办法,下午1时起全体出发各地宣传,规定如不参加即作汉奸论,輿众共弃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4日)



**中大严密救国组织** 国立中山大学员生以华北危在旦夕，于12日召集各科学院员生开临时大会，举行示威大巡行，13日复召集全校员生开会，决定严密救国组织，经即成立筹备会，于13日下午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下星期一（16）日再召开全校员生大会，讨论组织章程及进行步骤，特于昨（14）日通告各员生工友依期到石牌新校大礼堂踊跃参加云。又查该校昨（14）日派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杨光湛于是日下午7时赴市播音台演讲“权利与斗争”。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5日）

**岭大请讨殷逆** 昨日本市和私立岭南大学全体华教职员通电请讨殷汝耕云。（函略）自殷汝耕倡乱冀东，僭称自治，甘为国贼，罪实浮于石敬瑭、张邦昌，最近复截留关税盐税。华北形势，日益严重，苟正气一日尚存，应请政府立即声罪致讨，以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全国民众尤应奋起图存，使世界知吾民族决不为不义屈，临电迫切，维共鉴之。私立岭面大学全体华教职员叩。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5日）

**学联会开代表会电请抗敌** （15）日下午2时，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亦假省参议会礼堂召集全市中上学校学生自治会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是日赴会参加者异常热烈。2时30分宣布开会，先行推举主席团7人，结果以国民大学代表钟启瑞、法科学院代表侯民章、勤勤工学院代表吴恺如、广雅中学代表周辉光、市一中代表梁祖翹、勤勤教育学院代表汪兆开，知用中学代表徐永桓等7人为主席团，以市一中代表

梁祖翹为主席团主席，吴恺如报告该会工作状况。既毕，即开始讨论提案，并发出两电，直至6时许始散会。兹将电文分志如下：（一）南京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钧鉴：近来日贼使汉奸，伪造民意，图谋平津，凡有血气，莫不发指，而我中央政府决徇日要求，成立形同自治之冀察政务委员会，闻电不胜惊骇。敌之谋我，何压之有，占取东北，又谋冀察，屈辱求全，万难图存。际此日武力压迫之下，当即强硬对付，出兵讨逆，清除汉奸，率领国民收复失地，学生等愿效当前驱，临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二）清华大学学生会转北平全市同学暨全国同学公鉴：日劫夺东北，而今四载，近复唆使汉奸伪造民意，图谋平津。北平各学生9月向当局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本会曾通电声援，誓为后盾。当前日侵凌日甚一日，全国民气异常激昂，凡我学子，当发扬五四运动之精神，领导民众举行热烈之救国运动，以挽国家之危亡。万望在平同学一致响应，作实际之救国运动，更当一致努力。临电不胜翹企迫切之至。广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删（15）日叩。

（《广州国民日报》1935年12月16日）

**中大昨复开员生工友大会** 中大员生工友以汉奸受人唆使，企图华北自治，特于12日召开抗敌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13日再开会议，通过救国提案多项，一时学生救国空气为之一振。昨日（15）日下午2时，复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全体员生工友大会，革命空气异常紧张，讨论提案时尤为激昂。通过提案多项，并即草拟通电，分致各方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6日）

**中大员生议决组抗敌会** 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员生连日特

召开抗敌救国大会。16日上午复在石牌新校大礼堂开会，事先已邀集文明路旧校舍附中全体员生出席，计与会者不下2000余人，激昂忿慨，直至12时许始行散会。现该校决定组织中大员生抗敌会，已派员负责筹备，并定今日（17日）上午10时，在文明路旧校钟楼会客厅招待全市新闻记者，报告该会工作进行情形。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7日）

**广州学生召集紧急会议** 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自15日依照定章召集代表大会，复于昨日（17日）下午5时召开第15次常务会议。关于救国工作，决议：（一）定本月22日举办救国论文比赛及召集民众教育职教员谈话会；（二）制定扩大救国宣传大纲，各校宣传队出发宣传；（三）电全国同学对于知识道德体格须切实训练，并以沉着苦干之精神效忠党国；（四）北平学生于16日再举行救国运动被宪警大刀弹压，以致流血，特再电慰问，并电全国一致声援；（五）招待本市新闻记者，报告最近救国工作之进行，日期定本月19日上午11时，在太平洋支店举行；（六）召集临时紧急执委会会议，定本月18日下午5时半举行；（七）分函各校征集救国方案。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9日）

**中大学生定今照常上课** 中山大学抗敌救国会连日组织宣传队出发各地宣传，分为5大队，133小队，每小队设小队长1人，队员10余人，其分配如下：宣传总队长黄弘通、李康寿，第一大队（文学院）队长钟钺声、廖嘉祥，内分47小队，第二大队（法学院）队长钟君翼、叶汉生，内分25小队，第三大队（理学院）队长黄继梅、王昌云，内分16小队，第

四大队（工学院）队长黄士崇、卢祝尧，内分 27 小队，第五大队（农学院）队长李康寿、负兆槐，内分 17 小队。查该校停课一星期，至昨日（18）日已届期满，该校特通告各生今日起照常上课。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19 日）

**法学院昨日复开紧急会议** 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学生自治会以国难日亟，救国心切，复于昨日（18）日上午 9 时，在该学院礼堂召开全体紧急会议，到会者座为之满，空气异常紧张，即席通过要案多项，并去电中央请即日出师讨逆抗敌，并录下电文如下：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慨自九·一八以来，版图变色，敌人既夺东北，又谋冀察，近更威逼利诱，嗾使殷逆组织冀东伪自治委员会，脱离中央，企图分裂我国领土，以遂逐步并吞我国之毒计。测其野心，非至灭亡我国不止，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倘不亟谋应付，而徒以来到最后牺牲时期为口实，使敌深入，则我之土地有限，而敌之贪得无厌，不特华北无形丧失，即华中华南恐亦旦夕不保。国事至此，岂有再忍徘徊瞻顾之余地？恳请即日出师北上，讨逆抗敌，以顺輿情，领导民众恢复失地，生等愿为前驱，誓无反顾。临电悲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学生自治会叩嘯（18）日。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19 日）

**勤勤大学员生救国会议** 广东省立勤勤大学商学院全体员生于昨（18）日在该院大礼堂开临时救国会议，全体员生均出席。并将其决议及通电志左：一、关于商学院员生救国会应否组织案。议决：由本院全体员生推举代表组织之。二、

关于救国会负责人推举办法案。议决：每班 20 人中选一名，20 人以上选两名，教职员方面由训育主任负责。三、应否慰勉北平同学通电案。议决：用本学院全体员生救国大会名义，发出通电。四、关于宣传问题，应否组织宣传队案。议决：由各班自动组织落乡宣传队分组出发宣传。五、关于宣传时间问题案。议决：各组组织后，以目的地出发日期，报告大会主席团，请由学校准公假 3 天（由 12 月 19 日起至 22 日止）。六、关于宣传队经费问题案。议决：由各班自行解决。七、关于救国会经费问题案。议决：由救国会决定后，再提出大会讨论。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19 日）

**勤大各院之进行** 省立勤勤大学商学院全体员生自前（18）日成立全体员生救国大会后，是晚复召专修科全体员生开会，商组宣传队出发近郊及各县宣传抗敌救国。院长李泰初于会议时亲自指导，并阐述救国意义及唤醒同学在救国中不可为挑拨者利用，徒使虚耗时间，于事无补。是次讨论结果，除即由勤大商学院员生救国大会名义通电全国共赴国难外，即席由专修科全体员生决定组织番禺、增城、从化、花县四处宣传队，自昨日起由教授领队赴各县宣传，但出发时所用名义，则为勤大商学院经济调查队，使抵达各地顺便在当地调查农村经济状况。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20 日）

**民大开会** 私立国民大学 18 日下午开全体教职员会议，讨论指导学生爱国运动工作。当经议决将原日学生自治会改组为国民大学员生工友救国会，以原日自治会委员暨教职员

代表共同组织，以谋集思广益，并通电慰问华北学生，及致电中央暨各方请抗敌讨逆。昨日 19 日，该校校长为报告教职员开会经过，及指导学生爱国运动工作起见，特令各班学生于是日下午 2 时半，先开各班会议，3 时许，即在荔湾该校礼堂开全体员生大会，开会时计到者除吴校长及训育长、教务长、教职员外，大学部、附中部学生共约 800 余人。首由校长报告教职员会议经过，并指挥学生从事爱国运动意见。继讨论改组自治会为救国会问题，直至下午 6 时许始散。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20 日）

**中大学生昨日复课** 国立中山大学以华北濒危，一致愤起救亡，特于本月 12 日起召开抗敌救国大会，停课一星期，组队出发宣传抗敌救亡。现查该校各院学生本救国不忘读书之旨，业于昨（20）日一律上课，一方面仍积极进行该校抗敌会之组织，加紧救国工作。

（《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12 月 21 日）

**本市各大学教职员召开救国谈话会** 本市各大学教职员为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于本月 22 日下午各派代表假文明路中大旧校大礼堂开谈话会，计到林砺儒（勤勤大学）、黄学勤（广州大学）、陈廷恺（岭南大学）、李荫谷（中山大学）、任启珊（中山大学）、陈廷璠（中山大学）、黎东方（中山大学）、方棣棠（中山大学）、张希孟（中山大学）。9 代表即席推定林砺儒主席。谈话结果如左：（一）任启珊报告本谈话会筹备经过。（二）议决发表文电如下：甲，慰问北平教育界；乙，电促南京政府对敌抗战；丙，通电（或宣言）全国一致奋起抗敌救亡。（三）议决文电草稿先由出席四大学各推 1 人

负责拟就，再印送各大学转请各校教职员同人自由签名（以送到后3天为限）。各校签毕，由各校汇齐拍发。（四）推举岭大陈廷恺、勤大林砺儒、广大黄学勤、中大任启珊担任起草。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24日）

**赴京请愿学生各校已选定** 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自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后，关于该团赴京日期及赴京准备颇为社会人士所注目。记者昨日赴该会调查，据该会负责人称，本会自决定组赴京请愿团后，各校赴京代表业已先后依法选出，并于前（24）日晚召集各赴京代表首次谈话会，磋商赴京请愿各问题，计出席会议代表30余人。关于决议事项之重要者约有：一、定本月26日下午5时为各校代表报到截止期间。二、各校代表须由各该校发给证明书。三、各代表服装应着各校制服，外衣一律用灰色国货棉袄，由会发给。四、定本月25日下午3时开第二次赴京代表团谈话会。至于出发日期，约于下星期内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26日）

**邹鲁南返昨日抵省** 西南中委兼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月前赴京出席五全大会，并参加中常会议后，即离京过沪，25日由沪偕同中委刘芦隐、李文范、麦焕章及中大教授曹四勿等乘美国邮船加兰总统号南返，27日下午5时抵港，到港欢迎者有中委黄季陆、市党部委员程鸿轩、西南政委会秘书谢邦、中大教务长肃冠英及邹夫人等多人。邹氏到港后，逗留一宵，昨（28）日上午8时15分，即由港偕同欢迎人员乘广九花车附挂首次直通快车返省，即午11时25分抵步，刘委

员芦隐、李委员文范、麦委员焕章等则仍留香港。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29日）

**广州学生巡行请愿** 国立中山大学及执信、庚戌、市二中等学校员生工友，为促当局抗敌救亡起见，特于昨（31）日举行抗敌示威大巡行，并联赴西南政务会请愿。是日下午1时许，在各校员生工友齐集文明路中山大学操场出发，推中山大学代表为总领导，先往政务会请愿，各人手执旗帜传单等物，声势浩荡。2时许抵达政务会门首，即推举中大代表2人，执信、庚戌、市一中学校各1人为请愿代表，请谒各常务委员，由秘书谢宣邦接见。各代表辞退后，即率领全体员生巡行，经永汉、长堤、六二三路等处，情形激昂愤慨，至傍晚始收队返校。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1日）

**广州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出发** 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代表团赴京请愿，于昨（4）日上午10时假座中华北路省立民众教育馆，开屈送代表大会，并推定法学院、国民大学、勤勤大学、广雅中学、市立一中等5校为主席团。计是日到会各校代表百余人，开会后，由区昭文为主席团主席，宣布开会理由，旋即宣誓，高呼口号而散。查此次赴京请愿代表共有37人，由程少籍为北上代表团指导员，黄培才为干事，并推定钟启瑞为总代表，方鲁池为副代表，下午4时即整队出发，由广东海员工会派出耀诚小轮及该工会电轮，满插“敬送代表团北上请愿救国”等旗帜驶泊天字码头，接驳代表转赴海元轮赴沪。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5日）



**中大员生工友成立抗敌会** 国立中山大学于昨(6)日上午9时,在文明路旧校礼堂举行全体职员救国会议,出席者除邹校长外,肖教务长、邹事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教授及附属高初中教职员均全体参加。计到会者合共400余人。由邹校长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随将教育研究所拟具之战时教育工作计划逐一讨论,10时半散会。

是日下午2时,全体员生工友复开抗敌大会,出席1000余人,礼堂内外满贴各种标语,热烈情形为空前所未有。由邹鲁主席,宣布召开抗敌大会意义,即开始讨论,议决:(一)抗敌会执委教职员人数连校长共5人。(二)正式执委会未成立前,宣传事宜交临时主席团与筹委会协同办理。(三)全校宣传队定本星期三在新校总理铜像前举行宣誓后出发。(四)医学院组织战地救护队,加紧训练工作。(五)定期举行全市学生抗日大会案,议决交由负责机关办理。(六)请学校函省政府令各地机关保护宣传队,并请政务会令交通机关免收宣传队舟车费。

(《广州国民日报》1936年1月7日)

**中大学生赴各县宣传** 国立中山大学学生议决自动停课1月,分赴各县作抗敌宣传工作,昨日成立中大抗敌会扩大宣传委员会,负责办理停课期内扩大宣传抗敌事宜,并定由本星期四(8日)开始停课1月,至2月8日继续上课。在停课期内,由学生组织宣传队出发各县宣传,每队人数由10人至20人,如不欲赴乡宣传者,则留省担任联络各校进行宣传抗敌工作。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8日)

**省立女师组织救国会** 省立女师员生近以国难日亟，特于前日召集员生开大会讨论救国方案，即席通过成立救国会，随选出黄少霞等 21 人为该会干事。

（《广州民国日报》1936 年 1 月 8 日）

**粤学生抵沪** （9 日上海专电）广州市各大中学晋京聆训学生代表一行 35 人，9 日午抵沪。市府派科长李大超到埠欢迎，照料一切，该团定 10 日晨晋京。

（《广州民国日报》1936 年 1 月 10 日）

**9 日南京专电** 蒋院长召见学校代表期近，各省市已纷向教部呈报名单，启程来京。关于招待事宜，教部已拟订办法，10 日将成立学校代表招待处，设总干事 1 人，下设文书招待事务 3 组，由教部及中央党部政院派员组织之。代表住宿地点亦已租定中央等六旅店房间备用；会谈地点拟借用中央党部或励志社，正在商洽中。

（《广州民国日报》1936 年 1 月 10 日）

**广州各校学生昨再举行救国巡行** 中大员生工友抗敌会自决定扩大抗敌宣传后，各项筹备业经就绪，昨（9）日大学部全体学生在新校总理铜像前举行宣誓典礼，附中部学生则在东较场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既毕，即联络各校学生举行示威巡行。并将是日详情分志如下：是日上午 11 时许，大学部学生即集合石牌新校总理铜像前开宣誓大会，计参加同学暨教职员张农、黄昌谷、邓初民、邹校长代表萧鹏魂等千余人。由张农主席领导行礼。一、齐集。二、肃立。三、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宣誓，由

邹校长代表萧鹏魂监督。誓词云：“中山大学全体员生工友一心一德，本解放民族之决心，作扩大宣传，联络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抗日，如有异心，国人共殛。此誓。六、监督人致训辞后，继续演说，鼓励学生爱国运动者有邓教授等数人。七、报告。由主席团曾振声报告筹备再举行抗敌示威巡行、联络各校经过。八、高呼口号。九、礼成。散会后全体分乘校车货车到东较场，会同附中全体学生千余人开会，下午1时半，附中同学即举行誓师大会。2时许宣誓毕，随即联合各校学生举行全市学生抗敌示威巡行。是日参加巡行者，除中大全校学生及教授张农、邓初民、黎东方、萧鹏魂等外，计有仲元、市三职、教忠、大中、执信、广雅中学等校学生。于大队行抵永汉路时，各校学生即次第会合行进。总领队为张农，各校自推1人为领队，沿途所经学校团体均联络参加，此外有工人1队，市民1队，参加人数约六七千人。凡参加巡行者均执标语旗帜，声势浩荡。其巡行路线，由东较场出发，经过惠爱路、永汉路、泰康路、维新路、一德路、太平路、西濠口、六二三路、上下九甫、西门、惠爱路、公园前，下午6时许至文明路中大旧校散队。沿途纠察队维持秩序，并高呼口号，情形异常壮烈。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10日）

**中大生毁教厅门额，邹鲁电京自请处分** 国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于昨9日举行抗敌示威大巡行，于是日下午5时半，到教育厅请愿，因斯时教厅业已放工，诂该生等竟将教育厅门额毁去。该校校长邹鲁昨电呈教部，自请处分。电云：分送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南京教育部均鉴：本校员生鉴于冀察局面日趋严重，爰有救国运动之举，热诚本堪钦佩，惟鲁开

员生大会，各生对教授发言动辄加以嬉笑，佳（9日）联合广州市内各校学生巡行，竟将教育厅门额毁去。似此举动，实鲁教育无方，至有此结果，应请明令斥革，严予处分，以明责任，而肃学风，不胜惶迫待命之至。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叩蒸（10日）印。

查9日中大学生举行抗敌宣誓典礼时，中大邹校长特派邓初民、萧鹏魂两教授代表前往监督。大学部由邓初民教授监督并训话，大意可归纳为两点：第一、抗敌工作，必须绝对的取得社会同情。第二，工作态度，必须严密组织，严守纪律。附中部由萧鹏魂教授监督并训话，大意亦可归纳为两点的云。

又本报接中大教授邓初民来函略称：“9日全市各校抗敌巡行，贵报载中大教授方面，弟亦参加，殊非事实。查昨日午前11时，为敝校大学部在总理铜像前午后1时半为附中部在东较场举行抗敌宣誓典礼之期，敝校邹校长特派弟与萧鹏魂前往监督，职务完毕，即行返寓，恐有误会，务乞更正。”云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11日）

**各校代表晋京听训** 本省公私立中上学校代表入京听训一事，各校代表经由教厅揭派省女师校长李雪英代表省立中学校、知用中学校长张瑞权代表私立中学校、大学校代表由各该校自行派定。现因国民大学派副校长张香谱、岭南大学派谭焯煊、市立学校人选未定或不举派，前（9）日下午7时许，教育厅长黄麟书以各校代表经推定，首途在即，特于是晚在该厅会议室设宴饯别，昨（10）日各代表经将行李部署完竣，除知用代表张瑞权因香港私事，先行于昨日下午乘广

九车赴港，其余代表则定今（11）日下午乘第一次快车赴港，乘法轮霞飞将军号于1时启行，计程14日抵南京，15日由蒋院长中正训话。

（《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月11日）

**勤大工科学生成立救国会** 勤大工学院全体学生日前通电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并请政府剋日对敌宣战，昨（12）日下午7时复集于该院大礼堂开全体大会，讨论救亡工作，当即议决成立勤大工学院学生救国会，接收该院原有之学生会，并救亡方策多种，抗敌空气甚为紧张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13日）

**中大学生昨巡行与市民冲突** 西南政务委员会为完成各校学生救国会志愿，俾免误入歧途，特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剋日组织救国义勇队、救国看护队。惟自队部成立，通告各校学生报名入队受训以来，未见学生参加，而中大一部分学生复结队分赴各校要求罢课巡行。昨（13）日上午9时，广州国民大学学生又在荔枝湾本校开会，议决：一、即日起罢课；二、请学校免学期考试，并请一律准予及格；三、请学校发给出发旅费每人200元。旋有中大学生数十人，身怀武器，到场要求该校学生列队巡行，迨行抵荔枝湾桥脚附近，与自称市民救国锄奸团相遇，发生冲突。中大学生首以旗杆铁枝为武器。登时秩序大乱。事后查悉该自称市民救国锄奸团内有两人被伤。事后所有巡行学生皆即星散，民大亦经布告放假。又勤勤大学工学院昨日晨正在举行学期考试，亦到有中大学生数十人到校要求罢课巡行，该院学生旋即召集学生大会，议决：一、罢课；二、请求学校停止学期考试，并

请校门关闭，校内教职员均不准出入。迨至 11 时正遂列队出发巡行，及至西华路附近，该院学生不知如何，发生小冲突，幸无伤人，旋亦散队云。

（《广州民国日报》1936 年 1 月 14 日）

**全市划分四区办理警备事宜** 市内军警暂归戒严司令调度，西南政务委员会近以各校学生四出游行，且有挟枪械与市民发生冲突情事，以此影响治安甚大，并日特令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宣布临时戒严，陈总司令奉命后，即委总部参谋长缪培南兼任戒严司令。并查缪氏奉委后，经于 13 日在总部设部办公，是晚 11 时起，开始戒严。在戒严期内，所有戒严区域内军警暂时统由戒严司令指挥，并将市郊划分四区办理：一、燕塘沙河一带由军校负责巩固；二、河南东山一带由公安局负责；三、大小北、石牌、黄沙、西村由教导师负责；四、东山河南及市内要冲由公安局保安队负责。自决定分区办理戒严事宜后，即于前晚各派军警在区内要冲把守，来往行人车辆须经检查方准通过，如遇有形迹可疑或携有枪械认为暂时有代储存必要者，由各长官体察情形临时决定。宪兵司令部省会公安局仍派铁甲车队、单车车队、保安队梭巡市区，随时检查车辆，故治安甚佳。

（《广州民国日报》1936 年 1 月 15 日）

## 二、《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报道选

**本校教职员电请一中全会** 本校全体教职员，以暴日既夺我东北，又煽动通州自治，华北危殆，国将不国，与其忍辱图存而必不能存，曷若以武力救亡而未必即亡。爰于支

(4) 日电请一中会全，迅下决心，鞭策中央，挥军戡乱，御侮救亡，同人等当效死前驱，以尽匹夫之责云，原电如下：

南京一中全会钧鉴：日人夺我东北不已，今又煽动通州自治，前耻未雪，华北濒危，怒目裂肤，已难再忍。固知鲸吞之势，非尽全国土地不止，与其忍辱图存而必不能存，曷若以武力救亡而未必即亡。否则东北即失，华北五省，亦非我有，华中华南，深恐次第吞噬，中枢迄今犹迟徊审顾，岂不以准备为词。然我之准备者之一，人之准备者十，程度永相悬绝，抵抗必成空言。窃谓以忍求存则可，若以忍召亡则何如与数十盪十决，虽壮烈而死，犹愈于生以待毙乎？今日之事，义无反顾，应请钧会迅下决心，鞭策中央，速挥御侮之师，以雪失地亡省之辱。同人等凛怀国难，痛逾切肤，义当披发纓冠，效死前驱，以尽匹夫之责。临电迫切，伏维垂鉴！国立中山大学全体教职员叩支印。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12月9日）

**本校学生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 本校各院系同学，为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屈辱，在华北成立变相之自治政府，及声援无理被逮之平津爱国学生起见，特于昨（12）日上午10时在大礼堂召集全体同学开抗日救国大会，届时同学参加者2000余人，首由赵君哲君宣布开会理由，继推举张农、李树、黄继梅、黄弘通、曾矩庭、李康寿等为临时主席团。萧怀德、冯少道、李鹿传、江犛为纪录，行礼如仪毕，主席团先后宣读各院系提案，旋讨论下列各要案：一、通电响应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案。决议：通过。二、通电联络上海学生共同救亡案。议决：通过。三、通电全国民众奋起救亡案。议决：通过。四、关于用本校全体学生名义发起组织全国学生救亡联合会案。

议决：通过。五、通电慰藉北平受伤同学并请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案。议决：通过。六、电请邹校长在京就近督促中央抗日，并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之组织案。议决：通过。七、关于通电质问政府压迫学生抗日运动之理由，并要求政府准许人民抗日言论自由案。议决：通过。九、电请中央政府立即对日宣战案。议决：通过。十、通电全国同胞声请奋起组织人民抗日救国军案。议决：通过。十一、本校全体同学应否立即举行示威大巡行案。议决：通过。并议定办法如后：1. 时间：本日下午1时。2. 集合地点：本校图书馆前。3. 由主席团派员通知附中附小届时集队参加。4. 集队以每班为1组，每系为1队，每学院为1大队，附中附小共为1大队。5. 排列次序依文法理工农医而定先后，各班代表负责维持秩序。6. 推出张农教授为总领队。7. 主席团负责率领各该院队伍。8. 在出发巡行期间，实行封锁各宿舍，不准同学逗留学校。9. 联合全校教职员工友一致参加示威巡行。10. 巡行路径及传单口号由主席团负责指定与印发。11. 出发巡行时，各同学一律穿着制服。十二、请求西南政府撤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恢复言论自由案。议决：通过。十三、由本校发起组织全市学生抗日宣传队，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案。议决：通过”。十四、请求学校拨款交理工学院从速制备大帮防毒面具案，议决：通过。十五、本校抗日运动所需经费，应请求学校准予移用本校救国会经费案。议决：通过。十六、关于巡行时如有同学中途退出者应作汉奸论案。议决：通过。会议至此，因距离出发巡行时间不远，当即宣布暂时散会，使各同学对于出发事宜，得有准备，未议各案，移至今日（13）上午9时继续会议时，再提会讨论。昨日下午1时在图书馆前集合，列队出发到市内会同附校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巡行，计全校参加



学生不下 5000 人，并沿途分发告同胞书如后：

我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我们今天是从课室里跑出来到这里巡行的。我们这回巡行，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示威，是我们中华民族力量的表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今日的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逼迫的侵略，给政府当局无限的容忍，已弄成国不国民不民的殖民地的国家了。今日的中国，东北四省失去了，华北行将分裂了。国内各地又有不断的所谓“浪人”的横行跋扈。问起中国的国权，国权实在看不见了；说到人民，则日本帝国主义的军械的枪刀，经济的枪刀，都已经架在我们个个国民的颈上了。所以若说中国仍是一个国家，真是只有驱壳而无实体；若说我们的同胞仍是国民，也真是只有名义而无内容，这当然是惨极了！！然而我们中华民族的份子，是有明确的认识，是有宝贵的热血的。我们明确的认识是认为当前的中国再不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了，这就是我们要求立即抵抗日本的理由。其次，我们要拿民族的热血做武器，以求贯彻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屈服，我们不妥协，我们要立刻抗日。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民族坚强的力量，我们主张立刻抗日，就是我们民族力量的表现。同胞们！国事急矣！我们快起来吧！重复我们的说话！

我们已认明白今日的中国是非立刻抗日不可了。

我们要拿我们每个民族份子的力量组合起来做抵抗日本的武器。

胜利是在明日，明日是我们的！

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学生谨启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 年 12 月 13 日）

本校员生工友昨开抗日救国大会 途因华北风云险恶，

因势危殆本校员生工友为抗日救国起见，连日分别召开抗日大会，讨论一切救国进行事宜，各情迭志前讯。昨（16）日上午9时复在本校大礼堂，召开全校员生工友抗日大会，出席者有各学院暨各附校员生工友3000多人，公推教授萧冠英、邓初民、何衍琰、张农，及学生李树、李继梅、黄弘通、曾矩庭、陈国治、尹可权、曾邦迈、谢永龄为主席团，纪录萧怀德、李鹿传、江肇。行礼如仪毕，即次第报告及讨论章程提案。并将各情探录如后：

甲、报告事项。

一、由主席团主席宣布开会理由（略）

二、抗日会筹备委员李树报告筹备工作经过，及学校当局召集谈话情形。

三、黄弘通君报告出席市学联会被拒情形。

四、主席团介绍仲元中学代表黄金鸿君发表意见，略谓今日参加本校抗日大会，乃希望共同进行救国工作等语。

五、邓初民先生发表意见，略谓：1. 抗日工作是带长期性的，吾人抗日，时时都在奋斗中，希望保持沉着的精神，打倒一切帝国主义。2. 把此种抗日精神及力量扩大，因为在中大或在广州一隅，都是受外界压力所拘，而不能自由发展的。3. 拥护西南当局抗日主张，凡是抗日的，我们都应该拥护，以充实抗日的力量。4. 抗日运动中的牺牲是必然的，但要有效率的有计划的牺牲，抗日工作须顾及环境，但此非客观主义的论调，而是有效的沉着的应战。

六、郑彦芬先生发表意见。1. 同情及钦佩本校同学前周大巡行的精神。2. 完全同意邓教授之意见。3. 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奋斗，但须先具二条件：a、要有严密的组织。b、须顾虑环境的限制。4. 教职员与同学，对抗日工作应本合作精

神打成一片，救国为吾人之责任，亦为公民的义务，万勿以抗日为光荣或有名誉的事情，使在抗日运动中，参杂有不纯粹的成分。5. 在停课期间内应有救国工作之表现，不应故意规避，贻人口实，本人愿以充分精神，利用此时间做抗日工作，如有违背诺言，甘受全体同学严励之处分。

七、任启珊先生报告本校教职员抗日救国大会情形。

乙、讨论事项。

一、关于筹委会提出之抗日会章程应如何修正案。议决：照修正意见通过。

二、关于停课期内抗日工作应如何分配案。议决：交筹委会办理。办法：1. 组织宣传队。2. 组织纠察队。3. 组织交通队。4. 组织出版处。

三、关于筹备全市仇货展览会以资鉴别知所抵制案。议决：通过。交筹委会办理。

四、关于扩大宣传，联络市内各校同学举办总示威运动案。议决：通过。交筹委会酌量办理。

五、略

六、关于本校抗日会经费应如何筹措案。议决：办法如下：1. 请示学校照旧补助。2. 如学校不允许补助时，则学生在保证金项下扣出一元，教职员一次过扣薪十分之一，以充本会经费（工友免缴）。

七、关于各班系抗日会章程应如何规划案。议决：交大会主席团负责起草。

八、关于抗日会执行委员会应何时选出案。议决：待本星期四日上课后始行选出。

九、在停课期内应请本校教授演讲抗日救国论案。议决：通过，交筹委会办理。

十、在停课期内，应出版抗日刊案。议决：归并第二条议案，交筹委会办理。各项提案讨论完毕，时已下午两点，主席团宣布散会。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12月17日）

**本校抗日会宣传队昨已出发宣传** 本校抗日会宣传部遵照全体会议议决案，组织宣传队，全体出市内宣传，经于昨（17）日正午12时齐集大礼堂，乘校车出发市内宣传，计全校分5大队（医学院附校除外），每大队共分若干小队，计共133小队，每小队设小队长1人，队员10余人，其分配如下：宣传总队长黄弘通、李康寿。第一大队（文学院），第一大队长：钟铎声、廖嘉祥，内分47小队。第二大队（法学院），第二大队长：钟君翼、叶汉生，内分25小队。第三大队（理学院），第三大队长：黄继梅、王昌云，内分16小队。第四大队（工学院），第四大队长：黄士崇、卢祝尧，内分27小队。第五大队（农学院），第五大队长：李康寿、邓兆槐，内分17小队。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12月18日）

**抗日筹委会宣传部部务会议录** 日期：12月16日下午3时。地点：第四宿舍会客室。出席者：李康寿、黄弘通、朱质文、卢祝尧、钟远蕃、翔万和、罗宗煌、刘挺文、谢惠保、叶汉生、吴蔚民、钟铎声、刘一衡、钟君翼、邓兆槐。主席：黄弘通。纪录：李康寿。行礼如仪，主席宣布开会理由。讨论事项：

一、宣传队分队之原则应如何决定案。议决：以班为单位，并宜顾及宿舍情形。

二、关于宣传若干日如何决定案。议决：全校总动员两日（星期二、三两日）。

三、宣传大纲应如何决定案。议决：照修正通过。

四、告同胞书应如何决定案。议决：照修正通过。

五、关于宣传时间如何分配案。议决：文法理工农各学院负责日间宣传，每日正午出发，医学院及高初中负责夜间宣传，每日下午 6 时半出发。

六、关于交涉校车推何人负责案。议决：交宣传部协同交际部办理。

七、关于宣传用品应由何人负责办理案。议决：旗帜襟章等物交由曾炬庭君负责办理。

八、关于交通事宜应如何办理案。议决：由纠察部负责。

九、关于另组宣传队到各校宣传应如何办理案。议决：另组 5 队特别队，并即席推定霍赐影、钟远蕃、虞焕章、赵君哲、翔万和 5 位负责组织，并请纠察部每组派两位纠察协助。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 年 12 月 19 日）

**本校教职员抗日工作近讯** 自暴日侵略华北，利用汉奸组织伪自治机关，北平教育界学生奋起游行示威运动之后。本校员生亦于 12 日继起响应，通电游行，唤起民众。而本校教职员复于本月 15 日开抗日救国大会详情已志本报，现探悉该会代表最近工作录登如左：

一、17 日晚 7 时在文明路大钟楼开会，议决各案：1. 讨论大会交撰致全国通电案。议决：修正通过。2. 如何联络广州市教育界作抗日工作案。议决：先联络本市各大学教职员。3. 联络本市各大学人选如何推定案。议决：a、推任启珊、崔载阳两教授赴勸大师范学院、广东法学院、广州法学院、光

华医学院。b、推阳之春、傅尚霖两教授赴岭南大学。c、推方棣棠、康辛元两教授赴勤大工学院。d、推黎东方教授赴勤大商学院。e、推李函谷、陈廷璠两教授赴广州大学、国民大学。

二、19日晚7时在文明路旧校大钟楼开会，议决各案：1. 各代表报告赴各校联络情形。2. 各大学均表示赞同一致行动，现应如何进行案？议决：定本月22日下午2时，在旧校大钟楼召集各校代表开谈话会。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12月23日）

**本校学生昨举行第二次抗日巡行** 本校抗日救国筹委会，于昨（31）日上午9时许，在新校大礼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各院系同学，依时莅会者，极为踊跃，公推曾振声、钟远蕃、李康寿等5人为临时主席团，曾振声为主席团主席，领导行礼，并宣布开会理由，继即议决下列两要案：一、即日联络全市学生，举行总动员抗敌示威大巡行；二、定1月4日上午9时继续开第二次大会，并即席推派代表，先行出发本市联络各校学生，于是日下午1时集合文明路旧校大操场出发，至巡行救护工作，由医学院全体同学担任，直至11时始散会。负责人员，即分头联络各校学生参加，并预先在文明路旧校布置一切，及满贴各种标语，下午1时许，各院系同学即首途出发市内，齐集旧校大操场。附属中学及执信、庚戌、市三中等校学生亦陆续莅场参加。惟因本校筹委会是日临时召集开会，各院系同学，间有未及参加，其余市内各校，又因元旦假期，多已提前一日放假，致未能全数参加。计是日参加巡行者，约共2000人。各同学齐集后，由是日日本校大会主席团主席曾振声宣布大巡行动机及其意义，随即列队出发，总领队由本校各学院共推5人担任，先赴西南政务会请

愿，请愿要点有二、1. 请政府准许学生及民众抗日救国集会行动言论出版之自由；2. 请西南政委会宣布对日外交态度。查该会派代表答复后，各生即继续巡行。各巡行者均手执旗帜，纠察队沿途维持秩序，及散发告同胞书。巡行路径，计由旧校操场起，经德政路，永汉南路，长堤，六二三路，大同路，珠玑路，第十甫，丰宁路，惠爱路。其他各校学生，回至中央公园散队，本校学生，则回至旧校操扬散队，沿途高呼口号，秩序整齐肃，市民极表同情，直至6时余始毕。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月4日）

**本校昨午开全体员生工友抗日会** 本校全体员生工友，于昨（6）日下午2时在新校大礼堂，开抗日救国大会，各学院及附中员生工友参加者数千人，公推邹校长及上星期六大会临时主席团为临时主席团，先由校长领导全体员生工友举行抗日宣誓，表示全校员生工友团结一致，誓死抗日。继宣布开会理由。随讨论抗日救国一切进行事宜，议决要案多宗，并议决各院部区已选出抗日会委员，即席先行宣誓就职，正式成立本校员生工友抗日救国委员会，负责办理全校一切抗日救国工作，至其余各院部未选出委员者，应从速选举，当即由校长领导各委员，在大礼堂向总理遗像举右手宣誓，直至5时许始行散会，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月7日）

**本校全体员生工友非常抗日大会会议录** 时间：廿五年元月六日下午二时。地点：新校大礼堂。主席团：邹校长、曾振声、钟远蕃、张凤楼、李康寿、陈瑞勋、陈柏昌、张农、张万久、郑显准。主席团主席：邹校长。纪录：粟稔、陈克勋

(缺)、冯少杜、胡人任。行礼如仪。

### 甲、报告事项

#### 一、主席团报告开会理由（略）

二、本月 4 日大会主席团代表报告工作经过（详见报告书）。

三、抗日会筹委会代表报告工作经过（详情另发报告书）。

### 乙、讨论事项

一、关于“教职员区代表人数减少至 4 人，以致抗日执委会人数成为双数，应如何办理”案。议决：校长当然委员，使教职员区代表增至 5 人。

二、关于“本月 4 日大会议决案举行扩大抗日宣传应否再定有效办法”案。议决：办法如下：1. 抗日执委会未成立时，宣传事宜，应交本会临时主席团协同筹委会办理。2. 由宣传工作负责机关，定期召集全体宣传队员宣誓出发。3. 执行前次会议议决案，由学校拨出学生基金 1 元，教职员月薪十分之一，以作宣传工作之用。4. 愿留校工作者，由负责机关编予各种工作。5. 由学校通函省政府及各地军政机关，切实保护本校宣传队。6. 由校长转请西南政务委员会通令各舟车交通机关，准予宣传工作人员免费来往。

三、关于“在抗日运动时期医科同学应马上组织战地救护队加紧工作”案。议决：通过。

四、关于“应否举行全市学生联合大会”案。议决：由主席团负责筹办之。

五、关于“抗日会执委会应再限期促其成立”案。议决：立即在本会场中举行成立典礼。

六、关于“在宣传期中工作紧张，所有进行事宜应由抗



日执行委员会，本会主席团，及筹备委员会共同负责办理之”案。议决：通过。

七、关于“下乡宣传队于负责宣传外，并应调查各地农村状况”案。议决：通过。

八、关于“附中赴会车费应否由抗日会支付”案。议决：通过。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月8日）

**本校抗日宣传队今晨宣誓出发** 本校抗日会为唤起民众，一致奋起抗敌救亡，特组织宣传队出发粤桂各地宣传，并为表示郑重起见，定于今（8日）早9时，大学同学在新校总理铜像前，附中同学在东较场分别举行宣誓礼，以表郑重，而示决心。该会负责人已赶速制备旗帜、宣传品、工作报告表及请领舟车免费证等物，以便分发各队员。闻每队由10人至20人，队设队长纠察各一，以专责成。由昨日起已开始报告，自由认定宣传地点，计截至昨日晚止，报名参加者已有数十队，预计参加者，约有百余队，一俟举行宣誓后，各种手续办理完毕，即可陆续出发各地宣传。又闻教职员中，昨日报名参加者，亦有多人云。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月8日）

### 三、《救国时报》报道选

**粵当局竟受日贼唆使枪杀示威学生** 14日广州电：中山大学学生千五百人昨举行反日大示威，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讨伐北方叛逆！”等口号。宪兵向示威者开枪，学

生仍坚持前进。学生死4人，重伤14人，轻伤无数，示威领袖多人被捕。

15日东京同盟社电：13日广州反日示威学生受宪兵打伤者50人。枪杀学生事变发生后，学生又开群众大会，除提出反日口号外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工具的广州政府！”“驱逐反动军阀陈济棠！”

14日香港电：昨日示威事变结果，广州宣布戒严。军队一团，奉命包围中山大学。各要隘军警增防，警察搜查行人，如临大敌。全城学校关闭，禁止一切会议。中山大学各部主任宣布辞职。英法领事馆令英法侨民即迁入沙面。

14日广州电：路透社称，数日前，驻粤日领事会曾向华当局提出镇压学生反日运动办法。示威事变及广州宣布戒严后，日领对华当局之办法，表示满意。

（《救国时报》1936年1月19日）

广州学生誓死救国 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国的义旗一举，全国景从，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学生，当然不居人后。12月12日广州市便有援应北平示威的大巡行，击破了华南沉闷的空气。13日中山大学员生工友3000余人举行大会，选举抗日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宣传队、纠察队。号召抵制日货，罢课一周，真个抗日怒潮万丈涌起。

自12月12日广州示威巡行后，日寇驻粤总领事河湘、武宫白田，便再三向陈济棠口头的或正式的抗议。日领对陈的威胁口气竟如此，谓“粤学生再有示威运动，日领不敢负安全责任”。陈济棠的答复，是“尽力约束”。而教育厅长黄麟书，更诡计多端，实行分离学生爱国的统一路线，想把学生分成多个营垒，以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相对立，以私立学校

与官立学校相对立，以教会学校与非教会学校相对立，以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与中大抗日救国会筹备会相对立，以教职员学校工友与学生相对立等等，尽鬼蜮手腕的能事。

但是广州学生的爱国运动，始终是一心一意，联合一致的。“一二九”的第一周月日，中山大学学生便联合省立广雅中学、执信、仲元等中学六七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包围教育厅，要求政府出兵讨逆，收复失地，陈济棠竟下令戒严，派宪兵直接监察学生，且美其名曰组织救国义勇军救国义勇队，强迫学生编入。宪兵司令利树宗马上派大批宪兵分扎该日游行各校，自率第18队宪兵设“广东救国义勇军总队部”，办公处于中大军训处和农学院。全市学生更为愤怒非常，说：“巧立名目，派宪兵分驻各校监视学生，我们誓死力争，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计。”布告报名入伍，当然没有一个学生理睬。

全市学生的积愤，至13日上午7时，中大、民大、市立二中，越山中学、国民大学等数千人，忽自动示威游行抗议，手执旗帜，高呼口号。行至坤维女中附近，突来汽车一辆，满载便装短衣打手10余人，手持“民众锄奸团”旗帜，强迫解散队伍，并殴打掌旗前导的学生，因之混战10余分钟。旋又到装货汽车一辆，满载力士20余人，立加入该团，枪声卜卜，重伤学生数10人，并当场击毙数人，各生被迫散去。而自称“民众锄奸团”者，即乘原车驰去。这样的“民众”把戏，只有日本人在平津华北风行扮演，那知竟有人扮演于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了。

陈济棠黄麟书等，还继续有系统有计划地做他们的诬蔑和压迫残害爱国学生的行为。一面说学生行动“越轨”，一面令军警围搜各学校宿舍，学生被捕失踪者无数。同时命令各学校立刻放假；学生不愿加入义勇军训练，便勒令离校回家。

但是中大学生却再接再厉。13日下午5时重行示威游行，包围西南政务会，要求释放被捕爱国学生，抚卹重伤学生；查究“民众锄奸团”；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邹鲁觉得自己处境左右为难，已宣言辞职。

全市民众都愤怒至极，对于学生极表同情，一致声言不愿再缴抗日捐。平常号为“安分守己”的私立勤勤大学学生，正在考试之际，亦立刻决议罢课，对上午受伤被捕的同学表示同情。广州学生的团结一致，已更具体化。学生除在城内示威外，并分头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因怕陈济棠干涉，则以农村考查团等名义行之，同时工友商民亦跃跃欲试，俟机一涉他们爱国忠悃，表示他们同声相应的义气。

1936年1月15日写于香港

（《救国时报》1936年2月12日）

广州举行各界10万人反日大示威 据13日广州路透社电，本日在广州举行广大雄壮之反日示威，参加者工人、学生、兵士、苦力、店员、职员等10万人以上。四郊农民闻讯到来参加者亦数千人，各校一律停课；各工厂、银行及其他企业一律停业，使大家参加示威。示威者高举反日标语，散发传单，并在大会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街上满贴标语，号召立即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全城抗日空气，十分高涨云。但该社又谓，当群众举行反日示威时，当局曾决定采取严厉办法以“防范共产党份子”云。按粤当局此次允许反日示威，较之从前禁止与镇压学生及各界群众反日运动之政策，实已迟了一步，想亦系西南当局逐渐觉悟到要抗日必须发展民众反日运动使然；但若然出动抗日之时，仍未能捐弃一切党派成见，若仍籍“防共”之名，来

企图控制，把持以至镇压反日群众运动，则非特大悖西南领袖邹鲁、李、白等联合一切党派以抗日救国之宣言，实亦不符西南领袖号召全国民众齐起抗日之原旨，是则不免使国人及各党派有无从协助西南抗日之危险，而西南亦因此而削弱其自身抗日之力量，故无论就抗日救国上来看，或就西南本身利益来看，均应即毅然开展群众反日运动，实行欢迎各党派合作抗日，此固西南当局之前要图；实亦我一切爱国同胞应提出之要求。

（《救国时报》1936年6月20日）

#### 四、《大众日报》报道选

**珠光里疑案真相**（广州专讯）昨日报载珠光里某号住宅被拘去学生多人，有谓系共产党者。并查该宅为第六师长黄质文家，其子某为广雅学生，热心国事，与同学感情甚笃，常相聚晤，共谋抗日救国，因与同学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准备作实际行动。此组织渐扩大至各校学生，印发宣传品如大众文化等，并为商策进行工作起见，常相聚开会，致启警察之疑，乃有此次之祸，查彼等纯系热血纯洁青年，言论间不无过激，但纯系出于爱国举动。当局拘获彼等，闻已询明实情，黄师长之子亦在被捕之列。黄师长已向总部申述一切，想此案不致扩大，有等记者不察，竟指为共党，实未明真相也。

（《大众日报》1936年6月9日）

**文化界昨追悼鲁迅** 中国文学巨人周树人（鲁迅）先生，日前在沪逝，中外文化界闻讯，同深悼惜，广州各文化团体

特于昨（8）日正午 12 时，假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计各团参加者，有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广州艺术工作协会、世界语研究会、努力文艺社、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广州民众歌咏团、广州妇女歌咏团、我们的路社、少年歌咏团、文学生活社、大众文学社、新儿童社、前进社、锋社、众社等数十团体，人数凡千余人。事前经由该会筹备会将礼堂布置妥当，堂之台上正中悬挂水彩绘就之鲁迅先生的遗象一幅，其旁边挂各界致送之挽联，像前罗列花圈甚多，礼堂内外四周均张贴有纪念鲁迅之标语，情形甚为肃穆。如时行礼，推定余瑞尧、胡春冰、陈达人、徐青、李桦及妇女歌咏团代表为主席团，而余瑞尧为主席团主席，而鲁迅先生之妻妹许月平女士，亦亲临参加，并报告鲁迅行状。行礼秩序为。一、全体肃立。二、奏哀乐及唱追悼鲁迅先生歌。三、四、（略）五、为纪念鲁迅先生全体默哀 2 分钟。六、主席致开会词。七、报告筹备经过。八、报告鲁迅先生作品。九、各名流学者演说。十、各文化团体代表演说。十一、关于鲁迅先生之研究演说。十二、自由演说。十三、临时动议。十四、奏哀乐及唱歌。十五、各文化团体代表献花圈。十六、礼成。礼毕后，该会复以北平教育界日前曾发出之八大要求，议决通电拥护，直至下午 3 时奏哀乐而散。查奏哀乐时，各界人士多有哀恸痛哭者云。

（《大众日报》1936 年 11 月 9 日）

中大员生明日追悼冯道先 中大文学院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冯道先，于本年 1 月 13 日参各界抗日示威巡行，至荔湾桥头，惨遭前公安局组织之所谓市民锄奸团掳去，迨至 3 月 25 日，押回公安局，结果在陈济棠出走之翌日（7 月 19 日）

突将之押赴臭岗枪杀。现该校员生特发起追悼大会，定期明(19)日，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并将冯道先身世及遭难经过等情形，探录如次：

冯氏身世。冯道先，字德新，合浦人，毕业省十一中学(现改名廉州中学)后，在高师攻读一年，即不继，旋执粉笔生涯凡10余年，民廿二年，始得乡友资助，复入中大高中二年级肄业。冯喜攻新兴社会科学，在中学时期，目睹故乡学校之腐败，风气闭塞，以为实旧有社会之种祸，故广罗思想新颖有志之青年结成阵线，曾一度在廉北鼓动轰轰烈烈之学生运动，被邑中顽固乡坤，控以激烈，逮之下狱，现年31岁，昆仲5人，冯居长，父早歿，其祖父闻冯死，呼怆而逝。冯21岁结婚，妻住北海，已病两年，家人对冯惨事秘而不宣，恐其殉夫，现遗孤二、均幼。

遭难经过。荔湾惨案发生，冯被拘，即于1月13日被奸人囚于白云山能仁寺内一黑室，后再移囚于无尘境殿后面，当时8枝新式短枪看守，17日又移于黄岗地方，至2月18日再行迁往别处，是时看守者由8人减为2个工人，再隔两天后夜间，又移到芳村，3月25日晨5时35分押到省会公安局，卒于7月19日横遭惨杀。

举行追悼。中大员生以冯在校有年，此次竟不幸为爱国而惨死，除成立“筹备追悼冯道先大会”外，并拟集资为冯营葬建碑，刊印遗作，及抚卹家属。查连日捐款者极为踊跃，此次追悼会全校挽联甚多，记其两则：“捲地秋声，犹悼英年建危命；问天无语，空闻子夜有悲歌”。(文学院长范琦挽)。“死不逢时，四众同悲石牌道；魂归何处，秋涛犹咽荔枝湾”。(文学院教授王越挽)

(《大众日报》1936年11月18日)

一页救国学生血史（广州专讯）今日中大员生开会追悼荔湾惨案牺牲之同学冯道先君，已志昨讯。并续查冯君遇难经过详情如下，以见军阀统治之黑暗，与救国分子所受之惨遇。

奸人嫉视。记者据与冯君同时被掳之谋学生述。某君云，本年1月，中大学生因援助北平学生抗日运动，发起罢课示威运动，尤以同学冯道先主持最力。冯本为合浦人，与陈济棠、林翼中等有同乡之谊。去年中大发生逐邹运动，林某覬觎中大校长一席。林派中人，欲引冯为己用，诂冯深鄙林之为人，不为所动，于是林系中人，指之为共产党，亟欲去之而后快。本年1月13日，中大同学参加荔湾示威巡行，冯君为领队。

惨案发生。大队正启行中，突有所谓市民锄奸团者（即广州公安局所组织之奸徒），将冯君及同学共5人，强拉上铁甲囚车，沿观音山脚驶至白云山，挟枪者入押车，且行且用枪头将我等殴打。有两同学被欧满头进血，尤以冯君受伤为重。初拥至山脚某工场内，入夜乃押上山，囚于能仁寺内一黑室，仍由手持新式左轮手枪操广州音之8大汉经手，其中两大汉露出公安局号带，其余各裹黑绸纱带，一望而知其为侦缉中人。我等叩其原因，彼等初则谓是绿林，继谓市民锄奸团。

行同土匪。在该黑室，住了两夜，每日有人送饭与彼等同吃，越两夜，又将我等囚于无尘境殿后面，彼等佯称索我等地址，写信回家勒索，表示彼等真为土匪。至是月17日，又将我等移囚于黄花岗附近村落，时已易人看管，18日复移囚于三元里附近，继又移至芳村，直至3月24夜，有所谓警察等，由一线人至芳村木屋内，将我等起出。当军警未至之



前，只有两人看守，而军警未至之前 1 小时，看守者已预先走避，及军警到时，声言凭线特将等起掳。起掳后，直解公安局，局中人亦言据报起掳。我等即要求其释放，局谓放你走，恐防再发生危险，不如保护你们，暂且留局，俟本局肃清锄奸团后，始将你们送到学校去。

惨施毒手。至 7 月 19 日，陈济棠出走之前一日，由局下令始将我同学 4 人省释，而冯君竟遭枪决。据局宣称，冯君罪状为共产党，初当局本欲杀尽我辈，以为塞口，盖恐我辈将挟掳我等黑幕尽情揭出，于彼不利，闻经某氏力阻，结果只杀冯君 1 人。我等出虎口后，父兄相戒勿将经过扬于外，恐触当局之怒，发生不测，故我等始终不敢向人道述其事。今所谓锄奸领袖走了，我等始敢宣扬其事云云。

（《大众日报》1936 年 11 月 19 日）

# “一二·九”前后广州学生运动大事记

广州青运史研究室

1935年

6、7月 侵占我东北三省的日本侵略者又加紧对热河、察哈尔和关内的进逼，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继续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先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使日寇实际上控制了冀察两省大部分地区。

6月22日 广州中山大学全体教员、学生召开大会，决定联络各校团体加紧抗日工作，抵制日货，请各乡加紧民团之组织与训练，并通过了《广州中山大学全体员生电责南京抗敌救亡》的通电。

7月 原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出版部发行工作的王均予从上海到广州，根据秘密刊物《时代文化》读者会的发行关系，与勳勤大学学生邱萃藻取得联系，并商量决定在勳大、中大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青年同盟”。首先发展了邱萃藻，又吸收林振华、钱兴、粟稔、李驹良、曾振声等人为盟员，以后又陆续在中大、勳大、中大高中部、初中部、广雅、大中、知用、执信、女师、庚戌、仲凯等校发展一批成员。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达到全国武力、人

力、财力总动员，实现武装抗日，《八一宣言》发表后，在国内各阶层中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应。

10月 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张直心、吴超炯、叶乃勋、陈维岳、杜埃等人在地下党员何思敬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突进社”，出版秘密刊物《突进》。“突进社”成立后陆续在中大、广州大学、执信、广雅、中大附小、越山中学、市二职、南京中学及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了社员。开展各种形式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与此前后，“马列主义行动团”、“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反帝反封建大同盟”、“行社”等各种秘密组织和读书会在各校陆续出现，他们争相阅读革命理论书籍，传阅有关我党抗日的主张和红军消息的报刊，谈论抗日反蒋的国家民族大事。有的秘密刻印我党《八一宣言》、宋庆龄等人的《保障人权同盟宣言》、《救国十大纲领》，剪贴抗日救亡活动的报章等等。蕴藏在广大青年学生中的抗日怒火迅速燃烧起来。

11月 日寇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的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为更好地领导学生抗日救国，北平市学联成立，并决定联络各大中学校行动，定于12月9日在天安门前广场集合，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和通电全国反对华北自治及一切伪组织。

11月23日 进步教授何思敬在《中山大学日报》刊登《悲壮的民族叙事诗·序曲·抗战之号召》，号召处在死亡线上的中国民族，动员起来，冲破一切阻碍，武装起来抗战。这对中大爱国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月4日 中山大学全体教职员电请南京国民党一中

全会迅速下决心，敦促中央速挥御侮之师，以雪失地亡省之辱。

12月9日 北平学生1万人，不顾军警的包围和阻挡，面对大刀、水龙、皮鞭和逮捕的威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冒着严寒，忍受饥饿，从早上到下午，举行了大规模的爱国请愿和示威。但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当场有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12月16日，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布成立，北京市学生和市民两万多人，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会议，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收复东北失地；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

12月10日 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的消息从报章上传来，广州的爱国青年学生无不为之鼓舞。下午，中山大学农学院廿七年班召开全班会议。商讨联络全院各班级进而全校，举行援助北平爱国学生的行动等事宜。当晚，中大各班代表在文学院宿舍召开会议，进步学生坚决反对在班代表中占优势的西南军阀御用学生组织“抗声社”分子提出只发宣言的提议，决定12日召开全校抗日大会。会后，进步同学自行组成夜呼队，分散到学校各宿舍前高呼“抗日救国，不落人后！”动员同学为抗日救国迅速行动起来，“中青”、“突进”各秘密组织和读书会的进步学生，也分头联络同学出席大会。当晚，文明路中大高中部寄宿的同学也在宿舍开会，讨论派人到石牌大学部联络并召开全校师生抗日大会的问题。

12月11日 中大研究生院属下各研究所同学会，通电全国声援北平学生爱国示威大游行。中大农、法、工、文各

学院分别召开师生会议讨论响应北平学生事宜。

12月12日 上午，中大全体师生员工3000多人在石牌大学本部举行隆重的抗日大会。“抗声社”分子企图阻挠，但大会仍按绝大多数爱国同学的意志作出决议：“举行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示威大巡行并公推教授张农为总领队；通电全国学生，声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电促邹鲁校长请中央决定抗敌讨逆大计；请西南政府出师北伐殷逆。”会后，下午由总领队率领全校师生从石牌出发到市内文明路会同医学院、中学部及教忠、大中等校同学共4000多人到市区游行，游行队伍高举“中大救国会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示威巡行”的横额，手持各种旗帜标语，沿途振臂高呼口号和高唱救亡歌曲，并散发告同学书等。队伍经过六二三路时，面对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情绪更加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反对妥协投降”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队伍行经之处，市民无不鼓掌致意。教授何思敬、邓初民等参加了当天学生的游行。

游行当晚，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分别约见把持中大抗日大会主席团的“抗声社”骨干分子曾矩庭、柯景濂、欧阳洁娴、李树等人，授意要运动适可而止。

12月13日 中大及附中学生在石牌礼堂再开抗日救国大会。决议自动停课一周，到市内及落乡开展抗日宣传；联络全市各校扩大示威运动；发起组织全市学生抗日会，取消官办的全市学生救国会等。同时，议决撤消该校有名无实的抗日救国会，另行组织中大抗日会，并由各学校选出该院筹委会人选，并定于16日召集全体员生大会，讨论本校抗日会组织章程及选举执行委员等事项。

同日，岭南大学全体华籍教职员员工通电中央政府立即讨

伐殷汝耕。仲元中学全体学生开会，议决一致加入中山大学学生救国会。

就日本驻粤领事照会省府，请即制止学生抗日运动事，教育厅长黄麟书特召中上学校校长开会查询学生运动情况并上报省府。省府主席林云陔即向西南政委会请示指导学生爱国运动方针。陈济棠急召中大教务长萧冠英，面谕萧设法劝止学生慎重从事，勿过于妄动。

12月15日 官办的“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在省参议会礼堂召开全市学校学生自治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以组织中日问题研究会、防空队、举办救国剧团，推举代表赴京请愿抗敌等方式进行抗日工作，中山大学派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的要求遭到会议把持者的拒绝。

同日，中山大学全体教职员四五百人在文明路旧礼堂开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抗日，督促政府派兵，诛锄汉奸，扫荡一切类似傀儡之组织。

12月16日 中山大学在石牌大礼堂召开抗日大会，各学院及附中全体师生员工3000多人参加，仲元中学派代表出席，大会听取了中大抗日会筹委会修订的组织章程后，又通过停课期内到市内扩大宣传及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和全市仇货展览会等案。邓初民教授在会上发言，告诫学生抗日工作是长期性的。要扩大抗日的宣传和力量，凡抗日的都应拥护，会后两天，中大抗日宣传队共计算133个小队分发市内各区交通要地、各私立学校宣传演讲，高中部、附中部分也组织宣传队前往韶关、三水、佛山、惠州等地宣传。

12月18日 勤勤大学教育学院、商学院全体师生分别召开抗日会议，议决组织学院救国会，通电慰问北平学生；19至22日各班自行组织宣传队出发到近郊及各县宣传抗日救

国。中大教职员、广东法学院学生自治会、培正等学校也先后通电全国疾呼抗日救亡，慰勉北平学生。

同日，国民大学及附中全体教职员开会，决议发出抗日救亡通电并讨论指导学生抗日运动的原则，决定改组原学生自治会为国民大学员生工友救国会。

12月20日 中山大学停课一周出发宣传抗日救亡的学生陆续回校。附中爱国学生决定罢课一周，下乡宣传。学校当局威迫学生上课，同时又通知各县解押已下乡的同学回校。陈济棠又召中大教授张农查询学生抗日运动情形，并要张农转告学生抗日运动不要过激，以不荒废学业及不妨碍外交为原则，等等。

12月22日 由中山大学教授发起，有中大、岭大、勤大、广大4间大学教授9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并发起由全市400名教授、教师签名发出3个通电，1. 致电北平学生，勉其组织起来，继续奋斗；2. 电促南京政府开放言论，勿压迫爱国运动，对日抗战；3. 致电全国各团体联合一致，作抗战准备，共促政府抗战。

同时，官办的广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筹备各校选派代表赴京请愿事宜。

12月23日晚 中大爱国学生在石牌礼堂请何思敬教授发表题为《荆棘之路、神圣之路》的抗日演说。

12月25日 省教育厅长黄麟书在教育厅召集各大学、学院及各公立中学校长开会，商议组织“广东省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以控制学生抗日运动的局势。

12月30日 中大学生在石牌礼堂再次召开抗日大会。会上，爱国学生严厉斥责“抗声社”成员把持抗日机构，实行“包而不办”的怠工行为，并议决撤消他们在抗日会筹委

会主席团的席位，重新由各学院选出张凤楼、张万久、钟远蕃、李康寿、陈柏昌等进步学生为代表组成主席团，并选出曾振声担任主席，大会决定通电全国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坚决反对华北自治；剋日组织中大的抗日救国会，领导中大的爱国运动；次日举行广州全市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扩大抗日宣传。

当晚，中大同学在文学院前的草地举行野火会，纵情高唱救亡歌曲，呼喊抗日口号，朝鲜籍进步学生金昌华沉痛地演说东北沦亡之苦，激起广大同学抗日怒火。

12月31日 中大爱国学生在文明路旧校操场，会同不顾校方百般恐吓跑来参加的执信、庚戌、仲元、市三中等学校学生共2000多人，列队到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学生代表要求政委会表明对华北自治及学生抗日运动的态度；要求享有抗日行动、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质问省教育厅为何下令停课、封锁学校阻止各校发动抗日示威等。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前宪兵持枪戒备，如临大敌，仅派一秘书出来应付了事。请愿学生举行示威巡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的卖国政策”、“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散发传单，直至傍晚才返回学校。

## 1936年

1月4日 官办的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开会，为赴京请愿的学生代表送行。

1月6日 刚从南京回广州的邹鲁召集全体师生“训话”一改过去反蒋常态，吹嘘蒋介石“准备抗日”，又责备学生抗日行动“过激”、“越轨”，宣布要取消抗日会筹委会，成立一个由他包办的“救国会”。由于进步学生会前做好宣传联络工



作，在教授邓初民等的支持下，同学在会上与邹鲁等人展开激烈的斗争，使“训话”大会转变为全校师生的抗日大会。大会通过决议，立即选举组成以进步学生和进步教职员为主的中大抗日会执委会；并决定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由学校在学生保证金项下拨出3000元作抗日会的经费。

同日，省立女师召开全体员生大会，讨论救国方案，并通过立即成立该校救国会等决议。

1月7日 中大抗日会执委开会决定自动停课1个月，成立扩大宣传委员会，组织同学分赴各县扩大抗日宣传，留校同学负责联络各学校进行宣传抗日工作。

1月9日 中大联络市内的中大附中、仲元、市三职、教忠、大中、执信、省女师、广雅等学校学生共万余人，冲破省教育厅的阻挠，集合到长堤新填地广场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由于中大学生宣传队富有成效的鼓动，大批市民、工人也聚拢到广场。使会场人数骤增到3万多人，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以取代官办的“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反对南京政府妥协投降政策，会后列队游行至西门始散。中大等校部分东行的队伍途经省教育厅时，质问教育厅当局为何阻挠学生抗日运动。教育厅无人出来答话，愤怒的学生随即一涌而入，砸烂教育厅的办公台、玻璃等物，中大附中学生还拆下“广东省教育厅”的招牌抬回学校。是晚，广雅爱国学生乘兴开会，决定成立广雅学生抗日救国会；停课1个月下乡宣传，发还伙食结余为下乡宣传费用；关闭校门，组织纠察队把守。教育厅长黄麟书谒见陈济棠，请求对学生严办，陈即令市党部和公安局会商对策，派

出便衣侦察前往中大、广雅等校搜集情报、监视学生。次日，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及中大抗日会积极分子曾振声等被迫先后避往香港。

1月10日 中大校长邹鲁因学生抗日游行怒砸教育厅一事，登报引咎自责，电京请求处分。

同日，广雅同学发现校外有便衣警察窥视包围，即电告中大抗日会请求援助。中大同学，闻讯由纠察队长冯道先带领两卡车同学驰往，带回校门前的1个可疑大汉回中大盘问。市公安局随即派人到中大领走此大汉。

是晚，民大附中为反对校方宣布提前考试和放假，由学生会主席唐凌鹰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议于13日发动示威游行，并派人到中大、中大附中、勤大工学院、大中、教忠等校联络。

1月11日 市二中校方锁上校门，不准走读生与寄宿生会合召开抗日大会。在爱国民主人士陈汝棠先生的指导下，中大同学3车人急驰市二中，与该校同学合力破锁开门，使抗日大会如期举行，会上决定成立市二中学生抗日会。

1月12日 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布命令，要全市大、中学生组织救国义勇队，派宪兵司令利树宗兼任总队长，下属三大队，队部分设于中大、广雅、市二中，企图通过组织救国义勇队控制学生运动。

是晚，勤勤大学工学院在西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会议，组成勤勤大学工学院学生救国会，翌日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

1月13日 国民大学附中联络各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市二中、绅维、培英、岭南大学分校及中大七八十个留校同学前往荔湾民大汇合，中大附中、大中、教忠等校同学应邀到财厅前汇合，准备参加游行。当民大、中大等校学生游行

队伍走到荔湾桥头时，遭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埋伏的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阻拦，他们手持枪械向天射击，挥动棍棒殴打学生，当场打伤学生几十人，又抓走中大纠察队长冯道先等5人，是为轰动一时的“荔湾惨案”。前往参加游行的勤勤大工学院学生队伍途经西华路时，也遭特务、流氓的殴打，受伤多人。

事发后，西南政务委员会即宣布全市戒严，派出大批军警进驻中大、广雅、市二中等校，断绝石牌交通，在车站、码头搜查“可疑”学生、又密令各县押送下乡宣传队的学生回城，继而先后逮捕中大爱国进步学生粟稔、张凤楼等几十人，3月中旬又捕去中大学生梁荣生、雷瑞英等人，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

2月2日 进驻中大、广雅等学校宪兵陆续撤走。

2月10日 中大开课，校方宣布不准曾振声、钱兴、李苏民等一批爱国进步学生注册上课。广雅校方也强令莫福枝、叶纫锋等爱国进步同学离校，经斗争后，校方才同意他们转读惠州中学。中大高中校部又宣布不让张寿南等同学回校上课。陈济棠强行宣布中大附中改为中山中学，并自任校长。各校各个学生进步秘密组织继续建立与扩大读书会，先后吸收一批在抗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骨干，并组成“抗日五人团”、“抗日十人团”，秘密进行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2月15日 金昌华、黄焕秋等385名中大学生联名上书邹鲁，要求设法援救被捕同学及准许未获注册的同学注册。社会系二年级学生29人联名上书，要求邹鲁向省公安局查明冯道先下落和准予朝鲜籍同学李苏民注册上课。中大朝鲜籍同学17人也联名上书邹鲁，声明与李苏民同退。与此前后，学生家长也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放人。在社会各方面舆论的压

力下，西南政务委员会被迫宣布解散“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答应查明冯道先等人的“下落”；邹鲁也被迫同意曾振声等同学回校注册上课。至4月24日。邹鲁才保释粟稔、李驹良、翔万和、张凤楼等人出狱。西南当局先后释放中大吴近保、民大附中杨鉴培、勳大工学院赖支栋等同学，但仍继续扣押与3人同时被捕的冯道先。

4月30日 南来广州的陶行知先生应邀前往石牌中大礼堂作题为“粉碎大陆政策”的演讲。号召全国大众联合起来，并且要不分区域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救国。以后，又在中大、勳大作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演讲。对中大等校进行拉丁化新文字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月31日 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东进步抗日团体派出5名代表参加大会，工人代表洪飏，文艺界代表石辟澜，文化界代表何思敬，学生界代表方少逸、吴超炯。会后，何思敬、陈汝棠、李章达等人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南方总部”（简称“南总”）。

6月1日 国民党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了“西南事变”，出兵湖南，与南京政府相对抗，并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

6月4日 广州各界团体8000多人在省参议会礼堂开会，会后列队向西南政务委员会及第一集团军总部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抗日。

6月6日 勳大教育学院全体师生召开大会，要求西南政府敦促蒋介石南京政府出兵抗日。与此前后，各校学生也纷纷要求西南政府允许扩大抗日运动。中大学生组织学生军，准备参加抗日。

6月8日 广雅、中大附中、大中、女师、知用等学校进步同学发动学生1000多人前往教育厅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当局出兵抗日，取消阻碍抗日运动的会考、读经及集中军训的制度；要求出版、言论自由等，遭到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拒绝。请愿以后，部分进步同学前往珠光路珠光里开会，准备商议新的行动，事前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并以反政府嫌疑，先后逮捕前往开会的学生40多人，是为“珠光里事件”。事后，各校同学多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

大中中学利用学校放假10天复习考试的时间，又组织部分同学前往四会县宣传抗日救国。

6月13日 广州各团体、工厂、学校民众及市郊农民数万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群众高举抗日标语，散发传单，要求西南政府出兵抗日。挽救民族危亡。

7月间 “中青”的主要负责人王均予经上海到天津。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广州工作情况。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广州重建广州党的组织。首先在“中青”的成员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接着在中大、勳大、广雅等校建立了8个支部。又在东莞、新会、中山、高要等县建立了支部。12月成立了中共广州市委，党员100多人，由王均予任书记。

在此前后，中共北方局派薛尚实到香港，了解西南当局“反蒋抗日”的情况，同时重建广东党组织，恢复党在西南的白区工作，薛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又通过由他发展入党的中大学生党员张直心在“突进社”成员中发展一批党员，8月建立中大党支部，9月，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全省的工作，中大两个支部分属“市委”、“南委”领导。从此，广东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中共组织的直接领导。

7月19日 由于蒋介石的破坏、收买，陈济棠部属倒戈，陈济棠被迫宣布下野出走香港。蒋介石扶持余汉谋上台，统治广东。陈济棠出走前一天，中大爱国学生抗日救国积极分子冯道先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7月底 学校放暑假。广州长堤基督教男青年会组织学生进行歌咏活动。在中共广州组织的领导下，“突进社”、“中青”等秘密团体的成员利用这一公开阵地，推动举办“广州民众歌咏团”，大唱抗日救亡歌曲，还秘密组织了读书会，从事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参加“歌咏团”活动的有1000多人，除大部分学生外，还有青年工人、店员、教师、职员等。歌咏活动很快就遍及各学校、工厂和农村。这是广州青年自“一·一三”荔湾惨案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公开形式开展抗日宣传的活动。

8月 经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分头联络发动，广州文化艺术界有关社团和人士约六、七十人在白云山黄婆洞树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以文化艺术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同月 何思敬等人带领“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分会代表团”到广西，推动李、白反蒋抗日，广州学生界代表邱萃藻、谭本基、杨谨英、罗范群、方少逸、张凤楼、刘秉均等人随团前往。

中大的钱兴、龙世雄和陈伟、李德和、李家鼎等人成立秘密团体“抗日救亡前哨社”。陆续在中大、中大附小、中山纪念中学等校及工人、教职员、龙眼洞乡进步青年中建立小组。组织发动青年参加“歌咏团”活动及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

暑假 北平民先队队员于光远应邀来广州岭南大学执

教。并负有在广州发展队员的任务。11月先后发展仲凯农校的杨明、凌云衢，中大李康寿、霍赐影及大众、开明、生活等书店店员加入民先，但未成立广州的民先组织，主要是组织学习、歌咏等活动。曾到河南纺织厂女工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民先队的历史。翌年初，因一队员被国民党特务搜出他们的联络笔记本，在广州的民先队员多人被捕，于光远撤离广州返北平。

“突进社”等秘密社团的进步青年利用中大校方设立的“乡村服务实验区”，在中大附近石牌、岑村、长湴村、龙眼洞等地办农民夜班、拉丁化新文字实验识字班，通过自编识字教材及歌唱抗日救亡歌曲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对启发农民抗日救亡思想和培养该地农民抗日骨干有一定的影响。

9月 勳勤大学搬迁至石榴岗，勳大中共支部通过“活路社”及其他进步团体，团结广大的同学开展歌咏、演剧、诗歌，以及新文字、世界语学习等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并出版秘密刊物《活路》、组织乡村服务社。到附近乡村办夜校、识字班，进行演剧、歌咏等活动。作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10月 在各校普遍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活动的基础上，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统一会议在文明路中大旧校召开。勳勤大学黄书光被推任会议主席。经过讨论后较顺利通过了统一的方案。

11月 在中大中共组织负责人钱兴等人的联络发动下，“中青”、“突进”、“抗日救亡前哨社”等团体的代表在中大开会。决定联络统一中大校内各进步组织。成立秘密的“中山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对外仍用“中大学生救国联合会”

的名称。协会的主要任务除推动中大学生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外，还团结发动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校内公开举办的“乡村服务实验区”的工作，以为农民办夜校、教唱歌等形式，团结贫苦农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1月8日 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联络文化团体在文明路中大旧校礼堂举行广州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广州民众歌咏团、世界语研究会、大众文学社、锋社等数十个文化团体和大、中学生1000多人参加会。会上，中大学生黄焕秋、金昌华、岭大教师于光远等人登台演讲。追悼会变成了控诉国民党罪行的大会。“抗日救亡前哨社”的成员连夜刻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告同胞书》，呼吁同胞团结一致抗日，以实际行动纪念鲁迅，并在会上分发给到会的群众。

11月19日 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开会追悼爱国学生、抗日积极分子冯道先。会场内挂满教授、学生写的挽联，大会决定集资为冯道先营葬建碑，刊印遗作，发行纪念专刊。连日来捐款者极为踊跃。

同日晚，广雅中学歌咏团演出时，向同学提出发起募捐援助绥远抗日将士。

11月26日 中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全体工作同学及上下元岗村民举行援绥宣传大会，以使广大农民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及严重的国难，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在石牌长湴乡工作的同学及村友，实验区办事处职员，石牌区歌咏团团员等400多人也前来参加大会。

11月28日至30日 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联络市内各话剧团接连3晚联合公演筹款援绥。“艺协”、“蓝白”、“锋社”、“广雅”、“市一中”、“蓓蕾”等12个剧团参加演出。



11月底 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被蒋介石反动政府逮捕。中大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发动全校各团体召开大会。并组织签名活动，写抗议书，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被捕的一切抗日人士。

与此同时。“全救会”的代表韩孚秘密前来广州。同中大“救协”领导成员和主要骨干二三十人开会，介绍了上海和全国的时局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12月16日 “西安事变”在广州各校青年学生和秘密团体的进步同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广州学生方面的负责人方少逸、张克明等人创办《在抗战旗帜之下》半月刊，发表《陕西事变与我们的任务》、《履行抗日诺言，此其时矣》等文章，宣传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该刊物不仅在市内公开发行，还发行到外省。

年底 中共“南委”根据共青团中央1936年发出的关于改造共青团的通知精神，指示中共市委解散“中青”组织，同时，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又称“地下学联”）。由中大的黄泽成、广雅的李士洋、勤大的黄书光等几校代表组成领导机构。地下学联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各大、中学校进步学生，争取各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同官办的“广州市学联”相对抗。“地下学联”内还由罗范群、李士洋、黄书光等人组成党支部，书记罗范群。中共广州市委派邱萃藻负责领导学联的工作。

## 1937年

春 中大党支部和“突进社”为将来进行武装斗争，在东山柏子路萃林园“准庐”举办一期游击训练班，“南委”负

责人薛尚实请云广英同志讲游击战的课程。参加学习的有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南京中学等校同学和“突进社”社员，学习班历时半个月结束。

5月 温盛湘、张寿南、叶焜寰、梁淇俊等“中青”成员创办《游击队》半月刊。并在书店公开发行，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夏 中共广州市委决定由罗范群、李木子、张定邦3人组成“学工委”，专门负责学生运动及各校的党员。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郊区芦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是为“芦沟桥事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在广州，首先由中大、省一中、市一中等校员生发出通电，援助二十九路军抗战。广东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积极争取把过去学生抗日活动秘密的方式转为公开合法的方式。派出党员和推动进步学生参加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的暑期工作，并组织学抗会暑期临时工作委员会，同时根据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余汉谋、谌小岑、钟天心等的统战工作，以公开合法形式组织“御侮救亡会”、“省妇女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等群众抗日团体。1938年1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从此，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执笔：陈家文）

书名

前言

目录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刘智莹 黄穗生  
回忆录

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曾生

“一二·九”前后在广州勳勤大学参  
加学生运动的回顾&邹？

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回  
忆&刘汝深、温焯华、温盛湘、谭丕桓、叶  
焜寰

“一二·九”前后广雅学生参加抗日  
救亡运动的片断回忆&莫福枝

“一二·九”运动前后大中中学学生  
运动的一些情况&董世扬

回忆女师“一二·九”前后学生救亡  
运动的情况&梁绮

市立第二中学学生响应“一二·九”  
运动的情况&梁锦文

在广东纺织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岁月  
追忆&钟华

关于珠光里事件的回忆&阮群英

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新篇章——纪中  
山大学乡村服务实验区&黄焕秋

我所知道的中国青年同盟&温焯华

三十年代突进社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张  
直心 杜埃 刘天行 黄焕秋

追忆马列主义行动团&杨康华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与广州学生运动片  
断回忆&方少逸

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点滴回忆&梁嘉

广州反帝反封建大同盟片断&王文魁

回忆社会主义青年行动团&李康寿

行社读书会与广雅中学学生运动&李文  
浩

我所知道的力社&杨康华

回忆“一二·九”运动前后广州建党  
活动经过&王均予

抗战爆发前勸勤大学党组织概况&李木  
子（锦波）

三十年代广州学运及地下党斗争情况  
片断&李士洋

在省立女子中学参加中共组织前后情  
况回忆&余慧

回忆教忠中学党支部的建立及活动情  
况&王磊 张江明 袁鸿飞 方学 林榆  
陈坤仪

人物传记

冯道先传略&黄穗生

邱萃藻传略&温盛湘

钱兴传略&禔倩红

历史资料

悲壮的民族叙事诗&何思敬

荔湾惨案发生的前前后后&穗芒

广州学生的怒潮&怒潮  
论革命策源地的学生运动&杨益清  
我在广州国立中大时&邓初民  
各报有关广州学生运动的报道选辑&黄  
穗生  
“一二·九”前后广州学生运动大事  
记&广州青运史研究室